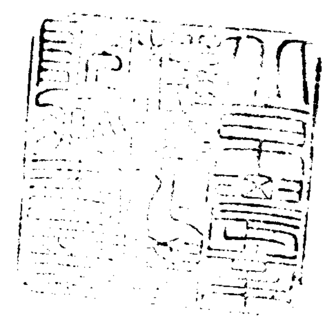
包惠僧回忆录

包惠僧回忆录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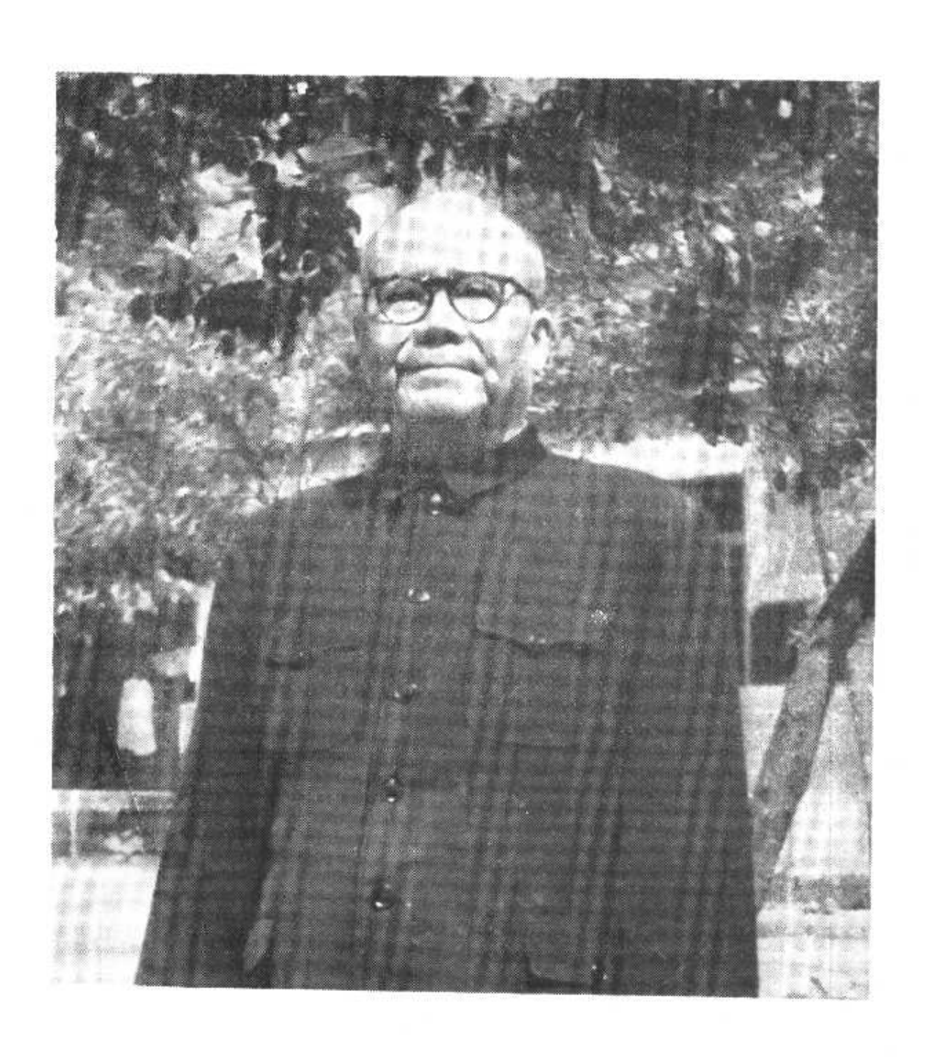
封面题字：国　石
封面设计：钱月华

包惠僧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28,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11001·517　定价1.70元



目　　录

回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一)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我正在休假的开始，中宣部李兰天、杜民两同志来访，据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一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李兰天同志说：关于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搜集的很少，只有李达写过一点也很简短。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是事隔三十多年，完全靠记忆要写出当时全部的活动是很难的。我和李同志谈了一点大概的情形，他提出要写如下的三个问题：1、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回忆；2、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回忆；3、北京区的工作回忆。李同志的问题倒提得很具体，不过要把这三部分的历史事实写得很全面，仍然是不容易的。我经过几天的回忆，就这三个问题和我在当时的经历与所见所闻，不问事之大小，有无历史上的价值，都写出来，提供中央负责同志选择与参考。本文所记情形如与当时事实稍有出入，请有关同志予以修正与指导为幸。

包惠僧

1953年8月20日

于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本寓

一九二〇年秋天，第三国际的代表之一马迈也夫到武汉。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我同他作过两次长谈，知道俄国革命后

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不久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他鼓励我到莫斯科去学习，因此我就写信给临时中央请求去莫斯科学习，中央答应了，但一时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成行。同年的冬天，上海经济来源断绝，武汉的几个同志如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眉轩（他不久就脱离了）等都回家过农历年，我一人在武昌几乎无钱举火。我把武汉的工作结束一下，写信告诉陈潭秋，我即带着三个青年团（当时简称 S. Y.）员到上海，作去莫斯科的准备。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部。见了李汉俊，才知道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回国了，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到广东去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备科校长。中央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由杨明斋负责，并不经常出稿，办了一个俄文补习班，由杨明斋任教，约有十几个学生在那儿学俄文，这些学生中我记得有刘少奇、许之桢、傅大庆、李启汉、罗亦农及彭述之、卜士奇等。当时去海参崴的船还不通，经过大连、满洲里到赤塔，的路也不通，去莫斯科的计划，一时没有办法。李汉俊留我暂在中央工作。中央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由我同杨明斋负责，主要的工作是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办俄文补习班，并参加上海的一些宣传组织活动。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还是一九二一年春天才加入，沈泽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李士林）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才加入。最初的工作是参加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的组织活动。四月间送了一批学生赴苏俄留学，是由海道到海参崴，再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我记得刘少奇及彭述之、卜士奇等是这一次去的。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上海天后宫举行了集会，在各报上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发了几种传单。这一次的五一劳动节虽然没有发动广大的

劳动群众，但在中国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会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①]统治上海的反动当局为这一次的运动震动了，法国巡捕房派了武装巡捕搜查了我们的机关部（渔阳里六号），住在六号一部分准备留俄的学生也搬走了。李汉俊也有点打饥荒，他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要我到广州去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

约在五月底我到了广州，见了陈独秀，报告了上海的情形。陈独秀说：上海无工作好做，广州的工作很多，你就暂在广州工作。于是，我就住在新兴马路（城内大新公司旁边）《新青年》杂志发行部，在《群报》（《群报》是受党指导，陈公博任总编辑）任撰述，并派我在宣传员养成所当学监（尚未到差）。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行前陈独秀同我说：大会后你还是回武汉工作，你在武汉工作比较有作用些。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渔阳里六号，后迁到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这是临时租定招待各地代表的地方，租房子的名义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在开会时统计出席代表有七个地区，共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开会的地址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门牌号数记不清，可问李书城夫妇）李汉俊家。各地区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后即进行讨论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这两

---

①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当为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编者

个问题占了这次会议主要的部分。会议进行到第四天，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一个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揭开，一只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说一句："对不起我走错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即刻解散。"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过了约在两个钟头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你们走了不过十多分钟，陈公博还没有走，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李书城)的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党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此处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便进行选举，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

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马林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时间比较长，李克诺斯基谈了一点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马林口若悬河，词令甚好；李克诺斯基好象是个工人出身，说话很简短，也没有讨论到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经济来源和开支情况由张国焘一手包办，也没有在大会上和委员会上作过报告，开支代表的旅费，也是由张国焘一意为

之，也没有人过问。这样的做法，我们都不满意，但也没有明白说出来，除了开了会就各回原处的代表们以外，留在上海的周佛海、李汉俊、李达和我都有同样的意见。

大会结束以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这个组织并没有经过大会讨论过，出版一种《劳动周刊》，发行的对象是各工厂的工人，由张国焘、包晦生（我的化名）、李震瀛、李启汉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开支很大，收效不多，后来又加了董锄平，许白昊，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展开了纺织厂、香烟厂、各印刷工厂的工人组织活动，在闸北叉袋角（译音）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由我同李震瀛、李启汉轮流去上课。

当时的工作情况比代表会议以前是有进步，可是我们的工作仍局限于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政治上的作用不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那是太不够了。马林对我们提出了意见：要我们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当时李达、周佛海等对马林的意见很不高兴，以为这是看他们不起，张国焘没有表示意见。经过了一次会商，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派我到广州去请陈独秀回上海。我即马上动身坐海船到香港改乘火车到广州。见了陈独秀说明了上海各同志的意见。他即决定辞职赴沪。我们回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同马林会面，谈了几次，意见未得一致，因为陈独秀是个最重感情的人，他听了我们同志间先入之见，也以为马林是看不起中国党。正在僵持当中，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言次不同意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他并准备介绍我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他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此时张太雷也到了上海，他经常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下午（约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十月之间），我到陈独秀家想问

问他同马林再次会谈的结果。一会儿杨明斋、柯庆施（他此时还是青年团团员）也来了。我们在他的楼下客厅里闲谈，陈独秀还在楼上，忽然有人打前门（经常是走后门），我们开门一看，来人说会陈独秀，我们认得这几个上海白相人打扮的人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就说，陈独秀不在家。他问我们为谁，我们答应是客人。独秀听着人声嘈杂，知道出了事，下楼来想从后门出去，但是后门已有武装巡捕把守，不准出门。他只好回到客堂同我们坐在一起。接着，进来了四、五个便衣侦探，七八个武装巡捕，问我们哪个是陈独秀？我们都说：陈独秀不在家。我们一一报了假名（陈独秀报的假名是高坦甫）。他们守着我们，随即开来了两部汽车，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走上了汽车，一会儿到了薛华立路法国总巡捕房，在候审室等了约两个多钟头，并到技术室取了我们的指纹。邵力子、褚辅成（他两人当天就释放了）也都从陈独秀家里解来了。褚辅成同陈独秀见面就说，我刚到你家就被押解来此。于是，陈独秀就不得不承认是陈独秀。这一次被捕的有陈独秀及他的夫人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我。我们坐了四天洋牢，经过了保释，打了官司，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罚了款，这一段公案算是完了。过了两天，陈独秀来找我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从他的这一段话，我了解他出监以后同马林会商，意见已经一致了，他也不坚持他的反对职业革命论了。

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弄堂里，租了两处房子（详细地址记不清了），李启汉、李震瀛住在里面，张国焘和我是另外在外面租的房子。我住在公共租界马霍路马德里三号楼上，算是《劳动周刊》的通讯处，收件人是鲍一德，也是我在当

时的化名。不久设了三个支部，即北京支部是罗章龙负责，广州支部是谭平山负责，长江支部在武汉是我负责，后来在长沙设了一个支部是毛泽东负责。

陈独秀回到上海，马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联合国民党，发动我们的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共产党的分子都是一些不满现状纯洁天真的青年；都把国民党看成是堕落腐化的集团，如果这个问题提到党中作民主讨论是很难通过的。因此，最初没有提出讨论过，只是在马林与陈独秀的默契之下，由马林去找孙中山商谈。约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我在武昌接着张太雷从芜湖发来的电报，要我某日到怡和码头接船。届时，我去接船，接着了，是张太雷和马林。他们说：在汉口不耽搁，马上到粤汉路买火车票南下。因为坐海船到广州，必须经过香港，怕英国鬼子捣麻烦（据说马林曾在香港被驱逐出境过）。所以，从粤汉路走较方便（其实粤汉路此时还没有全通车，此行到湖南砰石，再改乘轿子到韶关，再在韶关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走起来并不方便）。我们便叫了一只小船过江到徐家棚车站，买了票送他们上了车。这就是马林第一次访孙中山于广州，即是中苏友好的开端，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开始。

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间，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是很显然的，我和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等对他都不满意。接着，张国焘即以北大同学为基础搞了一个党内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在北京、上海发展很快，武汉也很厉害。当时李汉俊、李达被开除党籍，我被排挤，多半是小组织的作用。张国焘当时是组织部长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又有北大同学的班底。他在党内专横跋扈是很露骨的，他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

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

一九二一年初冬，我奉派回武汉主持党务。经过半年的时间，党团都有相当的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汉口人力车夫工会是在人力车夫总罢工之后组织起来的，由施洋负责。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由李书渠负责。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江岸总部及郑州以南各站都有组织，由项英负责。其他如扬子铁厂、汉阳兵工厂都有秘密小组，工作顺利。当时武汉机关部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五号楼上，住在机关内的有陈潭秋、陈荫林、刘子通、黄负生夫妇及我。《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部就在此处，是刘子通、黄负生负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亦附设在内，活动和范围是武高一师、一女师和武汉中学。约在一九二二年春，长沙劳工负责人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枪毙了，我党声援黄庞惨案，曾在长沙发动罢课示威活动，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赵恒惕下令缉捕，毛泽东曾避居武昌，即住在黄土坡我们的机关内部，我们住在一起约十余日，我同毛泽东从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后，也常有接触，要算这一次接触的时间最长，谈话的时间较多，我对他的印象也最深。

我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国焘磨擦很厉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前，中央有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来信署名“钟英”，“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

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这样性质的信照例应该是陈独秀亲笔，所以我接到这封信，就联想到小组织捣鬼。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同年约在七月中，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举行全路筹备大会。张国焘带着林育南、许白昊两同志来出席，我认定林、许两同志是小组织分子，我即利用工人作武器不准林、许出席，当时我以为这是打击小组织，今天检讨起来这当然是我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不久，中央调我到北京交通部工作。过了几个月，在北京同蔡和森谈起，和森说：张国焘由郑州回到中央坚持要开除你的党籍，争论了很久，仲甫才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之未作决定。过了几天，仲甫到莫斯科去了，就搁下来了，到现在（仲甫已回国）中央才决定只调你离开武汉和京汉铁路，不另作处罚。我想起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只调开原工作岗位不加处罚，可见当时中央反对小组织的人很多，但毕竟把我调开原工作岗位，可见张国焘在中央的力量之大。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北京区党委改选，我和范鸿劼、张昆弟等当选了区党委，何孟雄、安体诚当选候补委员，决定范鸿劼任委员长，我任秘书（其余分工情形记不清楚）。约在一九二三年一月间，鲍罗廷随加拉罕大使来北京，鲍罗廷约北京区负责同志会谈，地点在俄国大使馆。参加这次会谈的人有李大钊、范鸿劼、张昆弟、安体诚、何孟雄、刘仁静及我。鲍罗廷问了一些北京的工作情形后，就开始讲了一大篇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最后归结到共产党员都需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除了李大钊没有表示意见外，我们都是表示反对的意见，我们当时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党，与那一些上层干部的堕落腐化，中下层干部少而无能，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任何群众，不配同我们共同革命。经过很久的讨论，始

有人提出：1、党外联合；2、取消国民党加入共产党；3、重新组织混合新党。还有其他的意见。最后，鲍罗廷很沉着地说：民主统一战线在目前是很重要的，采取如何方式，这是技术问题，同志们好好地研究讨论提意见到中央再作决定。这个会是下午八时开始到午夜一时才散会。

一九二三年夏天，中央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北京区要选举一个代表出席，北京区张国焘小组织力量很雄厚，我是以反对小组织著名的当然不能当选，反对小组织的人也不少。还有一些中间派，何孟雄原来就是中间派之一，经过了一场明争暗斗，结果是何孟雄当选，小组织方面算是失败了一次。过了几天，高君宇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提请区党委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选派工人代表出席全国代表会议及胡鄂公（号新之，国会议员，他组织一个共产主义今日派，因得不着第三国际的支持，故请求入党）的问题。党员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先讨论胡鄂公入党问题，争辩甚久，算是否决了。其次讨论选派工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先由高君宇说明中央的意见要北京区选一个工人同志当代表，要把何孟雄当选代表的原案推翻另选，罗章龙抢着发言，应照中央的意见另行改选。我们听了这个报告就明白这是小组织捣鬼，我们提出反对意见：1、北京区增选一工人同志出席全会我们同意。2、推翻何孟雄当选原案另选代表，我们反对。我们并明白指出，如果推翻何孟雄当选原案另选代表，无论何人当选都是小组织操纵，就是违反党纪。会场中，也有很多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小组织方面利用他们有组织的阵容，几次提出付表决，我们因为反对的意见还没有集中，主张延长讨论，我同何孟雄都站在桌子上叫喊“反对小组织的诡计”，“反对小组织操纵选举”，“维持原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范鸿劼、刘子通，京汉铁路工人同志王俊等原来是站在中间的，最后也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罗章龙也有几次站在桌子上喊

"要选工人同志当代表","服从中央","付表决"。到了深夜三点才辩论终结,提付表决,"维持原案"多数通过。小组织活动又算是受了一次打击。这次会是在北大第三院一个课堂里举行。出席会议的党员约在五、六十人以上。从头一天下午八时起至次晨四点半钟才散会。散会后,何孟雄、缪伯英到我住的公寓来,很亲密地握了手谈了一下才散,何孟雄从此也成了反小组织的健将了。

…………

我在北京工作的两年中所知道的:守常对党的一般活动不大参加,也很少出席党员大会,如有较重大的事就由他代表党出面。如维经斯基第一次到中国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守常因孙丹林、白坚武的中介,曾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作过商谈。吴佩孚在一九二一年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就是守常与吴佩孚会谈的结果。一九二二年党派了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和我五个同志到交通部任职,发动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路的工会组织活动,也是守常的上层掩护。守常同蔡孑民先生的关系很好,他对外的政治活动,常把蔡先生拉在一起。有一次,我见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接谈间,次长劳之常进来,高向劳介绍说,这是包一宇(是我的别名)先生,是蔡孑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见我们到交通部还是拉的蔡孑民先生的关系。其实是守常之所为也。在这一两年中,我们的工作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得很快,如京汉铁路优秀工人林祥谦、津浦铁路工人王荷波、京奉铁路工人邓培等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很大,对全国铁路工人的启发与领导尽力独多,皆守常计划之力也。距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不过一年多的时光,"二七工潮"爆发了,林祥谦殉难,全路被屠杀的工人约数十人(江岸被屠杀者三十余人,其余各站都有死伤,细数不详)。这个血淋淋的事件,是吴佩孚亲手造成的,这一事件说明了反动派军阀的本性。而"二七工潮"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型范

例，使全国千百万工人同志认识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死亡的善后，失业的救济，是我们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援，树立了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二七工潮”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在世界劳动运动史上亦成为重要的事件。

在我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期，北京方面由守常代表我们的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他经常与顾孟余、李石曾等及北大的一般的同学密切联系，他在这个新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领导的作用。

自“二七工潮”以后，京汉铁路工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粤汉铁路工会及汉口各种工人组织也受到影响，党与工会之间有些裂痕，党内工作同志项英、李之龙、廖乾五与林育南、许白昊之间发生冲突。李之龙与林育南在汉口法租界熊晋槐住宅楼下廖乾五处打了一架，都报告到中央。中央为整理武汉的党务工作和工会工作，调我回武汉工作，并把林育南调开。我接到中央的通知很犹疑，因为北京区的工作刚刚走上轨道，小组织的风浪也很平静了，加以我的爱人夏松云在唐山扶轮学校教书，我在北京工作可以互相照顾，北京区的同志也不愿意我离开。我即写信给陈独秀表示不想回武汉。不久，陈独秀复信不准，并教我刻日动身，先到上海商量一下，再回武汉。项英也接二连三来信促我南下，这就不能由我不去了。约在旧历重阳前后，我到了上海，先同瞿秋白、蔡和森谈了一些北京的工作情况及曹锟贿选的一些情形，也谈到小组织问题。陈独秀和我谈了几次武汉的工作问题，他要我把党和工会整理一下，工作同志适当地调配一下。我在上海住了四天即动身到武汉，武汉的机关部在日本租界，项英及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周天元、黄子坚住在里面，还有一个女同志、陈云卿夫妇，她是在英美烟厂做工，也住在一起，一个秘密政党的机关内住的人这样复杂，我认为危险，但是项英是工人出身（他原是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很相信工人，他这样搞惯了，也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我也只好同他们住在一起。

我到汉口后，首先进行改组区党委，我们正在开会改选中，项英接到中央一封信，大意是要我负责武汉区国民党改组工作，希望李隆至（立三）负党的责任，这是同我在上海与陈独秀当面谈的完全相反。我即把来信当会场读了一遍，也把我在上海同陈独秀谈话内容向大家报告了，我没有作结论，大家也了解这又是小组织在起作用，于是进行选举（票选），结果我的票最多，许白昊也当了选，李隆至落选。我们即把区党委会组织起来，我任委员长（即书记），许白昊任秘书。工会方面，人力车夫工会照旧（吴樊、一狗、袁告成负责），京汉铁路工会仍由项英负责（自“二七工潮”后，京汉铁路工会秘密活动），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改由李书渠负责（原是刘易华），一切部署定了，报告中央也批准了，复信中指定李隆至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一切工作上了轨道，我自以为总算不错。一九二四年春，林祖涵至汉口，主持国民党汉口市及两湖的改组工作，我们也会谈过几次。约在四月间，中央召集扩大会议，要我前往上海开会，我到了上海同陈独秀见面谈了武汉的工作。他说我排斥异己，我说他袒护小组织，我质问他既调我到武汉去整理党务和工会，为什么又要我去搞国民党的工作？他同我吵起来了，他骂我骂得很苦，我同他是师友之间的同志，我一向尊重他，我也不能象他骂我的那样骂他，我抱着满腹委曲就哭了起来，适逢沈玄庐、杨之华来了，把我们解劝开了。第二天在扩大会议席上，陈独秀郑重声明，党内没有什么“小组织”问题，即有也是过去的事，以后不准任何人谈这个问题。当时我虽满怀委屈，因为尊重陈独秀，只好忍着不作声，准备回到武汉再写信给他说明我的见解。这一次出席的同志，我记得湖南是郭亮，浙江是沈玄庐，上海是张秋人，还有很多人记不清楚。扩大会议只开了一天，开完了会我即动身回武汉，我头天晚上上船，是张秋人送我上船的，第二天早晨上海各报专电载称：“汉口德润里二十三号共产党的机关被破获，刘伯垂、许白昊及工人杨德辅被

捕(后解洛阳),包惠僧、项英、廖乾五在逃……"中央得着这个消息即派王荷波坐火车到南京赶我的船，阻我西上，我当时犹疑了一下,对荷波说:我还是要去看看情况,看今后工作如何作,我的老婆孩子还住在德润里二十三号,也要设法接出来,我坐的是怡和公司的船,从英租界上岸,上岸住在英租界福昌旅馆当无危险。荷波也同意。我到了汉口,住在福昌旅馆,找着了夏松云(我的爱人)，知道项英、廖乾五平安脱险，刘伯垂、许白昊被捕，以后的情况不知道。汉口的风声还是很紧,据说这次问题的发生,可能是周天元告的密,刘伯垂在清芬二马路的律师事务所也被查抄了,汉口是无法立足。第二天,我就坐日本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几天,陈独秀来同我谈,他说:武汉的工作暂时停顿一下,项英、廖乾五有信不日就来,广州需要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工作,你就准备到广州去工作。我只好答应，不久我们夫妇同谭平山、周佛海结伴到广州,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了几个月的干事,就转到黄埔军校干军事工作(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参加党的组织工作及劳动运动工作,与陈独秀也断绝了来往,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他在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才见面。后来我还同他谈起张国焘小组织问题，他也承认,并很感慨地说，经过了大的变乱，认识了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叛变后逃到武汉，独秀也住在武昌，国焘常去找他，独秀对他很冷淡。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二）

一、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

五四运动以后约在一九二〇年春，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随苏俄大使尤林来到中国，由北大俄文专修馆的一个俄国教授鲍立维的介绍，见了陈独秀、李大钊等，谈了几次中国革命问题，因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常住上海，维经斯基同杨明斋也到上海。上海方面参加新文化运动并主张改革中国政治的除新青年派(《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当时被称为新青年派)外，还有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时事新报》(研究系的报纸)主编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由陈独秀介绍同戴季陶、张东荪见面，会谈了好几次，对中国政治改革有些共同的意见，最后发起组党。但张东荪是标榜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戴季陶有点河上肇那一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主张议会政策的（李汉俊也是这一派的思想)，陈独秀、维经斯基是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走俄国的路，完全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训来发展中国的革命，在《新青年》杂志上，曾发动对张东荪等改良主义的论战，结果张东荪、戴季陶退出了这一活动。沈玄庐、李汉俊等站到陈独秀这一边来了。张东荪仍以研究系的面貌办他的《时事新报》，戴季陶因为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失败回四川，船到宜昌，他曾投江自杀遇救，最后他成了共产党的敌人。《星期评论》由沈玄庐、李汉俊等接办了几期也停刊了。

约在同年的夏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部署也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临时中央通讯处是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苏新甫转，重要的文件及工作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处。同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介绍郑凯卿（文华书院的工友，是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到武汉讲演时结识的）和我作他的助手。刘伯垂回到武汉，即找董必武、张国恩（他不久就脱党了）、陈潭秋、郑凯卿、赵子俊、包晦生（包惠僧）、赵子健等商谈，都同意加入共产党，即以上述这几个人为基础成立武汉临时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开的，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经常在机关部工作。张国恩管钱，租定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亦挂在此处。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等，并带来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及有关苏俄革命的小册子。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及关于巴枯宁、克鲁包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

记。大家都很喜欢读。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同年冬季，李汉俊由上海回家路过武昌，我们集会请李汉俊讲《唯物史观》问题，也是在抚院街董必武寓内举行的。李汉俊常说：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不是一样的，如在法国为工团主义，在英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为I. W. W.，在俄国为布尔什维克。当时，大家听了以为很新奇，其实除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相同之处。党支部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是在抚院街董必武同志寓内，有时是在多公祠五号开，规定每次会是要做工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是作为教育同志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执行时并没有完全做到。

当时的工作情况：党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 Y.)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这个名称在当时各地恐怕不一致，有的地方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的地方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是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的吸收及青年团团员的吸收方法，是以同志们的个人关系进行的。如陈潭秋是武高毕业，他就负责吸收武高方面的进步学生；我是一师毕业，我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刘子通在女师教书，就负责在女师方面活动；武汉中学是董必武办的，陈潭秋也在该校教书，就由他们负责活动，主要的活动是这几个学校；其他如外国语专校、中华大学及一中的学生也有些接触，但影响不大。对工人运动方面，在一九二〇年临时支部时代，还没有发动起来，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此时还没有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去，郑凯卿虽然是工人出身，他为生活关系在文华书院（教会学校，后改为华中大学）当校工，也是一筹莫展。他做了一些调查工作，陈独秀曾制了一个工人状况调查表，是郑凯卿调查填报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

过。我写了一篇《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于一九二一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过。赵子俊是个失业工人，生活很苦，后来由党介绍他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干军事工作，不知所终。

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对于吸收党员非常慎重，并没有吸收新的同志，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我也去访问过他们，恽代英我也同他谈过，李书渠、廖焕星、芦斌（陆沉）、林育南等，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同他们接触过。但他们此刻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进修，一个一个都象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李汉俊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谈过，马迈也夫同鲍立维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终没有同他们联系上。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冬天，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针对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而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我们吸收利群书店的分子林育南为武汉学生的代表出席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张国焘任团长），林育南从伊尔库茨克开会回来以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的事。接着恽代英、芦斌、李书渠、李求实等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话。青年团员的发展，也不过十几个人，以武汉中学及第一师范为最多。青年团倒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的记录，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的青年团互相通报交换经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上海青年团的报告是署名秀松（即俞秀松），天津青年团的报告署名春木（张太雷），其余各地负责人记不清楚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也不过二十多个人，会开得比较少，每次开会都是由我们轮流做读书报告或发给宣传品（如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各种小册子），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五号。至一九二一年一月间，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的经济来源断绝，我便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武

汉的工作停顿了一个时期。

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七个地区，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七月十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开会的时间，原决定四日至五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词，报告的时间很长。李克诺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两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

"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象

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会议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即令有人有右倾或“左”的倾向，但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至于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的方向，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至于李汉俊的右倾及他的堕落是以后的事。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十九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和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扛，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至于他的“左”倾及他的堕落，也是以后的事，此时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意见。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还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

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中间李汉俊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原案的"官吏"是包括从内阁总理一直到低级科员，修正案的"政务官"只是在中央的阁员，在地方的督军省长，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大家也不同意，辩论了很久，陈公博也软下来了，李汉俊虽然坚持他的意见，但是少数，最后提出表决："维持原案"占多数。经过这一场的论战，张国焘等就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李汉俊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目空一切，也不向同志们说明他的见解，仅在主观上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只有他懂，因此李汉俊就孤立起来了，也并没有什么李汉俊的一派。好象第二天的会，党纲还没有讨论完，时间不早就散会了。第三天的会，没有继续讨论党纲，因张国焘说：马林对党纲还有意见，等马林来出席时再讨论，就开始讨论"劳动运动计划"。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会议共十三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五十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马林在他的报告中，也指明这个问题。因此，大家都认定如何深入到劳工群众中去，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党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把劳动运动的计划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刘仁静，他把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讲了一大套，归结到我们的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反对职业组合，甚至说我们要尽先把

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紧要。周佛海译过一部社会问题概论，李达译过一部社会问题详解，他们对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也算是有点研究，也是每人讲了一套，都是空论甚多，接触到实际问题很少。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意见是说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较少，有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只有职业工人，还有很多手工业工人，我们的劳动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产业组合固然好，但有些职业工人没有什么产业的凭借，如码头夫、黄包车夫等就不能采取职业组合的方式了。毛泽东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辩论了很久，终于是决定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关于劳动运动的总方针也写了一个文件，大意是：(1)组织起来；(2)经济斗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福利等）；(3)政治斗争（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请愿的自由等）。这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张国焘说：马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今天讨论的结果留在下次开会时马林出席再作决定。

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

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李书城）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我即匆忙出来，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买了一点零细食物，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李克诺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地风景甚好，游人不多，我们便雇了一只大船，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经过了前夜一场虚惊以后，大家发言也精简了些，在正午一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讨论“宣言”，讨论“宣言”时，也有一些小的争论。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象是把这一段删去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约在下午六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火万家了。接着各地代表准备离沪，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汉俊住在上海，间或也参加一些写的工作，但接触不多。

三、几点回忆和感想：

1、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石，在历史上的意义很重大，可是这次会开得不够好，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当时对马列主义的修养及政治水平很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李克诺斯基同我们的接触太少。张国焘是我们和马林间的中间人，他包办一切，把持一切，他对代表们是挟马林以自重，他对马林是包围了马林而孤立了马林，我们同马林开了两次会可是没有从马林那里得到什么！马林也没有从我们代表中得到什么！即是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有机会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可是没有去进行学习。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有机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来进行了解，他一切听张国焘的，使代表们的意见与马林的意见发生隔膜，这种隔膜一直到陈独秀回沪经过了很多次的会谈解释仍没有得到一致，几致中国共产党与马林翻脸，如果不是陈独秀和我们四个人在渔阳里二号被捕，马林出钱出力援救而缓和了那个僵局，可能马林这一次到中国来是劳而无功。

2、这一次的十三个代表，多数住在博文女校，相互间的来往很少，会前没有什么交谈，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代表们的提案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开会期间听张国焘等几个人拿出什么就讨论什么。除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是事前准备好了开会时发给各代表而外，就没有什么提案。“宣言”也是张国焘在南湖船上临时提出来的，“宣言”是如何重大的事，不经过事前的研究与交换意见，如何讨论？虽然说是幼年的党，是在草创时期，也未免太草率了。

3、中国共产党得有今日，是得力于伟大的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功业，从上井冈山、十年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统一全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事实中说明了，他的学养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名著及他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明了。

他的突出的天才，优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国际帝国主义的蹂躏榨取到半生不死、残破不全的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他是有史以来历史上有数的人物，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我是一个庸人，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除此之外，我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他回到长沙负党的责任，我回到武汉负党的责任，我们为了工作也常有信札来往。在一九二二年春，长沙黄庞惨案发生，我党声援，发动长沙的学生罢课示威活动。毛泽东因反动统治当局压迫避居武汉，就住在武昌黄土坡我们的机关部内。我们同住了十余日，朝夕在一起，工作余暇我同他还游逛了几次街，有一次在长沙柏寿巷对过一个小馆子里吃了一顿，象这样的接近，我对他也没有深刻的了解。在一九二四年初夏，我由武汉调广州工作，路过上海，中央发给我五十元路费，由毛泽东发给，我见他气色不太好，身体很瘦弱，有一次我同陈独秀谈及，陈独秀说："润芝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我倒常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在省议会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遇见一次，我见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健康。从此以后，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岁月，我总以为他的健康不够好。后一九四九年我到北京看了他挂在天安门的照片，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看见他站的天安门上主席台中间的神采，才了解毛主席的健康，也就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明前途，感觉到愉快！

1953年9月20日　于北京内务部

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

第一馆方面

第一馆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地点。当时是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开会时李书城先生不在家，会场是布置在楼上。……出席的代表计有：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武汉陈潭秋、董必武，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州陈公博、包惠僧，上海李达、李汉俊，东京周佛海，共十三人。所传十二人是错了的。再加上马林、李克诺斯基，共是十五人。不过，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是大会开幕的那天，是第一天，由马林作报告，题目是："国际形势与第三国际的任务"（注：报告内容是如此，文字或有出入）。李克诺斯基也讲了话，很简单，第一天会议就完了。因为马林的报告很长，他讲完了就到了十一点多钟，所以就宣布散会。第二天会议由各地代表谈了一点各地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情况，也没有个个发言，发言的也很简单，因为在草创时期各地的工作也不多，工作方针也没有确定，工作方法也是各处有各处的方法，所以代表们的报告不长。接着就讨论党纲了，有些争论已写在我的回忆一、二两篇中，就不再重复。

第三天的会议，讨论"劳动运动计划"，也有些争执，都没有做决定。原议等马林出席会议时再做决定。

我很同意王冶秋副局长的意见，"纪念馆须全部恢复原状，……"就一馆说，当时开会的会场，我们进出会场的后门和楼

梯；我们开会的第四天巡捕房搜查前一刹那；我们逃出会场的前门；在会议席上，毛主席的座次，这一点我记不清楚，最好问毛主席自己，都应尽可能访问调查清楚，恢复原状。……

第二馆方面

第二馆就是老渔阳里二号，即现在铭德里，原是陈独秀的住宅。在一九二〇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临时中央成立时，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常到这里来，在商量发起中国共产党之初，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曾到这个地方开过座谈会。在陈独秀没去广东以前，这个地方是经常集合之所，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时间在一九二〇年冬）后，这个地方很少集会。我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此时李汉俊代理书记，所谓临时中央只有李汉俊一个人唱独脚戏。我到上海后，住在新渔阳里即现在的铭德里（北）二十六号（即现在的六号），汉俊留我在中央工作，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我和杨明斋是正副主任。我们党的集会是在李汉俊家里的时间多，在沈雁冰家里也开过会。我们记得通过沈泽民入党的一次会是在沈雁冰家里开的。当时我们通讯处主要的是旧法租界大自鸣钟对过《新青年》发行社苏新甫，苏新甫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同乡，他是《新青年》的经理。

渔阳里二号楼下院厢房是陈望道住过，楼上亭子间李达住过。李达此时正在同王会悟恋爱，……楼上的院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

约在一九二一年中秋以后，重阳之前，马林要陈独秀回上海，再商量党的工作方针，中央派我到广州去接陈独秀。我们一路回沪，没有好久，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搜查。陈独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和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我们被捕到巡捕房有三小时之久，没有承认是陈独秀，后褚惠生也被捕到

巡捕房来，我们正在技术室取我们的指纹。褚惠生（辅成）一到我们身边，就说："仲甫呀！我刚到你家里就被押解进来。"陈独秀开始承认了他是陈独秀，当时向巡捕房说："一切我负责任。"他要求释放他的爱人和我们，没有得到准许，于是我们五人一起关了监。高君曼是一个人一间牢房，我们与高君曼紧壁，还可以说话。我们还做了一套口供，独秀因为有几件重要文件在抽屉内，他懂法文，也懂些法国的法律，自己预料必然判六年至三年的监禁。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讯，高君曼准保释。她出去了，我们还押着。又过了一天，陈独秀也有人来保出去了。我同杨明斋、柯庆施三人整整关了四天，才有人来保我们出监。出监以后，据陈独秀说：马林有两封重要的信在办事房写字台抽屉内，抽屉打开了，东西翻得很乱。这两封信没有被发现，真是侥幸！

自从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房子里被捕以后，打了官司，罚了款，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所有的保证金（好象是二千元或是五千元我记不清了）和罚款都是马林拿出来的，因为这一场官司，打开了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僵局。他们的意见接近了，主要的问题是：

（1）党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援助。

（2）开始由马林向孙中山接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即所谓国共合作）。

最后，我的回忆，毛主席到过陈独秀家里，他没有在这里办过公。他在上海是工作了一个时期，地点也在……（是否四十四号孙中山的住宅待考），我于一九二四年到广州前领经费曾到过他办公的地方，时间就是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以后。

第三馆方面

第三馆是博文女校旧址，也就是校长黄兆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代表住宿之地，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

十天左右。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的。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我的回忆楼底下好象没有天井，……十三个代表没有都住在这里。我的记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象是一个人住。其余的代表好象是都不住在这里。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象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我对于第三馆的意见是：毛泽东住过的那一间要恢复原状，楼梯要恢复原状，天井之有无要调查研究。

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补充意见

（之一）

新渔阳里六号：

新渔阳里六号（当时的号数我记得是二十六号）。在一九二〇年春，杨明斋、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之初，即租定这个房子——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接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学校因为没有立案，也没有挂招牌，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一些事公开活动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即在此处，团的书记是俞秀松。一九二一年一月间，我带着武汉的三个青年团员马念一（现任武汉法学院院长，改名马哲民）、丁勒生等到上海，即住在此。当时李汉俊代理临时中央书记，由他负责。我们到上海后，李汉俊在临时中央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指定我负责，杨明斋任副教育委员，主要的任务是选择青年团的优秀分子送莫斯科留学，团员约有二十余人，也有几个信仰无政府主义，如李中、彭湃、曾平等，约在四月间送了十几个学生赴莫斯科，我记得有刘少奇、许之桢、罗觉（当时都是团员），还有彭述之、卜士奇、韩平、蒋热血等。党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如一九二一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此处是我们的联络机关，我常到此处。我记得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也到过这里。这个地方要称为我党临时中央时代工作部，我同意李达的建议，把这个地方作为是青年团原始组织来纪念是

可以的。……或者是作为临时中央时代的工作部来纪念亦无不可。

一直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在韩德街附近一个里弄（好象叫新韩德里，部位似在南城路韩德里弄十九号）租了两栋一楼一底的新房子，一栋是代理书记周佛海住，刘仁静也住在这里，一栋是张国焘住（系组织部）。李达住在韩德里（系宣传部）。这三处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新渔阳里何时退租，我记不清楚了。在一九二二年中央宣传部办了一个平民女校，是李达任校长，丁玲（蒋冰之）、王一知都是平民女校的学生，是否利用了渔阳里六号，可问问她们。韩德里即李达住所处，丁玲、王一知也常常来，她们应当也记得一些。

1954年3月17日，

于上海大厦11楼7号

（之二）

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方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约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底八月初成立的。成立之先，没有经过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完全是张国焘秉承马林的意见组织成立的，起草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大纲，张国焘召集我们几个工作同志提出讨论过。参加这个会的有我和李启汉（李森烈士，湖南江华县人）、李震瀛，还有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周佛海没有参加，因为这是属于组织部门的工作。我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词的不通俗，也可以说很费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张国焘不肯修改，他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说这是马林的意见，我们不好变

更，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不中不西的名词。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大纲也是马林用英文写了一个底稿翻译成中文，对原意修改不多，提出讨论时也没有修改，不过是宣布一下而已。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筹备，是在中央工作部进行的，地点是在韩德里附近的一个新建的里弄，我的印象好象是叫"新韩德里"，是相连的两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一栋是周佛海（住楼上）、刘仁静（住楼下），一栋是张国焘住（组织部）。我们开工作会议，是在张国焘住的房子里。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后，在北成都路距离苏州河不远的一个里弄里，租了两栋房子，一栋是李启汉住在里面，另一栋是李震瀛住。不久，董锄平（改名董冰如，现在中央劳动部工作）、许白昊也被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另外在北成都路与北四川路的中间一个当街的里弄里租了一间……作为《劳动周刊》编辑部，这里只有张国焘、我及李启汉在这里工作，是比较秘密的，我们三人经常在此开会。《劳动周刊》的通讯处是在马霍路马德里一个两楼两底房屋的楼上的一个统楼（我记得是十三号，前天去勘察的象是三号），是我住的地方。柯庆施、丁勒生也在这个房子里住过。我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二号）被捕时，就是住在这里。《劳动周刊》的收件与发行人是鲍一德，是我的化名。编辑人的排列是：张特立（国焘）、包晦生（惠僧）、李启汉、李振因（瀛）、董锄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对象是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各印刷厂的印刷工人、叉袋角纺织工人。我们在叉袋角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李震瀛、李启汉轮流住在里面，经常与工人联系，我每星期去上两次课，我是讲政治常识和劳动组合一些有关的问题，在上海本埠的工作大体如此。在全国各地的发行计划，是确立在北京设一个支部，由罗章龙负责（名义支部主任）。中间设一个长江支部，地点在武汉，包惠僧负责（名义同前）。南方在广州设一个支部，谭平山负责。我是在渔阳里二号被捕，出来约在二十日左右，时间是在十月底。十一月

初，中央派我到武汉工作，负责建立长江支部，展开武汉工运（详见我的回忆录之二）。南方支部参加了海员罢工，北方展开了铁路工人的组合，劳动组合书记部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党领导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全国总工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所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转交全国总工会负责，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即告撤销。时间约在一年半左右的光景。在一九二三年我在北京区负责，及一九二三年冬至一九二四年春夏之交，我第三次在武汉负责的时候，就没有劳动组合书记部了。

1954 年 3 月 18 日

于上海大厦 11 楼 7 号

回忆党的创立时期

武汉支部于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成立，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机关设在多公祠五号，这里是刘伯垂律师的事务所，门口还挂着他的牌子。刘伯垂是陈独秀留日时相识的，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陈叫他回武汉发展组织，成立支部。他回武汉后，就介绍我入党，同时也发展了董必武、陈潭秋入党。董老曾回忆说，我入党是李汉俊的关系，其实我是武汉支部书记时才第一次同李汉俊见面的。

李汉俊代理书记时，经济很困难，他说要成立教育委员会。一九二〇年年底在外国语学校成立之后又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外国语学校内，我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斋为副主任。一九二三年九月间，我又被调回武汉任区党委书记。

在党的一大以后，党中央让我到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我估计是张国焘受马林的指使要陈独秀回来的。马林认为，党的总书记不应当官而应回来搞革命运动。陈独秀回上海后，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当时除张国焘一人外，我们都对第三国际特别是马林有意见，认为第三国际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马林与陈独秀谈了几次话，都谈不拢，当时张太雷是翻译，经常帮马林说话。有一次，张太雷在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对陈独秀说：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第三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听后拍着桌子说：我们是独立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陈独秀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因为区声白、朱谦之曾讽刺过陈独

秀是“卢布主义”，即拿苏俄的钱。

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实际上只有一年的寿命。罗章龙回忆说，是开过会后成立的。其实并没有开过会，只是马林对张国焘说了要成立就成立了。

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

临时中央是我写史料用的名字，当时只称“上海共产党”，不叫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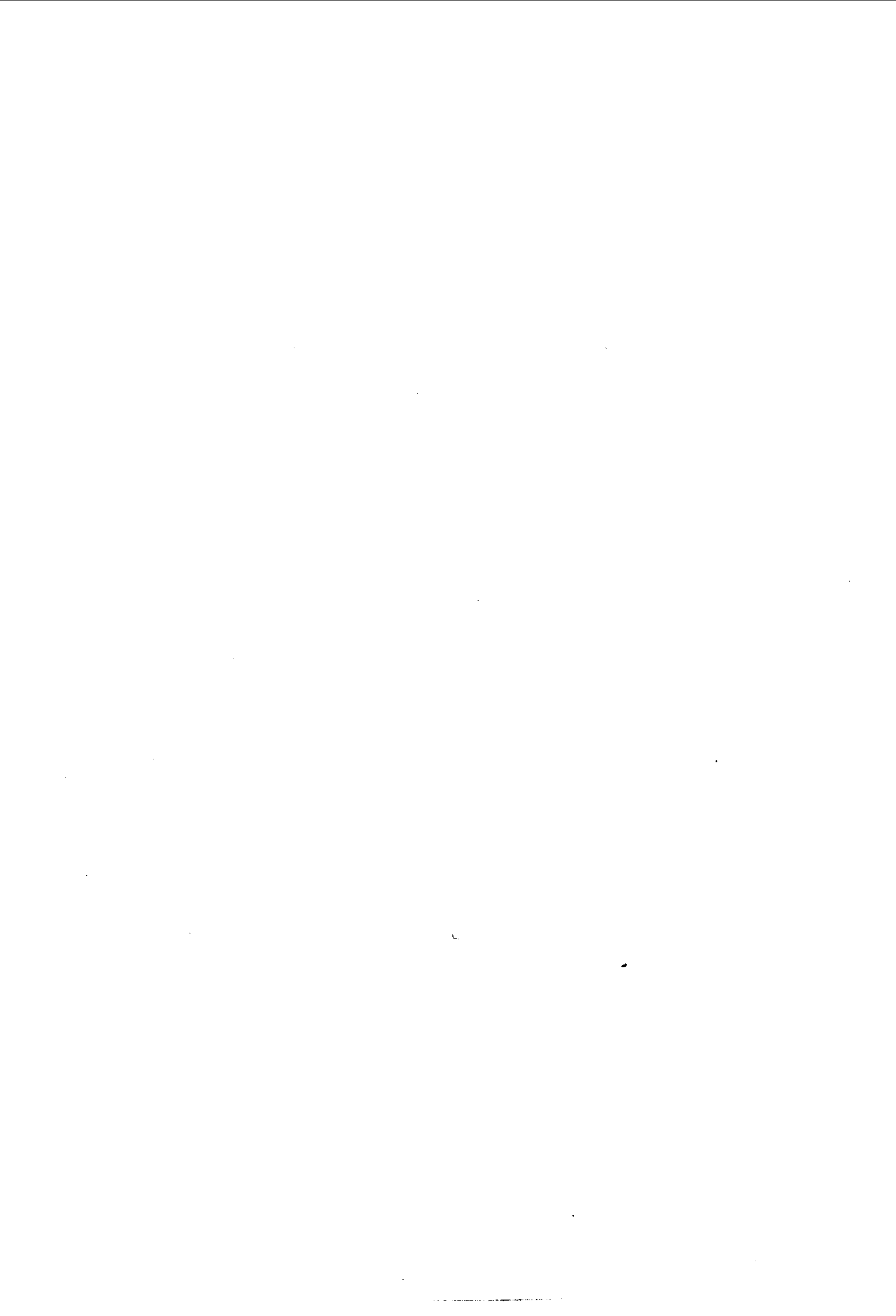
我在湖北一师读书时，叫包道享，后来又叫包一德、包悔生、亦愚、包一宇、栖梧老人。我在北京交通部工作时就叫包一宇。在上海办《现代中国》杂志时，就用亦愚的名字写文章。

我在湖北支部任书记时，与毛泽东有书信来往。一九二〇年夏曦来过多公祠五号，我见过他。我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是编《劳动周刊》的。《劳动周刊》的发起人有五个人：张国焘、包悔生、李启汉、董锄平、李震瀛。

李汉俊，湖北人，日本帝国大学工学士，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二年被开除党籍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在武汉当书记时，由我在党员会上宣布的。

李达是张国焘在一九二二年宣布开除他党籍的。

（叶心瑜访问、整理，经包惠僧本人看过。）



二七回忆录

流浪在武汉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武汉热的透不过气来。大街小巷都是屎尿淋漓，垃圾成堆，经过太阳的蒸发，就是臭气熏天，遇着一场大雨，变成屎尿横流，泥泞满地；地下的狐鼠与空中的蚊蝇，非常活跃，连达官贵人的楼台庭院也受到它们的光顾了。

当时我住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馆里，前门有便池，后门有粪坑，中间一个大天井，终年污水盈寸，臭不可当。我住的房间在天井旁边，每到黄昏时候，蚊虫撞破脸，一到天明又是苍蝇飞满室，加以铺板上的臭虫，窗檐上的蜘蛛，阴湿地上的跳蚤，真是骚扰不堪。有时候，室内发现毒蛇和蜈蚣，就更使人苦恼了！心想搞一次清洁运动，把臭虫和跳蚤镇压一下，再买床蚊帐，或可得到暂时的安静。但是事实上，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令搞一次清洁运动，又哪里能够改变这种龌龊污秽的环境！

这里是武昌最便宜的旅馆，连住房带吃饭每天二百四十个铜钱，每月仅费七串（千）二百个铜钱，合成银元不过两三块钱，因为便宜，住客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法政学生和各学校毕了业就失业的青年，还有少数打官司的乡下人。倒也是形形色色，构成一个小小的社会。

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样出房租、膳费，冷暖却有不同。法政学生多半是地主豪绅的纨袴子弟，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老板待若上宾。他们的膳食费用是整月或整季的预付，老板对他们是必恭必敬，称某少爷、某先生或称某相公、某老爷。那些失业的学生是

穷措大，膳食费是三天一交，一个礼拜一结，付不出膳食费的人，自然要受老板的白眼和冷落。甚至有的时候连名带姓叫骂一顿，以至撵赶出门，逼得那些穷苦的青年面红耳赤，不得不典当衣服行李清偿旅馆费用。古人说："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真是话不虚传！

我虽然有点零星收入，还可以按月付出膳食费用，没有受到老板正面的奚落，但是处境也并不比那些失学失业的青年好些。我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擅作威福的行为，因此，同老板发生过几次口角，同那些纨袴子弟们打过架，树立了不少仇敌。就这样在混乱中住了一年多！

一天夜晚，我又同老板吵了一架，觉得再住不下去了，就想设法迁居。我把那一天的新闻稿件写完已是午夜一时了，加上思想上的不安，蚊子和臭虫的侵袭，真疲乏极了，很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睡一觉。我想蛇山顶上没有人烟，那里或者没有蚊子和臭虫，至少比这个龌龊的小旅馆风凉一些，就悄悄地拿了一条卧单跑到蛇山顶上。

这里倒是凉风习习，寂静无声。我在一个多年不用的要塞炮台旁边的草地上，拣一块地方埋头睡下。心想：如果没有毒蛇和夜鬼来侵扰，这一睡必定要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不料刚刚入睡，脖子上好像针刺了一下似的，又痛又痒，用手一拍，打死了一个又长又大的蚊子，一会儿嗡嗡之声，越来越密，简直招架不了，这里的蚊子比旅馆里的蚊子厉害得多，不能再入睡了。一阵苦恼，便翻身爬了起来。

我在山顶上，一边缓步，一边极目四顾，武汉三镇的夜景，历历如画，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顿时把心中的烦闷，身上的疲乏冲洗尽了！汉阳兵工厂不断地向江面吐出火光，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与第一纱厂的乌烟缭绕，相映成趣，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隔江相

望，龟山在前，洪山在后，不仅是形势天然，从工商业条件来说，真是中国内地唯一无二的一个生产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总以为武汉是一个争名夺利的是非之地，罪恶的渊薮，一个堕落腐化龌龊不堪的城市，今天夜晚竟发现它有无比的美丽。心想，那些坏东西是人为的，如果有一个好的政府，有一种清明的政治，有一个好的市政建设计划，武汉三镇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精神兴奋起来，睡意全消。连忙拾起卧单，走下山来。

这时，报晓的更鸡齐鸣，街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了。路过龙王庙，忽然发现了奇迹。这个没有香火没有住持的破庙，向来是乞丐栖息之所，破烂与污秽是应有尽有的，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到这里来，这个破庙变样了：乱草铲平，瓦砾捡尽，庙门两厢虽然还是那样破烂，但是清静无哗，并没有一个乞丐。再看看庙门虚掩，左上方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上面写着："启明化学工业社"，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信步走了进去。

里面仍是空旷破落，无大变动，正殿上仍然是龙王爷的塑像，神气十足，只有左廊下睡着两个人，远看似乎是两个乞丐，走拢去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阎八士和陈治安。我把他俩叫醒了，他俩坐了起来很惊奇地问：

"你怎么来得这样早，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互相谈了别后的情况，才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回不得家乡，流浪在武汉很久，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准备做点小本生意，因为不懂生意经，又改变方针，买了两套做粉笔的模型做粉笔卖。在抵制仇货运动中，各学校都联合不用日本货，中国商人很少做这种经营，即令有做出来的，也像石头一样硬，写不出字来。他们利用在学校里的一点化学知识与做手工的经验，来搞这种行业，做出成品不比日本货差，比中国商人做的好，更以抵制仇货，提倡国货，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下，以学生的身份，

亲自拿着粉笔到各学校商店推销，几乎把武汉各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下来了，竟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两三个月之间，除了吃喝成本，还净赚了二百多块钱。因此信心十足，满想大干一场。正好找着这个破庙，挂出那样一个招牌，还准备招股，扩大经营呢！

"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油墨和浆糊了。"阎八士有些兴奋又有些难为情地说。"当初我们不过是谋个饭碗罢了，想不到学政法的倒办起实业来了！"

我也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古怪现象，一个人要存在下去，不得不在夹缝中去讨生活。

接着，他俩又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从买原料，制成成品，向各学校商店推销，都是他俩自己动手，照说成本低，应该利润大；但是由于在市场上没有信誉，各学校一贯都是用日本货，日本货一般地说比中国货好，所以制成的东西推销比较难，几乎赔了钱。五四运动以后，展开了抵制仇货运动，在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的支持之下，国货抬了头，他们半年多的积货在一个多月当中便销售一空，还有很多学校、商店继续来定货。

阎说："我们想从这一方面或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你能够加入我们的活动吗？能出钱也好，能出力也好，就是不出钱不出力，能够出一个名作为启明化学工业社的发起人，在精神上支持我们也好！"

我说："我也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想奔赴光明，但不知哪里有光明，我当新闻记者也是为了生活，同你们做粉笔卖是一样的，就我所知道的，时中书局是失业的学生办的，利群书社也是失业的或者将要失业的学生办的，这都是不安于现状又找不着出路的一群，国家不管我们，社会不管我们，我们为了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干起来，你们干吧！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给你们当股东没有钱，当学徒吗？那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一世无成。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

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黄鹤楼，两足踢翻鹦鹉洲，象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这个世界改变一下，越快越好，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耐心，象苦行僧似的，搞这样的行业。人生几何？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得到一个清平世界啊！”

阎问道：“你的终南捷径是甚么呢？”

我说：“揭发社会的黑暗！”

阎问：“你的武器呢？”

我说：“一枝铁笔！”

阎问：“一个人一枝笔能够起多大作用呢？”

我说：“这就看事在人为了。总之，这个社会不改变是不行的。”

阎说：“你的想法太不现实，不过同利群书社那些朋友有些相同。”

我问：“他们如何做法呢？”

阎说：“那说起来话长，你最好是去访问一下，也是一个新闻材料。”

我说：“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我也知道几个，我以为他们同你们和时中书局是一样的，他们真有与你们不同之处吗？我真要去访问他们一下。”

阎说：“你要我们介绍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用不着要人介绍。”

阎说：“他们对你不会说实话的。”

我说：“等到需要你们介绍时我再来找你们。”

谈到这里我就准备要走，他们拿出一份启明化学工业社的组织大纲及招股章程给我，要我替他们作义务宣传，并要我同他们常来往。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之后，又对这个破庙里的四方八面端详了一番，倒也清洁宁静，比我住的那个小旅馆好得多，我马上灵

机一动，问道：

“你们这里很宽敞，欢迎我住在你们这里吗？”

他俩同声说：“只要你不嫌这里破烂，我们很欢迎你来！不过我们的伙食吃得比较苦一点，一天吃两顿，每顿一菜一汤，差不多都是素食，我们是自己做饭，胃口倒也不错。”

我说：“我不会做饭，我也没有时间搞这些。”

阎说：“那没有问题，横竖我们是要吃饭的，用不着你动手。”

我当时笑说：今天可算不虚此行了！找着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又发现了一个利群书社的线索，今天就先搬家，再去访利群书社。分手之后，我就径直回到旅馆，同老板算了账，把一卷行李一个网篮搬到龙王庙，利用正殿上倒下来的一扇破门做铺板，虽然窄一点，长一点，不大好看，但是这里苍蝇不多，蚊子很少，没有一个臭虫，摊开了行李，很甜蜜地睡了三个钟点，赶去了长时间没有睡好的疲劳。吃了午饭，就辞别了两位朋友，去访问利群书社。

利群书社是开设在武昌横街头的一个丁字路口上，门前和其他的商店一样，只是比其他商店简单朴素一点，店堂的正中间有一张象餐桌的长方形的台子，上面堆满了上海北京各处新出版的杂志报章，台上置一个一尺见方的白底黑字的牌子，正面写着“阅览台”，反面写着几行简单的阅览规则，无论何人都可以在那里阅览，不取阅览费。柜台里面安置两个又高又大的书架，书架上，疏疏落落地摆了一些书籍，也没有人守柜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买书卖书的交易却很少，挤了一大堆人，也看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顾客。

我在那里徘徊了半个钟点，找不着一个问话的人，一会儿书社的后室有两个不象工人打扮的青年，抬着一筐垃圾走了出来，我想这总是他们的伙计吧！我就拦着他俩问：

“谁是你们的管事的呀？”

他们答应说：“我们没有经常管事的人，只有轮流值班的，现在

就是我们值班，你要买书报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我想采访贵书社的情况，替你们作一些宣传报道。”

他们笑说：“我们是甚么也没有，只有几个人，这个铺面是租的，贩卖的书报是卖了再给钱，我们是中华大学的走读生，借利群书社作一个宿舍，并可以得到阅览书报的方便，就是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东西，辜负了你的好意。”

说到这里，不等我再问便嘻嘻哈哈地走了。

我碰了个钉子，心想这里门坎真紧，可是也更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接着我就去访问了好几个与利群书社有关系的人：陈学渭、罗四维、林育南等，他们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仅仅说这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当时一些局外人也多以为他们不过是读书不成，生活不了，一个穷苦失业失学的一群青年的组织。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利群书社，是共存社的事业机构，共存社的发起人是恽代英。到这时我才算找到一些脉络。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该校任中学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更不满意那种社会和国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问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诣，颇有文名，他常在《东方杂志》和《大中华》杂志上写文章。他更善于词令，在教课和任何集会上，讲话很有热力，能吸引听众，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的威信。他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

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利群书社就是共存社最初的一个事业机构，后来恽代英在黄陂、黄冈办过乡村教育；在重庆、泸州办过师范教育。他在四川任教时，不仅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教员，并且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学生，萧楚女、林育南等都是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到一九二二年春，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吸收林育南为武汉学生代表，共存社才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它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加入共产党后，共存社即宣告解散，这是后话。

在当时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一共也不过十几个至二十几个人，除萧楚女外，都是中华大学附中、一中、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象一群清教徒似的，对人都是冷冰冰地叫人不可向迩。我想这也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不会成甚么大事，也没有兴趣去追随他们。仍然过着白日到处采访，夜晚埋头写稿的生活。

当时，武汉的报馆、通讯社很多，他们除有自己的记者外，也约请一些不拿薪水只拿稿费的特约记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两家报馆发给了我特约记者证，有了这两个证件，我就可以横冲直撞了。我采访新闻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各界联合会，是属于抵制仇货运动的报道；一个是湖北教育界，是揭发各学校的黑幕如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议员对鄂西军政府（是蔡济民、唐克明、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些报道。这在当时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可以刺伤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及军阀和学阀，因此采访来的新闻很有市场。

有一天，我到省议会秘书长蔡养朴那里去采访新闻，因为他教过我几何代数，我们算是师生关系，虽然他不大喜欢我，可是他有责任接见新闻记者，发布应该发布的新闻，所以我常到他那里走动。那一天他把省议会无关重要的两个议案交给我作为新闻发

布，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不对你说直话，一个读书人去当新闻记者就是末路，这种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危险，一句话或是一件事到了你们的口头笔下，都变成了嬉笑怒骂，总要刺激一些人，甚至骂得不成话，那谁还敢同你说实话呢，又有谁敢同你做朋友呢？截至现在就有不少的人怕你，把你的名字同‘报痞子’联在一起，我听着很为你难过，我劝你不要搞这一套，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

他说完之后，只顾抽他的水烟袋，不再看我。我受了这顿没头没脑的教训，颇不甘心，就说：

“自从毕业以后，我钻了不少的冷窟窿，坐了不少的冷板凳，谁也不理我，低首下心地去找了校长好几次，他给我在附小半个书记(支书记的半薪每月十余元)兼四点钟的课，虽然生活很苦，地位很低，我还是忍气吞声干了一个学期。八十串钱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员我也干了五十天，结果我同当地的豪绅及流氓地痞对骂了一阵，他们兴师动众要同我打架打官司，我被迫离开那个学校，逃到武昌来找学校的老师，谁也不支持我，接着又害了一场大病，逼得我好几次想跳江，真感到天地之大，无我立足之地，想下乡种田，无田可种，想披发入山，无山可入。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关头，在旅馆遇着一个新闻记者，他吹他当记者的一套混世法宝，启发了我，我才开始在各报投稿。经过了半月投稿的信用，才得到那两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这样才解决我的暂时生活问题。这一年多来，辛勤的采访，努力的写作，不造谣言，不说谎话，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至于刺激人不刺激人，骂人或不骂人的问题，我就没有去考虑。您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不过，天地间的事，正当不正当是人为的，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谓正当的职业，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恶的工具，新闻记者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不值一个大钱的，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新

闻记者倒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社会的尊重。我倒不一定要干这种行业，因为要活下去，恐怕只有这种行业好干，因为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来换生活，既不求人，又心安理得。”

我说到这里，他脸上作出极不愉快的表情，把他手上拿着的水烟袋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声不响地跑进内室去了。这是撵我出门的表示，我也只好站了起来，不辞而去。

此后，我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星期光景，有两个警察到龙王庙来调查我的情况，并检查了我的网篮行李，那两个同学害怕了，要我搬家，报馆里同我比较接近的一个编辑告诉我说：湖北省警察厅通函各报取缔“雷”“鸣”记者的稿件，他劝我暂停写稿，或是把笔名改一下，看看风色。我想这是一个无抵抗的办法，我既没有做贼，又没有造反，为甚么要那样怕人呢？这是那些老家伙放的火，他们排斥异己，才搞出这个鬼把戏。可是我不写稿不能生活，写了人家不用也是枉然，为了不使报馆为难，只得又换了两个笔名。龙王庙的老板既然不敢留我，只好又搬到大关帝庙十二号去。

转眼到了冬天，抵制仇货运动已经到了尾声，可报道的消息极少，湖北教育界黑幕的报道，不知政府与报馆之间是一种甚么默契，一概不采用，鄂西军政府的活动在冬防期间报馆也差不多不要。这样，稿件用得少，收入也相应减少，差不多不能维持生活了。武汉的天气，到了严冬，雨雪连绵，天寒地冻，那个破旅馆是纸糊的房子，到处是洞，寒风刺骨，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那时陈潭秋在武高毕业以后，也闲在这里。我们朝夕相处，唯以聊天消磨时光。闲得无聊，他也帮我采访、写稿。夜晚冷得难当的时候，就用报馆赠送的报纸作燃料来取暖。到了旧历年关，旅馆的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陈潭秋约我一路回家过年，我本不想回家，但是在旅馆里也住不下去，各报馆一律放假五天，我只好同他在旧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回到故乡。

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讨债的人川流不息。母亲看见游子远归，倒是欢天喜地，父亲却是气忿不平。他把一家穷困的责任都推在我同哥哥的头上，说我们兄弟不成才，带累父母弟妹受苦，每天要咒骂几顿。精神上的痛苦与在武汉的情况并没有两样。读着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冰霜刀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春去难寻觅，……"之句，真同感到流出泪来！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杀出重围，冲破罗网，找到一个自由天地，光明世界！

转变的一年

当时的农村也并不比城市安静。到处洋货充斥，一片萧条景象。落后的农业经济频于破产，农民生活贫困不堪，南北各省都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乡下人好辛苦，吃了年饭望端午"，这是说明农民一年只有两次吃肉的机会。农民一年的辛苦，只能生产一点粮食和棉花，而粮食棉花又受了舶来品的排挤，值不了几个大钱，加以贪官污吏的剥削，土豪劣绅的压榨，敲精剥髓，油尽灯枯，就是老百姓拿一点鸡蛋到集镇上去卖，如果遇着警察和衙役也要抽头，遇到厘金上的喽啰，还要纳税。县太爷的衙役一年四季下乡，名义上是催钱粮拿匪盗，实际上是挨家挨户打抽风，每到一处先供吃喝，走的时候还要送路费，如果吃得不好或是路费送少了，来一下拍破鼻子打一个假的破头案，用抵抗公差，殴打公差的名义来耍无赖。他们每到一处，就是鸡犬不宁，人心浮动。在官府苛逼、胥吏勒索之下，农民真是永无喘息之日。健壮的农民便一个一个逃到城市里来，有的在码头上当苦力，有的到武汉、上海、天津、广州拉洋车，有的到工厂旁边做临时工和小工，有的做小贩，还有的成了乞丐。这样，农村里的生产力降低，城市的游民增多，工商业地区的劳动预备军扩大，社会也就更加动荡不安了。

农民的工作甚忙，生活极苦，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片刻的安闲，在播秧割谷与播种的时候，都是日以继夜两不见天的劳动，收获以后，稻谷交给地主，棉花卖给富人，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为了生活，仍然是两不见天地上山砍柴，下水摸虾。有时吃稀

饭，有时吃青菜，有时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一九一九年前后，大江南北各省，连年闹旱灾虫灾，还有的地方遭水灾，官府有积谷，地主的粮仓里有二三年至五六年的陈谷不拿出来救灾，河南陕西的农民吃观音土，四川贵州的农民吃树皮草根，因为消化不了，引起了很普遍的瘟疫，还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些灾难是谁带来的呢？当然是那些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可是他们在灾后却装出一副假慈悲的嘴脸，发出"人心不好"、"天灾难测"的叹声！他们发起"皇经功德"、"玉皇大醮"，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忏悔，并借这样的名义，向穷苦农民派钱捐款，请些游手好闲的和尚道士念经诵咒，自己则大吃大喝，贪污中饱，有的地方闹了十天半月，有的地方闹了一个月至一百天，穷苦的农民出了钱，出了力，还要早晚到所谓"经堂"、"佛殿"里礼佛忏悔，还要向那些地主豪绅打躬作揖，称他们是经主、斋主、醮主、忏主，自己出了钱还称地主豪绅为施主，为善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黑暗，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初，农村里开始春耕了，那个破落的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只好再回到武汉。

到了武昌，照例要到各报和师友处走动一下。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操旧业，借了一点债，当了一件旧棉袄，暂时安排一下生活和工作。可是思想上总无法平静下来。

我在武汉居住多年，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足迹几遍大街小巷，深感这个城市藏污纳垢，丑恶不堪。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封建军阀的残忍狠毒，所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任何一个有热血的人，静夜自思，无不忧心如焚。

当时汉口租界林立，一江两岸，一望都是外国人的兵舰。谁能相信这是中国的领土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倒像是生活在外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兵舰所在之处，在一定范围以内，不准中国人的船舶靠近它。就

是过江的民船，也不准靠近日本兵舰，更不能靠日本租界登岸。外国人的舢板撞翻了中国人的民船是常有的事。兵舰上的官兵常常坐着舢板上岸，以采买菜蔬为名，撞入民房，调笑妇女，以至偷鸡摸狗，无所不为。人民的愤怒在卖国政府的压制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自认晦气！

租界的建筑比较汉口华界，那是有天堂地狱之分，但是租界内藏污纳垢，比起中国地界更肮脏更龌龊。无论是哪一国的租界内，都有赌场，有鸦片烟馆，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娼妓或外国娼妓。日本租界的鸦片烟馆更多更贱，就是乡下来的流氓地痞以及游手好闲的城市平民，都可以进去吹躺一番。法租界的赌场规模宏大，为富商大贾与所谓高等华人出入之地，轮盘赌、四门摊、牌九、三十六门，有一块钱的孤丁可以赢得一百六十元的巨款，因此吸引了不少冒险家。不少豪门子弟、姨太太、小姐，在这里倾家荡产，堕落腐化，终至送掉性命。从赌场里发生出来的奸淫、拐骗、窃盗，以及谋财害命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英租界也不例外，也是烟、赌、娼应有尽有，不过表面上还是维持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格，只有所谓高等华人才能出进罢了。

每个租界都俨如一个小国家，它有它的政府（工部局、巡捕房），有它的监狱，有它的武装（兵舰和武装巡捕），有它的法律。中国人如果在租界上违犯了它的法令规章，它可以照它管理租界的一套国家机器来处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就是它们在中国所享受的治外法权，租界上所用的巡捕，露骨地表示出殖民主义的特色，如日本租界的巡捕是朝鲜人，法租界的巡捕是越南人，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这些当巡捕的人，都是所谓“亡国贱民”，这些人都是它们选择来的忠实奴仆，一个个都是身强体壮，对于他们的主子是忠顺的，对于中国人就非常凶恶，他们主要的是管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在租界上的劳动平民。他们开口就骂，动手就

打，有时候还要敲诈勒索；动不动就带到巡捕房关起来。殖民主义者对于它们的奴隶固然是极尽压迫的能事，而对于它们的奴隶侵犯中国平民的非法行为，还是极其袒护的，谁遇上了这样的事，只有自认晦气，中国政府既不能保护这些受害的人民，租界当局更不管这些中国平民的死活。

此外，租界对中国人还有很多禁律：中国乞丐不准进入租界，中国武装官兵不准进入租界，租界上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招牌，汉口沿江大马路的滨江那一方面有树荫密布，花草丛生，可供游览，但是中国人不仅不准在那里游览，就是在那里走路也不行，即令是所谓高等华人也必须是穿洋服着革履才能在那里行走，任何一个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如果不穿洋服在那里经过，也要受到巡捕的干涉和侮辱。所以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租界没有不痛恨的（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时，工人和市民不顾英国兵舰的威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帝国主义国家在武汉的势力，除了兵舰与租界而外，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书院和学校很多：武昌有英美两国主办的昙花林的文华书院（后改为华中大学），胭脂山下的博学书院，洪山北麓的博文书院，还有圣三一学校，圣约瑟女校，都是规模宏大，气派不凡，所收的学生由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这些学校收费很重，穷人的子弟不敢问津，只有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子弟才能进去。这些学生都是养尊处优，穿洋服、吃大菜、读圣经。他们的课程主要的是神学，其次是英文和法文，自然科学和中国的文史学科不过是点缀风景，具体而微了！此外还有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密布在武汉三镇，日本人在汉口郊外还办了一个同文书院。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办的学校教堂青年会，目的都是一样，第一步是以神道设教来麻醉中国的青年；第二步是培养出来一群传教士、买办、洋奴，作为奴化中国的骨干；第三步在那些洋学生中培植间谍，作为政治侵

略军事侵略的内线。这些阴谋诡计，到五四运动以后，只要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谁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教会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学生，都存在一种轻视和鄙视的感觉。在任何一个教会学校的集会上，总有一个节目是某牧师或某传教士讲甚么"上帝教人行善，上帝引导你们的灵魂入天堂"，事实上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办学校传教，正是进行奴化中国青年，进行扩大它的殖民主义，想把中国人民埋葬到十八层地狱里。阴谋诡计与甜言蜜语，哪里能够掩住血淋淋的事实啊！

汉口是中国内地商业的中心，洋货的输入，土货的输出，行业甚多，交易频繁。从江汉路一直到桥口长达数里的河街与黄陂街，都是大小商店。他们对海关要纳进口税出口税，对征收局要纳营业税，对厘金局要纳百货厘金的运输税，关卡重叠，敲精剥髓，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此外对税务机关的大小喽罗还要送额外的贿赂，否则就交易不成，或者给制造一个瞒税漏税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或者停止营业若干日以至关门。各税务机关除海关是外国人管理不买军警机关的账以外，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机关还要买军警机关的账：就是送贿赂和用私人。商人对军警方面要纳营业牌照捐、门牌捐、户籍捐、房捐、清洁捐、保安捐、消防捐，对收捐的员警也有一套陋规费，也就是贿赂。这些税和捐以及大小的贿赂的费用，商人就加在商品上，真正负担这些苛税杂捐的还是劳动人民。所以商人是政府和军警压榨的对象，商人也是政府和军警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汉口又是个娼妓众多的地方。娼妓约有二三万人，管理娼妓的花捐局是一个肥缺，流氓政客趋之若鹜。无论官娼私娼，都受到军警权要的保护，否则就不能营业。有很多政治上的阴谋，商业上的投机，都是在那里计划成交的。娼妓所在之地，即是赌博与鸦片烟发展的场所，烟、赌、娼的糜烂社会，是军人与警察栽培灌溉起来

的，所以军警龟头娼妓有血肉相联的关系。

武汉的洪门哥老会，非常猖獗，与长江上游的袍哥棒老二，上海的青帮，同属一丘之貉。它们的范围广泛，组织严密，上到官府，下至里弄，都有它们的兄弟喽罗，据说无论青帮洪帮都讲交情义气，能为人济困扶危，在一些社会黑幕小说中，把那些帮会人物点缀得出神入化。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那些帮会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罪大恶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恶徒。王占元的汉口陆军稽查处长刘贵堂，就是一个著名的帮会人物，他除了为王占元缉捕爱国志士，杀害革命党人而外，并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还纵容他的部属，设置所谓架子楼，贩卖人口。在汉口各街各巷横行无忌的大摆队小摆队（流氓组织），都是他的喽罗，在洋船码头火车站上明抢暗偷的，也是他的兄弟。汉口陆军稽查处差不多是帮会的一个山头。直到蒋介石当权的时代，武汉行营侦缉处长（即陆军稽查处的后身）是长江双龙头的杨庆山。凡是帮会著名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没有一个不是为反动军阀当爪牙，作鹰犬，与进步的人士及善良的人民为敌的。

汉口是中国内地鸦片烟出口的枢纽。鸦片烟的产地主要的是川康滇黔，其次是甘陕，这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政府也有一套禁烟禁毒的法令规章和组织机构，但都是虚有其名。事实上各省的督军省长，驻防的军队，关卡的员司以及大小军警人员，几乎无人不沾染烟毒。负地方行政责任的军警长官包种鸦片烟，交通要地的军政人员包运鸦片烟，大小城市的文武官吏包售包吃鸦片烟。搞这种行业的商人，一定要上结权要，下联帮会，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否则也很容易出危险。各地的鸦片烟运到汉口，汉口的鸦片烟商设有神秘的宏大的鸦片烟栈，再由汉口转运到大江南北各口岸各城市。上海汉口各国租界内还设有提炼鸦片烟的吗啡制造厂，有的是中国人搞的，有的是外国人搞的；

英国和日本向中国输出鸦片烟由来已久。汉口因为是鸦片烟输出的总枢纽，所以货多价廉，吸鸦片烟的人多，不仅各国租界上有鸦片烟馆，中国地界各大小旅馆中也有鸦片烟馆，就是汉口西北一带地区的贫民窟里，也有秘密的鸦片烟馆。鸦片烟的毒害泛滥到各阶层各个角落里，更加深了政治上的黑暗，社会上的腐败，人民的贫困。

武汉三镇的人口总共不过百余万人，武昌约在十万人左右，汉阳约在五万人左右，汉口约在百万人左右，武昌汉阳是地大人稀，汉口是人稠地密，汉口租界上的卫生设备和社会秩序是另外一个天地，中国地界从江汉路到桥口，比武昌汉阳还要落后，河街黄陂街是商务最繁盛的地区，垃圾满地，乞丐成群。尤其是残废的乞丐，有没有脚的，有没有手的，有瞎子，有瘫子，有五官不正耳鼻脱落的麻疯病患者，在街头巷尾滚来滚去，叫嚣喧嚷，象蛆虫一般蠕动，使行人却步，不敢向迩。后城马路的人行道上，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有无家可归的老少男女睡在那里。那些饥寒交迫的穷人，有的是失业工人，有的是破产的农民，有的是无依无靠的孤老，有的是无父无母的弃儿，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每到春天有春瘟，夏秋有霍乱，瘟疫暴发，死亡枕藉。武汉的瘟疫流行，一年不止一次，每次的死亡率很高。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冲来撞去，依然是找不到出路。其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找我到江汉通讯社当编辑。这个通讯社是同乡的一个小政客在省议会的几个省议员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我当时也是饥不择食就答应了。通讯社的地址在汉口江汉路附近的一个里弄里。通讯社在出稿以前做了好几个宣传广告，真象煞有介事似的，其实里面只有一个社长一个编辑，一个厨师兼通讯员还兼油印工人，采访写稿编稿靠我一个人单干。社长租了一辆很漂亮的包车，每天晚上同那些腐败的官僚政

客在三分里四成里的妓院里鬼混。我干了一个礼拜，才知道一些苗头，他们是督军兼省长王占元的走狗，省议会最反动的一群议员。那一年省议会要改选，这个通讯社是他们竞选活动的工具。如果我同他们同流合污地搞下去，那就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了，我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干这样的勾当！

这天，我向社长正式提出不干了，他先甜言蜜语地留我，后来说要等他找着了人才能让我走，经过了好几次的争吵，我答应他干到月底，有人接替我也走，没有人接替我也走，好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羁绊。

接着有一个同学又来找我，他也是好久没有职业的人，突然在日本租界租了一栋房子，置了家具，也挂出一个"大江通讯社筹备处"的招牌，拉我入他们的伙，他倒很坦白地说：

"我也是穷极无聊，本不会搞通讯社这样的行业，只是有个亲长是国会议员，他们要搞一个通讯社，准备下届竞选，要我替他们帮忙，现在是在筹备期间，到处拉人，我想你是一个老新闻记者，他们一定欢迎你，你愿意干吗？"

我就把我在江汉通讯社的一段经过告诉了他，我说：

"我不愿当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

他说："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拥护王占元的人，他们是主张鄂人治鄂，将在省议会发动这种活动，在不反对王占元当督军的情形之下搞一个湖北人当省长，所以他们的活动不是同王占元有甚么直接的关系。"

我说："那就是王占元的参谋长何佩瑢搞的。"

他说："我也不完全清楚，恐怕同他有点关系吧。"

我说："新玩意儿不少，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一点我们可以做而且能做的事，你把我们的关系不要同他们讲，将来这个通讯社的编辑你担当起来，我可以帮你的忙，你必须把他们当中的

人和事告诉我，我可能替你们作点义务宣传。”

说完了我回到大关帝庙十二号仍营旧业。

五四运动的大半年以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在卖国政府压迫之下虽然沉寂一些，但是学生教职员和工商界不满意现状的情绪仍然没有消失，江浙各省已经发起了公民监督选举的活动，长江各省已经发现了学生选举监督团的组织。我同一个被王占元通缉有案住在法租界不敢出门一步的老国民党员熊晋槐商量了一下，我以学生、新闻记者的身份出面发起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在武昌湖北教育会招集了一个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筹备会，加上陈潭秋和其他几个朋友的奔走，几天功夫，联络了一些失学失业的学生和法政学校的学生。那一天到会的也有一二百人，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章程、宣言，选举了团长副团长，除当天到会的人都为发起人以外，并继续向各学校社团征求发起人，正式宣告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成立，分组办事，开会的记录和通过的文件送各报馆发表，看起来好象是声势浩大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找了几个失学失业的人，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熊晋槐拿出十串钱，我们印发了传单宣言章程，分发到各报馆学校社团，并没有甚么了不得的群众和组织。我们借此发一发牢骚，骂一骂人，为我们那些穷苦的青年一鸣不平而已，并没有希望在这方面搞出甚么名堂来。但是给军阀官僚政客学阀们看起来有点惊异，因为他们是做贼心虚，又以江浙各省也有同样的活动在前，不便采取高压手段来禁止这种活动，他们也怕再搞出五四运动那样的局面来，所以他们就采取了“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可见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已经削弱了，人民正义的呼声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舆论界的赞许，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当时的所谓督军派、自治派、议会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政客奔走豪门竞争选举的恶行，尽可能地揭发出来，虽然他们也向报馆里找过

麻烦，凭借军警的势力进行取缔，但报馆里推说新闻记者是有闻必录，就是报道与事实不符的，当事人可以更正，新闻记者并没有甚么责任，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汉口有八家大报，都是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我们当然也懂得行情，哪一方面的消息，适合于送到哪一家报馆发表，分途进行，无论是攻击哪一派的官僚政客，总有报馆把我们的报道发表出来。那几个月中，生意很好，收入较多，生活方面得到暂时的改善，接近的人似乎也比以前多一点。

有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

刘伯垂名芬，是湖北鄂城人，清末留学日本，在早稻田法科毕业，他在少年时曾从章太炎学过文字学，也跟陈独秀学过声韵学，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就当律师，一九一八年前后，广东军政府时代曾在广东做过高等审判厅厅长，他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一九二〇年秋，他在广东辞官北返路过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陈独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即开始物色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约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

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内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中，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刘伯垂报告了中共成立的经过和组织体系，最后选出支部书记，并决定租定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也挂在这里。他从上海带来了很多书和很多小册子，多半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

的，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小册子是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品。我们当时感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读得太少，对苏俄的情况也知道不多，主要的时间放在读书上面。每一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照临时中央的规定，发起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发起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青年团同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各地的青年团建立互相通报的关系。在那个草创的时期，虽然工作没有展开，也算是粗具规模了。

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从学校出来，过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好象是水上的浮萍，大海的飘舟，不知向哪里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经过了转弯抹角，才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我认识了我的前途，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再不是一个孤苦零丁的人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大转变！

开　端

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对人处事全凭热情，因此，有人讨厌我，也有人愿意同我做朋友。但就是这些朋友也免不了常和我争吵打架，因为我是过于感情用事。陈潭秋与我相识最早，他常呼我为"暴徒"，刘伯垂常戏称我是"感情动物"；我自以为这都是生活细节，并不放在心上。

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从前是幻想得多工作得少，后来是幻想得少做得多了。当时我们的党并没有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投入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加入党以后的第一个改变。

当时武汉的知识界人士比起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是落后得多，因为落后，同志就少；同志少了，工作面自然就窄，因此敌人也就不多。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或是我们警惕不高，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如党在武昌建立的第一个工作部，设在山前多公祠五号，就在湖北省警察厅紧隔壁。我们在那里集会，作各种宣传、组织的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秘密工作还是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经受了血的教训才学会的。至于封建势力，如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头儿，虽然仇视新文化，但并不知道我们是属于新文化当中的哪一家，更不知道有

何厉害，大了不得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指责我们是甚么“离经叛道”，“有过激嫌疑”，如此而已。别的倒也不来妨碍我们。不过他们这些指责、中伤，对我们的工作客观上却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思想中，多厌恶旧的东西，喜欢新的东西，那些老师宿儒最看不起的人或是骂得最毒的人，就是那些青年学生最喜欢接近的人；有好多青年在课堂上听着那些老先生的咒骂，引起了好奇心，便转弯抹角来找我们谈家庭问题，谈婚姻问题，谈社会问题，谈伦理道德问题；终于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吸收他们加入青年团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如果没有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先生的“宣传”，工作还可能发展得不那样快呢！

当时党组织的活动对象，主要是学生。学生有要求婚姻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女学生，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之下，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天罗地网，党组织不仅支持这种要求，还帮助他们离婚或逃婚。这样的事虽然只做过两三件，但在学生中却是一传十，十传百，影响遍及各校，都说《新青年》杂志派的人是自由天使。其次，学生要求升学，有很多穷苦学生中学毕了业怕考不上大学，即令考上了又没有钱交学费，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半工半读，或是介绍他们到莫斯科去免费留学；虽然这样的事也做得不多，但是只要做了一两件，这就给那些穷苦的学生带来了希望，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发生了向心力的作用。再其次，是学生在学校毕了业或是半途废学，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在学校或是报馆搞一点工作，或是介绍他们到上海广州工作，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这种热情帮助是很容易使人理解的。党组织通过这些方法联系群众，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树立了威信。

在那很短的一个时间中，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把革命的影响散布

到各学校里。此外，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吸收了武汉中学、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旅鄂湖南中学，及武高的一些学生为团员，虽然一共不过二十来个人，但是这些人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都成为主要的革命干部。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了。照说党应该向工人运动方面投下相当大的力量，换句话说，应该是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但是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而且他失业很久，才在昙花林文华书院找着一个校工的工作，跟工厂也没有甚么联系。他在文华书院工作很忙，工资很少，为了生活，又不能抛弃那个工作，来搞工人运动。即令可以为他的生活想出办法，也很难叫他一锄头挖一个井，把武汉的工人组织起来。支部经过好几次的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先从调查入手。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童工的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送到《新青年》杂志发表。除此以外，工人运动计划差不多是纸上谈兵了。实际上除了郑凯卿外，同志们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工人。为了商量如何去接触工人，如何去组织工人的问题，支部开了好几次的工作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劳资冲突，也发生一些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同的罢工运动；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经济意义的多，属于政治意义的斗争少。就是说，工人阶级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之下，活不下去了，自发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

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

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

问题。（二）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这个计划就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了。

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的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开始时，是先就小沙渡纺织工厂附近恢复了停办很久的工人补习学校，其次就以浦东和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和纺织工人，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各印刷工厂的印刷工人为工作对象。不过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

上海的各种企业：第一，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洋大人的暗探活动与工厂把头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压迫，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我们要接近工人，就比较困难。第二，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那时我已到了上海。我们本来就很难接近工人，就是接近了这一帮，就更难接近那一帮，这也是一个困难。第三，在上海各工厂、工场、码头、公共场所以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帮、洪帮的组织活动，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大而言之如公司企业工厂工场，小而言之如里弄摊贩，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必然动辄得咎，一事无成。

这三个难关，摆在工作前面。我们也认识到：第一个难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把帝国主义打垮，或是把他们赶走，第一个难关就冲不破。要冲破这一关，只有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力量，同这一伙强大的敌人战斗到底。第二个难关与第三个难关，是封建社会形成的恶劣势力，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

取它。对于第二个难关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这样做虽然说收效慢一点，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帮口与帮口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第三个难关：我们开过好几次会，不容易得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去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

过了不久，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她同李启汉处得很好；由她的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青帮以后，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工作这才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步的部署而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决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州，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接着在南方发生海员罢工运动。在武汉发生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同盟罢工运动，在北方发生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罢工运动，最初虽然是自发的罢工斗争，但是南方支部参加了海员罢工运动；长江支部参加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运动；北方支部会同长江支部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次罢工运动，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后，罢工运动的性

质不同了，不仅仅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了，而带了政治的要求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活动，就同京汉铁路郑州以南的各段工人发生联系，于是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

摸索中前进

前面说过，在临时中央时代，党在武汉的工作只是对于武汉各种工厂的分布、工人的数量作过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同任何工厂工场的工人发生联系。因此现在等于重新开始。一九二一年十月间，我回到武汉，陈潭秋、黄负生等同志决定先建立机关。经过几天奔走，在武昌黄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找到一处房子，这是一个三楼三底的全楼，陈潭秋兄弟（陈荫林是潭秋同志的八弟后亦入党）、黄负生夫妇，都住在这里。我们当时多是光杆，租房子是要有家眷的，所以租房子是黄负生出名，他的夫人王纯素算是我们这个机关部的女主人。日常生活都由她主管。

工作开始了，党的工作发展得很慢，只吸收李书渠入党（后来脱党），他原是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之一，除了他以外，利群书社方面的人物我们还是没有联系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较快。最初我们由黄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私立致公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也是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的。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是他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才认识他的弟弟孙叠芳，孙叠芳是个工匠，因为他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师傅，在那样的环境中，孙叠芳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兄弟父子的支持，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这个学校的校舍，是施洋经手建筑的。施洋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人，寒士出身，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在湖北省私立法政专门学

校毕业，毕业后在武汉赋闲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取得律师登记的证书，在武汉执行律师业务。他的性情豪迈，才气纵横，好与人论是非曲直，侃侃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概。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扶弱抑强出于天性。在五四运动时，他代表湖北学生会、武汉各界联合会，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间，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在爱国仇货运动中，颇负时誉。各界联合会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收集了一些捐款，并拍卖了一些仇货，到结束时剩下一笔钱，施洋就以办理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徐家棚的一块荒凉的空地上建筑一所简单的楼房，房子建筑起来约有两年的时间，空着没有使用。陈潭秋在找房子做校舍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所房子，并查明了这所房子的来历，第二天就去找施洋，请他把这所房子借给我们或是租给我们。施洋是个很敏感的人，他也知道一点我们是干什么的人，他同意把房子借给我们，并马上同我们过江到徐家棚，把管房子的人叫来，将房子点交清楚，什么条件也没有，他只说：如果这个学校成立董事会时要算他一个董事，我们也很慷慨地答应了，这就是我们同施洋共事的开始。

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为工人开补习班，白天开工人子弟班，陈潭秋、陈荫林轮流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补习英文的多半是工匠，补习国语、算术的以小工居多数。李书渠、孙瑞贤担任国语、算术教员。工人子弟学校，也招收了三十多个学生，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好象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李书渠经常住在徐家棚，并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工作，我隔天去一趟，或是一个星期去两趟，我们算是顺利地建立起来一个据点。不过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主要的工作对象还是京汉铁路。

过了些时，我们又找到孙叠芳，要他介绍我们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据他说：京汉铁路是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的人多，广东帮的工人在京汉铁路的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他同这方面没有任何联系。

这条路子走不通了，我们只好到大智门车站，江岸各工厂旁边作调查，想找机会接近工人，同他们发生联系，终于仍是不得其门而入。陈潭秋有个本家曾经在京汉路江岸警务段当过路警，我们找着了他，把他当作宝贝，缠住不放，要他住到刘家庙，设法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但他不好好干，我们花了些钱，费了不少的气力，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我们真感到苦恼，也只好耐心地等待。

张太雷曾经介绍我到磁家矶扬子铁厂一个姓沈的工程师那里去觅取工人运动的门路，这位先生是张太雷的同学，有很浓厚的书呆子气，我去同他谈过两次，他把扬子铁厂的各种设备，化铁炉的构造，生产的情况，工人的数目象上课堂一样，对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好象是不知道我为甚么去找他，他所说的，同我所想的完全是文不对题，我也只好认为是此路不通了。

在这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定了好几个工作计划，武汉有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工人，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真感到苦闷。我们也设想过，都进工厂做工，再搞工人运动，但是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一共只有三四个人，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工作，谁也不能进工厂，而且也没有哪个工厂招收工人，更不会招收我们这样文绉绉的既没有技能又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去做工。我们开过好几次会，研究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终于没有得出一个切实易行的方法来。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列宁的一个故事：列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时，费了很长的时间，组织了五个工人，他很得意地写信告诉莫斯科方面的同志，认为是在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成就。可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复杂的、长期的工作。

我们的急躁情绪，想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发动组织起来，那是谈何容易啊！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只好一再更改计划，最后定出步骤：（一）准备条件。（二）等待时机。（三）深入群众。（四）暴露敌情。我们一面觅取工作的对象，一面进行理论的学习，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汉口各报上，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又把上海《劳动周刊》分散在各工厂、各码头、各公共场所，也起了一些作用。到了十一月下旬，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发生同盟罢工，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这一次罢工运动，工作才得到进展。巴库宁曾说过："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这是一个真理。

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

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共有二千余辆，人力车工人约有六千人左右。我们得着罢工消息以后，先派郑凯卿化装一个人力车工人去调查情况，接着在大智门迎宾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们用《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找着了人力车工人的一个活动分子樊一狗。

樊一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苦人。我们在人力车停车的街口上遇着他，把他请到迎宾旅馆的房间里，请他把罢工的经过告诉我们。

据他说："老板如果再加租，就不能生活了。一辆车子分三班，每班不过五个钟点，生意好，一班可以拉得一块多钱，生意不好，不过几角钱。现在每人每日要交五角钱的租钱，老板还要每班加二角租金，这样下去，只好不干！"

他说到这里掉下泪来！我们安慰他说：

"你不必伤心，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步，你们可以向老板直接交涉，向他说理。第二步，可以到工部局去告他们，把反对加租与罢工的理由向工部局提出来。我替你们找一个义务律师，先作合法斗争，再看情形定办法如何？"

樊一狗马上转忧为喜，带着兴奋的表情说：

"先生！我们是苦力，谁也看我们不起，你们这样热心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有劲了！世界上真有好人啊！我们先到茶馆去喝一

杯茶，告诉了我们的弟兄，再去找律师好吗?”

为了不便在群众面前暴露身份，我们只好辞谢了他的好意，我说：

“不必到茶馆喝茶了。下午一点半钟，你们推出两个代表到后花楼大同旅社隔壁皮业公所左二巷五号施洋律师事务所来，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分别后，他去找他们的伙伴，我们就去找施洋，说明来意。施洋同我们虽然是熟人，但是此时他还不是同志，我们知道律师是要钱的，所以答应照他的规定折半给他公费。施洋笑说：

“如果谈公费，不仅不能折半，而且还要加倍，因为这是一个劳资冲突的问题。我接受这个案子，就是代表人力车工人向资本家说话，可能要到工部局去打官司，比到法院打官司要麻烦些。不过在正义与人道的观点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人力车工人是穷人，你这个新闻记者(我当时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我这个律师也是穷人，只要有机会，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说甚么公费呢?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

他的语气之间，充分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义愤！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们就把同樊一狗接谈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案件。

到下午一时半，樊一狗同袁诰成还有一个同伴共三个人来了。樊一狗是一身褴褛，腰弓背驼，头发胡须都斑白了，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头子。袁诰成不过三十多岁，身强力壮，身穿一件皂色棉布袄，头戴一顶黑布瓜皮帽，不高不矮的身材，黑胖的脸蛋，没有胡须。另外一个同伴：看来是个青年，据说他曾在法国做过三年华工，这个人倒是能说会道，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他们初进门来，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和施洋同他们握了

手坐下来，双方作了介绍之后，就请他们把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及要求的条件说一说，他们仍推樊一狗代表他们说话，樊一狗把情况摆完了之后，袁诰成紧接着说：

"律师先生！我们真忍不住了，我们对老板是一个铜板的租金也不能加了！我们要就这次罢工当中提出减租的要求，哪怕是减一个铜板，也叫我们服气；要不是这样，我们就罢工到底，车行也只好关门，我们横竖是穷人，他们那些老板们就穷不起！"

袁诰成愤恨之气，溢于眉宇。另外的那个小伙子也讲了很多理由。施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说：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照法律的规定，我们要签一个合同，你们还要给我一个委任书，我们把合同、委任书签定之后，明天我就用书面通知各车行老板，并要到法国工部局去备个案。"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最后我们又对他们三个代表说：

"罢工是反对加租的武器，团结又是罢工的武器，你们一定要团结，要把罢工支持到胜利，你们对于团结把罢工支持下去有把握吗？"

他们一致答应说："困难不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劝告弟兄们暂时咬紧牙关，找点零活，再大家相互间通挪一下，大概十天八天还不至于发生问题；今天已经是罢工的第三日了，罢工一日，我们的生活固然很困难，车行老板的损失也很大，听说他们也很着急。"

于是我们替他们拟了一个罢工的宣言和汉口租界全体人力车工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发车行老板联合压迫人力车工人造成罢工的事件。第二天汉口各报把这两个文件都发表出来。施洋律师向各车行老板提出书面的通知，我们又找了两家通讯社和我的几个老同行写了几条"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的第三日"的新闻报道，这样就把人力车工人罢工的事件，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有利的印象。

这一来，车行老板就被动了，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出面同施洋律师作仲裁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人力车工人罢工的阵容良好，秩序井然，巡捕房也了解这是一个劳资冲突的问题，对人力车工人方面没有施行甚么压力。车行老板在这次的罢工运动中是走的下风。但是在谈判中斤斤较量，关于租金的增减问题，就是减一分钱或是增一个铜板（当时三个铜板约值一分银元）都争执到一天半天，因此就把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

罢工支持到第九天的时候，巡捕房对双方提出警告，限期复工，同时人力车工人限于穷困，车行老板也感到损失不小，谈判到最后的关头，双方才同意以下的条款：

（一）车行老板取消加租。

（二）在原租金内，每日每班每人提出二分钱作为人力车工人的福利费，实际上每日每班每人缴租金四角八分（等于减租二分）。

（三）人力车工人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坏。

（四）在罢工期间，车行老板应负担人力车工人每人每日的饭食费二角，作为资方对劳方的损失赔偿。

这几个条款凭律师作成议定书，双方签字以后，写成一式三份，劳资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巡捕房备案，以资信守。租界人力车工人才宣告复工。

这一次的罢工运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我们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却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在启蒙时期的工人运动，很不容易发动一次罢工运动，尤其是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更难。这一次的罢工，开始是人力车工人的自发运动，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参加进去以后，提出了合法斗争的方式，整理了罢工运动的阵容，团结了斗争的力量，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先把资方那一向对人力车工

人居高临下的气焰压倒，使巡捕房对人力车工人罢工立于第三者的地位，就分散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壮大了罢工运动的声势，才有可能把这一次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以至胜利。第二，工人团结是罢工运动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有计划的宣传教育，工人的团结，尤其是人力车工人的团结，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罢工坚持到十余日，六千多人力车工人都能忍饥受饿，同仇敌忾，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也就是罢工胜利的保证。第三，当时的政治环境，工人还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武汉也没有任何工会，在这一次劳资协议的条款中把"人力车工人组织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坏"列为一款，得到资方的签字，得到巡捕房准予备案，人力车工人工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胜利，为武汉各种劳动组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人力车工人复工以后，大家欢欣鼓舞，在资方赔偿劳方的损失经费项下提出了五千元，作为建筑人力车工人工会的经费，在大智门附近法租界对面租了一块空地，把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会所建筑起来，工人的工会设置在自己斗争得来的房屋里，这在武汉也算是首创的，为工人运动树立起一个胜利的榜样。

人力车工人工会聘施洋为法律顾问，他们都很爱戴施洋，都称施洋为"施先生"，到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吸收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力车工人工会的工作，就由施洋负责指导，一直到他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牺牲为止。而施洋的名字则永远存留在武汉每一个人力车工人的心中。

陇海铁路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陇海铁路发生了罢工。党中央电令长江支部及北方支部同志前往参加，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们接到电报，即星夜动身北上。

到开封时，北方支部的负责人已先到了那里，我们都住在开封城内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内。

据多方面了解，陇海铁路这一次的罢工活动，是以一般工头为骨干，主要是由员工要求年终发给双薪而引起的。按照铁路上的成规，只要路局营业旺盛，十二月得发给员工一个月的双薪，如果路局营业不好的话，也可以不发。陇海铁路此时还没有全路通车，营业不甚好，所以路局决定不发双薪。但是京汉、津浦铁路年终都发给双薪，这几条铁路，有联运的关系，各路员工是互通声气的，因此以一些工头为首鼓噪起来，而员司工人亦以共同利害关系，便一呼百诺，相约罢工了。

罢工的原因既然单纯，问题不大，所以也易解决，罢工的第二天，铁路管理局取得了交通部的同意，答应年终双薪照发，很快就复工了。我们到开封时，他们已复工一天了。

但是总不能白来一趟，因此我们即以庆祝罢工胜利的名义，在开封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住了一天，同他们谈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出面招待我们的大部分是工头，他们的俱乐部叫做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俱乐部内有耶稣的画像，有詹天佑的画像，有交通总长、次长和铁路局长的照像，可以想象这个俱乐部

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交通系系统的那些老爷们搞的把戏，与我们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并没有相同之处。不过既到了那里，又得到热情招待，也只能相机行事了。我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任务，对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作了一些宣传，他们也表示愿意同我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谈到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谈到产业组合问题，他们很感兴趣；对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对于"劳工神圣"的说法，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的话头虽然是侧重劳资协调，发展生产，可是也不否认劳资的矛盾，阶级的对立。彼此谈话都很客气，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我们只是了解客观的情况，各说各的，各听各的，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这些工头当中，有一个姓金的，是山东人，他是高个子，粗眉毛，大眼睛，鹰鼻子，翘胡须，据说他是个基督教徒，能说会道，他对于全国各铁路的情况相当熟悉，我们同他谈到铁路工人组织工会问题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

"老兄！要把陇海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要把全国的铁路工人组织起来都不难，不过要面面照顾到，组织工人是主要的，工人得不到员司的支持，工人就很难组织起来。再说我们这个类型的人，就是员司与工人之间的桥梁，没有我们，组织工会就很难做到。"

我们听了他的议论，不置可否。后来他又谈到京汉铁路的情况，他说京汉铁路各方面的人，他都熟悉。我就便说：

"我想了解京汉铁路的情况，准备给《劳动周刊》写点文章，请你介绍一两个在京汉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好吗？最好是工人，我想研究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

他很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过了不久，在我们准备离开开封之前，他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一封是给车务处的一个工务员，姓名忘记了，我们到郑州也没有去找

他。

当离开开封的时候，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的几个朋友送我们上车，他们表示非常亲切，握别时，还约定要常通消息。

因为这一次的联系，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李震瀛（大革命以后不知消息，传闻已脱党）在陇海铁路做工运的工作。李震瀛经常住洛阳，常往来于郑州开封之间，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经过几次改组，逐渐把组织的重心，建立在工人方面，但是始终没有把工头的关系肃清，这是陇海铁路工人工会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离开开封的当天正午，到了郑州，有个同志在郑州交通部扶轮学校教书。下车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同志的宿舍里，并请他把介绍信送给凌楚藩，请凌当夜八时前后到扶轮学校来同我们见面。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对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对南方尚待完成的粤汉铁路，也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全路的规模宏大，员工约三万余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贯是视京汉铁路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命脉，历任主管交通的大员，均为北洋政府的宠儿，他们对于这五条铁路，都抓得很紧，尤其是对京汉铁路丝毫不肯放松，因此形成了交通系。交通系的后台老板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从铁路局长到各路各段各厂各站员司以至工头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醉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交通系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掌握铁路，愚弄工人，他们却没有想到工人会有阶级觉悟的那一天。不过这欺骗笼络的政策摆在我们的工作前面，总是我们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京汉铁路工人，一向处在中国官僚与外国工程师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组织活动，在交通系的劳资协调的政策之下，组织过甚么员工福利会与员工联谊会这样的团体，这在少数高级员司把持下，与广大铁路工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不能算是工人的团体。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曾派人到长辛店讲演过，同工人开始接触，到一九二〇年以后，在长辛店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启蒙工作。

初到郑州

正是寒冬的夜晚，郑州街上，几乎断绝行人了，凌楚藩来到扶轮学校。我们相见之下，双方都有一点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面，也许感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特从远道来访，过于突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几个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触到正规的铁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兴奋，又存着莫大的希望。

我们先谈了一点关于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才问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凌楚藩很感慨地说：

“铁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点，但也有限，象我这样的工匠，也算是经过了十磨九炼，在工作上负技术责任，还要带几个学徒，指挥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时间照规定是十小时，轮流值班，有时还要加班，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时左右。我们的待遇，是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级工匠的工资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很长的工龄。在一百个工匠中难得有一两个。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现不好，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在工人福利方面，也是虚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厂各处都设有福利机构，用人很多，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郑州已经当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

生活还过得去，不过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觉得没有甚么前途。机器工人，就是机器的奴隶，前途还有甚么希望呢？”

我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是相当懂事而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对人的态度也很热情，就对他说道：

“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马上站起来很兴奋地说：

“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那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干甚么呢？”

我说：“我们先计划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

他接着说：“我们还可以计划把江岸总段的工人也组织起来。”

我问：“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

他说："我有个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我同他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人，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

于是就决定先就郑州江岸这两个总段作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他负责，江岸方面由他介绍几个朋友同我们联系，组织活动由我们负责。谈到这里已到晚上十一点半了，话还没有谈完，他提议要我们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们再商谈一次，他再约一两个伙伴来同我们谈谈，作出初步决定。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作总算是找着门路了，很感愉快。

第二天下午七点多钟，凌楚藩同他的伙伴王宗培、刘文松来了（刘文松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了工贼）。他介绍我们见了面，坐下来，凌楚藩开始说：

"我们昨夜所谈的话，我已同他们（指王、刘）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夜所谈的意见；郑州方面暂由我们三个人负责联络，江岸方面也找出几个负责的人来，先把这两个总段组织起来，将来各站的组织，由江岸向北发展，由郑州向南发展，先把郑州以南的各站各厂组织起来，再由郑州向北发展，长辛店方面原来有个工人补习学校，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组织。"

我说："北段的组织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支部负责进行，我们可以分头进行。"

王宗培是个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过，他对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刘文松是个火车司机，河北人，家住在郑州，经常在车头上工作，他对全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也谈了一些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工人的福利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凌楚藩知道扶轮学校那个同志同我们的关系，便邀请他帮助他们做些联系及文书工作，他当时

答应了。但后来他因为教书很忙，对他们的帮助不多。

谈到最后，请他们写几封介绍信，好到江岸接洽，还告诉他们，准备次晨早车南下。凌楚藩说：

“坐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到江岸时刚放工，便于找人。明天我来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写好，明天带来。”

我们愉快地握手告别。

在我们准备上车前，凌楚藩、王宗培都来送行，交来他们写的介绍信，凌楚藩说：

“你到江岸接近黄昏时候了，刘家庙的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里除了车站，街上没有电灯，夜晚找人是很困难的，我到车上去找一个熟人带去就省事多了。”

上了车，找定座位，凌楚藩到车前车后寻找了一下，带来一个加油的工人，介绍给我们作伴。他两人把我们安顿好了才走下车厢，站在车厢的窗子外，凌楚藩还叮嘱到江岸见甚么人说甚么话，王宗培也带口信问这个和那个的好，列车要开动了，我们在窗口又紧紧地握手道别，我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车开出了车站。那个加油工人走到车厢里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据说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刘家庙，他把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谈了很多。他耳朵有点聋，问他的话，他很少听得见，所以只好让他自由自在的说，他说甚么就听甚么，无论他说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听起来都是很新鲜的。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真有点为工作前途担心。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了江岸车站，冬天的季节，又是农历下旬的时光，没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车站，转弯抹角，对面不见人，如果不是凌楚藩想得周到，走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真是两眼漆黑，寸步难行了。

江岸一夜

田福生把我带到凌楚藩的把兄弟杨德甫家里。见面之后，我把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交给他，并说明来意。杨德甫很殷勤地招待，并说：

"我这里的房子很窄，您大概也没有吃晚饭，我们先到得意楼去吃晚饭吧，为您接风！"

说了就拉着我走，那一种热情，使我没有方法推辞，同时又吩咐一个叫小周的小工去找姜绍基、黄桂荣、曾玉良等到得意楼来吃饭。他关照小周说：

"凌师傅的朋友来了，带来了一封信给他们，我在得意楼欢迎他吃便饭，请他们来作陪。"

我们到了得意楼的楼上，找了一个宽大的坐头，一面喝茶，一面谈在开封、郑州所见到的人和所接触的事。杨德甫以为我同凌楚藩是老朋友，也把他同凌楚藩的交情说了一个大概。不到半个钟点的时间，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黄桂荣、曾玉良、姜绍基等都来了，大家见面让座，他们轮流看了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又向我问了一些关于凌楚藩和王宗培的情况之后，都说：

"好！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一会儿酒菜都送上来了，就开始喝酒，他们几个人都是好酒量，相互之间称哥道弟，倒很亲切。这几个人中，除了杨德甫、曾玉良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外，其余的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对杨德甫、曾玉良都称师傅，其余的相互间称老黄、老姜。对杨

德甫更客气一点，事后了解，杨德甫是湖北帮的领袖，他的工龄长、手艺好，他在厂里的徒弟多，有不少的工匠是他一手带出师的，他也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喜欢交结人，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说，他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点地位的。

吃完了饭，我才开始把在郑州同凌楚藩、王宗培等所谈的话，在这里对他们又讲了一遍。黄桂荣首先发言说：

"我同意把江岸的工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我们才有力量！不过，今天到的人还不够齐全，我们要在各厂各处找出各帮负责的人商量一下，这是个大事，要大家同心协力，才搞得好。"

接着老姜说："我们在这一两天内找几个各帮负责的人在杨师傅家里会商一下，定一个日子，我们到您府上拜访，就便商量我们组织起来的方法。"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了一下，最后才对着我微笑。我当时很敏感地想到：他们大概是想先了解我是甚么样的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是甚么样的团体，就马上答应说：

"很好！下星期日就在我家里准备便饭，候诸位光临。"

他们同声说："好！"

杨德甫同我认了同乡，对我殷勤照顾，问长问短，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快到十一点半了，我已来不及过江，杨德甫留我住在他家里。这倒叫我难住了，心想我同他是老乡，怕福建、江南两帮的工人看了不顺眼，我便说：

"我还可以到汉口去找个旅馆住一夜。"

姜绍基说："如果您不嫌脏的话，就住在我们那里，我同黄子坚同住一间房，两人都是光杆，我们两个人同榻，你就住在我的铺上如何？"

我想找个机会同他们个别谈谈也好，进一步了解他们各帮间矛盾的所在，才能得出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也是工作中必要的

步骤，就答应住在姜绍基和黄子坚的宿舍里。

我们下得楼来，他们又一路送我到姜绍基的宿舍里，又坐了一会儿，已经是十二点了，我们才握手道别，又同姜绍基、黄子坚谈了一点各帮的情况，与一般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据他们说：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次晨，我们都起得很早，他们六点钟进厂，我即动身过江。回到黄土坡十六号我们的机关部，还不到八点，陈潭秋和黄负生都迎上来问长问短。黄负生说：

"出门一个星期多了，没有来信，我们倒怕你们在陇海路上出了危险！"

我当时把这一星期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陈潭秋笑说：

"这一炮算轰开一条路了！"

大家都很高兴。

过了三天就是星期日，我们照例从上午八时起举行工作汇报，到十点钟，会结束了。陈潭秋、黄负生、李汉俊等留下来准备接待京汉铁路江岸总段来访的工人，并商量了一下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计划。约在十一时左右，他们来了，除了杨德甫、姜绍基、黄桂荣、曾玉良外，还有黄子坚。只有一个我不认识，他身材不高，两眼凹陷而有光芒，身强体壮，态度沉默，约在三十左右年纪。他站在我们面前微笑着。正要准备问他尊姓大名时，杨德甫抢上前来替我们介绍说：

"这是林师傅，是我们多年的老伙伴，他的名字叫祥谦。"

我同林祥谦握手后，即介绍陈潭秋等同他们见面，并说明他们的身份。大家坐定之后，我们开始讲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最

后说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单情况。陈潭秋、黄负生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这样他们似乎是已经了解了我们都是文教界和报界有地位的人。

接着杨德甫(湖北帮)、黄桂荣(江南帮)、林祥谦(福建帮),分别报告了江岸总段各厂各处的工人分布情形,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情况,我们又针对各帮口不和睦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似乎也很受感动。最后杨德甫说:

“我们完全同意您们的意见组织起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弟兄调和解释,我想不是甚么大不得了的事。只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请大家想想办法: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按时上工,谁去负责同大家联系?谁去负责办理组织和登记工作呢?江岸各厂各处的工人一共有三千几百人,这种联系和组织的工作,不是容易做的,恐怕一个人还做不完,但是在眼前我是一个人也找不着,怎么办?”

大家又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然后决定了以下的几点办法:(一)由今天到场的人为发起人,进行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二)各帮的负责人继续征求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发起人。(三)由劳动组合书记部介绍一个适当的人担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和联络工作。(四)俱乐部成立以后再计划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会,并以江岸为起点向北发展,俟各段各厂各站的工人俱乐部组织相当成熟时,即进行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吃了午饭以后,又谈了一些关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们才动身过江,我们握别时,约定下星期日我到刘家庙杨德甫家里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

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工作是开始了,杨德甫提出来的需要有个专人负文书和联络责任,实际上这就是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

记部长江支部开会讨论过好几次，找不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正在党要用人的时候，事有凑巧，我们接到项德龙的一封来信，他自称是《劳动周刊》的读者，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要同我们谈谈和工人运动有关的问题。大家很高兴，马上复了他的信，请他在星期日下午来，并要我接见他。

一个青年工人

寒冬雨后，武昌的街道上泥泞满地，寒风刺骨。

项德龙到黄土坡十六号来访，那天，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头戴一顶黑棉布的瓜皮帽，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初见面时，他还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坐下来，我先开口问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他说：

"我想同您谈一两个钟点，您忙吗？"

我说："可以。"

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

"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长大的。我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

参加工作。”

他还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他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说话与表情中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有充沛的热力和远大的抱负，我还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我安慰了他一番，又鼓励了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定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来会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到两个半钟点，送他出门回来，我感到高兴，心想如果各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龙一样，工作就好做了。

第二天我到徐家棚同李书渠谈起同项德龙会谈的情况，李书渠说：

“项德龙是我小时的同学，他很聪明，也很调皮，家里很穷，他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但他从不同他叔父往来，他常骂他叔父是一个吃人的光棍。他叔父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你，他说要来找你谈谈。”听他这么说，我对项德龙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参加本星期日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们刚吃完午饭，项德龙就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

“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

李书渠过去接待他，又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那样拘谨了。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

厂和第一纺纱厂的工人情形，问他知道不知道。他很直率地说：

"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从第一次谈话之后，本来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工作，因为对他的了解还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两次的谈话和李书渠的介绍，组织上相信他确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因此就把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组织上请他先回家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一件小事；他说：

"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

过了几天，我们把介绍项德龙来工作的意见向杨德甫他们提出来，他们都表示欢迎。组织上又把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同项德龙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灭帮与帮的矛盾。他答应说：

"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八时，我同项德龙一路到江岸，参加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我介绍项德龙同他们见面以后，当场决定聘项德龙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文书，月支生活费十五元，他马上就担任会议的记录。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会，推定杨德甫、黄桂荣为筹备委

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经过事前同各帮口的协商，平均分配的。

会议以后，他们把所有关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都交给项德龙了。从此，项德龙就常住在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了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口头报告了厂长；这个厂长是法国人，他答应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他没有大惊小怪的表情，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因此大家就把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作为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他们就在工厂里写好了，做好了，油漆好了，挂出来了。

项德龙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

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篮球、京戏、讲演各组，并办了一个业余夜校，项德龙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工人，以小工居多数，小工是铁路工人中生活最苦，工时最长，地位最低而生活又没有保障的人；不仅如此，在工人没有组织以前，动不动还要挨打挨骂，最为人所看不起。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

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小工在工人中是多数，通过业余夜校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为最坚强的一个力量，项德龙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里，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

刘家庙是距汉口约十五华里的一个乡下小集镇，街道甚窄，居民不多。开会那一天，细雨濛濛，泥泞满地，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非常踊跃；全体工人中除了出勤的以外，都到了会，请了很多的来宾，江岸总段各厂的厂长，都被他们请到了；各处来参加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代表，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汉俊也被邀请；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身份出现的，我是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场布置在龙王庙正殿，堂皇富丽，气派不凡，有茶烟糖果，并有名贵的雪茄和洋点心。会场正中间有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会场的大门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的上方有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横额。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据说：这样热闹的场面是刘家庙从来所没有过的，全镇居民，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

上午十时左右，宣布开会了。放了很多鞭炮，主席杨德甫宣布开会，黄桂荣等人报告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和江岸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主席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林祥谦报告收入会费与支出筹备费的情形。

接着，主席请来宾讲演。第一个被他们请出来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洋厂长。这个法国人，身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翘胡

子，红脸蛋，他带着微笑，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有时还夹着几句法国话和英国话，讲了半个钟点；他先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工会作了简单的介绍；其次说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最后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甚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作了一些介绍，对我们的工作有好的影响。接着是请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讲话。这个中国厂长，本来是反对工人组织俱乐部的，但是洋厂长的一番演说，完全是支持的意思，于是他也讲了几句勉励的话。李汉俊讲了日本工会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当时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启蒙时期，还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问题。

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是在厂长、工程师、员司、工匠和小工和谐的气氛下举行的。据项德龙说：在成立会的前一天，各厂处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地到俱乐部缴会费，办理登记手续，在江岸各厂各处的工匠小工没有一个不加入工人俱乐部的。项德龙在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到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他被吸收入党以后，才改名项英。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工作，算是很顺利地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展江岸以北各站的工人俱乐部，并着手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

暴风雨前

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长江支部即自南而北发展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同时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本来俱乐部就是工会的雏形，不过有了俱乐部，不等于有了工会。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第一，在反动统治之下，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虽然是公开的活动，那是在复杂错综的环境之下，偶然发生的，并不等于工人已经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工人的组织，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干涉或解散，所以工人的集会结社问题，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第二，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反复的商量研究，党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一切公开宣传，都拿一九二一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作根据（这个通电是李大钊和吴佩孚在洛阳会谈之后，由吴佩孚发表的）；工会的组织活动则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第一步是联络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口的冲突。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在这方面，项德龙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尽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当时都用的化名。在那种军阀官僚政治的场合里，他们的地位不高，自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只要在铁路上能够进行工作，也就够了。在交通部里，他们是守口如瓶，不同任何人扯关系。而高恩洪却希望他们多多为之效劳。高以总长之尊，常常召见他们；有时甚至还用电话约他们到高家里，询问铁路上的情况。当然他特别注意的是交通系的人物和活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的要求。

有一次，包正在总长室同高恩洪谈话，次长劳之常进来，高恩洪对他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蔡孑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知李大钊是扯蔡孑民先生的关系，把他们介绍到交通部的。

当时他们常向李大钊汇报交通部的情况。李大钊要他们搞好同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好多拉些人作掩护，免得孤立。那时育才科新来了一个科长，名叫黄统，是吴佩孚交用的人。李大钊曾和他在日本同过学。因此特别要他们同黄统密切联系。后来发生了“二七”工潮，他们五个人以鼓动工潮的嫌疑被撤职。此时高恩洪去职，吴毓麟继任交通总长，欲置他们五人于法网，倒是黄统多方解

释，始得免予根究，这时，他们才了解李大钊同志当初的用心。

他们在交通部任职约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铁路上，各路各站各厂差不多都跑遍了，走熟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陇海铁路是由李震瀛负责，工作重点是开封与洛阳。他因为不是交通部的职员，往来全路各处是受到一些限制。据说，他在洛阳曾见过白坚武，并见过吴佩孚。他对上层的联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过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的面貌，始终是维持员工俱乐部的状态。在"二七"工潮中，李震瀛曾在京汉铁路工作过，以后即不知所终了。

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于同年四月间成立，其余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各站也在发动组织。一九二二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在郑州又召集了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共计全路十五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分给各筹备委员带到各厂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规模大备，各厂站的工会组织工作，由项德龙、吴汝明分别负责，全路的工人，对于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热心，形成了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高潮。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全路工人较多的车站：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十六个站口，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站口，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工人的组织，已经是普遍到全路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

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决定在全路的中心站郑州，所以成立大会决定在郑州举行。事前对全国各兄弟工会发出请柬数十起，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招牌于一月中旬即挂起来了，一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这些情况，事前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报告京汉铁路管理局，得到该局同意，并答应开会时郑州以南的代表准由江岸挂专车到郑州接送，郑州以北的代表由路局发给来回免票，一切安排好了，全路工人欢欣鼓舞。然而，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场激战也就由此开始了。

原来就在这时候，吴佩孚的后台老板英帝国主义正在幕后阴谋策动。它是有政治经验的，长江一带又是它的势力范围，工人一组织起来就不得了，因此就指使军阀吴佩孚无论如何要把工人镇压下去。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方面以事前既已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的同意，或可以得到转圜的余地，故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事态已经是一步逼紧一步，总工会就不能置之不理。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同吴佩孚见过几次面，他说：

"吴佩孚的事好办，只要同他见了面，我们的态度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有转圜的希望。"

这个办法固然不妙，但是目前已闹成了僵持的状态，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试一试，或可以打开僵局。于是就推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五个人为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

这五个代表从郑州到洛阳时，郑州的军警当局即把代表的姓名和行踪电告了吴佩孚，所以他们刚抵洛阳车站，就有吴佩孚的巡

阅使署副官在车站上相候，很快地吴佩孚就接见了他们。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对他们说：

“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甚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说到这里，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相继都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和平委婉，骨子里面还是很硬，主要的内容是：（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吴佩孚的那些“约法”和政治主张，原是骗人的，现在英国人又给他上了一课，他哪里还去管那“约法”和“主张”，便说道：

“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吴佩孚冷笑数声，起身走了。杨德甫等退出来，即匆忙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情况。

在大家会商之下，意见颇不一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在这一点，工人是胜利了。工会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就不能说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

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这是杨德甫的主张，有不少的人赞成。第二种看法，认为他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这种做法岂不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展缓一二天开会，再派代表分赴各方面请愿，同时也派代表再同吴佩孚交涉。这是凌楚藩的主张，也有一些人赞成。第三种看法，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靳云鹗、赵继贤、冯沄、黄殿辰以及大小员司都是压迫我们的人，都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还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这是项德龙的意见，他并且大声疾呼地说：

"我以为今天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甚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

项德龙说到这里更加激动，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大家很受感动。接着，吴汝明、李震瀛也说了话，同意项德龙的意见。各地来参加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大部分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主任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汉口香烟厂工会代表等都讲了话；尤其是施洋的讲话，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忿怒的声音震动了屋瓦。工人斗争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遂一致决定不问成败利钝，准在二月一日照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晚，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来郑州参加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计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汉阳兵工厂工会、汉冶萍驳轮工会、汉口人力车工人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扬子铁厂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及各段分会、武汉机器工会、缝纫工会、鄂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建筑工会等三十多个工人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男女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六十余人。京汉铁路十六个分会的代表共计六十五人。还有各小站分属各分会的工会小组及工会委员会的代表亦共数十人。大部分的代表住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五洲大旅馆。因为总工会是租的一栋民房办公，地点不够宽大，所以把工会会场布置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园——普乐园里，工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工会方面早有精神准备：吴佩孚、赵继贤、黄殿辰的臭威风都见过了，大了不得不过是禁止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组织工会是根据约法，军警凭甚么禁止工人开会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工人差不多都知道，所以工人都是理直气壮，估计军警当局把工会是无可如何的。

普乐园的会场，工会知道已被军警查封了，大家都认为封条不过是白纸写的黑字，并不是钢筋水泥的堡垒。到上午十点钟，住在五洲大旅馆的各地代表捧着对联、匾额、银盾各项礼物向普乐园进发；铁路总工会的委员及全郑州的工友都是从容不迫地向普乐园走来。两路人马汇集在普乐园门口，对着封闭了的大门一声吆喝，三拳两足，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大家还没有坐稳，军警的大队人马闯进了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一马当先，跑上主席台对大家说：

"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

主席和几个工会的委员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便呼起口号："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一呼百诺，声震屋瓦。军警虽然装出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是着重在威迫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实行镇压。

象这样牛皮糖的状态，相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军警监视之下。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宣布散会，再想第二步办法。

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各代表回到旅馆，旅馆里住满了军警，跑到菜馆里，菜馆里也是住满了军警，到总工会，也是挤满了军警，这就是吴佩孚对工会坚壁清野的战略！

英勇的战斗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各委员、各地代表以及郑州各厂处的工人都被军警围困住了。总工会遂决定改变斗争的办法向敌人反击。(一)把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二)准备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三)确定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各处分会由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四)重新改组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的纪律。(五)罢工命令由彭占元、马定清、刘文松及其他火车司机负责传达。各地代表各自设法回各自的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作实力援助。这个办法分途秘密通传以后，次晨各地代表都相继离开了郑州。郑州总工会于二月二日黎明被军警查封了。

至此，全路的工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情绪激增，工人的团结力量高涨，就是一向对吴佩孚存着幻想的工人如杨德甫之流，也看穿了吴佩孚的狰狞面貌，这就是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创造了条件。

总同盟罢工的五项办法，是在郑州先由党内同志会商决定之后，由项德龙同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等提出来的，他们都同意了，才秘密传达给各分会的负责人，这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动员总同盟罢工的第一道命令，时间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黎明前后，地点在郑州车站。

郑州军警封闭了工会，驱逐走了各地的工会代表，吴佩孚自以为京汉铁路的工潮，镇压下去了，对全路各处，并无警戒部署，这就给我们进行罢工运动以有利的机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各工会代表到达汉口以后，当夜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支持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并发动学生、工、商团体，一致声援，星夜分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同仇敌忾，以示坚决支援。江岸工会代表们回到江岸以后，即在工会集会。总工会决定于三日起在江岸分会开始办公，并决定命令各分会于二月三日开始总同盟罢工运动，罢工命令由三日早班北上快车的司机和加油工人分别送达。同时发出罢工宣言，并分别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及交通部提出罢工的要求如下：

（一）要求交通部撤换播弄是非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局长冯沄。要求吴佩孚、靳云鹗撤换破坏工会蹂躏工人的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损失费六千元。

（三）二月一日在郑州被军警扣留的各项匾额、对联、银盾等礼物，要求地方当局用军乐队送还工会，所有占据郑州工会的军队立即撤退，并将工会设备恢复原状，郑州军警当局向工会道歉。

（四）要求星期日工人轮流休假，工资照发。

（五）要求农历年关轮流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以上要求，若不达到圆满目的，全路工人，誓死决不上工。

罢工的部署既定，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等项文件于三日早晨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分别送由邮电局及武汉各报发表，到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即已普遍分送到各分会。上午九时起，各站各厂即实行罢工，至下午一时，全路车辆停止净尽，无论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顿。总工会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路员司的通告”，说明京汉铁路工会筹备的经过，及郑州京汉

铁路总工会被封闭的情形。

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工作，由工会纠察队担任。在工人俱乐部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各分会成立时，才正式编制起来，最初的任务是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排解工人与工人间的纠纷。罢工令下，工会纠察队重行编组，改名为工人纠察团，它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的破坏活动，执行罢工纪律，就成为罢工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各纠察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至二人。江岸工会与总工会是一体，纠察团组织比较健全，团长是罗海澄、副团长是曾玉良、姜绍基。罗海澄不细致，也不识字，曾玉良是个老好人，姜绍基是个小滑头，各人都有各人的缺点，所以把他们置于罢工委员会之下，受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指挥调遣。在罢工期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罢工的重心在江岸，支援罢工运动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由各工团的活动，发展到报馆和学校，各家报纸在四日下午，即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出号外，各学校在我们党的发动下，组织了京汉铁路罢工运动的慰问队，每日从数十人至数百人，络绎不绝，把一个刘家庙的小集镇，形成了一个闹市，这样就把罢工运动的声势壮大了，政治意义提高了。

关于组织学生和妇女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慰问的工作，党的方面是陈潭秋负责，团的方面也有几个同志负责，在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月五日，从早到晚，各学校团体妇女的慰问队逐渐增多，各学校并准备发动同盟罢课，各工厂也正在酝酿同盟罢工来支援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这样就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冯沄等不能不重视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了。

这些反动头子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动了两种攻势：一种是由

京汉铁路管理局派出代表二人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的条件，经过几次的会谈，他们答应只要工会命令全路立即复工，罢工的要求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职权范围以外的，可以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但是他们却把禁止工人开工会成立大会与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推说完全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答应只要路局能保证立即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启封，准工会另行定期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赔偿损失；其余的条件可以复工以后商量。当然敌人出面谈判，只是一种和平攻势，瓦解罢工运动，争取舆论同情，并无诚意。但杨德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人就认为这是路局的好意，谈判复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敌人的阴谋就毫不加戒备了。

敌人另一种攻势是由萧耀南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① 会同汉口镇守使署到江岸工会提出两个条件：(一)工人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其余被胁从的工人一概不究。这样的条件当然唬不倒已有锻炼的工人，遭到工会强硬的拒绝。

张厚庵当即指挥武装部队占驻工厂，监视工会的活动，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在工人家里捉去了火车头上的司机二人，强迫开车。事为总工会所闻，马上派纠察团率领工友约千余人，包围军警，将两个司机抢回，工人与军警发生格斗，同时军警也将纠察团的工人捉去了五个，再向工会交涉，以五个纠察团的工人换取两个司机；工会再派人到扶轮学校张厚庵临时指挥所交涉。他们知道工会的团结力量相当大，不是马马虎虎威胁得了的；就是捉去两个司机，也不可能叫全路复工，扣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遂转变态度，将五个纠察团的工人释放，并约定第二天工会派出实际负责的人同他切实会商复工的办法。

时间已经很晚，张厚庵走了。监视工会的武装部队是张厚庵的

① 过去一般书刊均误记为张厚生。

卫队，也随他走了，但是进驻工厂和车站的武装士兵并没有撤退，为数虽然不多，对工人总是一种压力，工人愤慨的情绪更为高涨。

这一天，总工会发行《罢工月刊》创刊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

二月六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江岸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大会，除江岸全体工人而外，有武汉各工团各学校组织的慰问队，总共约有一万四五千人，首先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报告罢工的情形，并对各工团各学校大力支援，热情慰问，表示感谢。接着各工团各学校代表演说，其中有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及烟厂工会的代表，学联会的代表，各报的新闻记者等。尤其是施洋的演说，慷慨激昂，更博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午三时，宣布散会，群众结队在江岸车站绕行一周，盘踞刘家庙的少数武装兵士也受到感动，对游行群众毫不留难，事实上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少数武装士兵也不可能有留难的举动。

游行示威的群众经过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到一码头，沿路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胜利万岁！”在游行示威时，群众手执白旗，旗上写着援助罢工的各种各样的标语。工人纠察团手执红旗，旗上写着：“维持秩序”“执行罢工的纪律”的标语，步伐整齐，秩序良好。

当天夜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呼吁经济支援与实力支援。

罢工运动，已经经过四天了，反动统治的军政当局，尚无丝毫接受工人罢工要求的迹象，张厚庵原约定六日再来谈判，亦不见来，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工人的团结很紧密，外面各工人团体，各学校和社团援助接踵而至。罢工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震撼着这个黑云弥漫的武汉和京汉铁路全线！

血染江岸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政治命脉，也是他的经济来源，罢工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不仅是对他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为了掌握京汉铁路的员工，是费了很多心机的。他对工人组织工会的问题，无疑地是恩威并用，总以不破脸，能使工人就范为度，免得损失实力，暴露他的弱点。所以在郑州军警与工人短兵相接，在江岸张厚庵与工会负责人当面交涉并没有决裂，都是吴佩孚软化工人的诡计；吴佩孚不下命令用屠杀来镇压工会，谁也不敢屠杀工人。

但是吴佩孚毕竟是一个最反动、最毒辣的军阀，到了恩威无灵的时候，他必然使用他的最后法宝——屠杀了。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当时犯了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的错误，总以为同军警打了几个回合，也不过如此，吴佩孚不会对工会采用屠杀镇压的手段，过于乐观，过于轻敌，终于造成很大的损失！

二月七日，罢工运动仍然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武汉各界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于途，各报馆派有专访记者在江岸采访罢工运动的新闻材料。到下午二时许，张厚庵又来到江岸，他和随从十余人，临时仍驻在扶轮学校的楼上，后来事实证明，这里就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指挥部。张厚庵派一个军官到工会通知：请工会派几个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和张参谋长谈判复工。工会以为有约在先，毫无顾虑，当由林祥谦等几个工会

负责人同张厚庵会见。

工会代表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判复工。张厚庵说：

“国家的军队驻在国土上，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也许复工了这里还驻军队，这是另外一件事，与罢工无关，还是先谈复工的问题。”工会代表说：“不能无条件复工。”张厚庵说：“你们的要求条件已送到北京，和转到了吴大帅那里；你们要求的范围太广，涉及的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现在只能答应你们已在各主管长官考虑中，京汉铁路是国家南北交通要道，与国家政治、军事、治安息息相关，必须马上复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只有由你们负责！”

不等他说完，林祥谦说道：“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既然这样，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

张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答：“林祥谦。”

张冷笑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

林祥谦说：“没有那样简单容易。”

张厚庵马上变了脸色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命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项德龙看到了事态的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委婉地问：“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

张答应说：“可以，快去。”

大家才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项德龙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对话的冷笑中，暗藏着无限的恶

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的任务。

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到工会来开会，我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他）到工会去等你们。"

林祥谦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他就径直回到工会，他此时已经失去自由了。

其余的人都散了，项德龙叫杨德甫暂时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杨德甫说："我暂到汉口居士林里听你们的消息。"项德龙去找纠察团准备抢救林祥谦出险。

一会儿车站上发出紧急集合的号音，大家还以为军队要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工会的四方八面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步兵，为数约有一千余人，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一触即发的神气。这样的场面，工人不止见过一次，不以为怪。第二次的号音又响了，这是冲锋的号音，军队散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的人，把林祥谦、李开元等十三人和几个火车司机由工会里绑到江岸车站上；把林祥谦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

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士兵来问林祥谦说："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祥谦很从容地回答说："我下命令给谁？"

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队。"

林祥谦很愤激地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然后再问道：

“上工不上工？”

林祥谦抗声说：“不上！”

那军官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

林祥谦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能上！”

军官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祥谦鲜血溅地过多，晕过去了。过了一会醒来，军官狞恶地笑道：“现在怎样？”

林祥谦操着福建口音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些忘八蛋手里……”

正在相持之际，项德龙率领工人纠察队约百余人，冲进了车站，快扑到林祥谦的身边，站在车站指挥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刘家庙立刻变成了战场，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线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员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的血泊中。

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亦发生了大屠杀的血案：当林祥谦等在工会被军队捆绑拖走时，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领纠察团团员约二十余人，前往抢救，曾玉良受伤后，奋起抓住一个持枪的士兵，扭作一团，拳打脚踢，复用口咬，兵士亦受重伤。曾玉良是一个身躯肥大，膂力过人的人，冲打起来，活象一只发狂的老虎，旁边的官兵不敢走近他的身边，一个军官拔出手枪，连发数响，曾玉良与那持枪的兵士同时中弹死去。

在这次战斗中，战死在工会门前，及在江岸车站同林祥谦烈士一起牺牲的，尚有平车厂的木工陈年伯，机器厂翻砂工人徐言发、李开元，平车厂工人吴海发、柳成有，机器厂合拢班工人王先瑞，机器厂锅炉工人陈端炳，车头厂验车工人林开庚、邵承鹰，机器厂打磨工人吴彩贞，机器厂翻砂工人朱仁斌、梅才咏，车务处铁工晏佑

来，车务处车头生火工人张福狗、梅启发，车头厂炭棚工人姜和顺、陈芝槐，车头厂机工王起鹏、司机刘文银，工务处工人丁道启、李启发、龚德咏，领班胡兴顺，车头厂工人刘长发，车务处摇车工人杨庆寿，车头厂生火工人陈道忠，平车厂油漆工人叶志槐，车头厂加油工人叶青山，工务处工人张春喜，车头厂工人秦君，车头厂锅炉工人钱惠和，机器厂车床工人胡如树，工务厂翻砂工人刘幼亭，机器厂铜工刘寿真，以及林祥谦烈士的弟弟林元成（原为信阳段升火工人）等三十余人。伤者无数。血满长渠，尸横遍地，哭声震地，杀气弥天，江岸工会牺牲最大，工人被杀最多，这次"二七"血案，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走上新的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资产阶级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起来，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开辟了革命进军的大道！

接着武装部队会同路警在刘家庙工人宿舍中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七时之间发生的大屠杀工人的血案。

林祥谦、曾玉良等三十七人被反革命军阀杀害了，他们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林祥谦烈士是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他的祖父林发趋是个贫农，只有半间瓦屋六分多水田，靠副业生产打渔摸虾为生，他的父亲林其庄有四个儿女，林祥谦是老大。在前清末年，林祥谦烈士的父亲在马尾造船厂做锅炉工人，每天只有两角多钱的工资，星期天休息就没有工钱，所以他的工资除了他一个人的伙食外所剩无几。林祥谦烈士的母亲就靠耕种那六分水田并搞些副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林祥谦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在童年时即养成了勤劳

俭朴的习惯，六七岁时即跟着母亲下田耕作。有时母亲留他在家里，他就象成人似的照顾弟妹，淘米洗菜，把灶火燃着，饭弄好了，等着妈妈，妈妈从田里回来总是欢天喜地的夸他说："好孩子！"

福建是龙眼的产地，他的家里有一株枝叶茂盛的龙眼树，每年结的龙眼又多又甜又早。但是附近地主的儿女仗着有钱有势，明抢暗偷，总得不到一点收成。林祥谦气愤极了，在他十三岁的那一年，他也有点气力，龙眼熟了的时候，他不分昼夜在龙眼树下看守着，快到收成的那几天，有一天夜里，那些小流氓成群结队地把龙眼偷去了很多，林祥谦赶到，同那些小流氓理论，反被打了一顿，他很气愤地跑到马尾造船厂对他的父亲说："地主崽子们太欺压人，我得在这里结交上很多的朋友，回到尚干去给那些坏蛋一顿恶打，才泄我心头之恨。不然我就再不回去了。"他的父亲就把他留在马尾，送进小学读书，他每天放学回家替父亲烧茶煮饭，这样半劳动半学习，进步很快，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能读能写能记账了。因为生活的困难，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进工厂当学徒，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因为勤于钻研，他很快地就学会了钳工的复杂技术。终以没有后台，工作了五年，亦未提升为正式工人。一九〇七年他的妹夫周连城把他介绍到京汉铁路机器厂当钳工，第二年他的父亲和弟弟元成也先后到京汉铁路刘家庙机器厂做工。一九一三年林祥谦被调到郾城做验车工作，这一年才同陈桂贞女士结婚，不久他又被调江岸机器厂工作。

林祥谦烈士性格和善，对父母孝顺，对妻子亲爱，对兄弟朋友和睦友爱。他自奉甚薄，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一生没有穿过绸缎呢绒的衣服，也没有穿过皮鞋，自己虽然是这样节省，但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在工人俱乐部任财务干事时，公私分明，丝

毫不苟，为同事所敬服。在“二七”罢工运动中，他同项德龙手联手，肩靠肩，不分昼夜地工作，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他常对项德龙说：“罢工运动就是革命运动，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革命，也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罢工，我们要准备一切应付事变！”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同志们无不悲痛落泪，切齿痛恨封建军阀。

各地的斗争

自二月四日全京汉铁路各段分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进行总同盟罢工以后，各处工人与反动统治阶级都发生了不同方式与不同情况的斗争。

在郑州方面：四日下午三时左右，驻军师长靳云鹗即将郑州工会执行委员长高彬，副委员长姜海士骗到该师司令部，先用花言巧语要他两人劝工人上工，高彬、姜海士不为所动，后即将他两人加上脚镣手铐，牵到车站及工人住宅区游行示众，以示威胁，最后把他两人关了监。五日又把工会副委员长刘文松捉去，靳云鹗亲自为他松绑，优礼相待，进行挑拨离间说刘文松是好人，高彬等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刘文松一人身上，他不信。他希望从刘文松口里得出高彬对主持罢工的责任。那时刘文松还没有变坏，激于义愤，很慷慨地说：罢工是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的事，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郑州工会是我们三个人负责，他们两个人坐牢受苦，我决不能怕祸偷生，你们把我也关起来吧！不然叫我们的弟兄看起来，我还能做人吗？靳云鹗的参谋副官同他问长问短，归根到底说到罢工复工的问题，刘文松一言不发，最后也把刘文松关了监。

六日军警当局多方设计追捕凌楚藩，凌楚藩是一个很乖巧的人，在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开始，就躲了起来。当天，军警把同凌楚藩住在一起的王宗培、钱能贵捉去，也是脚镣手铐，押解到郑州车站游行示众，企图威胁工人。七日上午，京汉铁路全路紧急戒严令下，又将司机彭占元、马定清捉去，严刑拷打，打得皮破肉烂才

释放出来。这样的威逼，工人不为所动，更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到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郑州军警又疯狂似的到处逮捕工人，工人拒捕，予军警以反击，造成流血惨案，死伤多人。

在长辛店方面，自罢工以来，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维持地方秩序，颇得地方群众和舆论的好评。军警方面对工人施行威迫利诱，赵继贤请出宛平县的县长及京兆尹的代表向工会商洽复工的条件，进行分化工人的诡计，其卑鄙无耻的行为与郑州军警当局大同小异。但长辛店的工会负责人对军警的警惕性比较高，罢工的第二天，工会即转入地下活动，军警屡次到工会寻找负责人，都没有找到。六日夜晚十二时左右，驻长辛店的陆军第十四混成旅会同当地的警察，挨户调查人口，搜索工人，在工人家中捕去史文彬、吴汝明、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人，押解到十四混成旅司令部，严刑审讯，剥去衣裤，打得皮破血流。当时正是三九寒天，他们十一个人关在拘留所里，带着脚镣手铐，一丝不挂地差不多达两天之久，每一个人哆嗦发抖，冻得死去活来。

当夜，工人纠察队分途报信，次晨天还没有大亮，长辛店的三千多工人集合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门前，当前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工人群众均手持小白旗，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声震天地。该旅旅长便拿出他的法宝，下令冲锋。密集的武装队伍由内向外，对工人群众射击，一时弹如雨下，接着数十骑马队向群众冲来，当场中枪死去四人，重伤三十余人，轻伤无数，工人群众不得不四散奔逃。史文彬等十一人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的拘留所拘押了两天多，到京汉铁路恢复交通以后，才解到保定关在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监牢里。“二七”惨案以后又有工人二十余人被捕，也关在这里，一直到曹吴失败之后，他们才从监狱里出来。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关在保定监狱里的工人和我们的同志，吃尽了苦头，受尽考验，但他们始终保持了工人

阶级不屈不挠的气节。

信阳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罢工的过程中，军警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对工人威迫利诱，每日里都有新的花样，工人的团结象铜墙铁壁似的，敌人都无能为力。七日下午，约在五点钟左右，工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被军警绑上车头，强迫开车，胡传道不为所屈、并厉声说：

“二千多里长的一条铁路，三万多员工掌管的复杂细致的技术，火车头开出去，这三万多人都要动脑筋，费气力，这三万多人中如果缺了一个打旗的，挂钩的或是加油的，这个火车头就寸步难行了，如果象你们这样蛮不讲理地把火车头开出去，一定要出轨或是翻斤斗，开火车是要有方法有条件才能开，不比强盗杀人放火，把人杀了，把火放了就完了。你们蛮不讲理地把我绑上车头，就同强盗杀人放火一样，你们杀人放火不负责任，我开车可要负责任，你们杀了我，不过是一条人命，在罢工问题没有解决前，我把火车头开出去，所出的乱子和带来的灾难，要比我这一条人命大得多，所以我宁可被你们杀死，也不能出卖工人为国家社会造成灾难。”

胡传道的话还没有说完，带领军警的军官指挥大刀队砍去胡传道的左右臂，当时胡传道就昏倒了。反动军警并当场枪杀了反对复工的工人数名。随后用两个军警绑架一个工人，强迫复工，这样屠杀工人的情况，从江岸一直到郑州都是一样。

工人在这样的黑暗势力压迫之下，生命都在呼吸之间，所以全路工人从二月七日深夜至八日早晨，才忍痛复工，罢工运动虽然是失败了，而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增高了。

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

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开始调查工人死难的情况，拟定善后的办法。这次大屠杀，在江岸方面：死难的工人三十七人，受重伤的二十七人，轻伤及在事变中失踪的还不在少数。被捕的百余人。长辛店方面：死难的工人四人，受重伤的二十余人，被捕三十余人。郑州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伤的十余人，被捕的数十人，也有失踪的。信阳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数人，受轻伤及被捕的亦不在少数。其他各分会及各站各厂，死难的，受伤的，被捕的工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进行调查，事后也就没有资料可查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另一位战士——施洋烈士。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之初，施洋同项德龙即有密切的联系，对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见。他在武汉各个工会都参加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他长于词令，勇于斗争，他不畏强权，不怕艰险，每与人争论，他的道理总要占上风。因此一般权要与学阀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武汉各工会的代表齐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被邀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也就是协助项德龙对工会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罢工运动发生，他也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虽然因为他的律师业务很忙，在罢工运动中，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但他在罢工期间每天夜晚都要到江岸工会与项德龙共同策划，到夜深人静时才回家。二月五日，刘家庙举行群众示威大会时，他代表武汉工团联合会出席讲演，他那锋利的词令，慷慨激昂的态度，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的情绪。他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过激派"。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

障人权。他常说："我们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是骗人的，是不兑现的支票，就是在群众面前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动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为得执行法律，如果被他们杀害或是关监，我们就是求仁得仁，一个革命家同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面对面地多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垮，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施洋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我们的同志与工人群众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罢工运动中，都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他经常同工会与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敌人非常仇视他。

"二七"惨案在江岸爆发时，施洋正在汉口地方法院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汉口陆军稽查处派了两个便衣暗探到施洋律师事务所，借接洽官司为名来找施洋。施洋的夫人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就对他们说：施先生到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他们就从后城马路到地方法院去，在新市场附近，遇着施洋坐着人力车回家。他们上前把施洋截留下来，先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查抄了一番，然后把他押解到陆军稽查处，转警察厅，未经审讯，即押解到武昌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的监狱里。到二月八日下午五时陆军审判处才开始审讯。他上公堂时带着三四十斤重的脚镣，二十多斤重的铁链，很大的一副手铐，虽然走路艰难，他的态度仍是从容自若，不改常态，审判他的人先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他首先向审判官提出两种抗辩，他抗辩的内容是：第一，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末你们就是渺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不着

脚镣手铐，尤其是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重脚镣手铐，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废除了，你们最好是采用文明国家的作风，废除这种落后的刑具，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墙高数丈，重门叠户的监牢里，你们也够威风了，我也够受折磨的了，再加上这样的刑具，你们从天理国法人情各方面来考虑一下是否确当。那个陆军审判处长姓孙，也是一个法政学生出身，对同道有点同情，他说：你的第一项申诉可以转呈，你安心守法，不要着急。第二项申诉，这是监狱的惯例，如果你守法的表现好，主管监狱的官员会给你卸除刑具，即宣布退庭。

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监狱，刚刚坐下，即有人在牢房外高声喊道："施洋下刑具"。这就是施洋在革命斗争中最后的一次胜利！

在公堂上审讯的情况，并不很恶劣，在宣布退庭前，审判处长说：你的供词我还有些没有听清楚，记录恐怕也不够好，你恐怕也还有要说的话没有说出来，你下堂以后，写一个亲笔的书面口供呈上来。你我是同道人，你尽管放心，我必凭情判断，决不冤枉你；不过这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与普通法院不同，你在亲笔供状上不必发牢骚……。

施洋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陆军审判处长强调"只重命令"四字，无疑是给他暗地送的一个警告，他已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九日七时起床，他草拟了一个供状，约二千余言，仍然是据理力争。十日为同狱的难友策划农历年关的福利，草拟申请书。十一、十二两日为难友石玉贵草拟请假释诉状。十三日写狱中日记及诗一首，十四日一日无事，到十五日拂晓，突然提出在陆军审判处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狱吏问施洋有无遗嘱，施洋从容笑说：

"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说完从容就义。

施洋是为工人阶级，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一贫如洗，只剩下他的夫人郭继烈和一个在当时不满三岁的女

孩儿，及一个十多岁的小弟弟。他的棺殓埋葬都是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负责办理，葬于武昌宾阳门外洪山北麓。他死难时年仅三十四岁。

"二七"血案后，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项德龙接受党的指示，在京汉铁路建立了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

自一九二一年八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南方的海员组织活动与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活动，形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洪流，在这两大洪流中党吸收了不少优秀的工人如苏兆征、项德龙等入党，在天津、上海、广州、湖北、湖南各大城市和工、矿地区，都普遍地建立了工人运动的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全国各城市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之下都活跃起来。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不仅是武汉的工人和学生沸腾起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学生对于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运动也起来声援。"二七"惨案之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残酷了；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会都被查封了，工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与所属的十八个工会也被查封了，武汉的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也受到限制。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统治之下的直隶（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很快地转入地下活动，其他各地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遭遇的一股逆流，工人运动暂时遭到挫折。

在这时候，第二国际的走卒湖南劳工会的头子王光辉等勾结一些流氓政客郭聘伯、袁正道、郭寄生等，工贼张纛、卢士英、张德惠等妄想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挑拨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动摇分子杨德甫、罗海澄、周天元、黄子坚等同

共产党的感情，离间京汉铁路工人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到处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报纸对共产党作恶意的攻击，说什么："共产党鼓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牺牲工人，报效俄国。""共产党人得了俄国人的钱，在中国发动罢工运动，壮大俄国人的声势。""共产党侵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救济款。"企图污蔑中国工人阶级"争自由、争人权"的革命运动。

"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一时转入低潮。但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工人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工贼张纛、郭聘伯等妄想勾结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张纛、郭聘伯等捕获，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把这几个工贼宣告死刑，当场执行枪决。

回忆大革命时代

自　序

这是我的回忆录的一部分。二十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劣，和生活上的艰苦，没有条件写。一九四九年流浪在澳门时，拟了一个提纲，准备着手写，又因为生活不安定，思想上的负担很多，常常拿起笔来搁下去，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在中南海勤政殿盘桓了很久，同周总理相对作了一点半钟的长谈。追忆往事，感慨万千，得到了很多的启发，真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此后，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一九五三年八月初，中共中央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的同志们来访，据他们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模型。我去看了两次，因为年代很久，而模型又太小，看不出甚么在历史上很突出的东西；接着杜明、李蓝天两同志约我为《党史资料》写点史料的文章，在同志们的帮助启发之下，接连写了几篇回忆录。当时的写法是根据党史资料室的需要，我完全是被动的，即是说：他们要甚么我就写甚么，没有我自己的主意，写成以后经过了有关方面的同志看到了，有的是看到原文，有的是经过有关方面谈及索阅我的底稿，就有些报章杂志出版社来请我写历史故事的文章。

此文于一九五七年九月间开始写，至十一月中我因高血压病倒了，中间停顿了两个多月，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中继续写，一直到

六月中旬才脱稿。此文算是在病中写成。过去虽然写过一个初稿，但文章的内容性质与本文绝不相同，加以我占有的史料很少，惟一的参考资料就是《向导》。在人、地、事、时的对证上，得《向导》的帮助很大，此外还收集了点滴史料。为了节省篇幅，历史文件用得很少，我想在一九二七年国共联合战线破灭的前夕，有几个历史文件如：(一)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胁武汉政府及蒋介石背叛的宣言；(二)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宣言；(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五)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见《向导》汇刊第五集)，可作为参考，俾读者容易了解当时的历史。

我以为这本书虽然是反映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情况，但是是片段的，只限于我个人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从历史的角度说，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只能作为写大革命时代历史的参证，不能作为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最好还是作为"故事书"、"回忆录"发表较为妥当，因为它只能说明我在大革命时代的见闻、感受和看法而已。我已是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本来就是不学无文，又长期在病中，精神体力也不够，在文字体裁描写各方面都考虑不够精到，还要请编辑同志大大地加工，如果不成为废品，那就由于在上面领导同志对我的支持和鼓舞，在下面出版社的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我个人的作用是太渺小了。

栖梧老人，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战线的提出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这一建议刚提出时，遭到中国共产党人普遍的反对。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集团，对革命的目标提得很高；对孙中山的个人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估计得很低。客观原因是：第一，孙中山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生长在海外，他在国内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他的革命方法是运动军队，联合帮会的上层人物搞军事投机活动；他没有把革命的基础建立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上面。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套东西，与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甚么相同之处。第二，国民党的中上级干部，不少人已是一些腐化堕落投机取巧的政客，如谢持、居正、张继、邹鲁、冯自由之流，或是做投机生意的张静江、戴季陶等。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基层干部和群众。最失人望的是辛亥革命之后，没有经过坚强的斗争，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换得一个全国铁路督办，使中国的封建统治换汤不换药地复活起来，使辛亥革命遭到失败，这不能说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责任。

我们的共产党在革命的初期，还是一个幼年的党，主观方面：第一，政治水平不高，只知道革命运动中纯洁性的重要，还没有理解到革命运动中广泛性的重要。我们把共产党的活动局限在一部

分工人和学生方面。我们只知道在群众中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发挥党在无产阶级中的作用。第二，我们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对政治环境认识不足，把党的活动停留在书院式研究宣传的阶段，对政治斗争既没有方法、也缺乏热情，对统一战线的作用没有认识。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马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当时他或者是在期待中国共产党会作出民主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决定，他还没有提出他的意见我们的会就闭幕了；因为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只开了五天会，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出席作报告是谈的第三国际的使命、国际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四天的会议马林到会是准备谈当时民主运动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刚一开会法国巡捕房有一个侦探闯入会场，我们发现了马上散会，我们没有被他捉住。第五天的会我们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的，马林不便参加，所以马林的这个意见一直到会后一个多月才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是陈独秀，他此时还在广州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马林的意见是（一）陈独秀要到上海履行他的职务；（二）重新部署党的工作；（三）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又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陈独秀回上海同马林会商了好几次，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波折，最后才决定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是由马林的建议，在陈独秀默契的情况下，由马林出面同孙中山商谈，如果这个问题要到中国共产党用民主讨论的方式来作决定的话，那就恐怕很难得通过。好在我们的党在建党之初即是集中重于民主，只要第三国际提出的意见，中共中央不会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意见，全国各地的组织和同志虽然可以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所以马林就可能很快地很顺利地到广东与孙中山进行商讨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

的联合战线问题。

当时的孙中山在广东的处境矛盾很多，他内受粤军将领陈炯明、叶举等的挟持，外受北洋军阀的围攻，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中。为了免除内部的冲突，希望向外发展，亲率建国第一军黄大伟部联合一部分桂军刘震寰等出驻桂林，名义上是北阀，实际上是缓和或者可以说是避免与陈炯明的冲突。他只求陈炯明按月给他相当的给养，至于广东政府从上到下一切用人行政，他都不过问。陈炯明一身兼九个要职，如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类，可以说广东政府实际权力是在陈炯明的掌握中，已形成了陈炯明的"狄克推多"的局面。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北伐军大元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而且陈炯明已与北洋政府信使往还，孙中山有随时被陈炯明遗弃的危险。

马林此次到广东访孙中山，为了避免经过香港受检查的麻烦（马林曾在香港被驱逐出境，如再经过香港即有被拘捕的危险），所以他是从上海坐怡和公司的船到武汉。我事先接到我们党中央的电报，按时到汉口怡和码头接他。他偕同张太雷带着很简单的行李，我们一路下了船，即叫一个小划子过江，笔直到徐家棚粤汉铁路火车站买了两张头等车票。火车经过武昌通湘门，我准备下车，马林带着微笑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在广州见面。可以想见马林对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热情与对于此行的期望！

马林先到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在广州接待他，很快地就派人送他到桂林。孙中山正在苦闷中得到马林的访问，作过好几次的长谈，当然主要谈的是中国革命问题，也涉及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在精神上给孙中山很大的鼓励。孙中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知道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孤立，他如果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建立"联俄"、"联共"的关系，在国际方面就可以得到苏

俄的支持，在国内就可以得到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使他在广东摇摇欲坠的革命政权得到新的血液。他认识到革命的武装固然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以革命之名而行私人割据之实的武装部队，不仅不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是革命的障碍。同时，他了解到组织革命的武力与他一贯地运动军队搞的军事投机也有本质的不同。

自从马林与孙中山会谈以后，孙中山才由悲观失望转变为生气勃勃，勇猛前进，他的革命方法由依靠军事投机转变为依靠工农群众。他更大的进步是开始接受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确定以俄为师的政治路线，学习列宁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开始建立他的革命理论，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出来了的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修改成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晚年即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在广东大学所讲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在民生主义部分中特别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义。”虽然说很多地方是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倾向到新的方面，这不能说不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进步和转变。

孙中山同马林会谈之后，他的思想被革命的真理武装起来了。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由桂林回到广州，对陈炯明等不假以词色，甚至下令免去陈炯明的本兼各职。孙中山当时在广州差不多是赤手空拳，他敢于同陈炯明的数万骄兵悍将决斗，所恃的是甚么呢？无疑的是国际方面有苏俄的联系，在国内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支持。他认清了革命的力量，知道了革命发展的方向，他才不怕反革命的骄兵悍将，更不怕失败。虽然陈炯明叛变了，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孙中山被迫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州，但在革命的真理与正义的支持之下，不到几个月的光景，陈炯明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加以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桂军刘震寰等东下，豫军樊钟秀南下，在广州近郊一战，陈炯明溃败。孙中山仍

回广州，重整旗鼓再来主持革命大计。在这个时期，陈独秀曾一度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宣传工作，这在当时对于收拾人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约在一九二〇年粤军回粤之后，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之前，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时，曾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从事实判断，陈炯明对陈独秀似有相当的信任。陈独秀离开广东时，是一九二一年九月的前后，孙中山下令免陈炯明本兼各职，是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此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在酝酿中，并无成议。陈炯明被孙中山免职以后，即由广州退到惠州，表面上通电下野，暗中是在进行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实行他的所谓联省自治。在这双方相持的形势之下，国民党人跟着孙中山的固然是多数，跟着陈炯明走的也有，首鼠两端乘机观变的也有，而共产党在当时的政论上是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我们的党报《向导》五十一期《广东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这两年来广东的战争，一般人都说是孙陈之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前年陈炯明袭击中山先生，倘然是在宪法会议中，明白地拿着拥护地方分权的旗帜，反抗中山先生严格的集权主张，那便可以说是孙陈集权制与分权制政见不同之战争。但事实却不如此，陈之攻孙，始终未曾发表与孙不同的政见，而且正在孙军北伐时，攻孙的口号是'请孙下野''赞成统一'；这明明是应援北洋军阀的统一，这明明是破坏南方革命之进行，如何能说是孙陈政见不同的战争？去年陈炯明在东江举兵，正是为沈北军打接应；陈林洪各军队都受北方曹、吴、齐经济的援助；石龙得胜时，陈炯明电告齐燮元；褚慧僧君想到老隆劝陈炯明发表反曹意见，到汕头被陈拒绝前往；这些事实，便是亲陈者也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以为广东和孙军对敌的，不能说是什么粤军陈军，简直是北洋军阀派来的军队，和杨森在四川赵恒惕在湖南是一样。……我们应该说

此时广东的战争，……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之战争，决不是广东内部的什么孙陈之争。”

象这样义正词严地把革命与反革命划清界线，使孙中山革命的旗帜更鲜明，革命的力量更强大，全国的进步势力都站在孙中山这一边，孤立了陈炯明，挽救了孙中山和国民党。

在陈炯明叛变，叶举炮击总统府的前后，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如陈公博、谭植棠、谭鸣谦（谭平山的原名）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这三个人迷信陈炯明的实力，看不起孙中山的空架子，他们同陈炯明搞在一起。共产党中央对他们三个人写信、打电报，下命令要他们帮助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他们不听。陈炯明窃踞广州时，他们还是照旧任职，共产党中央命令他们离开广州，他们才推谭平山到上海报告广州的情况。中共中央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也受了处分，要他到北京听候分配工作。他在北京闲住了几个月，满腹牢骚，百无聊赖。一九二二年秋天，“今日派”的领袖胡鄂公希望加入共产党，多方拉拢共产党人，他拉谭平山到高等警官学校任训导主任。当时李世璋也在警官学校任职，李世璋同谭平山的关系就从此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秋冬之交，孙中山再回广州主持革命大计，正式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共产党才派谭平山回广东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中，谭平山成为一时的红人。陈公博、谭植棠一直追随陈炯明到底，在陈炯明战败的前夕，陈公博骗了陈炯明一笔钱，溜到美国混了两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又以邹鲁的关系回到广州，初在广东大学任教，曾向共产党要求恢复党籍，遭到拒绝，未几在共产党发展国民党左派政策的情况之下，陈公博才接近廖仲恺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廖仲恺被刺的前后，他又做了广东省政府的农工厅长，及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他由汪精卫又搭上了蒋介石，他成了汪、蒋间的红人。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中，他

完全投到蒋介石的门下。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时，他在广州发表祝词，希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凯末尔，以后即明目张胆地站在反共的旗帜之下，死心塌地做革命的敌人，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时当了汉奸。在他当汉奸的行政院长时，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寒风集》，他在这本书上为他自己涂脂抹粉说，他在共产党初期如何重要，一九二二年孙陈战争中他如何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他主要的用意是想把当时的历史事实反转过来，影射当时共产党是帮助陈炯明的，他是帮助孙中山的。他哪里料想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到一九四六年他在苏州监狱被枪决，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革命同志还有很多人健在，岂是陈公博一手所能掩尽天下人耳目的吗？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到一九二三年底才正式建立起来。在联合战线的初期，发生了不少的波折，主要的情况是：在国民党方面，它虽然说是个有领袖没有群众，大而无当，空空洞洞的党，但是它有辛亥革命，缔造共和的历史，孙中山之下还有不少的大人物，有国会的议员议长如张继、谢持、居正、田桐、邹鲁、冯自由之类；有在民国初年当过督军省长的如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熊克武，但懋辛及正在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等；还有华侨的领袖陈友仁、邓泽如、陈树人等；帮会的上层人物李福林、魏邦平、樊锺秀等，以及搞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还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如于右任、胡景翼、孙岳、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汪精卫等。就当时的情况说，这些人是士大夫集团，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差不多都是风头人物，在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是思想落后的人物了。他们差不多都中了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毒，把苏俄和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似的，称为“过激派”，同这样的一些人来谈“联俄”、“联共”，就如对牛弹琴！一窍不通。但是孙中山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人，他不顾一切要建

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创造一个新的局面。他在癸丑之役以后，鉴于国民党的暮气很深，他不顾黄兴等的反对，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领导少数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革命。在陈炯明叛变以后，他理解到国民党的失败，仍然是因为组织不健全，纪律不严密。更以受了列宁的启示，苏俄革命的影响，所以马林的建议一提出，他就很敏感地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在决定改组国民党时，谢持、居正、田桐、张继、冯自由等极力劝阻；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他们鉴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无法挽回，他们不跟孙中山走，也没有另外搞一套的政治本钱，因此就造成了国民党内的"反共"暗潮。从表面上看，当时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活动的有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陈友仁、邓泽如等。他如宋庆龄夫人、何香凝夫人是赞成孙中山的主张的，但是他们此时还没有参加实际活动，蒋介石此时还是革命的后辈，不起甚么作用。事实证明真正襄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只有廖仲恺、陈友仁等少数人而已，其他如伍朝枢、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以及大小军政学方面的人物，多半是乘机观变，依违两可，或是别有用心如胡汉民等，一面装出孙中山的股肱心腹的样子，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暗通右派搞反共反俄的活动，这就是联合战线建立的初期国民党方面的情况。

共产党方面，也有些不利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问题存在。当时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学生、教职员、新闻记者及少数的工人，大部分是没有政治经验。把革命事业看成是纯洁的神圣的事业，对于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的人就看不起，自视过高，对整个的政治环境估计不足。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看法，从好的一方面，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从坏的方面，说它是堕落腐化，争权夺利的士大

夫集团。

我们不相信国民党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更不相信国民党能够同共产党共同革命，这是国共联合战线的初期许多共产党人的见解。但是在共产党的初期，党的集中领导重于民主，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这一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虽然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不过对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多的争论；最后的决定是：共产党员得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内部可以指定某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中央书记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及谭平山、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事实上是孙中山指派的），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样才把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与政策方针作了新的部署，中国国民党的阵容为之一新。

孙中山重建帅府与国共合作的初期

一九二三年秋冬之交，滇桂联军东下，与南下的湘豫各军，和粤军陈炯明所部各军会战于广州近郊。陈炯明虽然败走东江，所部叶举、林虎、洪兆麟、谢文炳、陈修爵等尚有二三万人，他们割据在东江富庶之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他们的最前线布置到石龙，对广州的威胁很大。入驻广州的部队如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赵成梁等，原仅有破烂不全的六个团。进驻广州以后，加以补充整顿，也不过一万多兵员。桂军刘震寰部不过三四千人，豫军樊锺秀不过二千多人，湘军谭延闿、陈嘉佑部驻粤北不及万人，还是客军的地位。以军事实力而论，陈炯明还是占优势。更以广东人有排外的天性，潜伏在广州市郊的民团与界于兵匪之间的李福林、魏邦平、朱卓文、袁虾九等，以乡土关系与陈炯明也暗通声气，这对滇桂湘豫各军也是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不得不打起孙中山的旗号，以勤王之师的姿态，派代表打电报请孙中山回粤，主持革命大计；在骨子里面，他们无非借孙中山之名，行割据之实而已。孙中山准备回广州之前，电令邹鲁筹款二十万元，作为大元帅犒赏各军之用。因邹鲁历任广州财政厅长、盐运使，差不多跟着孙中山革命的那些人物只有他最有钱。但是，邹鲁装病逃到香港，避不见面。孙中山到了香港，却回不了广州。在进退两难的关头，才由孙科出面找吴铁城。吴铁城曾做过中山县县长，刮了不少地皮，象以广东人为主体的这样一些人物，钱到了腰包里再拿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很难得吴铁城慷慨地拿出八万元。孙科又找了他的部下凑了

两万元，共凑成十万元，才装潢孙中山回广州的场面，重整旗鼓，组织大元帅府于河南士敏土厂。孙科吴铁城因这一次筹款有功，遂形成所谓太子派的小组织，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并立，后来都发展为反共的势力。孙中山回广州以后，即发表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孙科力保吴铁城为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其瑗为财政局长，形成了太子派的阵容。他们一帆风顺，在国民党中翻云覆雨，搞了很多把戏，成为一代红人。而邹鲁呢？终孙中山之世，只当了一些时的广东大学校长，再也不要他过问政治了。

孙中山回到广州为甚么选择士敏土厂做大元帅府呢？因为广州市内精华之区，都被滇桂军占驻完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时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孙中山亦莫可如何也。

滇桂军占驻广州以后，无钱不要，无恶不作，骄奢淫逸，肆无忌惮。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既无可管之兵，也无可管之政。广州市的赌税、鸦片烟税、花捐收入甚大，均入了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及桂军刘震寰的私囊。北江为赵成梁所割据，还有就食广东的湘军谭延闿、陈嘉佑及杂牌军队何成浚的鄂军，李明扬的赣军，朱培德的建国滇军各部。西江为粤军许崇智所部占据。河南为李福林所占据。各私其土，各有其民。大本营的开支是十分艰窘，所以大本营的编制很小，胡汉民任秘书长徒具虚名，黄昌谷任秘书兼金柜司长，此外，只一些挂名没有事做的参军、参谋、秘书、副官及五十多名的卫士队。他的卫士多半是华侨子弟，卫士队长卢振柳也是一个很平庸的华侨。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与陈炯明占据广州时还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思想和作风改变了；他放弃了军事投机的方法，他不重视那些落在时代后面的军人，决心学习苏俄，联合共产党，发动群众，依靠工农，建立起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第一次国共联合战线。联合战线的具体内容就是中国国民

党的"联俄"、"联共"、"工农政策"，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个方案的决定是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马林与孙中山多次的协商，最后由孙中山、马林和中共中央共同决定的。这个方案的体系是民主革命的形式，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的领导工作，放在自己的革命任务中而献身于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创造条件，把中国的革命运动推进一步。孙中山同意这样的革命纲领，他愿意把他那持之有故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国民党改变方向，领导它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军阀。在他的三民主义讲演中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感情确实是依靠苏俄和共产党，对国共联合战线寄予了无穷的希望。可是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还很多，许多国民党人对国共联合战线的看法和做法，与孙中山的思想感情和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年代，也就是斗争的年代。

国民党改组前后

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是在孙中山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决定的。在国民党内，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经过了孙中山对他们的说服教育，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分化形成三类：第一类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居正，田桐、谢持、冯自由等。在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开始，他们就离开广州，表示反抗。他们宁可投降到北洋军阀的门下，奔走于卢永祥、孙传芳、齐燮元、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那里，也不参加国共合作的局面。这一类的人物后来发展形成了最反动的集团——西山会议派。第二类是国民党的中间派，他们同意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反对"联共"。他们以为联俄可以得到国际上的声援，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所以同意联俄。其次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之内，久已感到粥少僧多，他们把共产党理解得同他们一样，他们怕船多碍港不便私图，所以不主张"联共"。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张继、邹鲁、戴季陶、徐苏中、邵元冲等。他们在表面上是服从孙中山，而暗中是与第一类的人物通声气，并在广州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散布反共的空气，鼓动反共的风潮。后来他们与西山会议派合流，至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们起了很大的翻云覆雨的作用。第三类是当时孙中山最亲信的干部，他们完全跟着孙中山走，参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谋议，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后来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但在当时他们对国民党的改组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一致表示拥护的。这一类的人物主要的

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蒋介石等。此外，还有同情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并不参加实际活动，保持缄默态度的，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还有不问孙中山搞甚么，只要有搞头，总跟着孙中山走，如李福林、邓泽如、陈树人、古应芬、伍朝枢等。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实行新政纲，贯彻三大政策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的。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无组织无纪律。苏俄革命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后，而成功在中国革命之前，就是因为苏俄有列宁领导的党布尔什维克，它有健全的组织与铁的纪律。今后我们一定要学习苏俄，着重党的组织工作与遵守党的纪律，这是党的最高原则。任何国民党员，如果不重视这个原则或违反这个原则，一定要受严厉的处分。接着冯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联俄"、"联共"。孙中山即明令开除冯自由的党籍。其次，柏烈武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曾表示反对宣誓打手印等规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态度模糊，孙中山在大会中提出要柏烈武表明态度，并责令他在大会上表示悔过。柏烈武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在大会上做了检讨表示悔过，这就是孙中山建立党纪的开始。此后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内公开反对"联俄"、"联共"的活动是没有，而"反共"的暗潮仍在发展中。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并没有地方组织，就是在广州的组织形式也不完备。因此大会代表的产生就不能不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有的是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的是几个老国民党员联名提出、经孙中山批准的；有的是共产党提出、孙中山同意批准的。在全国各地，国民党没有地方组织，共产党有地方组织，那就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之下，由共产党地方组织提出人选，经中共中央核准，取得孙中山或国民党的同意来决定。如武汉的代表刘伯垂、廖乾五、李隆

郅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产生出来的。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是由当地国共双方负责同志协商产生的。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虽然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如“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都是由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

在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即在广州市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于华侨路惠州会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处，这个机构就当时的情况说很庞大，共辖会计、庶务、文书、机要各处室，工作人员不下数十人，秘书长是廖仲恺，秘书长之下又设秘书处长(后改为书记长)，秘书干事各若干人。另外设组织、宣传、农民、海外四部，组织部长是谭平山、秘书杨匏安，这一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人称我们为跨党分子。组织部内有一个职工运动的组织，是阮啸仙、刘尔崧在那里负责。宣传部长是戴季陶，副部长是邵元冲，秘书是郎醒石、刘芦隐、甘乃光等。宣传部内设了一个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主任是徐苏中，宣传部内差不多都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他们天天在那里制造谣言，发动国共两党的摩擦。农民部的部长是廖仲恺兼，另外有一个代理部长是个老国民党员彭素民，他是江西人，大概也是右派，在一九二四年夏秋间脑冲血死了。林伯渠曾兼农民部的副部长，因为他到武汉主持两湖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并没有到农民部。在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所计划的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只有彭湃在广东东江开始搞农民运动。农民部的工作不多，工作人员也很少。海外部是邓泽如、陈树人任正副部长，这一部的工作不多，人员也很少。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属于总理，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的唯一的总理载在国民党的党章上。国民党当时虽然有中央执行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各部各处，都是秉承孙中山的意旨办事。从形式上看，这个总理制度好象是个人独裁，从实质上说这个总理制度就是国共合作的保障，否则那些右派分子随时随地可以起哄，制造国共联合战线的破坏活动。

一九二四年初夏，我在武汉工作。我们党的机关（设在汉口模范区德润里二十三号）被军警机关查抄，许白昊，刘伯垂两位同志被捕。由于我同项英、廖乾五诸同志都在吴佩孚、萧耀南的明令通缉中，党中央才调我到广州，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约在五月中旬，我在上海同谭平山、周佛海结伴到广州，谭平山同我一路去到宣传部见戴季陶，先谈了一些我在汉口被迫害的情形，其次谈了一点宣传部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同戴季陶见面，他穿一套黑烤纱的短褂裤，留着两撇小胡子，态度轻佻、言语诙谐，活象一个小商人的样子。我当时就产生一种感想：我在民国初年喜欢读《民报》，尤其是喜欢读戴天仇的文章，我以为这个人一定是英气勃勃颇不平凡，今日一见原来如此，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了。他当面要我担任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训育工作，我只好答应。当天下午我就去找谭平山，我问党员干部训练班应该是属于组织部的工作，怎么由宣传部办呢？这个班在甚么地方呢？谭平山说最初是为了开展组织工作，想招收各机关、学校、社团、部队的青年党员加以训练，再回去担任各单位的小组长或区分部、区党部的组织委员。我们定出方案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时，戴季陶要由宣传部办，廖仲恺等都赞成戴季陶的意见，我也不便力争，就只好让他去办。至于怎样办？在甚么地方办？我也不知道。这就说明国共联合战线一开始，国民党人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采取防御的态度，没有分工合作的精神。他们宁可少办事或者不办事，也不能让共产党有机会发展。而共产党方面，遇事采取退让态度，强调合作的重要，忽视斗争的必要。所以谭平山的组织部长和他所领导的组织部，在国

民党的工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天，我找到戴季陶，接洽训练班如何开始的问题。他介绍我同邵元冲、郎醒石见面，并说关于党员训练班的问题你们商量一下，他就走开了。邵元冲、郎醒石对我很冷淡，我真不知道同他们说甚么才好。我坐了半个钟点的冷板凳，他们两个拿着报纸看，也不理我，我不耐烦了，我即以沉重而急骤的声调问：你们两位有甚么话说没有？我便站起来准备要走。邵元冲抬起头来好象是看见了我的脸色，低下头说：今天我还没有准备，明天再谈吧！我便紧接着问：明天谈吗？甚么时间？甚么地点？谈些甚么问题也请你先告诉我，我也要作个准备。他慢吞吞地说：明天上午九点钟，地点仍在宣传部，谈的问题明天再说，你也用不着做什么准备。我便出了中央党部跑回旅馆。当时我带着我的爱人夏松云和孩子住在永汉马路珠江旅馆，周佛海也住在这里等着派工作。我把在中央党部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们，最后我说我想回上海。夏松云劝我忍耐着。周佛海同我的处境相同，也很气愤，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找谭平山汇报情况，好决定去留。我们气冲冲地跑到谭平山家里，一口气把我在中央党部接洽的情况告诉他，并说我不愿同这样的臭官僚共事，我要回上海。谭平山说不要急，慢慢来。你既同他们约好了明天去谈，还是要去。他们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所以冷淡你，在工作中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了，就会怕你了。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又接着说：今天晚上中央党部在广东大学有一个集会，欢迎各地被压迫来广东工作的同志，请了你，一定要到，并要讲话。我本来抱着一腔怨气而来，被谭平山同我嬉皮笑脸地闹了一阵冲淡了。临走时，他给我同周佛海各三十元毫洋，作为开销旅馆的费用。他并关照我说，这是中央给的任务，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不能打败仗。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邵元冲对我说：戴先生到香港去了，何时回来不知道。训练班的工作以前我没有参加，戴先生也没有明白

交给我如何办，所以昨天我不知道如何同你谈。昨天下午同廖先生（仲恺）会谈后决定，仍照组织部拟定的办法调训。下星期一起学员开始报到，两个月毕业，每天上课两小时至四小时，间天开一次讨论会，你同我们一起负责指导讨论会的工作。其余的事另外有人办，你可以不管。训练班的地点就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办公地点就在宣传部，讲课的都是党政各方面的负责人，由宣传部约请。他说到这里，就心不在焉地上楼去了。我退了出来，非常纳闷。我想这就是国共合作？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很抱怨党把我从武汉区那样繁重的工作岗位上，调到这样的一个镶边的工作岗位上来，一时七上八下，百感交集，真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几天，训练班开学了，没有主讲的人，也没有固定的教员，没有教学纲领，也没有训练班的组织规程。每天由宣传部约一、二人来讲演，有时讲四点钟，有时讲两点钟。担任讲演的人如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孙科、林云陔、邵元冲、谭平山等。廖、汪、胡是分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伍朝枢讲“外交问题”，林云陔讲“司法问题”，孙科讲“市政问题”，邵元冲讲“德国劳工问题”，谭平山讲“国民党组织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我讲了两点钟的“中国劳动运动问题”，又讲了两点钟的“各派社会主义”。在这一个多月中，我无论有事无事，每天都到训练班看看。我是抱定有事做事，无事读书的方法，来对待工作与安排自己。每次讨论会我都参加，同受训人员处得很好。至于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等都是高高在上，从没有参加讨论会，也很少到训练班。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学员们提出要求：请中央党部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不愿回原机关。邵元冲代理宣传部长，不接受学员的要求，也不同学员见面，很粗暴地斥责学员为无理取闹。约在七月中旬，在广东大学举行训练班的毕业考试，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甘乃光和我监试。邵元冲神气十足地摆出一个大主考的架子，刘芦隐、郎醒石、甘乃光跟在

他前后左右小心奉承。学员们对他们是怒目而视，有的学员发问，他们不解答，学员相互交换一个意见或说一句话，他们一齐吆喝"不准说话"。我想这样的一个考试，为甚么要这样地气氛森严？邵元冲是一个前清的举人，大概这一套排场是从浙江省乡试中抄袭来的吧。不到两个钟点的时间试卷都交齐了，他们把试卷带到宣传部，慎重其事地关着门评了一天多卷，发了榜，训练班的任务就算完了。学员们回原机关也好，不回原机关也好，有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宣传部一概不管。有的受训人员来找他们谈工作，他们一概不见，也不说理由。也有受训人员去找组织部，组织部推说训练班归宣传部管，用人归秘书处管，组织部无权过问。秘书处是高高在上，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基层干部问题根本就不管。从这个训练班的问题，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一个工作如果由共产党人发动起来，国民党一定要拿过去由他们去干，如果国民党人办不了，干不好，宁可不办，也不能放手叫共产党人去干。这样的作法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张，由中间派运用，孙中山最亲近的一部分人物，所谓进步派的来执行，就是廖仲恺也不能跳出这个圈子。所以就造成了国共之间的矛盾，形成国共之间貌合神离的局面。联系于顽固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原来是中间派。戴季陶是中间派的骨干，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所以他有时不能不站在进步的方面，对联合战线表现忠诚，否则对孙中山方面是交代不过去的。因此引起了张继对戴季陶的责难。在党员训练班开始筹备的时候，张继来到广州，在邹鲁家里会着戴季陶，谈到共产党的问题。戴季陶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张继就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也骂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彼此一句一句地争论起来，张继发了牛脾气，高声大骂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起拳头要打他。戴季陶打张继不过，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一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仍搞他

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去了。宣传部由邵元冲代理部长，首先就裁撤党员训练班，我的工作也被裁了。我在宣传部工作了三个多月，自到职同邵元冲谈过一次话以后，同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甘乃光等从没有说过话，见面也从不打招呼。这也可以说明在国共联合战线中，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关系，邵元冲等对共产党专门吹毛求疵，到处找我们的麻烦。他们并把“联俄”、“联共”、“工农政策”，曲解为“联俄”、“容共”、“扶植工农”，象这样地以讹传讹，把国共联合战线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当时国民党人固然是别有用心，共产党方面也有将错就错的倾向，并没有提出纠正的意见。

我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到广州，七、八月间就在广东大学师范部兼了六点钟的课。在这个期间，周恩来、陈延年两位同志从法国回来，调到广东工作。陈延年接谭平山的工作，任广东区的书记，周恩来接戴季陶的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切工作重新部署，调我到苏俄代表团资料室，搞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工作，并兼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资料室是鲍罗廷的助手李洛夫任主任，资料的来源是国内外的报纸，总共有好几十份报，有中文的，有外文的。我担任中文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有一个越南人名李瑞，他的相貌很象胡志明主席，可能就是他，及一个岭南大学的学生廖勒生担任翻译和打字。这里的工作很忙，我们每天要从那几十份报上搜集整理出好几十条新闻译成俄文或英文给鲍罗廷、加伦及其他高级顾问看，有时鲍罗廷、加伦亲自到这里看报，工作很紧张，每日工作虽规定八小时，有时还要加班。我们的工资是代表团开支。

铁甲车队是直属大本营的，卢振柳兼任总队长、罗嘉觉夫将军任顾问、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招收的队员不及百人，据说原定计划是准备组织一个铁甲车兵团，与航空处海军局地位相等，后来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必须集中力量发展黄埔军校，要建一种新型的

陆军，所以把直属大本营的特种兵计划暂耽搁了下来。

共产党调陈延年、周恩来两位同志到广东工作，并改组广东区党委，是为了加强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广东区的组织开始于一九二〇年冬，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等四个党员，谭平山任书记。在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陈公博等违抗中央决策，附陈反孙，中央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调北京工作。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仍回广州，正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谭平山因为是广东人的关系，仍调他回广州重建组织。除谭平山、刘尔崧之外，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阮啸仙、杨殷入党，仍由谭平山任书记。谭平山是一个粗枝大叶、遇事不求甚解的人，对于工作的推进，缺乏积极性和计划性，他在广东任了新旧两三年的书记，工作没有甚么发展。他这样一个人为甚么把他抬到国民党中央去当组织部长呢？因为在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伊始，对于这项工作条件具备的干部不多。谭平山因为是广东人，北大的学生，共产党员，陈炯明叛变时离开了广州，算是同孙中山共了一次患难，加以共产党的推荐，马林与孙中山同意，所以他才当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当时我们的同志都认为孙中山在广州倒是人杰地灵，谭平山当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是地灵人杰，谭平山自己也不否认。其次国共合作开始，双方的工作接触频繁，中共中央在上海，也没有派一个负责的人常驻广州，一切都由谭平山负责，而事实证明，他的才具很短，不够应付。为了加强国共合作，才决定改组广东区的组织，加以充实。自陈延年、周恩来两同志到广东工作以后，工作重加部署，在文德路租了一个两层楼的全楼为办公地点，党的组织和纪律都谨严起来，学生、工人、妇女、军事及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都有平衡的发展。

黄埔建军

孙中山革命半生，做过中华民国开国的临时大总统，做过护国军军政府的总裁，做过非常大总统，做过护法讨贼军的大元帅，可是他始终是单枪匹马。他没有甚么可靠的将领，也没有甚么可用的部队，就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黄大伟建国第一军，终于是叛变了。虽然他是那样孤立，但是无论在哪一次的军事运动中，总有那些骄兵悍将利用他的虚名为争夺地盘的工具。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及在国共联合战线中他不断地学习苏俄革命的先进经验，他才认识到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本质不同，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军事投机不足以建立与巩固革命的政权。当时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等的滇桂军与以前陈炯明的粤军及沈鸿英、莫荣新、龙济光等的护国联军并没有两样，他才理解到革命运动中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在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之初才开始计划黄埔练兵。黄埔练兵的计划是同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同时提出来的，这个计划不是孙中山的计划，也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计划，更不是蒋介石的计划，而是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三方面协议决定下来的。黄埔建军是国共联合战线的共同事业。当时的国民党还是一个空洞洞的党，孙中山是一个既没有兵又没有钱的光杆大元帅，关于练兵之所需，国民党与孙中山是一筹莫展的。黄埔建军的计划确定之后，苏俄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派了数十名优秀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调配了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主持政治教育工作，并参加军事工作。黄埔军校的开办是由于苏俄无条件资助

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俄无代价地从海参崴陆续送来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原定招收学生五百名，招考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吸收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应考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区党委选择介绍的党团员，或是有革命性的贫苦学生及青年工人。在广州虽举行了一次考试，那不过是个形式。在广州直接招考的学生不多，当时选择的标准比较严格，所以只招收了四百余人，共编为四队，后来把程潜在广州北教场所办的军政部讲武堂归并到黄埔编为第六队。原定计划招生五百人，因为没有足额所以留一队的番号，第六队的人事经费是原计划之外，也可以说是一个增加的编制，这一队的学生在军政部讲武堂时受过比较严格些的军事教育，后来在蒋介石当权的时代出了很多的高级将领，这也可能是蒋介石看中了程潜的原因之一。

黄埔军校开办之前，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俄去考察军事，决定派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认为这一次的联合战线黄埔建军是一个开创的局面，以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与他曾到苏俄考察军事的条件，他说一切既是学习苏俄，程潜那一点日本派的旧的军事知识有甚么用处呢？他不愿屈居在程潜之下，就愤然离开了广州。张静江、戴季陶又为他撑腰，张静江为这个问题还亲自跑到广州找孙中山说过话，最后孙中山才调蒋介石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兼党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还兼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视事之初倒装成很进步的样子，他对苏俄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对政治工作很重视，原来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自戴季陶离开广州以后，由邵元冲以副任代理主任。邵元冲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做政治工作的方法，他住在广州，每隔一、二天到政治部去

一趟，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他把政治部主任当一个官做，他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校党代表廖仲恺是直接领导政治部的，政治部是校党代表的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是校党代表的参谋长，这是黄埔军官学校的组织系统中有规定的，他也不管，他同廖仲恺也很少打交道。苏俄顾问团对政治部是应该密切联系的，他对顾问团向不来往。他这样地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员生都提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撤换邵元冲"的要求。蒋介石也认为邵元冲不能当政治部主任，经过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伦将军的会商，决定请中共推荐一个适当的人来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四年秋冬之交，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将政治部的工作重加部署，在学生队中调出一部分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李汉藩等在政治部工作，重订政治教育计划，除"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照旧讲授外，加授"社会发展史"，提高了政治教育的份量，丰富了政治工作的内容。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区党部，用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加强了国民党的组织教育工作。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的工作开始发展，从而建立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威信，发展了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党发展的过程中，凡属优秀的学生都加入了共产党或青年团，在任何集会中，很容易看出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共产主义的思想在群众中发展得很普遍。这种情况刺激了那一般思想落后的学生，就是蒋介石、廖仲恺以及一般国民党的老党员也感到不安，因此发生了"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

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约在一九二四年秋冬之交，最初出面的发起人是贺衷寒、缪斌等。他们取得了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同意之后，开始向各方面征求会员，进行组织。贺衷寒原是武汉区的一个

青年团员，于一九二一年冬曾由中共派遣以中国学生代表名义到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他有些小聪明，富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出席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时不服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领导，回国后被开除团籍。他在武汉、长沙办过通讯社，因为他没有能力没有信誉，走到流落的边缘，才去投考黄埔军校，他是骗取了董必武的介绍信才到广州进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他冒充青年团员，被李之龙揭破，他同李之龙、蒋先云打过架，是一个反动透顶的无赖。缪斌是黄埔军校的通讯兵教官，据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也加入过青年团。这两个人是被革命队伍淘汰出去的渣滓。贺衷寒到黄埔军校以后，到处钻门路，他先希望钻到共产党或是青年团里，碰了壁之后，他就尽量地装出是一个反共的志士，经常奔走于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之门。他常叫嚣说“青年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在共产党轰轰烈烈发展的情况当中，一些落后青年对他的这种叫嚣很感兴趣，因此就把一些落后的青年团结在孙文主义学会的旗帜之下，形成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共产党对立的一个右派组织。

李之龙在没有进黄埔军校之前，曾任鲍罗廷的翻译，因此他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很熟悉，他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曾以私人名义去找廖仲恺谈过。他说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反共为目的的一个反动组织，贺衷寒是一个被社会主义青年团开除出去的无赖，国民党如果支持贺衷寒等的活动是对国共合作有害的。廖仲恺这时还没有看出这个组织的本质，毫不犹疑地说：“共产党应该发展，国民党也应该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与发展，对于中国的革命工作是有必要的，你们应该对事不对人地加入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如果真有人搞反共的活动，那是违反我们的政策方针的，可以随时提出纠正。”在国共合作的开始，国民党内部即有反共的暗潮，到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国民党内的反共活动，就由暗渡陈仓到明修栈道结

合起来了。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除贺衷寒、缪斌外，还有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酆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杲、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教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加入，如王柏龄、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等。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孙文主义学会已经由黄埔军校发展到广州市了。与此同时，在上海方面也发起了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出面的人物是萧叔宇、段锡朋及西山会议派分子童理璋、喻育之等，与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互相呼应。国民党改组初期分化为三派，到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时候大体上又合流了，他们相互之间虽然有矛盾，在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与反共的活动中差不多是一致的，仅仅是在程度上略有差别而已。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州有陆军四校同学会的组织，所谓陆军四校是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各省陆军小学，云南讲武堂等校出身的雇佣军人落后的组织，是在同学同乡同事的封建意识上结合起来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共产党为了改造革命政府之下的军人的意识形态，发动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与接受共产党影响的教职员和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个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展很快，活动的范围很广。主要的负责人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黄鳌、李汉藩、杨其纲、袁策夷、刘云、张际春、余洒度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桢、鲁易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不限于黄埔军校，也不限于陆军，当时在广东的各个部队如滇军、桂军、湘军、豫军、海军都有军官学校或讲武堂的组织，差不多直接或间接都接受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在一九二五年解决滇桂军的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初，经过了校党代表廖

仲恺的批准、蒋介石的同意组织起来的。在组织之初，照顾国共合作的精神，规定凡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在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它对共产党员采取敌视的态度，青年军人联合会又是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就很自然地把青年军人联合会纯洁化了，凡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就有意识地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不容纳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也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这样就很自然地把青年军人联合会变成了纯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团体，不过在名义上还是受黄埔军校校长、校党代表的直接领导。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明争暗斗非常激烈，校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处理双方因斗争而发生的纠纷颇费周章。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时，以团结与斗争相结合，双方还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一九二四年冬黄埔军校已成立两个教导团，及一、二、三期共约二千余人的学生队，就当时广东的政治军事情况来说，黄埔已形成了一个战斗的力量。而陈炯明陈兵石龙，随时有进犯广州的可能，革命政府不得不发动第一次东征，周恩来随军出发，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由李汉藩、杨其纲、李默菴、黄鳌、袁策夷、陈启科等（都是共产党员）负实际责任，由卜士奇挂名代理政治部主任。卜士奇是鲍罗廷的翻译，他很忙，很少到政治部，因此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共产党人之间常常发生纠纷而无法解决。在过去，政治部的威信很高，在这一时期内，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对政治部采取轻视的态度，使政治部的工作不好推动，互相间发生了很多问题，积怨很久，李汉藩等也将情况报告过我党广东区委，陈延年也无法解决。有一天李汉藩为了领办公用品与管理处长林振雄发生口角，由相骂到相打，最后林振雄发了牛脾气，拿出手枪对李汉藩开了一枪，虽然没有打中，也闹出乱子来了。闻枪声而至的人很多，李汉藩指出林振雄是杀人的凶犯，共产党的同志奋勇上前把林振雄的手枪夺

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林振雄团团围住，用麻绳把林振雄捆起来关进禁闭室。这次事故的发生正值校长在前方与敌人作战，校党代表因公在广州，教育长在新旧交替中，无人负责。这一事态表面上是李汉藩和林振雄打架，实际上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林振雄开枪打人固然是违法乱纪，而政治部的几个科长没有把这个事情报告校方请求处理，迳直把一个管理处长捆起来关进禁闭室，在道理人情上也说不过去，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双方正在酝酿新的斗争，随时可以发生事故。于是总值日官同各部主任联合起来维持秩序，差不多是宣布校内临时戒严，不准双方有任何接触，另一方面派人到广州报告廖党代表，请他马上到黄埔来处理这个问题。廖仲恺接报告，即刻动身到黄埔，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了一下，即下令：管理处长林振雄擅自开枪打人，撤职查办，李汉藩亦以对林振雄处理不当，记大过一次。林振雄离开黄埔即跑到东江向蒋介石诉苦去了。问题虽然处理了，但并不算得到解决，双方都不服气，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廖仲恺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政治部主任经常住在黄埔，把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冲突缓和下来。廖仲恺曾电蒋介石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复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来，廖仲恺于无可如何中，去找陈延年，请他担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来处理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纠纷。陈延年与廖仲恺算是世交，他在法国留学时，廖仲恺、许崇智常接济他的用费，他那一年回国的旅费还是廖仲恺给他寄去的，在这样的公谊私情的情况之下，要他担任这个职务，他还能推辞吗？不过陈延年是共产党广东区的书记，工作刚刚展开，他很忙，每天工作总是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他哪里有时间干这个呢！于是他不得不向廖仲恺说明原因，并提到广东区委作出决定由他向廖仲恺推荐包惠僧以自代。廖仲恺约我谈了两次，接受了陈延年的意见，并向我交待任务说：青年军人联合会与

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大多数没有把目前革命的任务搞清楚，没有认识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志，各立门户，互相摩擦，把革命的精神实力在内部闹小宗派抵消了，这还对得起总理，对得起革命吗？今后的军校政治部要改组，要加强政治工作的作用，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团结起来。要建立同志间的友谊，更要建立革命工作上的纪律。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工作和学习的会议上争辩，可以向校长、党代表、政治部提出意见听候处理，万不能互相冷言热语地吵架和打架。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有权代行党代表的职权，先处理，再报告。他说完了马上打电话通知校本部，要包惠僧先到职视事再办任命的手续。并要我刻日到黄埔就职。我同廖仲恺会谈以后即到陈延年那里汇报情况。陈延年说：廖仲恺的作风就是简单明了，说做就做，你就照他说的明天就去到职，黄埔军校的党组也由你指导，要劝我们的同志踏实一点，团结群众，学习理论，做好工作要紧。吵架打架不是革命的方法，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固然要斗争，但不能采取打架的方式。一面进行公开的辩论，一面把他们反动言行的真凭实据搜集起来送给廖仲恺请他处理，最要紧的是在群众中建立我们党的威信。

我同廖仲恺和陈延年分别谈话之后，即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苏俄顾问团资料室主任李洛夫那里，把所有我经手的工作交待清楚，接我下手的是一个越南人，名字是李瑞。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我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校的教育长是钱大钧，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我们互相间交换了工作上的意见，倒算是一见如故。政治部的工作开始了，人员还是照旧，根据周恩来所订的工作方针，参照当时的情况，订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为把学生浮动的情绪安定下来，就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整理笔记的方面，开会讨论问题的

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这样搞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学生的情绪安定下来。每天夜晚接见双方面的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问题就替他们解决问题，是误会就为他们解释误会，学生的思想方面没有什么波动。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听政治课。

黄埔军校一、二、三期的学程都是规定一个月入伍，搞新兵训练；六个月的教学及野外演习。入伍期间是新兵教育，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的份量相等，甚至可以说政治课程比军事课程的份量还要重一点。政治课程每一门最多讲十六次，即三十二点钟；最少讲四次。教课的人按照授课的次数，编定讲授提纲，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那一门课程教完，学生当堂做笔记，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学生的程度，有的是在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有的到国外留过学的；有的中学没有毕业；有的连小学还没有上过的。所以当时的政治教育方针并不是灌输他们有关政治学科的系统知识，而是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促进与提高他们对于现实政治上的认识而已。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工作，是采取秘密小组的活动。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学生、教职员，大部分出发前方作战去了，留在学校工作的还有李汉藩、黄鳌、李默菴、杨其纲、周逸群、陈启科、袁策夷、余洒度等，他们汇报工作多半在夜晚十点钟以后，在政治部主任的寝室内秘密进行。军官学校是九点钟吹熄灯号，熄了灯以后，各个角落里都是静止状态，只有我们在活动着。象这样地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孙文主义学会方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也许他们亦是转为秘密活动了。学校的风潮暂时平静了，可是东征军从广东出发一直进到潮梅，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一直就摩擦到潮梅，由于周恩来驾驭前方，一路上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抵达潮梅之后，总指

挥在汕头，周恩来驻在汕头，在汕头方面虽然是风平浪静，在潮州与梅县常有双方争吵的事。有一次在梅县的一个集会上，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次大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结果把李之龙调回黄埔军校工作，贺衷寒也受了调职的处分。在二次东征时，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又打了一大架，双方已势如水火，形成不可调和的局势，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才下命令把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取消，另组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军校的学生、教职员的组织统一起来，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真被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不仅是由黄埔同学会借尸还魂地存在着，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还散布在全国各省市，干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成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力量。

党军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一九二四年五月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因为是个党立军校，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分，亲临主持。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很多，如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以及各军各师的师、旅长，党政方面的负责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古应芬等，苏俄顾问团以鲍罗廷、加伦为首的十多个顾问。五百多个学生都是年纪很轻，体质很壮，一律穿着苏俄式的黄色卡其布军服和翻皮鞋，军容极盛。这在广东是从没有见过的新型部队，对各军的将领是一个刺激。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大意是：中国革命其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作基础；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他的讲话博得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热烈的掌声，对各军的将领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种下了革命与反革命分化的种子。

一九二四年六月前后，孙中山在广东大学大礼堂讲演他的三民主义，召集党政各方面的中高级干部听讲。他把三民主义已修改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

义。还加了很多弯弯曲曲的解释，他的讲演是黄昌谷记录，一共讲了六、七次。大概还没有讲完，他就统率湘豫各军及吴铁城所部的保安警察改警卫师（吴铁城任师长），还有许崇智、李济深、张民达等统率的部分粤军，出驻韶关准备北伐。留在广东的各种反动势力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情况下结合起来，举行叛乱，首先爆发了商团事件。

商团叛乱

广州市是帝国主义争相觊觎的一个市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在这里占优势。七十二个商行中，没有哪一行不是靠同外国人做买卖或是替外国人当经纪的。在经济上很占势力的有一个七十二行《商报》，是当时买办商人自己出版的报纸。自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以后，他的三大政策为举世所瞩目了，这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就不得不寻找破坏中国革命的邪道，这就是广州商团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广州商人为什么有武装呢？因为广东盛行赌博，从城市到乡村遍地是赌场。赌、烟、娼这是三位一体的糜烂社会的毒害，它的活动必须依靠驻军的保护。这样就把坏人、坏事、坏政治、坏军队结合起来，而造成了军人横行市上，盗贼布满通衢，奸淫抢劫之事时有所闻。政府不禁赌，不缉盗，而准商人置械自卫，逐渐发展成为商团。商团的领袖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及地主兼资本家的陈廉仔、陈恭绶。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得广州驻军将领的默契，并与北洋政府及陈炯明等暗通声气，形成了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阵线。到一九二四年夏秋之交，他们明目张胆地要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阴

谋建立商人政府。商团军的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花县各地，武装齐全，声势浩大，对革命政权已形成咄咄逼人之势。到八月上旬，又由外商南利洋行购得枪械一万余支，计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支，子弹二百一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子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子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元。这些枪械弹药经粤海关查获辗转报到大元帅府。此时孙中山正在韶关督师，得报后即电令长州要塞司令部将私运军械船只扣留在黄埔军校江面，严密监视听候发落。当时长州要塞司令是蒋介石兼任，他的军事力量除了几门要塞炮而外，只有五百余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商团军与滇桂军暗中勾结的形势下，受到极大的威胁。商团总部一面以罢市相要挟，一面请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作调人，希望发还枪械。革命政府一面命令蒋介石将枪械搬运登陆隐蔽，一面调集海军各舰艇拱卫黄埔，形成了革命政府的军事势力与反革命的商团军对立的局面。范石生趁火打劫，向蒋介石讹诈去了长短枪共二千余支，也就缓和了滇军对商团的支持（这段史料，见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向导》周刊第七十九期）。当时广州的形势，孙中山可以指挥得动的军队都调到北江准备北伐去了。在广州的军队如杨希闵、刘震寰等，是别有用心地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驻在西关的范石生、廖行超等，与商团有默契，采取趁火打劫的态度。省长胡汉民、市长李朗如，民团督办李福林等代表国民党右派，采取中间人的态度，奔走于商团与大元帅府之间，进行调解，更助长了商团叛乱的气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如廖仲恺、谭平山等，对这件事虽然很愤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正赤胆忠心保卫革命政权与孙中山共患难的，除了黄埔军校的五百多名学生武装而外，就只有共产党与共产党所直接领导的各工会、市郊的农民及学生、妇女等团体而已。在一九二四年双十节之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实行武装叛变，陈炯明、林虎、

洪兆麟等反革命军队准备从石龙、东莞进袭虎门与商团会师广州，局势是一天紧张一天，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革命军事计划：第一步解散商团，第二步讨伐陈炯明，第三步北伐，并改双十节为警告节，请国民党作镇压反叛的准备。廖仲恺等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请孙中山回师靖乱，先巩固后方，再行北伐。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意见。军队还没有调回，双十节到了，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的集会，到会的团体有"反帝大同盟"、"民族解放协会"、"建国宣传团"、农讲所学员、农民自卫军，以及各校学生和一部分市民，总共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会场里的标语口号，差不多都是中共方面布置的，主要的如"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要求民主独立共和国"，"实行国民革命"，"追念革命先烈"，"复活辛亥革命精神"，"要求一个革命成功的庆祝节"。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徒手，没有任何人带任何一种武器。会后已下午三时，旋即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便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相遇，某商店楼上忽然一声枪响，商团军立即向游行群众施放排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受伤的百数十人，一时秩序大乱，而商团军与福军（李福林部号称福军）配合起来追赶游行群众。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毙命，并被商团军剖腹示众，其状极惨。之后，商团军和福军又逮捕了很多工农群众，进行非刑拷打，并实行罢市，以威胁革命政府。商团军的步哨从西关一直放到东山，盘查行人，凡是不会说广东话的外江人，无不受到商团军与福军的侮辱或打骂。这样的紧张局势一直延续了三四天，北伐部队才由北江回来。警卫军吴铁城部于十月十三日夜晚先行到达，其余各军于十四日陆续抵省，政府方面才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之先，中共、苏俄顾问团与廖仲恺、蒋介石等有所协商，最后取决于孙中山。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内左右派之争了如指掌，故在韶关

行营复函说“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亦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此信墨迹稿载一九二六年太平洋学社出版的《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标点是作者加的）。接着，即免去胡汉民的广东省长职，以廖仲恺继任。所以镇压商团叛乱，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之下，以廖仲恺为中心，执行孙中山的命令来进行的，国民党的右派如胡汉民、汪精卫、邓泽如、伍朝枢、李福林等，当时虽均在广州，不以武力解决商团为然，但扼于孙中山的坚持毅力之下，亦只有表示消极而已。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惠州会馆设临时军事指挥部，孙中山命令省长公署布告解散商团，警卫军包围西关商团军总部。十四日黄昏，革命军与商团军开火，同时陈炯明果然进袭虎门。革命委员会说服滇桂军将领及李福林部会合布防，黄埔军校开来两队学生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卫队，驻在惠州会馆，当时共产党员如周恩来、陈延年及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均在革命委员会工作，领导工人、学生、妇女、农民等团体对镇压商团叛乱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一夜激战，才把商团击溃，商团军残部退到西村一带，但商团军的武器，大都为滇军范石生、廖行超部及福军所得。为巩固革命政权，保卫革命根据地广州，不得不进一步发展党军，肃清反动军事势力，而有两次东征及剿灭杨、刘诸战役。

第一次东征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战败以后，即在东江一带负隅顽抗，并接受了北洋政府任命的粤军总司令之职。陈炯明所辖各部有叶举、熊略、钟景棠、林虎、洪兆麟、谢文炳等约三万余人，并与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互通声气，以联省自治相号召，声势亦颇不弱，是革命政府当前的第一个顽强敌人。孙中山回师广州剿灭商团不久，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以国民军的名义讨伐曹吴，囚曹锟于中南海的延庆楼，驱逐溥仪于故宫。冯玉祥请出段祺瑞来维持北洋政府的残局。在那样大动乱的局面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孙中山在广东发出和平统一的号召，段祺瑞、冯玉祥等亦自知那样的变乱局面不容易收拾，也就将计就计地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的大计。孙中山准备北上，北伐之师就停顿下来。革命政府以陈炯明既勾结商团叛乱，又窃踞东江，他的防线布置到石龙与东莞附近，随时威胁广州，因此而有第一次东征之役。

东征军是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及粤军张民达一师，莫雄、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组成的。革命武装的核心是黄埔军校校本部。蒋介石、加伦、周恩来等的紧密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导第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编制采用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战斗兵。团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机关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侦探队、一个通讯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团设团长一人，团党代表一人，参谋长一人，中校副团长一人，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长一人；党代

表下设少校干事一人，上尉书记一人，团部还有上尉参谋二人，上、中尉副官各一人。营部设营长一人，营党代表一人，副营长一人，上、中尉参谋各一人。连设连长一人，连党代表一人，副连长一人，特务长一人。排设排长、副排长各一人。当时在广东作战主要的是步兵，兵器主要的是步枪。当时敌人没有炮，我们的炮也很少。在第一次东征时没有发生攻城战斗；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攻城时才用炮战。我们的炮手也很少，射击不准确，苏俄顾问常担任炮手。作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敌人方面连机关枪、驳壳枪都很少，每逢一次战斗，只要我们的机关枪一开火，敌兵就望风奔逃。党军作战差不多是连为作战单位，每一连有九个军官，配备九支驳壳枪，我们在火线上是军官持驳壳枪任前驱，士兵持步枪跟着军官前进。每一连的九个军官中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仅身先士卒，还要监督其他官兵作战。所以在火线上无坚不摧，树立了黄埔军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

在第一次东征中打了两次恶仗：第一次是淡水之役，党军第二团与陈炯明的主力叶举、熊略各部战于淡水城下，战斗正进行到紧急关头，团长王柏龄逃跑了。后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与各级党代表严密合作的情况下，不仅把战斗继续进行到底，并且攻下了淡水城，瓦解了敌人的战斗力量，树立了政治工作在党军中的威信。这一仗的胜利，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第二次是棉湖会战，这一次陈炯明的主力是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所谓三黄部队就是有三个姓黄或王的师长统率的部队，广东人是王、黄不分的。它是陈炯明割据东江的支柱。在东征军方面是以党军第一团为主力，配合以粤军一部及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和“三黄部队”血战了两天三夜，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党军第一团始终士气旺盛，加以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党

军所到之处，人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并送水、送稀饭、送草鞋，军民一体，更鼓舞士气。最后敌军动摇，分向大埔、饶平及兴宁、五华以北逃窜。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即传檄而定潮梅，第一次东征即告一段落。我们在广州得到捷报后，发动各报馆发号外，各机关团体学校开会庆祝，市民放鞭炮，欢欣鼓舞，而滇桂军对于我们这一胜利，反而感到惶惶不安。

在东征军出发的前后，孙中山正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的活动。当时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他主张召集各派军阀举行善后会议，换汤不换药地来维持反动军阀的统治。他们把孙中山也看作是代表南方军阀的人物，而暗中又勾结滇桂军，准备分别给杨希闵、赵成梁、刘震寰以两广巡阅使、广东省长和广西省长的职位。除这时范石生自动率部西归而外，其余的滇桂军都准备走段祺瑞的门路，要做陈炯明第二了。

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希望同北洋军阀妥协。共产党方面鉴于国民军有左倾的表示，希望把孙中山与国民军结合起来，以南北两个进步势力的团结，来瓦解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所以也赞成孙中山北上。共产党一面推动孙中山与国民军的团结，一面请孙中山提出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大会来解决国是，他同意这个意见。孙中山由广州坐船到上海，又由上海绕道到日本，再由日本乘船到天津，一路之上作了一些政治宣传。他绕道日本是希望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而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天津市民与进步人士所组织的欢迎会就受到租界当局的阴谋破坏，使孙中山在面子上很不好看。到了北京以后，段祺瑞与国民军方面表面上是热烈欢迎，实际上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已经组织起来，正在部署召开各派军阀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被他们束之高阁。所谓段祺瑞、冯玉祥等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变成了叫孙中山到北京来听他

们的摆布。孙中山本来就有相当严重的肝脏病，到北京以后因为劳累过度，刺激过深，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从而加重了病势，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革命政府方面，“谁继承孙中山”，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问题。当时的大元帅府仍然存在，谁也不敢自命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提不出来一个孙中山的继承人。名义上大元帅是由秘书长胡汉民代理，但胡汉民始终同国民党右派有联系，同共产党从不打交道，同执行国共联合战线的国民党方面的廖仲恺、蒋介石等也是貌合神离，同各军的将领也很少来往，他在广州对各方面的关系都不好。自孙中山北上以后，他只同一部分广东人形成的以他为首的所谓元老派有来往，这些人都是反共的。就是在大本营那稀稀拉拉的一群中，也没有谁承认胡汉民是一代理大元帅，只有黄昌谷常在人前人后称胡汉民为“代帅”，闻者莫不齿冷。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他是一个公子哥儿的本色，他的实力与人望都不够继承孙中山的地位。廖仲恺倒是执行国共联合战线的主脑，但他是文人的本色，他没有继承孙中山的想法，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孙中山的后身，反对他最力的人就是国民党右派与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其他如汪精卫、蒋介石也都不够继承孙中山的条件，至于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都与这个问题联系不起来。孙中山在世时，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的重要与伟大，孙中山过世了，在革命政府范围内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我们才了解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因此，大元帅府在若有若无之间，拖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再度到广州组织护法讨贼军大元帅府时，曾推定唐继尧为副元帅。这不过是互相利用，借以壮声势而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没有征询唐继尧的意见。孙中

山逝世前后，在广东的各军将领除党军外都有点动摇。刘震寰为活动回广西，曾亲自到云南与唐继尧有所勾结。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食指大动，派孔庚为代表到广东游说，要以副元帅的身份继承孙中山为革命政府的大元帅。唐继尧的代表孔庚初到广州时，刘震寰以贵宾相待，出入护从甚众，招摇过市，粤人为之侧目，以为唐继尧有东下的野心。当时广东的局面是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谁也当不了谁的家。滇桂军在广州好象是实力派，但是政治重心都在国共联合战线，粤湘各军还不敢冒险犯难，轻易有所作为。孔庚在广州住了几个月不得要领，后来得到廖仲恺与胡汉民的默契，又到东江去找蒋介石进行游说。孔庚以日本士官学校前后同学的关系，向蒋游说西南团结的重要，说唐继尧如何虚心，希望同广东方面的同志共图大举等等。蒋介石开宗明义地对孔庚说：唐继尧是一个联省自治的倡导者，他是我们的敌人，陈炯明的朋友，漫说他并未就护法讨贼军副元帅，就是他真是一个孙大元帅的副手的话，他已经反对孙大元帅的革命方针，他还有甚么理由，有甚么条件同我们谈团结呢？好在你此次南来是光杆一身，一无所有，我们这里还要用人，你如果愿意同唐继尧断绝关系，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我只能以老同学、老同志的关系接待你；如果你还要打着唐继尧的代表身份，这里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孔庚鉴于形势不妙，就答应跟着蒋介石走。孔庚带着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雷大同当秘书，他们俩人到黄埔住了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党军即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孔庚本来同刘震寰来往密切，又有唐继尧的关系，因而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在回师前，蒋即电令黄埔军校教育长胡谦将孔庚、雷大同监禁起来。有一天我奉命去侦察他的情况，因为是同乡，在黄埔又一同生活了些时，我把有关的问题问完了以后，他紧拉着我说：我的问题，不怪蒋校长，我知道这是胡展堂（胡汉民的字）的鬼把戏，他怕唐蓂赓继承了大元帅，他那个代帅落了空。他早就恨

我，……我在前方同蒋校长谈得很好，为甚么突如其来地这样对待我呢？你应该为我向蒋说说公道话。言次气愤到要流出泪来。孔庚自从大同镇守使下台以后，即穷极无聊走投无路，跑到云南，也无非是想依靠唐继尧搞点政治或军事上的活动。适逢其会，孙中山去世了，广东的局面好象是群龙无首的样子，唐继尧与孔庚之间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于是孔庚有广东之行。孔庚在黄埔关了一些时，等讨伐刘杨的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他释放出来，并送了他三百元的路费，一张船票，算是很客气地驱逐出境，这就结束了唐继尧派孔庚到广东游说，妄想继承孙中山做大元帅的一段公案。

党军回师广州

军队进入城市很容易腐化，是雇佣军队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滇桂军，在当时东下是饥军，一旦进入华洋杂处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广州，有新式的赌场，有旧式的烟馆，有上、中、下三等的娼寮，纸醉金迷，无奇不有，岂有不留连忘返之理。滇桂军将领自以为拥孙驱陈有功，孙中山又是一向以宽大待人，他们就一生一世在广州吃着不尽了。他们就凭这一套本钱，横行百粤，无法无天。他们把新兴的黄埔军事集团，视为无足重轻，把东征的胜利，视为是粤军的内战，杨希闵、周自得俾昼作夜地吹大烟，廖行超、范石生、赵成梁等不顾一切地刮地皮，声名狼藉、民怨沸腾。这些老爷们不懂得做事，也不懂做人。滇军在北教场办了一个滇军干部学校，也有一千几百学生，学校的规模与黄埔军校大同小异，只是精神上有所不同，也是廖仲恺任校党代表，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没有成立），苏俄顾问团也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学校当局对我们非常冷淡。

校长是杨希闵的参谋长周自得兼任，他又兼广州市公安局长，他一身兼无数要职。他的生活同唐继尧、杨希闵一样，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他兼职很多，办公的时间很短，经常一连几个星期不到学校，岂有不百事俱废之理。他们在广州向人民搜刮的钱很多，都入了私囊，不做一点正事。学校的设备，东倒西歪，教官休息室、会客室，桌椅不全，连茶壶茶杯都没有。我每次去上课，有一个姓周的教育长接待我们，每有攀谈，他总是要请廖党代表拨款成立政治部，要苏俄顾问拿军械给他们成立教导团。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代表团对黄埔军校与滇军干部学校是不公平的对待；一九二五年春，有一次该校举行毕业典礼，时间是下午五点钟，杨希闵、周自得到得很晚，他同苏俄顾问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黄昌谷代表大本营参加，算是代帅的代表，也只有相见点头而已。他们对毕业生讲完了话之后进行照相，他们自己都高高在上地坐着，把我同黄昌谷及苏联顾问挤到人丛中，看不见前后左右，真叫我们哭笑不得！如此可见滇桂军不仅是横暴，而且是麻木，他们如果长斯占据广州，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人民不堪其扰，政府无事可为，革命政府还成甚么局面呢？这就是党军回师广州，讨伐刘、杨的主要原因。至于战争爆发前后，我们宣传杨希闵、刘震寰、赵成梁等勾结北京政府，企图颠覆革命政府，容或有之，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甚么真凭实据。

蒋介石率领东征军进驻潮、梅，陈炯明所部退驻福建、江西边境，实力并没有完全消灭；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在潮州宴东征军上尉以上的军官。他在宴会上说："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众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他的这一段话载在蒋介石初期的讲演集上，几乎是举世所共知。所以国民党的右派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蒋介石在当时对苏俄对共产党的甜言蜜语，够使人迷惑的了。所以当时一般共产党人都认为蒋介石对中国的革命是有作用的一个人物，中国的革命需要他。在事实上，孙中山死了，是需要一个继承孙中山的人；但谁也不够继承孙中山，谁也不敢自封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不推重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与无意之间就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已极明显，但共产党从中央一直到广东地方，还以为这是右派包围蒋介石造成的事变，仍然把蒋介石认为是一个左派，至少也认为他是可与为善的人。约在三月二十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在黄埔宴请党军上尉以上的军官时，他的讲话中仍然指责共产党不信任他。中山舰事件明明是右派陷害李之龙的一个阴谋，他说成是有人阴谋倒蒋，还故作惊人之笔说：这个疑案要千秋后世才能明白，这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方面没有从正面驳他。在党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有周恩来及在第一军远戍潮汕的同志没有到，其余到会的共产党员约百余人，包惠僧、傅维钰等也讲了话，主要的内容是从侧面说明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拥护到底，拥护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对三月二十事变的阴谋，对李之龙无辜被捕的暗害，没有提出来批评和指责。这样无原则的迁就，更助长了蒋介石的逆焰。当时的局势下，共产党应该团结国民党的左派，对国民党的右派作无情的斗争，争取蒋介石向左转。但是，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区对蒋介石国民党退让来维持国共的联合战线。这种退让在事实上就是对右派退让。当时我们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对中央退让政策是有怀疑的，这种怀疑归结到中国革命是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物，而化为乌有。所以大家只好忍气吞声，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广东的艰巨任务。蒋介石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苏俄的帮

助，才有两次东征与回师广州剿灭刘、杨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广东的局势是：军人割据的情况，恶劣到了顶点；滇桂军大部驻广州市；赵成梁驻北江；廖行超驻西关；刘震寰驻东关；曾万锺、杨池生、杨如轩等驻石龙、增城间。杨希闵的总司令部驻在广州中心区的八旗会馆。他有六个警卫团，装备比较齐全，是杨希闵的主力，分布在市中心区永汉马路及广九车站等交通要地，总共约三万余人，约有枪枝二万五千余枝。粤军许崇智部有一部分精锐部队参加东征军而外，尚有梁鸿楷一师，张国桢一师，许济、梁士锋、杨锦龙各一旅，残缺不全，驻在西江；李福林的福军驻在他的老巢河南。还有谭延闿、陈嘉佑的湘军驻在韶关以北，建国滇军朱培德部不及二千人、赣军李明扬部不及千人也驻在北江。还有何成浚的鄂军，程潜的攻鄂军各七、八百人驻在韶关附近。尚有无兵司令如柏烈武的建国皖军，胡谦的建国赣军，赵杰的鲁豫招讨使等部，这都是革命政府的疮疤，人民的负担，没有什么作用。

党军方面：东征军抵定潮梅，经过了三、四个月的休息补充整理，党军与粤军之一部共约二万人，约有一万五六千枝枪，黄埔第二期已经毕业的学生约七八百人，第三期的入伍生约千余人，这两千多学生军武装齐全，必要时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并联合湘军谭陈两部约八、九千人，有枪约六、七千枝，各种杂牌部队共约四、五千人，有枪共约三千余枝，再加西江许崇智部，党军实力与滇桂军比较略占优势；惟党军分散在东江、北江、西江三方面，主力在东江，战线较长，交通联络设备不够，故指挥作战与三面配合作战上较有困难，不若滇桂军的兵力集中，交通方便，兵力的调配使用较为灵活。

一九二五年六月中，东征军回师广州，前锋到达石龙，准备向广州攻击前进，革命政府的党政各机关及中央银行，都撤到黄埔，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延闿、陈嘉佑（湘军由鲁涤平指挥）、

宋子文等都到了黄埔，住在长州要塞司令部，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跑到了香港、澳门，我们不参加战争的同志及眷属，在党的组织计划之下，暂时退出了广州。杨希闵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在广州宣布戒严，他的司令部仍设在八旗会馆。他派周自得为广州市卫戍司令，派赵成梁为广东省长，在广九车站设前敌总指挥部，赵成梁任前敌总指挥，他们的防线布置在瘦狗岭与白云山之间，福军也在河南宣布戒严，它对双方都有勾结，它是广州的地头蛇，谁也要买他的账，它虽然不能成大事，但可以制造小麻烦，这就是福军的特性。

战争爆发了，党军两个教导团配合粤军之一部任前驱，在瘦狗岭与白云山之间，打了一天多硬仗，滇桂军的生活虽然腐败，打起仗来亦甚骁勇，滇军的特点就是在火线上沉着。它无论官兵，每人都有两枝枪，一枝是步枪或是手枪，一枝是鸦片烟枪。他们在阵地上一面打仗，一面抽鸦片烟，他们能在弹雨枪林中沉着地抽烟，如果烟抽饱了，瘾过足了，也能冲锋陷阵。杨希闵的六个警卫团，装备比较好，他们在正面作战，同党军打了一天多硬仗，双方都有死伤。到了第二天，黄埔军校二千多学生组成一个突击总队，由张治中率领，苏俄顾问契齐班诺夫等参加指挥作战，在黄埔上游腊德炮台附近上岸，袭击滇桂军的后路。这是一支奇兵，滇桂军没有预想到黄埔还有这样装备齐全作战英勇的新型部队，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一队奇兵正打在滇军主力六个警卫团阵地的后面，使滇桂军受到严重的打击。还有一支奇兵，出其不意地缩短了这次战争的时间，也是滇桂军所意想不到的，即是飞鹰兵舰上的炮战。飞鹰兵舰年久失修，停泊在黄埔江面很久不能行动，在这次战争爆发后，由苏俄顾问的建议，把飞鹰兵舰拖到腊德炮台附近，利用原有的炮位装备起来，原不过是作为掩护黄埔学生军渡江之用。作战到了紧急关头，苏俄顾问在飞鹰兵舰上继续不断地开炮助战，

在射击时并没有甚么很正确的目标，不过是向敌人的阵地射击而已，事有凑巧，刚刚一个炮弹射进了广九路车站赵成梁的司令部。赵成梁正在那里同杨希闵吃饭，炮弹开花，把赵成梁炸掉了半边死了，杨希闵虽然没有受伤，但在这样的突变情势之下，也就无心恋战了。他急忙地部署了防守的战斗，就带着赵成梁的死尸回到广州，把赵成梁的尸首送到省议会，还没有等到棺殓，即回到八旗会馆准备召集一个会议；但是，广州市的水电都被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破坏了，电话不通，水源断绝，电灯不亮，他已成了“孤王的锣儿也不响了，鼓儿也不响了”的局势。杨希闵就不得不自己驱车亲自去找周自得，不知周自得的去向，又到西关去找廖行超，也没有找到廖行超的踪迹。他鉴于大事已去，就一溜烟地跑进了沙面，滇军就此完全瓦解了。桂军刘震寰部原不过四千多人，滇军败北，它们的部队退到西村，全部缴械，刘震寰也走了杨希闵的路了！滇桂军盘踞广州两三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妾成群，在战事爆发之前，都是收拾细软，在港澳间另筑香巢，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所以赵成梁一死，即形成瓦解之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兵各方面的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区以内的工人学生破坏交通及宣传鼓动，使敌人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近郊农民自卫军为党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送茶水，通情报，所以党军士气旺盛，进军神速。滇军干部学校、桂军讲武堂差不多是完全投到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之下，以及各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都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配合党军，作各种打击敌人的活动，对于扩大战线、缩短战争的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军回师广州解决刘、杨的战争，算是很顺利地胜利完成，滇桂军除杨池生、杨如轩、曾万锺等带着两三千人逃到江西投降了北洋军队而外，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缴械投降，当时收容俘虏，安抚流亡，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当滇桂军刚溃败时，李福林的军

队首先侵入广州市，大肆抢掠，见了外江人就打，除了掳掠财物而外，还强奸妇女。福军的野蛮与排外的特性，在商团叛变中，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黄埔军校政治部事先在一、二、三期的学生中，挑选了四、五十个精干的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有少数的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宣传队，派共产党员李之龙为队长，尽先进入广州市，他们的任务第一是为各方面地下工作人员办接应；第二是布告安民；第三是驱逐散兵游勇，防范匪盗，救济难民，维持市面上的秩序。当时党军的符号：官兵都带着鲜红的领带；福军因为是我们的友军，他们的每一个官兵都是光着头，赤着脚，身穿一身烤绸褂裤，脖子上也系上一块红布条，在大街小巷横行抢劫；黄埔军校的宣传队一律是黄卡其军服，俄式军帽，绑腿皮鞋。市民一望而知是黄埔革命军，表示欢迎，寄予希望，福军一望也知道是黄埔的队伍。虽然宣传队的人少，福军的人多，但是黄埔军校的威信已经树立起来了，对宣传队也只有望而却步。宣传队对福军恩威并用，经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才把福军赶回到河南的老巢。宣传队并会同滇军干部学校及桂军讲武堂的学生，会合协助党军收容俘虏，被俘的滇桂军共约二万余人，分别收容在广州市东郊的燕塘，西郊的西村及黄埔。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官兵差不多都调出去作战或服战勤去了，校内只留下代理教育长胡谦及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及少数的秘书、副官、参谋，及一个入伍生连，不到一百人，负校本部及长州警卫之责，并办理调配船只，输送给养等任务。

战事甫告结束，在黄埔避难高级官员刚上船回广州，校本部即接到前方的命令：在黄埔设立第三俘虏收容所，由校本部留守人员中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俘虏管理处，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学校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传令兵就来报告：已有几十只民船，装满了俘虏到达学校门口，正在陆续上岸。从上午九时

起到下午三时止，陆续运到黄埔的俘虏达五千余人。黄埔的民房极少，学校的房屋亦仅够用，突然增加了五千多人，真是无法安置，只好叫他们睡在黄埔江岸边树林底下。据说他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饭，每人背一支卸掉枪机的步枪，腰上还挂一支鸦片烟枪，东倒西歪，面无人色。他们不仅要求吃饭，而且还要求抽鸦片烟。黄埔军校的官兵从来没有达到五千人之多，这样多人的炊事器具要临时去购买，米粮也要临时去采购。无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怎样好，事务上安排得如何周到，我们没有方法满足他们物质上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恶劣，情绪不安，有的要投水，有的要吊颈，有的哭、有的叫，秩序之乱，形势之紧，至今回想，犹有余悸！当时有人说，这五千多带枪的俘虏，就是没有枪，如果暴动起来，那不到百人的学生队如何招架！因此我们一面温语相劝，一面布置警卫，学校的大门，架了两挺机关枪，组织了不同番号的巡查队，警卫哨虽然稀疏，看起来也还是星罗棋布，戒备森严。那几天中把那九十多名的入伍生真是忙得不能开交，背着枪巡查，持着枪站岗，轮流转换，换来换去还是那九十多个学生。政治部的三个科长，校部办公厅的三个参谋两个副官，都是马不停蹄地放下笔就拿枪，丢下枪又要对俘虏作宣传讲话。胡谦很不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收容俘虏，不是后勤工作，简直是在前线作战，并且是一次艰苦的战斗！我笑着说：我们作战没有兵，我们简直是唱空城计。我们大家白天不能休息，夜晚不能睡觉，象这样支持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出征的学生总队才凯旋归来，同广州的交通也恢复正常，学校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我才到广州，军官学校校本部行营设在八旗会馆，我到那里同周恩来见了面，汇报了工作情况。我便去看蒋介石，因为他有事，约我第二天上午十时见面。我即回到东山慈幼院街我的家里，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到香港避难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夜晚八、九点钟时，她才回来。乱离的时间虽然不长，经过的场面不能说不

险，所以我们见面之后有欢喜若狂之态！第二天上午，蒋介石约我在长堤军官学校办事处见面，这是我同他第一次会见。我们见面之后，他问了一些学校的情形，及政治部的工作情况。他并说：周主任（恩来）很忙，一时不能回学校，你快一点回学校去，继续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北教场入伍生第一总队讲话，突然有滇军之一部约三四千人，越过白云山向广州市袭击，前哨到达东山附近；而我们的部队因为打了胜仗，大部敌人已被消灭，在放假休息中。当时，蒋介石同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仓促中率入伍生队任前锋打了一仗，接着教导团（教导团驻在北教场，党军第一旅司令部在造币厂）赶到，把这一部分滇军打败，向北江落荒而走。原来是杨、刘没有失败前约曾万锺、杨池生、杨如轩等定期会师广州，杨、刘失败了，他们在行军途中不知道，进入近郊，遭遇党军有力的抵御，尤其是听见党军的机关枪声，才知道形势不妙，向北江逃窜去了。在北江本来有湘军及好几种杂牌部队，如果他们和党军一样作战，这一部分滇军可以完全消灭，因为这些都是雇佣军队，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他们相互之间可能有互不侵犯的默契，所以杨池生、杨如轩等部平安地逃到曲江以北，投降到进攻广东的北洋军阀方本仁那里去了，而广东的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廖仲恺被刺的前后

滇桂军被党军消灭了，粤军许崇智部完全进入了广州市，设总司令部于东关省议会。它把在西江的一整套搜刮人民的机器所谓财政、税务、厘金机构的全套人马搬进了广州市。因而赌场、鸦片烟馆、娼寮布满了广州市，一切的一切与滇桂军反动统治时代是一模一样；原在西江替许崇智当财政处长及主持税务厘金的人物如

张难先、李基鸿、关霁等都成了广州的要人，粤军的将士，无不弹冠相庆。而黄埔军校系统的党军每月最低限度的军饷还不能及时发放，这样，粤军与党军就不能不发生矛盾。此时的省长是廖仲恺，他虽然是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是他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方法来解除这些矛盾。共产党人建议他“禁赌”、“禁鸦片烟”、“统一税收”、“整顿市政”，他虽然同意我们的意见，而迟迟不能提出来付诸实施。在许崇智方面，以为孙中山死了，他是粤军总司令，就是惟一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是他的参谋长，又是后辈，他以为蒋介石是没有问题的，他并把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看成是他的力量，他就这样行所无事地抽他的鸦片烟，玩他的女人，他自以为是太平无事的总司令，不作别的打算。在蒋介石方面，以为孙中山死了，广东是个危局，他联合共产党，统率党军，完成了“第一次东征”，又解决了滇桂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他把所有的这些胜利据为己有，他有继承孙中山的企图，他想拉拢共产党人，壮大他的声势。而胡汉民、汪精卫是首鼠两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又想依靠共产党和苏俄发展革命势力，又想联合右派，维持国民党的党统。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之下，也很矛盾，一面派了很多的同志同蒋介石一起发展军事力量，而在《向导》上又写了很多论文主张放弃军事行动，到民间去的号召；因此把我们的军事工作陷于被动，形成了帮助蒋介石的军事工作，没有作积极发展与独立活动的打算，甚至只着重军事政治工作，不重视军事工作，这样就纵容了右派，给孙文主义学会发展的机会，铸成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失败的大错。

粤军进驻广州，毫无革新的气象，军人包庇烟赌，截留税收，使政府的财政无法整理，党军饷源陷于枯竭，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廖仲恺调和于许、蒋之间，使党军饷源得到保障。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任蒋介石为广州

卫戍总司令兼党军司令官，仍兼黄埔军校的校长，形成了广东惟一的新军事势力，粤军将领颇不满意。在蒋介石并不满足，廖仲恺居中联系，颇费周章。

在国共合作之初，以广东人为中心的有所谓“元老派”和“太子派”。元老派是以胡汉民为首，主要的干部有胡毅生、林之勉及李福林、梁鸿楷等。太子派是以孙科为首，主要的干部有吴铁城、陈其瑗、马超俊等。这一帮人物有排外的天性，有反共的宿根；孙中山在世时，他们为了服从孙中山，对三大政策虽不满意，也就无可如何；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以一个外江人，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力量，这对广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在反共的共同目标之下，把所谓“元老派”、“太子派”以及广东土著的军人政客团结起来，这个反动集团无疑地是以胡汉民为首，不过胡汉民不出头露面罢了。

在解决刘、杨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与中共及苏俄顾问团协商安排之下，派胡汉民到苏俄考察政治。胡汉民到苏俄未及三月即行回国。他回到广州之后，在公开的集会上装出很进步的姿态，暗中却勾结所谓“元老派”、“太子派”的人物以及国民党老右派，发动反俄反共的阴谋，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他们把共产党及共产党人无可如何，他们其次恨的是党军，但是当时的党军在广东是一个新兴的力量，他们把党军也无可如何。在国民党中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廖仲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了攘夺权利，颠覆革命政府，把所有的怨气集中在廖仲恺等人的身上，在广州文华堂成立一恐怖组织。他们收买粤军的一个旅长兼民团司令的朱单文，负责指挥他的党徒对廖仲恺等进行暗杀。在廖案发生后，当场被捕的凶手陈顺口供说：进行暗杀的人物除廖仲恺外，还有鲍罗廷、谭平山、蒋介石、汪精卫及共产党人

周恩来、陈延年等。这个阴谋组织事先散布流言说廖仲恺、蒋介石等都是共产党员，廖仲恺在死难前还发表谈话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希望得到右派对他的谅解。他虽然对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忠实执行，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同右派的联系，并且煞费苦心地想把右派同共产党人拉在一起。一九二五年初夏，我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他屡次要我去请胡汉民到军校给学生讲话；他再四叮嘱我同胡汉民多联系。我们当时是分清了敌我的，我们从商团事件中就认清了胡汉民是右派的领袖，国共合作的暗礁，革命的敌人。廖仲恺每次要我去看胡汉民时，我总是支吾其词，我感到难过！他也看出了我的思想情况。他有一次问我："你为甚么怕见胡先生呢？你在没有任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前，是不是也怕见我呢？我记得你在党员训练班工作时，我们不也是常常见面吗？你也没有同我说过话，我们现在一起工作了四、五个月，我了解你是一个热情任事，勤谨工作的同志，所以我想把你的政治关系从各方面联系起来，将来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多更好。你还是应该去看胡先生，也应该去看汪先生。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为学生多请几个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做的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也应该多同国民党的同志联系。"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对我微笑，还期待我的答复；我答应说："我并不怕见任何人，我就是因为忙，不可能常去看他们，汪先生到黄埔讲演过几次话，每次都是我接待他，我们谈得不少；胡先生每次排了他的课，用书面通知他，他没有去，我就替他代了。如果廖先生一定要我去当面请他，我当然要去。"他接着说："他是有点架子的，你耐烦一点，你今天就去看他一次，约他给学生讲话，不要限定他讲甚么，你现在就坐我的车子去。"他送我下楼还说："你不要说是我要你去的。"他在国共合作中对人事的联系上，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我约胡汉民到学校去讲演，他倒很愉快地答应了，时间就在第二天下午二时至四时。他讲的

是《马克思学说与孙文学说》。他牵强附会地把孙中山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是社会病理学，孙文学说是社会生理学。他武断地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学说，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够，并引经据典地讲了两个钟点。学生听了都不高兴，尤其是我们的同志，都对他怒目而视，有人站起来要发问，我制止了。接着我又陪他坐小汽船到大沙头对面东山医院的疗养院去看蒋介石的病；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甚么病，自从剿灭滇桂军以后，他自以为是不世的功勋，他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在结束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时，在军事方面许崇智压在他的头上，政治方面汪精卫、胡汉民等都算是他的前辈，党的方面，他不是中央委员，无法插进去，虽然廖仲恺帮他的忙，得以一身兼三要职，他仍感不满；他把广州卫戍司令交给党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党军司令交给何应钦代理，军官学校校长交给教育长王柏龄代理，他自己托病进医院，这就说明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我同胡汉民进了蒋介石的病室，问了他的病状，他说：神经衰弱很厉害，夜晚不能睡觉，医生说要休息。但他的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病人。我们扯谈了一下，就辞出，他送我们到房门外，胡汉民还很殷勤的样子，叫他好好休息。我们上了小汽船，顷刻之间就到了广州。我同胡汉民分别后，就到八旗会馆看周恩来。他告诉我说：党军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希望你担任第三团党代表，他已同廖党代表谈过，廖先生已同意了，我也同意你去，你看如何？我说：你同延年同志同意我去，我当然就去。他说：你去同延年同志谈一谈，我想他一定同意。过了几天，我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调我任党军第三团党代表，邵力子接我的下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鲁易任副主任。我同邵力子很快地办了交接，我就到北教场党军第三团就职视事。这一团是新成立的，完全是新兵，我们做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工作，李默菴跟我到党军第三团任少校干事。约在八月底、九月初，有一天

下午三时左右，李默菴从中央党部回来说：中央党部发生了暗杀案，廖党代表同陈秋霖到中央党部办公，下了汽车走上台阶即迎面来了凶手约四、五人，向廖党代表围攻，廖党代表受了重伤，陈秋霖当场毙命，廖党代表的卫士对凶手还击，当场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廖党代表已送到东山医院去了。

我们得到这个青天霹雷的消息，都叫起来"反了！"党军各部对廖仲恺有深厚的感情，平常都说：廖党代表是党军的慈母，我同他的公谊私交也非常密切，对他的生命总希望没有危险，我同钱大钧马上跨上了马，一口气跑到东山医院，匆忙地跑进了他的病房，医生说伤重到医院即断气了。他的遗体已收拾干净，躺在病榻上，倒是面目如生，眉心里中了一枪，枪眼很小，可以看出凶器是一只很小的手枪，大概这就是致命的一枪。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站在他的遗体旁边哭得泪人儿似的。我们安慰了她一番，我们一致说：要为廖党代表报仇。我们出了医院，又到惠州会馆去看出事的地点，看完了，钱大钧回北教场，我便到文德路我们党的机关部找陈延年汇报情况。共产党人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有计划的阴谋，这是反共的一个讯号。我说：如果我有权，把所有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分子一起逮捕起来，严加审讯，此案不难水落石出。陈延年说：看吧！看国民党怎么办？当天夜晚我又到周恩来家里，他此时已同邓颖超结婚了，他住在万福路的一个横马路新建洋楼的二层楼上。他说：这个问题当然不简单，是两党合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一定还有事故发生，你要经常住在部队里，好好掌握第三团。我们谈到深夜才分手，我仍回到北教场党军第三团。第二天廖仲恺的遗体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大殓，所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蒋介石等都到了，大家都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思似的，很少说话。我到楼上秘书处的大办公厅里遇着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问入伍生的训练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从

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几句话就走开了。我当时想：这个家伙就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戍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我们虽然看得很清楚，而国民党的当权人物，都在装糊涂，口头和命令都叫嚣缉凶，而对于摆在面前的凶犯，却熟视无睹似的，我真感到闷气。廖仲恺的灵柩停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了几天吊，各工农团体和个人参加吊唁的甚众。出殡的那一天，参加送殡的约二、三十万人，墓地在东郊沙河邓仲元的墓地附近，送殡的人排成四路纵队，从惠州会馆经过东堤到永汉路转惠爱东路经过红花岗、黄花岗到沙河墓地，真是人山人海。我同周恩来、林伯渠共乘一辆汽车。我们送葬的行列到达永汉路时，忽然一阵狂风把商店一个三层楼上的招牌刮了下来，一声怪响，登时秩序大乱，多以为又出了甚么乱子，好在沿途服警戒勤务的是我们的党军队伍，一会儿就恢复秩序，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广州，到处都是人心惶惶的。

廖仲恺死了以后，经过相当时间的考虑，决定由汪精卫继任军官学校的党代表、兼党军的党代表。在剿灭刘、杨以后，廖案发生以前，党军已有长足的发展，原党军的三个团编为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一团团长刘峙，党代表先为缪斌，后为贺衷寒；第二团团长先为沈应时，后为金佛庄，党代表先为张静愚，后为金佛庄；三团团长钱大钧，党代表包惠僧。这是党军的基本部队，政工人员十之六七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在党军中威信很高，蒋介石也很尊重他。新成立的党军第二师，编制规模同第一师一样，惟官兵质量较差，政治空气不浓厚，师长王懋功、师党代表缪斌，三个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调升的，大部分是雇佣军人出身，有一部分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共产党人也有一部分在这一师搞政治工作，因为人少，根基浅，故作用不大。王懋功是一个极狡猾的军人，他是面面俱到，他本来是许崇智的一个旅长，他看到蒋介石

比许崇智有作为些，他就丢掉粤军旅长到黄埔军校来当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他自命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提升为党军第二师师长兼代广州卫戍司令。他对共产党人处得很好，同汪精卫更密切。军官学校已招到了第五期，当时有两个入伍生团，一个学生总队，一共有五千多人。党军的力量虽然是这样的发展，但是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革命的军事力量与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对比，反革命的军事势力还是占优势。廖仲恺是为联俄联共，发展黄埔革命军事势力而死，这就可以说明反动势力在广州市潜伏的力量很大。而掩护反动势力与发展反动势力的是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的政治地位、许崇智所部多种多样的反动粤军。这个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不澄清，革命的根据地是难得巩固的。其次，党军原仅有一套本钱，第一次东征，广州的滇桂军就造起反来，回师广州剿灭刘、杨，陈炯明的军队跟在党军的后面前进，又恢复了第一次东征以前的局面，陈炯明的前线又达到石龙，有随时进袭广州的危险。再其次熊克武、汤子模的川军约二万余人，从湘西进到广东的北江，来意不明，也有随时侵入广州之势。这三种反动的军事势力，如果处置得不当，或是同时发生暴乱，广州市就可能一塌糊涂，有不堪设想的危险，这是罗列在党军面前的问题，也就是国共联合战线当前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为得处理这些问题，苏俄代表团，共产党人和蒋介石等作过缜密的研究，才决定从处理廖案着手，先解决反动粤军，羁縻川军，再准备第二次东征。

约在九月下旬，党军部署已定，有一天的半夜开始行动，党军第一团包围粤军驻在西关一带的梁鸿楷部，并进行逮捕梁鸿楷、胡汉民、胡毅生、林之勉及李基鸿、关霁等。党军第二团会同湘军监视北江的川军，并在广州逮捕熊克武、汤子模等。党军第三团包围东关粤军总司令部，并监视许崇智（许住东山），党军第二师之一部会同党军第三团解决驻在石碑的粤军杨锦龙、梁士锋、张国桢部，

第二师另一部对虎门东莞一带警戒。

胡汉民做贼心虚，从廖案发生，他即知道有这一天，胡毅生知道形势不妙，老早逃到香港去了，胡汉民自以为是老资格，他又没有亲自动手杀廖仲恺，就故作镇静在广州不动。当天夜晚他一听到有人打门，即从床上跑下来，赤着脚由后门溜出去，逃到汪精卫的家里，请汪精卫保护他。汪精卫一面招待他，一面打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派员把胡汉民送到黄埔软禁起来。对许崇智倒比较客气些，蒋介石写一封信，派陈铭枢当说客，劝他暂到上海去休息，约定三个月以后，他把广东整理好了，再请他回来，并要陈铭枢送他到上海，还送了二万元的旅费。许崇智已成瓮中之鳖，只好答应，当天就上船到上海，度他的寓公生活去了。梁鸿楷送到黄埔，关在长州要塞炮台下的地道里，熊克武、汤子模送到虎门，关在要塞炮台下的地道里，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逮捕不久即执行枪决，其余被捕的还有胡清瑞、林之勉、李基鸿、关霁等都关了监，一直到北伐军动员前，蒋作宾到广州为李基鸿作保，李基鸿、关霁还报效了不少的钱给蒋介石才释放出来。原粤军许崇智统率的部队，除李济深所部的陈济棠、莫雄、陈铭枢、张发奎等四个旅是照旧而外，其余的各部均经严格的裁汰，许济一师原系粤军的精锐，改编为党军第三师，任谭曙卿为师长，粤军的杂牌部队除在战场上消灭了大部分外，散而为匪为盗的也不在少数。

在解决粤军的同时，东江的陈炯明，南路的邓本殷都蠢蠢欲动，由党军补充整理过的张发奎部，轻装进入南路，在新会单水口打了一仗，就把邓本殷部完全肃清。在这一个战役中，廖乾吾任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把军民团结在一起，在作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缩短了战争的时间。

熊克武、汤子模的川军，因在四川为刘湘、杨森等所排挤，流亡入粤，有枪无弹，疲惫不堪，饥军就食，没有战斗力量，也没有政治

目的，熊克武、汤子模把部队停留在北江，赤手空拳到广州，到处拜客，不疑有变，就糊里糊涂地被捕了。金佛庄率领党军二团配合湘军对川军包围，责令缴械，听候改编。川军没有抵抗，全部缴械。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中，除在广州党军与粤军打了一天一夜而外，其余北江南路没有打甚么仗，川军大部分都解散了，只挑选了三四千青壮年士兵，编为军官学校的两个教导团，从此党军的实力震动了百粤，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州，统一广东的战争还有最后的一战，就是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是紧接着改编粤军、肃清南路、消灭川军之后开始进行的。在第二次东征之前，党军第一师的一、二、三团，是集中在广州市北教场训练，师司令部在旧造币厂内，也在北教场旁边。周恩来是第一师的党代表，但他不经常住在第一师司令部，因为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在长堤八旗会馆，他同蒋介石经常在八旗会馆办公，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在邵力子任主任及熊雄任主任时期，蒋介石都是交给周恩来处理，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如恽代英、聂荣臻、安体诚诸同志，以及高语罕、李召林等，都是由周恩来向蒋介石或军官学校提出任用的，无形中他是代表共产党的活动。

在准备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调我到党军第三师当党代表；因为这一师是粤军许济部改编的，师长谭曙卿是湖南人，行伍出身，虽然识字不多，他是粤军的宿将，兵士及下级干部都是广东人，它们差不多是许崇智的子弟兵，地方色彩很浓厚，政治工作，毫无基础，已编为东征军的作战部队，所以要调我去一面行军，一面整理。

我当时认为这是很不好做的一种工作。而党军第三团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兵，三个营中第一营营长郭俊，第二营营长唐同德都是共产党员好共事，第三营营长王禄丰虽然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但这个人很平庸，好控制，全团的干部和士兵我都处得很好。我知道打仗不是可以随便凑合的，如果这个部队我掌握不住，打起仗来是很容易出麻烦的。我是一个文人出身，没有作战的经验，我总以为在一次战斗中，不是成功，就是成仁，中间的路是很少有的，我不能不作一个比较安全的准备，所以我坚决不去。我同周恩来说，要调请把仗打完了再调，周恩来听了我陈述的理由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果然在华阳一战，第三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虽然有点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但是党军第三团在海丰一战，我们以两营兵力击溃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千余人，还俘敌千余人，我坚决留在第三团也算起了一点作用。

东征军设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是蒋介石，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是何应钦，所属的部队为党军第一师全部，第二师第五团，粤军张发奎一旅，总共约万余人，这是东征军的主力。第二纵队司令是李济深，所属部队是党军第三师全部，及粤军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总共约万余人。第三纵队司令是程潜，所属部队除攻鄂军全部不过二千多人而外，还有何成浚所部的鄂军及朱培德所部的建国滇军，拼凑起来一共也不过四五千人，担任总预备队的任务。另外有一个独立炮兵营，营长是蔡忠笏，是蒋介石的同乡，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总共东征军的兵力约三万余人。卫戍广州的部队除党军第二师四、六两团外，还有入伍生第一团驻沙河，入伍生第二团驻西村，吴铁城所部的警卫军驻广州市区，加以驻在北江的湘军及各种杂牌部队共达二万余人，卫戍司令仍由王懋功代理。

在讨伐滇桂军胜利之后，即将孙中山时代的大本营结束，成立

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得到中共与苏俄代表团的密切合作。苏俄代表团的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高等顾问加伦将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都到北京参加国民军的工作，还没有回来，苏俄顾问团由新来中国参加工作的季山嘉负责，东征军的军事顾问由罗嘉觉夫将军担任，还有步、炮、工各兵种的顾问一共有五六人。

这一次的东征，打了三次很激烈的仗，我们大概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由广州出发，在十月中旬就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惠州的城防司令是陈炯明的一个师长杨坤如，为粤军著名的骁将，而惠州倚山带河，三面环水，形势险要，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东征军在飞鹅岭布置了炮兵阵地，党军第一师第一团及第二师第五团任前锋；在炮火连天地攻打了四五天之后，敌人仍在城上沉着应战，毫无动摇的迹象，到了第六天，惠州城内着弹起火，北门的城楼被炮火攻垮了，城墙亦打开了一丈多长的一个缺口，第五团即开始爬城，在爬城的战斗中，党军死伤甚众。周恩来同苏俄顾问和蒋介石等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北门外督战，第三团驻守博罗县城，担任惠州攻城的预备队，整装待命出发中，第五团团长刘尧宸战死在惠州城下。从围城到城破，剧战十余日，敌人弹尽粮绝，由惠阳向紫金方面逃窜。惠州城攻下后，党军第三团奉命尽先进城，清理战场，安抚百姓。所见败瓦颓垣，尸横遍地，行人稀少，满目凄凉，我真感到战争的残酷。我们的队伍在惠州休息了一天，蒋介石同罗嘉觉夫将军召集我们讲过一次话。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团死伤惨重，残余部队不过三、四百人，由副团长惠东升调升团长，调回广州休息整理，东征军即分两路东进。第一纵队由平山、赤石、梅龙镇经海丰陆丰趋潮梅。第二纵队由河源、紫金经五华、兴宁定期在潮梅会师。总指挥部率领第二纵队进到紫金以东的华阳镇与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发生遭遇战，第三师谭曙卿的三个团打垮了两个，剩下的一个团还不完整，谭曙卿失去了指挥的能力，官

兵纷纷地从前线溃退下来。蒋介石带着很少数的卫队及政治部的工作同志进到了最前线，已到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关头。陈赓当时在政治部工作，他同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奋勇督战，还打死了几个擅自退却的官兵，才把战线稳定下来。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总指挥部，慑于党军的声威，以为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即向安流方面仓促退却；如果敌军再前进，这一纵队就会完全消灭，蒋介石不死就被俘！敌军到了胜利关头退却，宁非怪事。他们刚刚到达安流，党军的增援部队真赶到了，粤军陈济棠、陈铭枢两旅由五华南下，党军第一师一二两团由河婆北进，正在安流会合，打了一个大包抄，三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三师在华阳战役损失的人枪，在安流这一战除将原人原枪缴回而外，还俘获敌军官兵万余，步枪八千余枝，辎重器材无算。在这一战役，林虎的三黄部队，差不多完全瓦解了。这一路此后就没有打甚么仗。

在第一师向华阳增援的同时，党军第三团由平山、白云、赤石、梅龙进入海丰向沿海各县搜索前进，并派郭俊的一营到汕尾搜索、二三营及直属部队在海丰宿营，海丰城城东北面有一条大河，宽约二十余丈，不能徒涉。河上通陆丰方面有钢筋水泥建筑的一座大桥，名郑家桥。桥距海丰北门不过一二华里，这是一条公路，桥上可行四路纵队。我们到海丰宿营时，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来同我们联系过，据说距海丰三十华里之地，即有敌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共约七八千人，号称万余人。我们已知道了情况，即在海丰城北门外右侧面的一个小土山上设置了一个连哨，郑家大桥的桥头上设置了一个瞭望哨。当天的黄昏时候，我同钱大钧还亲去看过哨位，以为这样设防，不会有甚么问题。我们的团部，驻在城中心的一个学校的楼上。到夜半三时许，我们正在熟睡中，特务连长龙慕韩来报告说：北门外有很密的枪声。我是没有打仗经验的人，自行军以来即时时刻刻准备应战。钱大钧要打电

话到二三营去问情况，我说，枪声很紧了，我们到北门去看看。在五分钟内，我们都准备好了，带着特务连和侦探队，一个跑步到了北门外的一棵大榆树下，了解了前线的情况，第二营全部都投入了正面的战斗，第三营在左侧面的小山附近待命，正面的敌人已进入到我们连哨所在地的小土山上，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混战状态中，我们的机关枪无法施展，前进的号音，越听越近，步枪的子弹已经飞到我们阵地的前后左右。我们判断敌情之后，即派侦探队长俞济时率领所部从右侧方冲锋前进，抄袭敌人的后路，为第二营增援。传令兵来报告，二营营长唐同德受伤，正面有崩溃的危险，我们又将特务连挑选了两排人向正面增援上去，团部即再无战斗兵可调了，仅剩我同钱大钧的八个卫士及不到十名的传令兵，钱大钧同中校团副蔡熙盛、参谋长赵锦雯很恐慌，他们问我："党代表，怎么办？"因为执行连坐法的是各级党代表，他们见于形势不利，想退却，先回团部，向师部请援，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营长如果阵亡，我答应团部退却，是要受临阵脱逃的处分，是要枪毙的，无论向前如何艰难险阻，只能死中求生，不能向死路去就死，我当时答应说：退却是要受连坐法的处分的，我们还有二十几条枪，还有两挺机关枪，我们还有第三营，我们打一个冲锋上去把第三营拉过来，还可以希望挽回这个危局。龙慕韩同意我的意见，钱大钧也无话可说，于是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团本部由左侧方即第三营所占的高地前进。此时已到五点钟了，我们站在高地上，望见敌人的队伍密集在公路上，蠕动地前进，我们才开始用机关枪向公路上的敌人扫射，并命令第三营向郑家大桥桥头冲锋前进。俞济时部已先第三营冲到郑家大桥桥头，把敌人的一字长蛇阵的队伍截为两段，在桥头以东的敌人就不得不退却，在桥头以西的敌人就不得不缴械投降，这一战斗，告了结束。第二营的官兵死了二十余人，伤数十人，唐同德腹部受伤，抬到卫生队的临时医疗所。我去看他，他躺在铺板上很痛

苦地呻吟，我问他的伤情？他说："党代表！我怕不行了！敌人打退了没有？"我说："大敌击退，前线的敌人被俘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枝。"他忍痛微笑说："我们胜利了！"当天夜晚，他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唐同德是安徽人，江西讲武堂毕业，他是笃信共产主义、埋头苦干的一个共产党员，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没有结婚。战后审讯俘虏，据说：谢文炳亲到桥头督战，他们这一路军队企图绕过我们的第一纵队后路，由平山淡水趋樟木头、进取石龙，威胁广州。如果不是这一战我们胜利了，洪兆麟、谢文炳的部队冲到东征军的后面，东征军的全局，当为之一变，胜负之数，亦未可知。

当时何应钦的纵队司令部在公平，钱大钧当天中午骑着马到公平报功请赏去了。我们在海丰休息一天，郭俊的第一营也从汕尾调回来了。第三天拂晓，我们又从海丰出发，一路之上搜索前进，到陆丰宿营。敌人又在距陆丰约四五十里之博美一带逗留，据报有回窜的模样。我们在海丰粗心大意对待敌人，几乎吃了一个大亏，再也不敢马虎了。钱大钧、蔡熙盛、赵锦雯（团部参谋长），轮流守着电话，经常同前哨保持联系，了解敌人的动向，一直到次晨四点钟我们吃了早饭，开始行军。经过河田到河婆与第一二团会合，我同周恩来在马上见了一面，又分途向潮梅前进。我们由普宁、揭阳搜索前进，一直顺利地到达潮州，没有发生战事。残敌一部由饶平、大埔老路窜闽南，一部由平远窜赣南，陈炯明从这一次战败以后即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活。

东征军会师潮梅，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战役。我们从广州出发一直到抵定潮梅，不过五十余日，杀敌致果，党军的声威，震动遐迩。全部东征军分布在蕉岭、梅县、潮州、汕头一带，开始补充整理，在潮州设立军官学校的分校。在部队中挑选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中年青略有文化的入伍，各级军官政工人员都有升调，士气益盛。总指挥部在汕头，蒋介石、何应钦及周恩来均在汕头驻

扎，蒋介石召集过一次营级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整军、复员、布防各项任务。会议完了，举行宴会。在战后调整人事，调何应钦为潮梅绥靖主任，所有东江的军事均由他节制指挥，仍兼原职；调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长，主管政事、仍兼原职；调鲁易为党军第三师党代表；调包惠僧为军官学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未及就职又调教导师党代表；金佛庄调升团长；郭俊调升团党代表。营连各级人员都有升调。孙文主义学会方面的分子如刘峙、顾祝同、沈应时、缪斌、贺衷寒等都有升调。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与共产党人，常有磨擦，如缪斌、贺衷寒等与蒋先云、傅维钰等几乎是开口就相骂，动手就打架。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以团结与斗争相结合尚没有发生甚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广州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就很激烈。

我在参加了汕头的军事会议之后，请了一个月的事假回广州。我在海丰作战时，我的爱人在广州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在广州得知我在海丰的战斗中转危为安了，她就把这个孩子命名凯歌，此儿已在复旦大学当副教授了，她早已作古人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回到广州以后，同陈延年汇报工作情况，才知道广州和黄埔有新右派的发展，所谓新右派即是王柏龄、陈肇英、徐桴、吴铁城等联合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向共产党方面制造纠纷。有一次，在广东大学的一个集会中，打了一大架，双方都打伤了人，汪精卫对这些纠纷是一筹莫展。我去看汪精卫，他问了前方作战的情形之后，也提到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纠纷，他说：我希望能够从前方多调几位同志回后方工作。他或者以为这些纠纷是从人事的调配上可以挽回的。一会儿王懋功来了，自从我们出师东征以后，他在后方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他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他成了一时的红人，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同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也搞得不错，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我们没有把他看

得比蒋介石进步些。而新右派造谣中伤，说他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当时我同王懋功周旋了一会儿，我就辞出，下楼时遇着李之龙去见汪精卫，他此时是海军局长兼代中山舰舰长，也是广州的红人，新右派把他们两个看成是共产党的前哨，是他们的眼中钉。

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月，假满了，周恩来约我结伴回汕头。我们到了汕头，分别见了蒋介石，免不了一番的世故，他对我问长问短，表示亲切。第二天周恩来告诉我说："校长已决定要你当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地点在广州，入伍生有两个团，工作相当繁重。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时间在下月初，第一师要选出五个代表出席大会，我们党决定要你竞选，你把选举办完了，即将第三团的事务交待清楚，就回广州。"我照周恩来的指示，一面布置选举，一面准备办移交，在潮州、汕头停留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便动身回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二十事变的前后

三月二十事变，是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的开始，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讯号，中间的经过虽然很长，所发生的事故也很多，但这一切都不是三月二十事变的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蒋介石的阶级性，是他独揽军权、政权、党权的野心。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因为他是那样的一种货色，所以新右派才能包围他，他处处心虚，遇事猜疑，因此就爆发了三月二十事变。

第一：自党军回师广州解决滇桂军而后，国民政府是在国共联合战线中成立的，共产党人只有林伯渠、谭平山是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是少数，不占统治地位，应该不会引起蒋介石的反共情绪。主席是汪精卫，自廖仲恺死了以后，他兼军官学校的党代表及各军

的总党代表，事实上汪精卫是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不过负一部分或可以说是大部分军事责任的一个将领，关于最高的决策当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不可能也不必要遇事都要由蒋介石来决定。汪精卫本来是书生气重，处理政务和事务不够周密，廖仲恺没有死以前，一切事务有他周旋于汪、蒋之间，还没有发生甚么矛盾，自廖仲恺死了以后，汪精卫做他的主席，蒋介石搞他的军事，就有些貌合神离的样子，有的问题，汪精卫也找蒋介石商量，但不经常，也不自然；蒋介石是一个很猜疑的人，气量很小、脾气很大，因之汪、蒋之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发生一些隔阂；尤其是在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在前方作战，关于黄埔军校，广州卫戍司令部，新成立的海军局，以及其他军政机构的人事调配、制度的兴革、业务的推进等重大问题，都是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汪精卫在当时虽然是遇事同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团紧密联系，想把工作做好，但与蒋介石是比较疏远了。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是一个贪污腐化、奸狡诡谲的人，他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桴及海军方面的陈策、欧阳格等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他们同西山会议派也有联系，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争权夺利；他们以为广东的局面是蒋介石打出来的天下，就应该是蒋介石当首领，他们当股肱，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常为蒋介石发出不平之鸣，常说："中国的历史没有武人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的先例。"他们天天制造谣言，向蒋介石做情报，这是三月二十事变的导火线之一。另一方面，代理卫戍司令王懋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他原是许崇智所部的一个旅长，他以出卖许崇智投到蒋介石的部下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以第二师师长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门，他对共产党人也极尽拉拢的能事，他虽然处处表现很

进步的样子，在共产党方面，并没有改变对他的观感。在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为了军政军制军令的措施，他以代理卫戍司令的身分，得参与谋议，因之与汪、季之间的关系就很自然地逐渐密切，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同蒋介石的关系就比较冷淡，甚至在工作上应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的也马虎了，这就与蒋介石的爪牙王柏龄等以口实。王柏龄到处攻击王懋功，他说：王栋成是以“反水”起家的，校长相信他，将来是要吃亏的。王懋功对王柏龄也是一样，逢人便骂：“王柏龄是一个贪财好色、贪生怕死的小人，打仗的逃跑将军。”他们见面也毫不客气带笑带骂相互称呼：“狗屎”，互相倾轧到了极点。其次卫戍司令部与虎门要塞司令部为了走私的问题，王懋功与陈肇英利害冲突，卫戍司令部与广州市公安局为包赌、包烟、包娼的问题，王懋功与吴铁城也有冲突。他们相互之间差不多是仇人，尤其是王懋功，经常奔走于汪、季之门，表现出身势赫赫的样子，更增加了陈肇英、王柏龄、吴铁城等对他的嫉妒与憎恨，也就更招致他们对他的造谣中伤。再其次就是李之龙的问题：在孙中山没有死以前，大本营直辖的海军局与航空处两个机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处长，但没有正式成立。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俄专家自动辞去局长处长，由参谋团与国民政府商洽决定，派张静愚为航空处处长，李之龙为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武汉上海地方工作过，在国共联合战线建立之初，在广州曾任鲍罗廷的翻译，他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很熟悉。黄埔军校成立，他奉共产党的命令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蒋介石与廖仲恺的重视，成了国共联合战线中的一个有作用的人物。第二次东征军出发时，他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转任海军局局长，没有经过蒋介石同意，他也没有报告蒋介石，这当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李之龙本身的缺点很多，如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犯了不少的错误，曾经受过党的留党察看的处分。他当了海军局长以后，也同王懋功一样，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之门。他把陈肇英走私的勾当，报告了汪精卫，汪精卫下了一个手令给海军局：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着海军局厉行缉私。李之龙奉命以后，即把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扣留起来，人员拘禁、货物充公，陈肇英以下有走私嫌疑的人员，都受了处分，这样李之龙就与陈肇英结下了不解之仇。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间，我在教导师党代表任内，同蒋介石、王柏龄（教导师师长）到虎门东莞检阅部队时，陈肇英由广州同我们一路到虎门，陈肇英一面向蒋介石诉苦，一面托王柏龄央求我同李之龙说项，不要与他为难，请他把船只放回。他们在船上谈这个问题时，我在坐，我看蒋介石的态度对陈肇英并没有甚么指责之意，他只说："你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有误会的地方你自己应该向汪党代表报告，也可以同李之龙说明白，这不是甚么大了不得的事，不要小题大做。"我回到广州把这些情形告诉陈延年，陈延年说："李之龙也是太好多事了，陈肇英走私，王懋功、吴铁城还不是一样走私吗？一个海军局长管得了这些事吗？他也没有给我们报告，你去找他一趟，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他，教他要把这些事给蒋介石报告，把奉命缉私的经过说明白。"我特为去找李之龙谈了一次，李之龙对我和陈延年的意见表示抗拒，他说："我是奉命办事，校长也不能管我，我同他不同系统，我何必向他去做报告呢？"他并得意忘形地说："这一架最新式的留声机是陈策送的，那一套新沙发是欧阳格送的，海军将领差不多都同我处得不错。"我问："你的这些情况报告陈延年同志没有？"他说："我因为忙，没有去。"李之龙兼中山舰的舰长，也是爆发三月二十事变的原因之一。这只兵舰，是永丰兵舰改的，在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由广州逃上永丰兵舰，在白鹅潭与陈炯明炮战差不多有一月之久，改为中山舰，是纪念孙中山蒙难

的，陈策、欧阳格都做过中山舰舰长，它是国民政府惟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也就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李之龙兼了中山舰的舰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也不顺眼，李之龙更成为众矢之鹄了。

蒋介石在潮梅抵定之后，把军事政治都作了一番新的部署。在他准备回广州之前，新右派的人物，天天制造谣言，捏造情报，似是而非的消息，布满了蒋介石的前后左右。第一个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第二个谣言说："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第三个谣言说："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尚有其他含沙射影，挑拨离间的谣言很多。这些谣言，是另外一个天地制造出来的，我们的同志很少接触得到，即令间或听到一言半语，我们也不以为怪。事实是很明显的，国民党中有右派，有孙文主义学会，他们是一贯以造谣生事为目的，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当时把蒋介石是认为智者一流的人物，只要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难道说谣言与事实还分不清楚吗？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听到这些谣言，就疑神见鬼，造成了混乱。尤其是第二个谣言，更打中了他的心坎。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做了主席，他不服气，但是说不出口，他是一个权利欲望很高的人，只能叫汪精卫做他的配角，他不能做汪精卫的配角，如以后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林森一样，要听他的摆布。当时汪精卫做了主席以后，对于用人行政，大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势态，与蒋介石造成了不少的矛盾。尤其是汪精卫与季山嘉、王懋功之间关系密切，更增加了蒋介石的猜忌。其次黄埔军校的经费，没有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开支经费由蒋介石信笔乱批，他用钱的手笔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龄当教育长时，也和蒋介石一样，他狂嫖乱赌，还有三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他调教导师师长

时，邓演达继任教育长。邓演达新从德国回来，他是一个有才华又有朝气的人，对人对事，都很认真，他对人事经费控制得很严，他接手以后把王柏龄任内亏空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并要王柏龄把亏空填清再行离任，这样给王柏龄下不了台，也是给蒋介石过不去，因此王柏龄与邓演达结成了不解的冤仇。不仅在三月二十事变把邓演达与共产党牵扯在一起予以监视，后来一九三一年邓演达在上海被捕，以至蒋介石在南京杀害邓演达，与王柏龄的暗害有重大的关系。在当时我们看得很明白，这些谣言是王柏龄等制造出来的，而蒋介石偏信以为真，硬说有人阴谋倒蒋，要撤销军官学校，在三月二十事变之后他指明这是共产党倒蒋的阴谋之一。

在汕头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大会，是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的。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当选的占绝对的优势，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当选较少，连贺衷寒也落了选，这无可讳言的是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士兵同志，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群众中竞选，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仅仅是靠蒋介石支持，不接近士兵同志，他们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要士兵同志选谁与不选举谁，这在受过政治教育的部队中是吃不开的；在选举开票完结以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就罗唣起来，蒋介石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样有组织和得人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就是十个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也不及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能力。他由惊奇而怀疑，由怀疑而发生恐惧，最后蒋介石发了牛性，他硬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团、营长十余名，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谐合作的局面，蒋介石在当时是被认为左派的领袖，他的这一请求虽然不合法也不合理，但为了敷衍他的面子，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大会并通过了慰问蒋介石及东征军将士的电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寄予了无穷的希望。大会开了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的会他都没有参加。大会开了十几天，除了各项报告及讨论提案而外，最紧张的一幕就是詹大悲的紧急动议：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少有才气，颇有文名。辛亥革命前后，他任汉口《大江日报》主笔，鼓吹革命，颇负时誉，他同黄兴有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在阳夏战争中，他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自任为汉口都督分府的都督，阳夏战败，冯国璋火烧汉口时，黎元洪曾一度出走，是詹大悲带着队伍把黎元洪追回来的。武昌初起义时、各义军赶走了瑞征和张彪，共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黎元洪逃避，詹大悲带着军队从黎元洪家里仆妇的床底下把黎元洪找了出来，他对于辛亥武昌起义，算是一个有功的人物。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背着一个辛亥革命的伟人的包袱到处流浪，最后虽流浪到广东很久，因为他是黄兴那个系统的人，没有方法同孙中山接近。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他也是一个反对联俄联共的人，后来为生活所迫，才借何成濬在福建的一点军队，他就住在广州当何成濬驻广州的代表。一九二五年我在黄埔军校工作，家住在广州东山，与詹大悲为比邻，因为同乡关系，常有往来。我们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在这一次的代表大会中，他以鄂军的代表出席，董必武是湖北的代表，他们都是辛亥革命的老人，多年没有见面，旧友重逢、很感亲切，他接受了董必武的影响，在大会中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举行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的人物是居正、谢持、张继、邹鲁、邵元冲等。詹大悲的紧急动议主张开除居正的党籍，并以反革命罪犯交国民政府通缉究办。得到全体代表的拥护，一致通过。其实，当时同情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也还

有，如吴铁城、陈肇英、潘宜之及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等，不过他们是绝对的少数，他们慑于左派的强大威力，不得不赞成这个动议。代表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举。在选举之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选择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方面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表，一共不到二十个人。召集这个会议主要的动机是要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始终是保持缄默的态度，不表示任何意见，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除了蒋先生及何敬之(应钦)同志应该当选外，还有王茂如(柏龄)、王东成(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蒋介石就截断汪精卫的话题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甚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茨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甚么意见。"当时我们都针对蒋介石的发言，提了一些意见，差不多一致认为他应该当选，其余的我们都认为是次要的。汪精卫倒是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蒋介石从开始一直到散会始终是不自然地，好象是有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从汕头回来，就陷入新右派的包围中。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对汪精卫、季山嘉、王懋功的密切结合感到非常愤慨与不安，所以汪精卫一提到王懋功为候选人，他就面红耳赤地坚决反对。在汪精卫以为王懋功是蒋介石的亲信干部，同他自己也处得很好，他提出王懋功做候选人，并提王柏龄作陪衬，他以为一定不会有问题，讵料恰中了蒋介石的痛处，遭到蒋介石的反感。汪精卫虽是个很机警的人，当时并没有甚么突出的感觉，也没有提不同的意见，事情就算过去了。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三月二十事变以前，有一天早

晨，王懋功到东山蒋介石家里去见蒋介石汇报公事，蒋介石突然下命令解除王懋功卫士的武装，并送他三千元的旅费，一张船票，限令他即刻上船，同对许崇智一样的办法，驱逐出境，即以刘峙调升第二师师长。后来据钱大钧说：沈应时（是蒋介石的亲信，二十师副师长）有一次问蒋介石关于处置王东成的原因，蒋介石笑说："王东成的环境不好，为得保全他，所以教他离开广州。"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一次宴会中指明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军队的番号，把第七军空着，暗示我的部下反叛我之后，再将第二师与二十师（即教导师的后身）编为第七军来酬劳我的部下。"这里他所说的部下，就是指的王懋功，当时第七军的番号确实是空了一些时，我们也有点奇怪，这是不是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有计划教王懋功反了蒋介石之后，再给王懋功当第七军军长呢？这一段公案，我们当时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以我们从当时到现在的判断，苏俄代表团同中共不会有这样的计划，不会设想到用王懋功这样的一个人来代替蒋介石，汪精卫与国民党也不可能离开苏俄代表团和中共的关系而有这样的计划，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向导》第一百五十七期解释得很明白，可是也有点可疑之点。《向导》一百五十七期陈独秀给蒋介石一封公开的信说："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是没有倒蒋，别方面或是汪精卫方面有无倒蒋的勾当我们就不负责任呢？蒋介石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宴党军全体党代表时说得那样活灵活现，我们以前都认为这是国民党新右派的谣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我们谈到三月二十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崴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与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黄埔军校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有很多代表讲话，都是谈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在革命工作中的作用与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功绩。高语罕当时是共产党员，也是代表之一，他从法国刚回来，在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对国内情形及广东的状况不很熟悉，他也讲了话，所讲的内容同其他的代表所讲的话差不多，就是末尾提出纯洁革命阵容，分清敌我的界线，大意是说：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对任何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肃清在我们革命阵线以内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蒋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一样地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会上他也有类似的说法。这一天的欢迎会，蒋介石没有到，新右派就断章取义地抓住了这个小辫子，加油作醋说共产党指明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下的段祺瑞，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信以为真。到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党军全体政工人员讲话时指责这是共产党倒蒋活动之一。三月二十事变之后，高语罕在黄埔军校当然呆不下去了，对共产党当时的策略来说也算是犯了“失言”的一个错误，受到党的责难，他到上海给蒋介石一封公开的信①，把蒋介石恭维到九重天上，解释到水净沙明，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来说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权利的冲突，有阶级的矛盾，无论高语罕对他如何低首下心，也不会得到他的谅解。自此以后高语罕在共产党内有“高大炮”之称，其实高语罕那一炮并没有打中敌人，只算是走了火炸伤了自己，为国共合作的战线上多增了一条裂痕罢了。

在三月二十事变之前，我同王柏龄都在东莞驻防，此时教导师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了，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病故，调升刘峙为二十师副师长，三个团有两团驻东莞，一团驻虎门，第一

① 见《向导》第158期。

团团长王文翰，团党代表是余程万。第二团团长叶剑英，团党代表是李默菴。第三团团长李杲，团党代表是曾扩情，我同叶剑英是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的这一团，是由粤军张民达师改编的，他原是张民达部的旅长。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的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他调升新编第二师副师长，一九二七年春，他在江西被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迫害，他离开了队伍，来到武汉，我们曾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见过一面。

我们在东莞驻防时，同王柏龄是来往频繁。有一天他约我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他的话箱子开了，他谈了很多嫖经和赌经，最后他慎重其事地对我说："老兄！你知道吗？昨天毛县长（东莞县长，是蒋介石的大舅子）从广州来，听说广州方面反蒋的谣言很盛，你听到甚么消息没有？"我听了很奇怪，我便说："谁反蒋！这个谣言从哪里来的，应该追究一下。"他又说："你大概是装糊涂吧！这个谣言老早就有的，你想除了汪精卫，谁还能反蒋呢？天下竟有这样不平的事，校长东征西剿打下来的天下，他做了主席，今天还要反蒋，真是岂有此理！"言次他表示很愤慨的样子。我接着又说："这样的谣言，我确实是没有听见过，如有真应该严查究办。"他又说："那你真是孤陋寡闻了，这些谣言，不仅是广州有，东莞也有。"我越听越离奇，我就说："如果你的话真有根据，汪精卫就是自找死路，广东的军队不都是我们的吗？"他才哈哈大笑说："可不是吗？"当夜我回到政治部，即打电话到广州有关方面问情况，好几处的电话都没有打通，最后打到我家里，因为夏松云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她常同陈延年一块儿工作，如有甚么事，她可能知道一点。她在电话上说："今天下午还在文德路汇报工作，广州方面并没有甚么特

殊的新闻。”我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听了王柏龄所传的谣言，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晨打电话找王柏龄，据司令部的值日官说：王师长一大早回广州去了。我更感到奇怪，即召集各团我们的负责同志到政治部汇报，我把王柏龄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也接触到同样的传说，不过总的情况，这些谣传多半是出于王柏龄的亲信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口。这样一来，我认为问题是应该搞清楚，我即准备回广州，但是那几天刚刚凑巧发暴风雨，商船净了江，我想回广州或回黄埔没有船，电话也不通了。我即打电报给校长和校党代表，请派船到东莞接我，我因有要公面陈。第三天黄埔军校派一只小火轮到东莞来接我，我即坐船先到黄埔去看蒋介石，约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我即笔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会见蒋介石，我就报告他说：“王师长已回广州去了好几天，我从王师长、毛县长及其他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很奇怪的谣言，说广州有‘反蒋’的空气，又说校长与党代表有矛盾，我听到这些谣传，我感到奇怪与不安，我想这种谣言很危险，即令仅仅是谣言，也应该进行查究，予以澄清。如果是事实呢？那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要着手镇压。”蒋介石听了我的话之后，毫不奇怪，并带着微笑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的意见当然不错，不过我还没有听到这样多。我今天夜晚要给学生讲话，我们一路到校本部，你可以同邓教育长（演达）谈谈，并要他安置你住宿吃饭。”我当答：“我同校长到校本部看看邓教育长，即就原船到广州，我还要去看看汪党代表。”我们就一路步行到了军校，我同邓演达除了寒暄以外，谈了一点关于二十师训练的情况。我同邓虽然认识很久，没有交谈过，这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们也不能深谈，我即辞出坐原船到广州，我到了家里时间还不到七点，我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说我要去看他。汪精卫亲自接电话，他说：“周主任新从汕头回来，我约他在国民政府吃晚饭，在坐的有陈公博、缪丕成，请你也来吃晚饭。我即马上到国民

政府，同他们见了面，闲谈了一下就吃饭，吃完了饭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就散了。因为有缪斌、陈公博在坐，我要说的话也不好同汪精卫说，握别时我即同汪精卫约定明天再去看他，有一些人事上的问题请他决定。他答应说：校长今天夜晚就回来，我明天早晨八点钟到他家里去，你也来一起谈谈好不好？我答应了，才分手。我从国民政府出来即到文德路去找陈延年，他们正在举行工作汇报，夏松云也在坐，她告诉我说，前天夜晚你在电话上说的话已报告延年同志了。我即把陈延年拉到另外一间房里，把王柏龄在东莞酒后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陈延年说："我想是新右派制造的谣言，王柏龄就是谣言的发动机，王柏龄既在广州，你也可以在广州多住些时，你同他多多接近，看他还说些甚么？你得到甚么情况同傅烈同志联系。"傅烈是四川人，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广东区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傅烈负责。当夜我等夏松云开完了会一路回家，据夏松云说："广州市这几天风平浪静，你疑神见鬼干吗？"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约八点钟起床，我因同汪精卫有约，即急急忙忙地吃了点东西，就跨上车到东山蒋介石家里，我进门正遇着汪精卫从楼上下来，他表示很诚恳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说："政治训练部需要一个副主任，因为陈公博兼职太多，工作很忙，政治训练部的工作又多，他顾不了，要一个副主任负实际责任，我想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如何？这个工作比二十师的工作不止重要一百倍，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复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我就很世故地答应说："我对工作完全服从汪先生的意旨，我没有甚么自己的意见。不过我从东莞回来，有一些情况要给汪先生报告，我们甚么时候谈，我希望快一点。"他看了表，迟疑了一下他说："已经九点半钟了，十点钟我还要到中央党部开会，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早晨再通电话约时间好了。"我也只好同他分手，上车回家。

汪精卫为甚么要调我当政治训练部的副主任呢？这是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因为当时党代表的职权太重，党代表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在必要时，可以作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级。这样的法律制度认真执行起来，主管人事经费的师长团长连长，就不能克扣军饷，也不能随便动用经费，任用私人。当时蒋介石所用的中上级干部，大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云南讲武堂出身的雇佣军人，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为了革命而来参加这里军事工作的，除了共产党人而外，那就寥若晨星了。因此这种制度的公布实施，对所有的各级军事主官都感到惶惶不安，就是蒋介石自己也感觉到不痛快。不过在参谋团的设计，汪精卫执行公布以后，各级将领，谁也不能不服从。他们最感威胁的是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忠实执行革命政府的法令，是丝毫不苟且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尤其是各级党代表，在士兵同志中的威信很高，谁都知道任何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是无效的，实际上就是置军权于党权之下。各级将领，大部分都是作贼心虚，所以对党代表制度都感到惶惶不安。我奉命到教导师任党代表，在我们不过是担任一种革命工作，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要把军队训练到钢铁一般坚强，把官兵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在王柏龄等看起来呢，以为党代表是去监督他们的，是去找他们的麻烦的。他是一个贪财好色、营私舞弊的恶棍，他对于革命的纪律哪里能遵守呢？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之下，革命的纪律是森严的，谁也不能置身于革命纪律之外。他们为了便于私图，不得不想方设法地破坏这个革命的纪律，阴谋取消党代表制度。最初他们不敢反对制度，先从反对人，反对共产党员开始，他们对蒋介石不只一次地危言耸听地说："共产党员的团结力量大，组织活动的办法多，又有苏俄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在军队中十个国民党员也不及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整个国民革

命军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了。"蒋介石为了防御共产党人的过分发展，也提拔一些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如缪斌、张静愚、贺衷寒等任党代表，他们这些人当了党代表，无非是同那些同级军官一团和气，吃喝嫖赌，不发生任何作用。如在第一次东征，"淡水之战"，团长王柏龄在火线上逃跑了，党代表张静愚也逃跑了，坚持战争到底，把战事转危为安的是共产党人。北伐时，"南昌战役"打到紧急关头第一师指挥官王柏龄逃跑了，师党代表缪斌也逃跑了。这一师是在三月二十事变之后改编的，全师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所以在这一战役中，第一师全师瓦解，这样就显示出来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的作用。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他很想利用共产党人训练他的军队，壮大他的军事实力，又怕共产党人在军队中过分地发展，使他无法控制。王柏龄更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不敢同共产党人共事，所以他怂恿蒋介石把二十师的共产党人都排挤出来，好造成他们的清一色的黑暗势力，蒋介石为王柏龄所动，所以同汪精卫谈到将我调职的问题；同时蒋介石也知道王柏龄的暮气很深，还需要我们把这一师新兵训练好，所以又迟迟没有调。过了几天，我因公去见蒋介石，他还催我早点回东莞防地。我因为要留在广州侦查王柏龄的行动，所以我还没有回去。

有一天一大早晨，王柏龄到我家里来找我，他的态度很颓丧，他还没有坐下就开口说："党代表！事情搞坏了，我们在东莞酒后乱谈的那些话，你就认真地报了季顾问，季顾问就当成了一桩大事，告诉了汪党代表，汪党代表很生气，他跑到校长家里辨白是非，并指定是我造谣生事。校长是甚么也不知道，今天五点钟就打电话要我去，大发雷霆地骂了我一顿，还要我把事情的经过，消息的来源，当面向汪党代表报告明白。我当时对校长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包党代表可以作证，我想请你替我负点责任，不然我恐怕呆不

下去了！"他说到这里，几乎要哭出来。其实我没有见季山嘉，季山嘉的消息是从陈延年那里得来。我便答复王柏龄说："我没有见季顾问，你同我讲的话，我报告过校长的，没有来得及同汪党代表讲，我认为这样的事是要搞清楚的，应该追查消息的来源。我请校长查究谣言的来源时，校长还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既然话说穿了，你就应该把谣言的来源向校长党代表说明白，不就完了吗？还要我负甚么责任呢？"他又说："这个话，讲的人很多，都是捕风捉影，一个传一个，没有哪一个能负责交出真凭实据来，如果一个一个地攀扯起来，牵涉的人很多，反而不好。我想只好请你对校长说：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或者说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就减轻了我的责任，校长就不会对我生气了。"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天天在那里制造谣言，还要我替他扯谎。我又顾虑到如果我不敷衍他一下，对于将来的共事上就是一个裂痕，我就答应同他到蒋介石那里去一趟。我同王柏龄一路到蒋介石家里，蒋介石的态度还很平静，他带笑地对我问："你同季顾问怎样说的呀？叫汪先生感到不安！"我答应说："我没有见季顾问，我也没有同汪党代表谈这个问题，我仅把我所听到的谣言报告校长。"蒋介石听说我没有见季山嘉，有点奇怪的表情，他也不追究谣言的来源和真假。他说："你们去看看汪先生，把话说清楚，叫他安心就好了。"我们坐了一下，就同王柏龄去看汪精卫。我们到汪精卫家里，汪精卫不在家，我就准备到国民政府去找他，王柏龄不想去，我们就分别回家。事实是很明显的，王柏龄不怕汪精卫误会和不高兴，只怕蒋介石责骂！他只要蒋介石不骂他胡说乱道，他就百事大吉了。我们在广州一连住了三个星期，中间陈肇英还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他船放回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说："我同李之龙说过，他说他要请示主席再决定。"陈肇英很不高兴地说："我看他总不能没收吧？这又不是哪个私人的东西，就听他去吧。"我因为到虎门检阅军队时，他隆重地招待我们，

为了还他的情，我就请他在我家里吃晚饭，还请了王柏龄、詹大悲作陪，打了八圈麻将。第二天，他又请我们到西园吃饭，王柏龄又请我们吃饭，这样昏天黑地的混了几天，而不知道他们就在这几天中，发动了三月二十事变。

三月二十早晨，约在八点钟前后，新任二十师副师长林振雄同入伍生团长张叔同先后到我家来看我。林振雄是准备到东莞去就职，他来拜访我，并想约我同去东莞；张叔同与我在黄埔同过事，他为入伍生团请求甚么，托我向蒋介石说说话。我们把事情说完了，他们问我说：外面有几条马路戒严，从惠州会馆到造币厂这一带断绝交通，十字路口都架着机关枪，第五团全副武装向省议会急进（海军局在省议会内），不知出了甚么事故。党代表知道吗？我听了他们的话，想不出是甚么事故。我一面答应他们说："我不知道。"同时我就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情况。接电话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立夫，他说："校长不在家。"过了一会儿，林振雄、张叔同走了，我再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消息，还是陈立夫接电话。我告诉他说：我是包党代表，有要公请校长说话。他才告诉我说：校长昨夜三时就出去了，不知道是处理一件甚么紧急的公事，他此时在造币厂，你如果有事，你可以到造币厂去见他。我还是想不着是出了甚么事，我即打电话给王柏龄，他家里没有人接电话。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把所有的情况由电话报告周恩来，他也是一点消息不知道。他为了明了情况，就到造币厂去见蒋介石。他带着四个武装卫士，到了造币厂也被缴械。周恩来见着蒋介石，蒋介石才告诉周恩来说："李之龙及中山兵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觉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二师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周恩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自请蒋介石改派他的卫士，蒋介石答应了，当天晚上蒋介石派的卫士撤回去了，周恩来卫士的枪械全部发还。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之后，他同我通了

电话，我即马上步行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周恩来对我说："事情是很显然，新右派制造谣言，包围蒋介石，李之龙落到新右派的圈子里，他已被捕了，第二师的各级党代表都关起来了，虽然目前尚没有侵犯我们（他同我），这个局势是否算稳定，还很难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去看过汪精卫，他气得两眼发直，他用手捶胸，以头碰壁，他简直象一个小孩子一样，毫无主意。在蒋、汪之间的唯一的一个穿针度线的人，就是谭组菴（谭延闿），我想他也不会有甚么好的办法。如果可能，你可以去看看王柏龄和刘峙（第二师师长），去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我从周恩来家里出来，就去看王柏龄。他家里警卫森严，楼上楼下，都布满了武装卫兵。他住在文德路附近新建的一个里弄里，他与李之龙是邻居，李之龙住二楼，他住三楼，到他家里要从李之龙的门口过，顺便看去，见李之龙的门开着，并没有人，一切家具都是乱七八糟，好象抄了家似的。我通过警卫岗哨到三楼敲门，卫兵都认识我，还是行礼如仪。一个卫兵班长高声说："报告师长，包党代表来了。"王柏龄在里面答应："请进。"我进去同他握手坐下，我问："茂如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怎么不打我一个招呼呢？"他得意洋洋地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勾结一起，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装，李之龙已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我问："同海军局打吗？"他说："也许不止是海军局吧？"我就顺着他的语气又问："就你所说的情况，就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他说："校长不肯这样干，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卿。"我们又胡扯了一番才辞出。到了下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全市已恢复常态。我又去看刘峙，刘峙见面，也很客气，我同他握手坐下，我问："今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呀？"他倒是很平心静气地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甚么，我就

干甚么。"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下，我就回家。夏松云告诉我说："陈延年同志派人来通知，叫你这几天少出门，夜晚不要住在家里，行动要简单轻便一点，不要坐汽车，不要带卫兵，也不要到他那里去，有事他派人来通知你，我们门口有几个便衣侦探走来走去，你知道吗？"当天夜晚，我在西濠口亚洲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夜。我们共产党人一直也紧张了几天。事后才知道：三月二十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包围蒋介石说："汪精卫、季山嘉阴谋倒蒋。""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布置圈套：三月十九日下午，伪造蒋介石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中山舰三月十九日下午生火，夜晚约十时许开到黄埔江面。同时，他们包围蒋介石，先回广州进行镇压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暴动"。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到夜晚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俄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计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以靖乱的名义来一次大屠杀。但是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的反动阴谋没有预计到，也没有作任何准备，还以为蒋介石及他的部下是我们的革命的战友，事出突然，所以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反抗，就是刘峙把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捆起来，大家都是很从容地说：我们问心无愧，不知为了甚么，见了校长再说吧！这些被捆绑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是周恩来到造币厂看见了，才对蒋介石提出说："校长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集中看管，又何必要把他们捆绑起来呢？"蒋介石当时也表示很生气的样子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才把他们

解开。李之龙在新婚不久，昏天黑地地过他的爱情生活，他当时只知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反动派计算他、报复他，闹到满城风雨，他完全梦不闻雷。当夜陈肇英、王柏龄带着十几个健汉，破门而入，把他俩夫妻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拖到地下来，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顿，才捆起来。他俩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李之龙最初喊叫救命，他们把李之龙的口塞满了乱纸破布，严密地捆扎，陈肇英亲自动手打李之龙，并捆李之龙，还吆喝着说：“校长的命令，把这个忘八蛋捆紧些。”他们是这样无耻地下流地报私仇。后来把李之龙关了很久，要他写悔过书，脱离共产党，才释放出来，派他随北伐军到前方工作。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政府时代，汪精卫回到武汉复任国民政府主席，李之龙曾经写过三月二十事变的经过，揭发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并向共产党申请恢复党籍，虽然共产党没有批准，他还是表示接近共产党这一方面。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事变之前，蒋介石在南京打电报给李之龙，要他到南京去，李之龙徘徊在十字街头很久，终于是带着老婆跑到广州，在广州白色恐怖时，仍以共产党的关系被枪毙了。后得之传闻：蒋介石在报上见着李之龙在广州被捕的消息，还打了一个电报给李济深要他把李之龙解到南京处理，电报到时，李之龙已经枪毙了。

三月二十事变，是共产党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事后共产党中央采取退让政策，以期维护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为了革命的前途，委曲求全，争取蒋介石的谅解。在蒋介石方面，仍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排挤共产党人的活动为出发点，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党务整理方案，解除季山嘉的聘约，在国共的联合战线中种下了一粒破裂的种子。三月二十事变以后，新右派制造的一切谣言，在事实上完全证明是毫无根据，蒋介石发动这一次事变，可以说是摸了一个空。蒋介石在当时也许是装糊涂，也许是后来明白了真相，在事变不久即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以钱大钧继任二十师师长；

陈肇英也免去虎门要塞司令，亦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曾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仍请汪精卫继续负责。汪精卫称病，表示消极，他不问事，也不见人。约在四月中旬，汪精卫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了广州。事有凑巧，汪精卫由广州乘船到香港上船时，正遇着胡汉民也坐这只船到香港。胡汉民自廖案发生之后，驱逐许崇智离粤的同时，蒋介石把他软禁在黄埔，到此时才释放出来。他俩人在船上碰了一个正着，各自低下头来，没有说话。胡汉民此行到香港做寓公，汪精卫准备到法国去养病。从此广东的局面已形成了蒋介石的狄克推多了，而支持他的仍然是苏俄与共产党，其次就是当时共产党左派政策之下发展出来的人物如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陈公博等。蒋介石还拉着几个国民党的元老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及他的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孙文主义学会的全部人马。

蒋介石此时的思想作风，还是认为国共联合战线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他的国共合作的新方案，不是采取联合的方式，而是采取统治的方式。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整理党务方案最初的内容是：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置于他或他的代理人国民党中央主席的隶属之下。他的思想是不管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服从他，为他所用，他都兼容并收。换句话说：他不仅要管国民党，还要管共产党，至少限度他要把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管起来，由他一手包办。他更异想天开地要邵力子脱离共产党，代表他到苏俄去办交涉，要求苏俄把扶植中国的革命工作，完全以蒋介石为对象，不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由他来指挥监督，最好是取消中国共产党。他不懂第三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组织，也不懂苏俄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组织成员，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邵力子同他的私交

很厚，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登报脱离共产党。邵力子于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由广州动身到苏俄，可以说是碰了一个橡皮钉子，毫无结果地回来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多次的修改，至五月十五日才举行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这一次会议是以蒋介石为主体，所作出的决议，都是体现蒋介石的主张，主要的内容是：(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二)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的部长。(三)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不得隐瞒原来的党籍。(五)共产党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六)国民党推举代表五人共产党中央推举代表三人组织两党中央联席会议。(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推选张静江为第一任的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共产党人出席的很少，出席的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职权的分配，没有作任何争执，对于限制共产党人的各种活动，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横竖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共产党人，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分出席会议，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不能受国民党单方决议的拘束有所变动。所以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所作的决议，保持冷静的态度。会议后发了一个对时局的宣言，着重于国民党内部纠纷的解释，其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决议案，“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这还是共产党的主张，还没有出国共联合战线的范围。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前后，季山嘉回国了，鲍罗廷、加伦将军不久仍回到广州。鲍罗廷在孙中山没有逝世以前，国民党人对他是以国师相待，加伦将军亦为蒋介石素所尊敬，他们相见之下，似乎没有甚么隔阂，蒋介石对于军政大计，还同他们商量，苏俄代表团的作用，依然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的重要人事方

面，略有更张，国民党中央设主席一人，推选张静江担任，组织部长改选陈果夫担任，新设军人部，部长由蒋介石兼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还有：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刘伯垂任书记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病请假出国疗养，推选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这些人事上的更张虽然是蒋介石的主动，国共联合战线的局面依然存在，国共之间虽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大体上还算是没有破裂，因此才有可能出师北伐。

北伐问题：蒋介石与苏俄代表团有急进与缓进的分歧，共产党内亦有急进与缓进的争执，主张急进的是鉴于直系军阀动员南侵，将欲利用湖南赵恒惕为前驱进攻广东，故主张借湖南唐生智与赵恒惕的战争，以重兵出湖南，以编唐生智部、消灭赵恒惕，打击直军南进，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主张缓进的是鉴于革命军连年征战，疲敝堪虞，应先予以休养生息，整理军实，培植士气，先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然后出师北伐，反对轻于尝试。闻苏俄代表团方面的意见亦主张先巩固革命根据地，再出师北伐。急进与缓进，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是主张一面打仗，一面练兵，一面行军，一面筹饷。他在北伐誓师词中说：总理在天之灵，我们的北伐一定胜利。他是拿北伐作为一个赌注，成败之数，他是靠运气，并不是知己知彼，兵对兵、将对将地来计算，作出北伐的计划。当时共产党虽然不完全同意蒋介石的作法，但是在国共联合战线的名义之下，不得不支持北伐，所以发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福建、河南各省的工农群众参加北伐的战斗。北伐军中除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的政工人员已全部撤退外，共产党的同志如郭俊、金佛庄仍留在东路军当团长，其他各军如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并起骨干作用。北伐军抵武汉后，第八军政治部改任彭泽湘为政治部主任，这些人事上的配备都是经过蒋介石的同意由国民政府任命

的。总党代表自汪精卫出走以后即无人继任，总党代表的任务即由国民党军人部长代替了。北伐军出发以前，在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与其他政工人员，在广州市中心的大佛寺设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由周恩来任班主任，包惠僧任主任政治教官。两个月毕业后，分发在前线各军工作，都成为北伐军的骨干。在国民政府训练部内设置一个战时政治训练班，包惠僧任班主任，毕业后大部分分发到第八军工作，为改造第八军的骨干。

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总司令部之下设总政治部，由邓演达任主任，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才告结束。邓演达在准备组织政治部时，曾在广东东山他的住宅内邀集周恩来及包惠僧、陈公博等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周恩来推荐我们的同志朱代杰为总政治部的秘书处长。共产党人与邓演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克复武汉后，总政治部的三个科长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即章伯钧、李合林。总政治部的工作，差不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因此造成了蒋介石与邓演达的矛盾，而我们的工作因为邓演达接近我们的关系，得到很多的便利，得到很大的发展。

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

一九二六年夏，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战线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因为共产党对国共联合战线的无限忠诚，才能把北伐战争发动起来，并且支持到底。虽然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国民党内部有很多的矛盾，国共联合战线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对于“出师北伐”这一总的概念，大体都是一致的。惟从三月二十事变的经验教训当中，共产党对蒋介石采取了最大限度的退让政策，认为中国革命事业，在当时的情况，是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共产党把蒋介石作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领袖，规劝他，爱护他，帮助他，简直是和慈母爱护幼子一样地原谅他的错误，希望他的进步，宁可共产党人自己多受一些委屈，对蒋介石及他所领导的一切，总是加以原谅。共产党人在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受了委屈，也向广东区及共产党中央提了不少的意见，都在巩固革命联合战线的大原则之下，化为乌有了。而事实证明，这样对蒋介石无限退让的政策，不仅没有把蒋介石从反革命的深渊里，国民党的右派当中挽救出来，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逆焰，在革命事业中造成了无可弥补的错误——右倾错误的开端。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人是有相当的正确的估计，在三月二十事变中虽然是打击了共产党人，他仍然还是拉住共产党人，他还不敢同共产党一刀两断地造成分裂的局面，他对党军中的高级共产党人如周恩来等还是优礼有加。在三月二十事变之后，在很短的期间内，即将制造三月二十事变的主要人物如二十师师

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职，并限期责令离开广州。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桴，分别撤职查办，并呈请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请处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蒋介石拉住共产党人的做作，好象他是知过必改的样子。可是蒋介石又同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党务整理方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作出限制共产党人的各种决议，以及季山嘉解聘、汪精卫出国，派邵力子代表他到莫斯科。这一系列的把戏，都是对付共产党、向共产党进攻、并明白向苏俄和第三国际提出要把共产党置于他个人和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阴谋野心是完全暴露出来了。三月二十事变，是蒋介石和蒋介石的部下阴谋反共，并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是共产党阴谋倒蒋，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之下，共产党就该及时地、适当地采取行动，同蒋介石说理、或是斗争，即令是因此把国共联合战线破裂了，在共产党方面也是光明磊落，是非曲直亦自有公论。但是当时共产党没有这样做，采取了所谓为联合战线为革命的需要而退让的政策，只是挨打挨骂并不还手，当时我们党人真是一肚皮的怨气无处申诉了。一直拖了两个多月，到六月四日，才有《共产党致国民党书》，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在共产党党报《向导》上发表出来，辨明三月二十事变的是非曲直，在这两个文件上，对蒋介石团结的气氛很多，斗争与责问的气氛简直是稀薄得可怜，这无可讳言的是共产党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步骤上落后了一步，甚至可以说是落后得很多，但是从此以后对蒋介石的认识上倒是进了一步，或者可以说是进步得很多，对蒋介石的信任上，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因之共产党对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一切措施与以蒋介石为骨干的国民党的政策方针，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暴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

在国共联合战线的运动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对革命事业平担义务而不平分权利，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为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权利

之争，就有强调团结、忽视斗争的偏向，所以在革命政府的政权组织中，是以国民党员为主，以共产党员为辅，而在革命的工作中，在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基层的各种艰苦工作中，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如：工农运动、省港罢工运动以及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等工作，都是以共产党人为中心，自不必论；即两次东征，回师广州，解决川贵，肃清南路等战役，没有一次不是共产党人任前驱打死仗，这也是蒋介石所完全了解的。到革命势力发展到统一广东以后，新右派为攘夺权利，便利私图，所以不得不反共；蒋介石的本性同右派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他还认识共产党的作用与共产党人的能力。他常对人说："共产党是革命的，我也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合作。"这是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前他常说的话。高君宇因公到广州听见蒋介石的这种言论，他回到上海对陈独秀说："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危险人物。"陈独秀问："何以见得呢？"高君宇把蒋介石的这一段话提出来作证，并接着说："蒋介石说他是革命的，为甚么不说国民党是革命的呢？他说共产党应该同他合作、为甚么不说共产党应该同国民党合作呢？从他的言论和作风，很突出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危险人物！"陈独秀当时付之一笑，并没有把这一段话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到了三月二十事变以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出师北伐以前，在这三四个月当中，蒋介石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和他所挟持的国民政府一切的措施，一天一天地同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有距离，相反地它同国民党右派逐渐接近；王柏龄又回广州任第一师指挥官，吴铁城释放出来派往奉天当代表进行同张作霖的勾结，陈肇英派赴江浙为军事特派员，著名右派分子与国民党改组后毫无关系的一般官僚政客如蒋作宾、田桐、茅祖权以及邵元冲等都来到广州跃跃欲试。广东各县代表豪绅的民团武力一天一天地抬头。挂着国民革命军招牌的蒋介石的军队与民团结合在一起压迫农民，摧残农民协会，有很多县已发现军队民团

屠杀农民的惨案。事态是一天一天地严重了，共产党在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头，没有采取直截了当的办法来回击反动派，慢腾腾地到七月七日才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提出共产党对于北伐的意见，并指责蒋介石的各种反动措施，舌剑唇枪、文字上的论战，与事实上的磨擦，明朗化了。

这一篇论文算是共产党对蒋介石第一个当头棒喝，而引起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吵闹不休。当时的蒋介石自命是天之骄子，共产党一向也是以当前的革命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人物期许蒋介石，这一次共产党对蒋介石给了一个不重不轻的鞭策，如果蒋介石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意见，或者是顾全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虚心同共产党商量，觅取一个求同存异的办法，或是在国共两党中央开一次联席会议来觅取解决这个分歧的途径，并不是绝无可能，但是当时国共两党都没有这样的打算。在共产党方面（包括鲍罗廷在内），认为我们指出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错误，就是纠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错误，蒋介石和国民党改正或不改正错误，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事，对于维护国共联合战线做得不够，即是对国共联合战线重视不够，所以分歧只有逐渐扩大。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认为国民党已经掌握了军权和政权，共产党与革命的民众都应该在它的统治之下，他们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书呆子，把苏俄顾问团看成是客卿，看成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谋臣策士，孙中山认为是国师的鲍罗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已经忘记了，“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的呼声，在蒋介石回想起来认为是幼稚得可怜了。他自以为他已成为一个逐鹿中原的英雄了，因此他就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国共联合战线的政治意义与国际意义，在蒋介石都不在乎了。于是他们一面以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的名义，用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另一面蒋介石在公共的集会上，对共产党恶毒地指责，并声明他一定要制裁共产党。蒋介石当时的那一种居高

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激起了共产党人无比的愤怒。虽然双方的矛盾表面化了，但是蒋介石已成了北伐军的总司令，他在直接与间接之间，还是拉着共产党人不肯放手，而共产党仍然是执行国共联合战线的任务，并没有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对北伐战争置身事外，不过合作的气氛逐渐减少而已。

在共产党方面，认为北伐战争的敌人是整个的北洋军阀，而不是哪一个北洋军阀。因为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京政府，仍是一个封建王朝，从袁世凯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到洪宪皇帝朝代失败以后：有黎元洪的大总统朝代，新国会选举的徐世昌为大总统朝代，吴佩孚推翻新国会赶走徐世昌、黎元洪复职的朝代，曹锟贿选的朝代，段祺瑞临时执政的朝代，段祺瑞出走以后颜惠庆、贾德耀先后以内阁总理摄政的朝代，最后是以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的朝代。从民国五年到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时，这短短的十年中，经过了六七个朝代，这六七个朝代的主要人物虽各有不同，而本质上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殊无二致。无论是谁当总统、执政、摄阁，都不过是北洋军阀的傀儡，都不过是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形式而已。北洋军阀轮流地军阀专制，都是依靠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为后援，横征暴敛，压迫人民，造成了连年内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北京政府，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势力，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一代不如一代的一种政治集团，他们相互的矛盾也很尖锐，各有各的国际背景，各有各的利害关系，他们相互之间，曾经发生过："皖直之战"、"奉直之战"、"国民军与奉直之战"、"奉、直、鲁军与浙卢之战"。在每一次的战争中，北京政府都是依违于两可之间，没有发生一点统治权力的作用。因为北京政府的后面是封建军阀，封建军阀后面是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因此北伐之师应该是以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大小封建军阀为对象，而不是以哪一个帝国主义或是哪一个军阀为对象，所以北伐战争不仅是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权革

命，更重要的是反对各帝国主义的列强，求得民族解放的战争。此外还有割据东南五省与吴佩孚结成反动联盟的孙传芳，割据西南以联省自治相号召的唐继尧、赵恒惕等，还有乘机观变攘夺权利的如川黔反动军阀刘湘、杨森、周西城、袁祖铭、王家烈、王天培、李小炎，陕豫间镇嵩军刘镇华、毅军米振标、及割据山西的阎锡山等大小军阀，都是与革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军事势力。国民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本来是由北洋军队中受排挤分化出来的，在冯玉祥与奉直联军战败以后，逼上梁山，有点革命的倾向，自冯玉祥出走，国民军已成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的立场不坚定、实力很有限，不能认为是革命的武装势力。所以当时的情况：革命的武装势力与反革命的武装势力比较之下，反革命的军事力量还是占绝对的优势。因此共产党主张：北伐是势在必行，但不能以北伐作革命的尝试，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在出师北伐以前，第一，先要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尤其是要肃清土匪，解决民团（地主豪绅的武装），把广东人民的敌人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的反动残余斩草除根。第二，要充分地对国民革命军的训练补充，尤其是要划一编制，补充员额和器械，并提高士气。第三，要建立革命军与革命工农的密切联系，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把革命的学生与妇女都组织起来。第四，北伐军的战费应由国民政府发行军需公债，分别向绅富及工商业团体或个人捐募，不得抽收赌捐及剥削平民。共产党的主张是适合革命的需要，是适合人民的愿望，但不适合蒋介石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要求，所以受到蒋介石的反对，无法施行。而蒋介石好大喜功纵横捭阖的北伐计划，也遭到共产党的冷视与严肃的批评，因此统一战线中发生了更尖锐的矛盾。

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北伐计划，除了用私人的名义同他商洽外，并在《向导》周报上提出了很多的公开的批评，共产党的中心愿望是想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打击一切应该打倒的敌人，

把北伐战争进行到底，所有共产党主办的报章杂志都动员起来为北伐军作政治宣传，发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河南七省工农群众，普遍支持北伐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千余万，有组织的工人达二百八十余万，都成为北伐军的战友，都是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配合北伐军作战。粤汉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在军事运输工作上，在北伐军前进与北洋军退却时，起了很大的支援北伐军的作用。湖南唐生智与赵恒惕的战争，都是以争权夺利为出发点。唐生智是一个职业军人，并没有政治觉悟与革命的意愿，湘战初起，唐生智原以拥护省宪相号召，他的政治意识就可想而知了。在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影响之下，在湖南工人、农民、学生的各种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急转直下地抛弃省宪，投奔国民政府，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打开了大门。此时的北伐军还在广东，并没有一兵一卒到湖南，而北伐军的威力已由湖南而震动大江南北了。

共产党的精锐干部，大部分分配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前，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与二十师工作的已达三百三十多人，北伐军动员北上之前，共产党人退出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分配到其他各军，及到内地潜伏，联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组织，作响应北伐军的活动。在武汉、南昌、开封等大小城市，共产党人为响应北伐军，被捕不屈为敌所杀害的不知凡几，在北伐军克复武汉之前，陈定一在武汉被陈嘉模、刘玉春捕杀于武昌长街南楼之下。北伐军出动的初期，八个军中除第五军李福林部没有共产党人而外，其余各军都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三月二十事变后，共产党人退出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他们把金佛庄与郭俊留在第一军当团长，何应钦统率的东路军进入浙江，在兰溪一战，郭俊战死在兰溪城下，是否是蒋介石、何应钦

等有意置共产党人于险地，情形亦殊可疑。

在整编军队问题上，共产党与蒋介石也有很大的分歧。共产党与参谋团主张划一编制，补充足额，除李福林的第五军不编入北伐军作战序列另案办理而外，其余各军都按三三制编制，补充足额：即一军三师，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四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一排三十名左右的战斗兵，补充足额。每一军都配备适当数量的炮兵及其他特种部队，并予以适当的训练，再加入前方作战。当时国民政府统率下的六个军，除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统率的第一军是按照编制补充足额而外，还有一个教导师（后改为二十师），也是按照新编制建立起来的，并有炮兵及其他兵种部队，黄埔还有四个入伍生团也是武装齐全。其他的五个军编制都没有足额，尤其是第三军朱培德部约四千兵员，按编制不过一师，第六军程潜部三千余人，按编制不足一师，第五军李福林部号称两师，实际上是老弱残兵，兵员数额少，素质差，不堪作战。只有第二军谭延闿部由鲁涤平代理军长，连陈嘉佑部，号称三师，实际上也不过八九千人，没有炮兵及其他兵种的队伍，第四军李济琛部，在两次东征前后，曾加以补充整理，约有三师另一个独立团，编入作战序列的是两师一个独立团，特种兵与炮兵不全。我们主张把这六个军一视同仁地编制足额，尤其要改造第五军，补充第三军和第六军，使各军的战斗力平衡发展，先充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然后动员北进，即是说我们要有准备的北伐，时间不必求急。但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意见相反：第一他要急于出师北伐，第二各军按原有的兵员器械编制，维持现状，主张一面打仗，一面练兵。实际上他是扩充他的嫡系军队，反对各军平衡发展，以便独揽军权，操纵各军。第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北伐战费的计划：(1) 预征钱粮。(2) 开放赌禁烟禁。(3)征收各项捐税的附加。这一套办法完全是剥削平民，与北洋军阀如出一辙，共产党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力争，他们

置之不理，反说共产党是破坏北伐大业！第四北伐是一个革命战争，革命的敌人是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与奉张直吴及其大小军阀，敌人的反动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北伐军无疑地是应该建立在工、农、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苏俄的联合战线上，也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具体实践。但是蒋介石戴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王冠之后，即不分敌我，东扯西拉，北伐军还没有动员北进之前即派何成浚、詹大悲驻在上海搞联合孙传芳的把戏，派蒋作宾、吴铁城先后到奉天与张作霖勾结，北伐战争中，置弟子礼以事段祺瑞，与北京政府有关系的大小军阀大小政客频送秋波，并委派大批的招抚使、招讨使、无兵司令、军事特派员，名为招降纳叛，实际上是祸国殃民，造成了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恶劣局势。共产党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走入歧途，开始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希望挽救国民革命的危局。其实国民党自从孙中山病死北京，廖仲恺被刺广东，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共产党把联合过的徐季龙、谭延闿、汪精卫、孙科、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乃至于甘乃光、陈公博之流，都看成是左派。一九二七年夏，共产党还同这些所谓国民党左派成立联合政府，到了革命的逆流来了，他们都作鸟兽散。至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等，倒是始终同共产党联合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是国民党中最脆弱的一环，也可以说他们不过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产党的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几个人也是各干各的，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政纲，没有权力，没有群众，在国共联合战线和谐发展的时候，他们是有作用的，到了联合战线中共产党与革命的敌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们不能和共产党发生联合斗争的作用，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一个革命的政党，主要的任务就是摧毁反动的政权，建立自己的和人民的政权。共产党自然有自己的夺取政权的任务，姑且不

论。在第一次国共联合战线中，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并肩作战，建立两党的联合革命政权，在革命的实质上是如此，在政权形式上也是如此。但是在国共联合战线建立的初期，共产党没有采取直截了当的态度对革命负责任，而是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分，现身于国民革命。这样的做法不知道当时是否是因为避免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各种反动派如：政学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宣传、指责赤化呢？还是别有用意？我们的敌人认为共产党是赤化，是非法的，无足为怪，难道说与共产党建立革命联盟的友党国民党也可以认共产党为非法的吗？当时有些共产党人在国共联合战线中也不自觉地藏头露尾不敢露面似的，因之予人以可乘之隙，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受到国民党一部分人的歧视，增加了工作中的不少的麻烦和困难。这个右倾错误的责任除陈独秀是责无旁贷而外，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鲍罗廷都有责任。如果这不算是右倾的表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如此，而当时的国民党，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没有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是赤手空拳，国民党是一无所有，便是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在共产党的立场，也应该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有一个平担责任的君子协定，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当时国共两党没有这样做，这不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失策。

其次在统一战线的革命过程中，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发动与组织之下，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有长足的进展，而领导这些运动的纯粹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几乎是完全没有过问。革命的军事势力，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共同努力之下也同样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军事的领导责任，几乎是完全属于国民党方面。北伐以前，共产党人即有三百多人参加黄埔和第一军工作，而主要的是搞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也有少数共产党人搞军

事工作如郭俊、唐因德、金佛庄、茅延桢、蒋先云、叶挺、曹渊等，在东征与北伐各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受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歧视而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在北伐军克复武汉、南昌、上海前后，全国各地大小军阀的军事势力都动摇了，各种革命势力如工、农、学生、店员、小商人、城市市民及知识分子都起来了，汇合成为一个广大的革命洪流，共产党在革命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学生工人多以为没有加入共产党、青年团(C. Y.)或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术研究会、妇女读书会等团体为落后，为可耻。雇佣军人出身的小军阀，也到处找门路希望接近共产党，与共产党人来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找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产党既有广大民众的基础，又有第三国际的政治背景，如果改变在野党的政治态度，放弃国共合作一切清规戒律，及时地果敢地于蒋介石在南昌溃败的前后，把自己武装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之间，集合十余万至二十余万武装队伍，易于反掌，再加以适当的改造成为革命的武力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进可以与国民党有条件地继续合作，维持联合战线的成规，退可以分道扬镳，以革命的武力结合革命的民众，仍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并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即不能在短期内消灭蒋介石，也可以与蒋介石在江河南北分庭抗礼，革命形势决不至陷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但是当时共产党始终没有武装自己的准备，除全国总工会有少数的工人纠察队，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河南各省有少数的武装农民自卫队而外，我们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来武装共产党和革命民众。我们对蒋介石的猖狂的反革命活动，除了纸上谈兵，作了一些不解决问题的政治宣传而外，没有给蒋介石一个事实上的沉重的打击，仍然与三月二十事变一样，处处采取退让的态度，如上海工人纠察队的缴械，各省农民自卫队的缴械，还公开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各省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打击过

火。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正确地指出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意义，也没有挽回右倾的错误，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形式万分紧急的关头，共产党没有一个紧急措施来镇压敌人，还希望和平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幻想保持一个在野党的态度，来做一些合法的斗争，把国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国民党左派。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而后，国民党的左派就瓦解了，除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出走了，其余的无论是文人或是武将，都是成群结队地或是一个一个地投降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总起来说：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联合战线中的失策：第一，从统一战线的建立一直到分裂，共产党是过分地重视团结，忽视斗争；第二，在共产党与蒋介石的矛盾暴露时，共产党采取退让政策的影响之下，发展了蒋介石的反动势力，纵容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第三，共产党没有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及时地有计划地来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对革命的敌人予以反击；第四，共产党始终是抱定是一个在野党，而不作夺取政权的准备。因为有了这些错误，所以就不可能不陷进右倾错误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损失，而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蒋介石独揽军权篡夺党权的形形色色

一九二五年夏天，党军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得到胜利，才成立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的性质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时的大元帅府的后身，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最高组织形式，它是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所以国民政府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不过联合的形式是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罢了。国民政府的七个委员据我的记忆是：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伍朝枢、林祖涵、谭平山。这就说明国民政府是由五个国民党员和两个共产党员组成的。此外第三国际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他出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经常协助主席处理重要的政务。从国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就可以说明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了。汪精卫任主席时，鲍罗廷因北京国民军发动政变，曾一度离开广州，由季山嘉代替鲍罗廷的职务，而发生了汪、蒋之间与蒋、季之间的一些矛盾，爆发了三月二十日事变。共产党人虽然一面对蒋介石退让，而另一面总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总有一天要翻脸，革命与反革命总是要相打相骂的，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横蛮，共产党对蒋介石是冷淡。

国民党方面，它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如老右派的冯自由、邹鲁、张继、谢持、居正、田桐之徒，根本就是富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天性，就是新右派的如贺衷寒、缪斌、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段锡朋等，都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小人，就是共产党曾经把他们视为国民党左派的如汪精卫、蒋介石以及他们的大小喽罗

等，谁都是假革命之名遂行攘夺权利之实的人物。共产党人在第一次统一战线中，始终是站在副手的地位，没有把党政军的实权实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只作思想和政治宣传的领导工作，把革命的实权委之于所谓国民党的左派，对某人或某几个人如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唐生智、冯玉祥等寄予以无穷的幻想，这就是第一次统一战线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广东长时间的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民党本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他们不得不联俄、联共。由于苏俄的经济支援与军事支援，共产党的大量人力支援，在三四年中，统一了广东，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权力，震动了全世界。国民党与蒋介石有了政治本钱，他们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的阶级本性暴露出来，他们开始进行撕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尽可能地退让政策，国民党和蒋介石仍不以革命的友谊对待共产党，他们不接受共产党对于北伐提出的意见——巩固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采用纵横捭阖的反动方式，不分敌我，同军阀官僚政客勾结在一起。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们的北伐是采取以暴易暴不顾劳苦大众的死活、不团结工农革命的力量，蒋介石开始搞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准备走法西斯的政治路线。

蒋介石的个人英雄主义是由来已久，并不是逐渐萌芽生长出来的。在黄埔练兵之初，他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里，距军官学校不及一华里，他每天从家里到学校，总是仪卫森严。在黄埔军校初成立时，物质条件是非常不够，没有校长固定的卫兵，也没有自卫的枪枝，但是他每天上班下班，或是在长州岛走动，他总是着军服，披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一个副官开道，后面有四个军服齐全的士兵背着四条步枪，摇摇摆摆，好象是戏台上大将出征的神气。他当时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要塞炮台前面

树立一面红旗，旗上有斗大的一个“蒋”字，他算是那个小岛上的最高统帅。他在路上行走时，每遇着官兵如果没有向他敬礼，他就认为是触犯了他的尊严，一定要查问明白，给予处分。他为了造成对学生和官兵的偶像，经常对学生官兵举行精神教育讲话，主要的内容是服从长官，服从校长，服从孙大元帅，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他想建立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中国革命的局面，他想利用苏俄和第三国际的实力援助，出师北伐，统一中国。他第一步免去王柏龄、陈肇英等的职务，并限令离开广州；第二步向国民党国民政府自请处分；第三步派邵力子为国民党及他个人的代表到莫斯科，表示接受苏俄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他要求苏俄和第三国际把中国的革命事业以蒋介石为主要的领导人物，象信任孙中山那样来信任他，象帮助孙中山那样来帮助他。他异想天开地要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他的指挥监督之下。他给邵力子的使命虽然很秘密，外人无从得知，但是从他在当时的言论、行动以及各种部署表现出来，这些是主要的内容。

蒋介石处心积虑是要搞军事独裁的，他标榜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他所说的一个领袖，就是指死去了的孙中山和活在人间的蒋介石。他不问是甚么人，甚么思想，甚么主义，甚么党，只要是服从他的，他就认为是同志。如段锡朋、陈沧波，原来是国家主义派的成员，吴济沧原来是陈炯明的谋士，都是以反共、反国民党、反孙中山出名的人物，在一九二四年出师北伐的前后，这些滥政客看到蒋介石有出息，都去接近他，表示服从他，他就认为是忠实同志，都置之于高位厚禄。又如西山会议派，始终是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谁都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成员都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反叛，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蒋介石也骂这些人是背叛革命的逆党。到了一九二六年出师北伐之前，西山会议派的人物如邵元冲、张继、邹鲁、田桐等，都来到广州表示服从，他

对他们都是优礼相待，并派田桐为武汉招抚使，蒋作宾为湖北招抚使。他对共产党人也是用这样一套手段来拉拢，凡是同蒋介石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他都设法拉拢。人所共知的，他对周恩来非常重视，非常礼貌，他同周恩来认同乡，他要邵力子、张文伯多接近周恩来。北伐军克复武汉，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战地财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来征求周恩来的同意，来拉拢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始终没有上他的圈套。一九二六年出师北伐之前，邵力子登报脱离共产党的同时，他派钱大钧、王柏龄送我钱，表示亲近，钱大钧并劝我脱离共产党，仍回二十师党代表的原职，我没有答应。在我动身离开广州之前，钱大钧来给我送行说："行前去看看校长。"我也没有上他的圈套。他以同宗的关系，拉拢蒋先云，他也确实很爱蒋先云，他派蒋先云为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之一。在北伐军出师北进之前，他任蒋先云为总司令部的秘书，随同他工作，北伐军收复湖南，他送蒋先云二千元，给假半月，要蒋先云回家祭祖。他常对人说，他同蒋先云犹如父子之亲，兄弟之义。在北伐过程中，南昌武汉正在闹对立的关头，他把蒋先云留在南昌，几乎是寸步不离，共产党调蒋先云到武汉工作，蒋先云服从党命，不待蒋介石的同意即只身回到武汉，先任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二次北伐河南战役中调第十一军独立团团长。在开封战役中，他战死在开封城下，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表示非常悲痛，他在黄埔同学会讲话时恶毒地说："蒋先云之死，是共产党害了他。"他是这样诡谲地笼络黄埔学生，中伤共产党。李之龙是三月二十事变的牺牲品，他把李之龙胡里胡涂地抓去关了三个多月，他派人威胁李之龙说："如果不悔过，不脱离共产党，就要枪毙。"李之龙经不起考验，上了他的圈套，毁灭了自己的一切。金佛庄与蒋介石为同乡，他对金佛庄在表面上也算是另眼相看，他不只一次暗示金佛庄脱离共产党，金佛庄不为所动。一九二六年北伐

军收复南昌，金佛庄在第二师任团长，蒋介石调金佛庄赴浙江做敌后工作，约在十月间，金佛庄从九江上船，到南京上岸，即被孙传芳捕杀。据说：蒋介石虽然同孙传芳打仗，还是信使往还，他派金佛庄由南京到浙江做敌后工作，是否是学会了曹操置弥衡于死地的故事，很成疑问，所传虽不尽可靠，形迹亦属可疑！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军校同学会，这是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统一意志的组织，无疑地这个所谓黄埔同学统一意志的组织，主要的目的是要限制共产党方面的活动和发展，并企图根本消灭共产党。所以事实上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了就禁止活动，孙文主义学会名义上是解散了，事实上仍存在。黄埔同学会中也有共产党人参加，如杨其纲、李汉藩、蒋先云、余洒度、周逸群等，但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如曾扩情、潘佑强、杨引之、贾伯涛、酆悌、贺衷寒等。他们在表面上说甚么黄埔同学精诚团结，骨子里对于共产党人则是用拉拢软化排挤打击的阴谋手段，使共产党在同学会中一筹莫展，动辄得咎而不得不陆续离开黄埔同学会，就很自然地把黄埔同学会形成了清一色的反共组织。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克复武汉，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被迫来到武汉，李默菴已经登报脱离共产党了，他们还是疑神见鬼说李默菴是别有作用，使他在南昌工作不下去。李默菴打电报给我，要到武汉来工作。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在党军中不准跨党的要求，共产党在退让政策之下，曾经决定送一批党员给国民党，使之自动脱离共产党，同邵力子一样的办法。最初提出的名单中，有李默菴。李默菴当时不愿意脱党，但过了不久，他的思想变化，又登报脱离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蒋介石提出一个党务整理方案：这个方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体会议通过，产生了一套新的措施，这一套新

措施都是限制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一切活动。我除了在三月二十事变的前后一文中已作了大体的叙述而外，还有一个中共与国民党的中央联席会议的问题提出。所谓国共两党中央联席会议，是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重大措施，既名之为两党中央联席会议，应该由两党协商产生，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而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方式，由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体会议作出决定，用书面通知中共中央查照办理，原函如下：

敬启者：查本党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为求中国共产党员与中国国民党员以道德的基念公忠的精神为合作信约共同遵守以蕲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进展起见，议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基此规定，本党业于十五年（1926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选举张静江谭延闿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五同志为本党出席联席会议代表在案。特此奉告，并请贵执行委员会推定代表三名，并于推定后通知敝处，俾得早日成立。无任企祷！此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六月十九日①

从这个文件，可以得出以下的几个概念：

（一）中国国民党自居于统治地位，把中共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们单方面作出决定，通知共产党遵照执行。

（二）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国民党对共产党是五与三之比，国民党占绝对的多数；使共产党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

（三）共产党如果同意国民党的这一措施，则共产党的一切须

① 见《向导》第165期。

受联席会议的拘束，而听命于国民党。如果不同意这项措施，就须大费唇舌推翻这个决定，统一战线的矛盾是尖锐化了。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我们只能服从第三国际的命令，我们决不能接受任何民主党派和任何政治势力的任何约束，所以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文件没有从正面作答复，仅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而外，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上把这个文件发表了，这不过是表示知道了而已，没有作可否的表示。拖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在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的，在汉口南洋大楼也举行过国共两党中央的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的人物是汪精卫、谭延闿、邓演达、孙科、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丁惟汾、王乐平等。共产党方面出席的人比较少，只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苏兆征等数人而已。但是统一战线的作用就很微妙了！会议虽然常开，但是已经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总算是成功了。

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重大措施，不仅要动员军事，并且要动员经济，动员民众，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支持这一革命的战斗；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应该统筹全局，把党、政、军配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把发动民众与组织民众加强起来，革命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革命民众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之前、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都是从蒋介石的口袋中拿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两位主席是蒋介石的傀儡，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掌玺大臣，一切的措施都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由他一个人计划好提交这两位主席分别执行照办。就体制说：为北伐而设置一个北伐军总司令，为统一军制而设置一个军事统帅，为当时特殊人事关系把这两个性质不同的任务统一起来由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都无不可，但这个总司令应以主管军事

为限，国民党的工作与国民政府的职权仍应按照革命工作的需要分工合作，正常发展，而不能因为北伐，因为设置了一个总司令，就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变质，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在出师北伐之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部署不是分工合作而是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国民党中央方面，张静江任主席，陈果夫任组织部长，蒋介石兼任军人部长，张静江、陈果夫都是没有灵魂的人，而且都是蒋介石夹袋中的人，他们一切是服从蒋介石的，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就等于蒋介石，蒋介石就等于国民党中央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他是一个亡清的翰林公，北洋政府时代的湖南省督军，是一个极其圆滑的官僚，他的政治地位是蒋介石给他的，他只知道做官，哪里懂得革命呢？他的代理主席的作用就等于零了。国民政府之下设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蒋介石而不是谭延闿，这样就使国民政府主席不能过问军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是由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命令予以明白规定，它不仅是统率前后方的陆海各军、并指挥监督前后方的党务、民政和财政。它不受任何拘束可以自由自在地设置机关，任用人员。最荒谬的是在北伐军动员北上之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在北伐时期内，无论前后方一律禁止工人罢工。”蒋介石的用心是想把共产党置于他的军事统制之下，他要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威权禁止革命民众的革命活动，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共产党与革命的工人群众谁理他那一套呢？蒋介石把他自己装扮成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他把他的命令视同封建国王的敕书一样，把他自己的言论行动都自以为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里已经是吃不开了，他愈想提高他个人的权力，愈在革命民众中失去了他在革命民众中仅有的威信，蒋介石逐渐走到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上了。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地发动革命民众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以无情的打

击，在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之下与僵尸一般的国民党，面貌狰狞的蒋介石拖拖拉拉，让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以革命之名遂行反革命之实地混了一年多，一直到蒋介石公然叛变之后才发动讨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在革命史上铸成了大错。

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的危机继续不断地暴露出来，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与中国新旧军阀的反革命势力一天接近一天。中共鉴于局势的严重，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发出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和教员、机关的职员以及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地区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举行国民会议，提出革命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最低的目标如下：

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

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

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士兵及失业游民；

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

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

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

十、停止预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

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

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

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

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会法、商会法；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

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十七、禁止勒种鸦片；

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

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

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

二十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

二十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

二十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个政纲是中共五年来政治主张的最后的一个，从形式上看是号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被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追剥削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对英美日法帝国主义与奉直各派大小北洋军阀作坚决的斗争，而骨子里对蒋介石国民党一系列的反动措施敲响警钟，实际上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与其一系列的反动部署，尤其是处心积虑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及禁止工人罢工运动等类的措施，他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之处，我们算是同豺狼虎豹睡在一起，还有甚么国共联合战线之可言呢？

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北伐战略是甚么呢？从总的来说，他是不打硬仗的，他常常搬弄孙子兵法："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类的教条，实质上他是在第二次东征华

阳战役中吃了一个败仗，他深知打硬仗的艰苦。其次他自统一广东以后，有了政治本钱，得失心重，不轻于冒险。所以他主要的战略是：

第一政治宣传：在国共联合战线的活动中，统一广东的各个战役，政治宣传工作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政治宣传工作是共产党人组织领导，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依靠民众，团结工农，把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有人民带路，宿营的时候有人民供给我们的柴草粮秣（当然给以相当的代价），作战时有人民供给各种情报，并自觉自愿地给革命军承担运输工作，无论在行军宿营打仗，军民都是臂靠臂，肩并肩地以进以退，所以打起仗来革命军好象铜墙铁壁似的，卒能以少胜众，这就是当时政治工作的作用。在蒋介石看起来，他以为无论是机关、学校、部队，只要有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有政治工作人员，不问是甚么人，只要有人发传单、贴标语，开军民联欢大会，就可以团结民众、瓦解敌人，他自以为学会了共产党人所主持的政治工作的奥妙，他以为凡是共产党人所做的工作，国民党人、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一样能做，他以为政治工作的影响很大，政治工作的内容不多，只要是派一些青年学生穿上军衣，拿着传单标语和文告，四出张贴发散就尽了政治工作之能事，他不知道共产党人所主持的政治工作，是发动民众与组织民众的武器，是军民合作的桥梁，共产党人是站在民众之中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人民打成一片。蒋介石同他的喽罗们，把政治工作看成是一种商标，而又骑在人民头上，驱使人民，奴役人民，就很自然地与人民形成了貌合神离。一样的事，两种不同的看法和两种不同的做法，就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及他所有的嫡系部队，如二十师东路军等，这些部队的政工人员都改用他

所谓的忠实国民党员，主要的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这些老爷们走到政治工作的岗位上，大部分就同那些职业军官同流合污，狂嫖乱赌，贪污腐化，不独不深入民间联系工农群众，反而骑在人民头上，奴役人民，剥削人民，因此军民之间就很自然地有了一道鸿沟，就必然得不到民众的帮助，随之军纪风纪的败坏，士气的低落，军队的战斗力量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北伐军在南昌一战，蒋介石嫡系第一师溃不成军，司令官王柏龄逃跑了，党代表缪斌失踪，实际上也是逃跑了，蒋介石率刘峙、朱培德两部分人马退高安待援。他从这个经验教训当中，认识共产党人的工作能力，他为了北伐，才对反共的阴谋活动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略为敛迹。同时北伐各军的政工人员，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如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廖乾五，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林伯渠，第七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虽然不是共产党人，而各级干部中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如第七军苏俄顾问马迈也夫，第八军政治部秘书张其雄对于该军政治工作之部署，对军民的联系，对各将领的政治影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北伐军出长江以后所有收编的部队，大部分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在很短的期间补充训练成为作战部队并赶上蒋介石嫡系各军的水平，这也是蒋介石感到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本来是把政治工作作为一个作战的法宝之一，但是他始终没懂得政治工作的实质。他自以为学会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他的所属各军都有庞大的政工组织，因为蒋介石注意表面文章，讲究形式，不注重实质，一时成为风气，所以他所属的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都是布置得堂皇富丽，好象是高级衙门似的，各级政工人员差不多都是皮绑腿、皮手套、皮马鞭，都装扮成为高级将领似的。他们的工作：在白天照例上班，写通报，批公事，发传单，贴标语，坐在公事房里闭门造车，搞一套空中楼阁的政治宣传，既不深入民间，也不接近

士兵，对上做报告则粉饰太平，对下下命令则狐假虎威，军行所至，征发民财，强占民居，四方骚动，鸡犬不宁，他们的政治工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革命，危害人民，流毒甚大。蒋介石本人始终没有了解他的政治工作与共产党人所主持的政治工作根本不同，他把政治工作的骷髅死死地抓着不放，一直到他失败时，他的所属各军还有政治工作，起了什么作用呢？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他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变成特务。

第二避实就虚：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出师的前后，北洋军阀分化为奉、直、皖及国民军各派，互争雄长，四分五裂，北京政府长期在风雨飘摇中，这倒是我们北伐的有利条件。湖南是赵恒惕与唐生智因权利之争打了好几个月的硬仗，吴佩孚割据豫鄂两省，力图向南方侵略，他鉴于赵恒惕的实力比唐生智为优，故支持赵恒惕攻唐，唐生智吃了败仗退出长沙，逼得走投无路，才派刘文岛当代表到广东向国民政府请降，这又是北伐的一个有利条件。就当时形势而论，北伐军应就湖南已开辟了的战场，北伐军主力出湖南，以唐生智为前驱，直捣长沙，进窥武汉，胜则可以顺流而下，一鼓而下东南，再行整军北进，即不胜亦可以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使敌不能南犯，当时共产党就是这样主张。但是蒋介石认为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第一个劲敌，同赵恒惕打仗不难，同吴佩孚打仗就不很容易，他怕一出师就遇着劲敌，损害了他的锐气和威望，他迟疑很久，才派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和叶挺的独立团与第七军夏威、胡宗铎等部相继出湖南，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兼湖南主席指挥各军作战，即是说把攻打吴佩孚的这一作战任务交给唐生智。蒋介石自己统率他的嫡系军队第一军一二两师及第二军谭延闿部（代理军长鲁涤平，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留在广州），第六军程潜部，第三军朱培德部，共约二万余人，出江西。蒋介石为甚么以主力出江西呢？第一因为江西是北洋军队最弱的一环，加以前江

西军务督办方本仁被直系军阀挤垮了，方本仁只身走上海，有一肚子怨气要发泄，由于方子樵、詹大悲、李西屏等居中牵线，方本仁就投降到国民政府了。方本仁在江西当军务督办时，统率唐福山、蒋镇臣两师及改编滇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独立旅，分驻赣西赣南一带。方本仁吹牛皮说：这几部分军队他完全可以指挥调遣，蒋介石就信以为真，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间，方本仁到了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方本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随蒋介石出江西，蒋介石以为有方本仁这个法宝，一到江西就有两师两旅的军队来迎接他们，这是如何的便宜，又是如何的威风呀！不料一入赣南，两军接触，打了两天硬仗，蒋介石才感到这一战役很棘手，方本仁的西洋眼镜拆穿了，于是暴跳如雷地把方本仁叫了来骂了一顿，并予以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方本仁在当时的处境是前有杀场，后无退路，逼得无计奈何，便轻车简从，长衫羽扇地只身投到蒋震臣的司令部里，被蒋震臣扣留了，据说：蒋震臣原是行伍出身，方本仁把他从一个大兵提拔起来当了师长，这是北洋军队中常有的事，方本仁以为他同蒋震臣的关系比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可靠，他如果能说降蒋震臣，他那第十一军军长的宝座还可以保留，即说降不了蒋震臣，他自信蒋震臣也不会要他的老命，果然不错，蒋震臣扣留方本仁之后，一面通电孙传芳、吴佩孚等，报捷说：某日与粤军蒋介石部接触，生擒第十一军军长并俘获行李辎重甚多，实际上对方本仁仍是优礼相待，仍称方本仁为“恩帅”，蒋震臣亦或有用方本仁这个法宝待机而动之意。北洋将领自恃兵多将广，装备齐全，对北伐军的估计很低，蒋介石在广东露头角的时间很短，以全国的武将来衡量，他的威望还远在吴佩孚、孙传芳之下，这就是方本仁不能说降蒋震臣的症结所在。蒋介石用兵向来是着重打头一仗的，他鉴于方本仁的玄虚伎俩不足恃，于是集中主力先平定赣西赣南，再图大举，进窥南昌。经过了一个多月战斗，打了两次硬仗，第一个回合

因第一军王柏龄部作战不力，北伐军在南昌城下吃了一个败仗。第二个回合北伐军调第七军、第二军对集结在南昌附近的敌军主力打一个大包抄，击溃了敌军主力，生擒张凤岐、蒋震臣、唐福山等三个军长，克复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进驻南昌，即以旧军务督办公署为行辕。蒋介石为了立威，曾搞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一天，在总司令行辕，他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将张凤岐、蒋震臣、唐福山等捆绑在辕门外示众，方本仁到总司令行辕开会，经过蒋镇臣等三人站立的前面，他们三人见了方本仁，都异口同声叫道："恩帅救命。"方本仁也表现一副尴尬相。在那一次的会议中，蒋介石作了两次南昌战役的讲评，最后宣布方本仁作战不力，应予免职，被俘敌军军长张凤岐、蒋震臣、唐福山等顽抗义师，危害国家，一律执行枪决。蒋介石的声威震动了东南各省，原第十一军的番号由第四军陈铭枢师升补，蒋介石想利用方本仁的妙计算是落空了。第二，蒋介石在准备出师北伐之前一两个月，即派何成浚当他的代表，到南京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修好，提出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国民革命军与五省联军联合反吴，第二个办法是国民革命军与五省联军互不侵犯。孙传芳本来是从直系分化出来的，他那江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是一个新形成的局面，他的声势和实力远在吴佩孚之下，他与吴佩孚的军事势力都在长江流域各省，他们相互之间也有不少的矛盾，孙传芳为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与巩固他的地盘，也愿意多结外援，借壮声势。何成浚与孙传芳有同学之谊，向有私交，在他们几次商谈之后，孙传芳答应只要不侵犯他的防地、假道江西是暂时之计，尚无不可。及方本仁勾结蒋震臣、唐福山之事爆发，孙传芳以蒋介石失信，即向江西增兵，阻止北伐军北进，除在赣西赣南屡次接触而外，在南昌近郊的两次恶战，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转败为胜，孙传芳既没有可操胜算的把握，仍然与何成浚拉拉扯扯、与蒋介石边打边谈，一直到北伐军收复东南，固

然是由共产党组织工人在上海几次起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何成浚常驻上海，经常与浙江的夏超，福建的曹万顺，上海的毕庶澄等联络分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不分敌友，联奉倒直。一九二六年的北洋军阀，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奉直之战而后，北京政府对各部北洋军队更无统御的能力，皖系没落了，段祺瑞依违于奉直之间，没有任何主张，国民一二三军曾以革新政治，信仰三民主义相号召，由于信仰不坚，主张不定，与各派军阀拖拖拉拉，终被奉直联军搞垮了。各派军阀，各霸一方，互争雄长，惟利是图，反动政局的混乱，已达极点，这倒是对北伐军有利的形势。可是这些反动军阀有一共同之点：一致反对进步的势力，他们把工人、学生、进步知识分子都视为过激派，对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大小进步的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都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对于一些报纸间或报道一点工农学生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都一致认为是过激宣传，象北京的《京报》及《社会日报》都是职业报人办的，奉直各军军阀把这两家报纸指为赤化的报纸，京报社长邵飘萍(振青)、社会日报总编辑林白水都以赤化嫌疑先后被奉直军捉去枪毙了。冯玉祥、胡景翼、张岳即所谓国民一二三军，本来是在奉直皖各派大军阀排挤之下形成的，他们没有甚么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北洋军阀也为他们戴上赤化的大帽子。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之时，正值张作霖入关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进行"讨赤"，他们发出通电，声讨南北二赤："南赤"即指北伐军，"北赤"即指国民军，他们的分工是吴佩孚统率直鲁川湘各军讨伐"南赤"，张作霖统率关内外各军讨伐"北赤"，这是旗鼓相当，界线分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在北洋军阀方面，还有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北伐军方面有工农群众与苏俄的支持。北伐军的装备虽然比北洋军阀的装备差一点，但是北伐军得人心，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力量作后盾，无疑地北伐军是站在有利的地位，

胜负之数，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们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是如何对待敌人呢？他是采取甚么样的战略呢？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前，即派蒋作宾当他的代表到奉天，因为蒋作宾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是朋友，借杨宇霆的关系找张作霖。一个被讨伐的“南赤”派代表去同讨赤军大元帅打交道，除了向张作霖解释说他不是赤化以外，还有甚么话好说呢？人所共知的蒋作宾曾经出卖国民党，投降袁世凯，做过一任陆军次长，洪宪之役首先劝进的一个滥政客，此时他不仅不是蒋介石的干部，也不是国民党员。张作霖知道蒋作宾的分量，对他很冷淡，算是毫无结果。蒋作宾回到广州以后，接着又派吴铁城为代表到奉天，吴铁城是三月二十事变制造阴谋的人物之一，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著名的反共人物，据说吴铁城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还带了很多礼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去找张作霖还能说甚么呢？这恐怕不是招降纳叛，而是张松献地图的把戏吧！所以过了没有好久，张作霖到了北京，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只要蒋介石有诚意，当然可以合作。”这里所说的诚意是甚么呢？合作又是甚么呢？不难理解，吴铁城代表蒋介石同张作霖所谈的总不外：“反俄反共，联合讨赤”吧！除此以外，蒋介石还有甚么话同张作霖好说呢？除此以外还拿甚么合奉张口味的条件来进行联奉呢？国共联合战线的危机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共产党人是太不敏感了！当时也有人为蒋介石这样地解释说：大敌当前，北伐军的实力究竟有限，联奉是符合于远交近攻的战略，也是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措施。殊不知革命的统一战线，不能把革命的敌人拉来做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成员，如果是远交近攻吧，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的防地与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接壤，而孙传芳本来就是直系的一部分，他与吴佩孚算是血肉相联的关系，孙传芳原也是“讨赤”的大将，在北伐军还没有出动之先，蒋介石即派何成浚当代表到南京与孙传芳商量合

作的条件，何经常住在上海与孙传芳交换情报，这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又如何解释呢？而且当时蒋介石对无论哪个大小军阀，只要能够找出一点关系来的，都派代表或是军事特派员或是招抚使去勾搭，如果不是吴秀才装出一副忠心贯日、大义参天的面孔，讨伐赤化异端的话，蒋介石一定也派代表去联吴，所有的大小军阀都联合殆尽了，那末北伐军的敌人究竟是谁呢？

第四：勾结与收买。蒋介石是搞交易所的出身，他对政治生活和军事行动也是用搞交易所的方法来搞政治投机和军事投机。他的总司令部中设置好几个总参议和无数的参议，他们的任务就是代表蒋介石向各方面进行交际和拉拢与勾结收买军队与军人的工具，这些当总参议的人物如何成浚、张群、朱绍良以及后来的贺国光等，都是在南北军政界有些关系的，他们的市场就在各大都会的租界中妓馆里，于嫖赌逍遥鸦片烟的场合中来进行交易。蒋介石本来是青洪帮的人，一向是挥金如土，大往大来的，他所用的这些总参议同他是气味相投作风一样的朋友，他在搞军事投机和政治投机的活动中，用嫖赌逍遥，勾结收买为战略之一，居然也发生了很多的作用。在北伐战争中，他把福建的杜起云、曹万顺收买过来，就搞垮了王永泉，削弱了孙传芳，何应钦的东路军便兵不血刃而定福建，他把浙江的陈仪、周凤岐收买过来，即很顺利地克复浙江。不仅在北伐战争中如此，在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同冯阎的战争中，他用重价收买韩复榘、石友三及商震，因而瓦解了冯阎。一九二九年春，蒋介石西征，桂系的李、白、胡、陶，陈兵武汉准备同蒋介石决一死战，蒋介石事先在日本租界设置了收买桂系军队的人员，蒋介石用兵不多，两军尚未接触，桂系悍将李明瑞、翁照垣、俞作柏被蒋介石收买，在应山、孝感一带通电降蒋，桂系在武汉近郊的主力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军心动摇，不战而溃。桂系割据武汉的局面瓦解了，蒋介石进驻武汉，此时韩复榘任河南主席，石友三驻

洛阳，蒋介石勾结韩、石到武汉，除隆重地招待而外，并各赠送十万元，韩、石本来是头脑简单的军人，加以冯玉祥不善于将将，对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看待，刻薄寡恩，人怀怨望，蒋介石这样一来就使韩复榘、石友三堕进了他的迷魂阵里。韩复榘见了蒋介石之后，行前到各处辞行，他对钱大钧、周佛海说：老总（指蒋）真不愧为圣明的领袖，我们一定为他效劳，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象我们的那位鸟老总（指冯）真没有人味……。据说韩复榘任河南主席时，与冯玉祥一言不合，即命韩复榘罚跪，不久蒋介石与冯阎战争爆发，韩复榘、石友三、商震先后倒戈降蒋，冯、阎就垮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流氓手段，对他的军事独裁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伐军克复武汉前后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这个誓师典礼，在共产党人与革命的工农群众看起来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自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在这两年半的时期中，经过了平定商团的叛乱，第一次东征，回师广州讨伐刘杨，第二次东征等战役，革命战争是在国共联合战线的情况下，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北伐战争虽然是战争的敌人强大些，战争的地域辽阔些，而战争的性质仍然是一样，所不同的是广东统一了，革命根据地巩固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由无到有由小变大了。以前的任何战役中，都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从没有装腔作势搞一个甚么誓师。在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方面，就把这个誓师典礼视为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最隆重的典礼。当时湖南的战事很吃紧，赵恒惕吴佩孚联军南下，唐生智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之下，连战皆北，丢了长沙，败退到湘南各县待援，请国民政府派兵增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乞援的使节，络绎于途，在那万万分紧急的关头，蒋介石慢腾腾地不发一兵，不输一弹，借口："团结力量"，"巩固后方"，"筹措军饷"，他聚精会神地选择黄道吉日筹备举行誓师典礼。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为了请兵增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常去晋见蒋介石请求增兵，蒋介石对他说：誓师是个大典，汤武革命，莫不誓师，没有誓师就动兵员那是轻举妄动。再就湖南战事说，也应该给唐孟潇一个锻炼的机会，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湖南的局势还没有那样严重。刘文岛又说：誓师典礼，可否提前举行？蒋介石

说：誓师典礼是关系全局，不能因为湖南这一局部的情况有所改变。刘文岛也就无可如何了。事实上是因为蒋介石派到奉天与张作霖勾结的代表，与张作霖还没有得到谅解，派到南京与孙传芳勾结的代表还在讨价还价中，他也知道唐生智是一个自命不凡，野心很大的人，如果不使之几经危难，折去锋芒，将来不好驾驭，这就是蒋介石迟迟不发兵援湘的主要原因。至于誓师典礼，蒋介石也真是视为是他树立威信、巩固权力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他说：汤武革命，莫不誓师，誓师典礼，就是拜将的典礼，拜将就是戴上王冠的初步。他以为汤伐桀，武王伐纣，都举行誓师，誓师也是取得军权，攘夺政权必不可少的程序。他完全是带着封建意识，才慎重其事地举行这个誓师典礼。誓师典礼是意味着国民政府的主席拜蒋介石为大将，把国民政府的征伐之权委之于蒋介石，所以监誓与授印的仪节应该由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分别担任。但是蒋介石认为这样还不够隆重。他以为谭延闿不过是北洋政府的一个督军，他直属的一个军长；张静江既无功业，又无学问，连虚名也没有，不过是一个富翁而已。他要选择一个地位很高，名誉很大，相当于孙中山那样的人而又不会与他自己有权利地位之争。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来监誓授印，哪里有呢？不得已而思其次，有点清名，不容易居人下的人物，恰好吴稚晖自被北京政府通缉以后，就蛰居在上海，以写作自活。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是孙中山的朋友，在北大教书多年，学术地位，与蔡孑民、陈独秀齐名，也算是门生满天下，也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是宣言不做官的，在这些条件之下，蒋介石才把他请到广东来担任誓师典礼中的监誓与授印的角色。誓师的那一天，在广州东教场搭了一个很宽敞高大的将台，戏剧性地点缀得金碧辉煌、庄严灿烂似的。誓师典礼开始了，时间在上午十时，正是烈日当空、热气熏人，将台上吴铁城拿着传声筒司仪，蒋介石宣誓，吴稚晖监誓并授印，谭延闿与张静江

作了简短的致词，蒋介石作了长篇的演说，将台上的来宾不多。台下军队很多，他的直属部队如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师及吴铁城的警卫师改编的新编第一师，及保安警察的官兵都到了，也有些学校的全体师生参加，但民众团体尤其是工农群众，来参加这个蒋介石所谓盛典的并不多，这也就反映蒋介石脱离群众的开端了。

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北伐大军的后方，动员北伐之前，巩固后方是非常必要的。共产党主张健全工农组织，加强城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村的农民自卫军，制止地主豪绅的政治活动，防范反革命的军事势力如陈炯明、魏邦平等的死灰复燃，建立一个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巩卫后方，这是符合国共联合战线的要求的。蒋介石对于巩固后方也非常重视，但是他的想法与做法，是违反国共联合战线的要求的。他自以为有三万军队与广东的地盘，他不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自以为是地另搞一套，他反对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工人纠察队，更不相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他招降纳叛，大量收容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他把各县的臭名昭彰的土豪劣绅的武装——民团复活起来，在北伐军还没有动员之前，他驻防在东江南路各地的军队，即与民团勾结压迫农民、封闭农会的事件不一而足。共产党方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用各种方式提出忠告，提出批评，甚至提出抗议，要它们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顾全国共联合战线的立场，维持革命的利益，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装聋作痴，硬行抵赖，一面把共产党的公正评论说成是破坏国民党的威信，破坏北伐事业，把共产党的忠告，认为是恶意中伤，共产党指责军警压迫民众、枪杀农民的事实，蒋介石反噬为是煽动工农阴谋捣乱。国共两党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但是大敌当前，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及奉张与直系曹、吴，是当时革命事业中主要的敌人，所以把国共的矛盾冲淡了，总以为是兄弟阋于墙，共产党对蒋介石仍然抱定退让态度，

共同进行北伐战争。

蒋介石对于后方的部署十分周密，张静江和谭延闿这两位主席，本来就是蒋介石的化身，他们发一言、举一事，无不事先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或是蒋介石交办，他们一点也不敢走样的，而蒋介石犹以为未足，他为了加强他的反动统治，派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并执行代理总司令的职权。蒋介石是强调在战时是军令高于一切的，所以在后方，李济深的权力是超过了张静江和谭延闿之上，党政军各方面的事务在总司令的名义之下是一把抓，蒋介石创造了这样的作风，李济深也是这样干。总司令之下在各大城市或军事交通要地，分设卫戍总司令或是警备司令，卫戍司令与警备司令就是一个地区的小总司令，也是党、政、军、民、财各事都管，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各级行政机关与党务机关，但是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以军事长官为主。党政方面负责的人如各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及各省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和委员，都不过是军事机关的附属品，也可以说都是军事长官的狗腿子，如北伐军出发以后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是古应芬、市长是欧阳驹，这都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代行总司令职权的李济深，次一等的人物就是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及省市党部负责人朱家骅。李济深、钱大钧、朱家骅三个人是三位一体，一个鼻窟窿出气来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东南各省市普遍地发动白色恐怖时，捉谁关谁杀谁放谁，都是蒋介石预定下来的锦囊妙计，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共产党方面倒是预见到蒋介石总有一天要同共产党翻脸，但是我们革命的经验不够，警惕性不高，我们没有想到蒋介石对于赤手空拳久经患难的战友，一翻脸就大肆屠杀，因此我们在革命的策源地，北伐军的大后方，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之变，共产党牺牲了很多的优秀党员，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北伐军的战费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共产党方面认为，广东在海外经商的华侨很多，绅富地主很多，如果由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发行殷实公债或军需公债，就当时的需要每月发行三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公债券，或是一次以一年计，发行五六千万元的公债即可应付裕如。当时军费之所需连唐生智的第八军在内，计第一军三师另加钱大钧的第二十师共四师，第二军鲁涤平部二师另加陈嘉佑一师共三师，第三军朱培德部不足二师，第四军连前后方一起共三师一团，第五军李福林部不足二师，第六军约计一师，第七军二师，第八军二师，总共不过十六个师，每师每月给养平均以十三万元计算（有的师十五万元，有的师十万或十二万元），每月不过二百余万元，再加上行军必要之所需，每师每月约需一二万元不等，每月总共也不过三百余万元，再加上总司令部的给养和特别开支打算每月一百万元，总共也不过四百余万元。在这样的数目之内，如果在动员北伐半年之前发行公债，而富商、华侨、地主摊派或劝募，那都是轻而易举，军用足而民不扰了。共产党不只一次向蒋介石提出筹措军费不增加贫民负担的原则。但是蒋介石不接受这样的意见，他说北伐大业，人人有份，有钱要出钱，没有钱的也要出钱，有力的要出力，没有力的也要出力，这就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总动员论。他筹措军费的办法是：（一）预征田赋；（二）开放赌禁烟禁；（三）捐税附加；（四）大量发行纸币；（五）发行金库券；（六）在占领城市征收房地捐；（七）在占领地区实行厘金附加。这些办法，几乎是完全增加贫民的负担，而富商大贾、土豪劣绅，一点也没有负担着北伐战费的义务。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和金库券，是按人口平均摊派，而发行的方法又是经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手，向贫苦人民摊派，这一副千斤重担就完全落在贫苦工农的肩上。共产党对蒋介石这样搜刮贫民的办法，不得不表示反对，在共产党的党报——《向导》上提出批评，陈独秀以共产党负责人

的身份，向蒋介石提出劝告。就是国民党中比较开明的人士，也认为这样无限度地搜刮民财，与北洋军阀并没有甚么分别。在正义的呼声压迫之下，所以到一九二六年七月间，发行第二次公债时，国民政府公布一个《公债摊派法》，又成立一个"改良税捐委员会"，拟定《取缔奸人操纵公债票金库券条例》，又颁布《剿清土匪的计划》。监察院曾有专察官吏舞弊的措施。这一些比较开明的、有利于劳苦大众的办法，是经过了共产党相当长的时间的斗争才决定下来的，虽然这些差强人意的办法决定了，公布了，其效果如何呢？也不过是白纸写成黑字的空头支票，都在"军政时期"的借口之下，而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民团以及国民党右派军人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画出了一道鸿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集团站在鸿沟的右边，工农群众以及广大的革命民众站在鸿沟的左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了一句空话，而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逐渐地形成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北伐军部署已定，动员北进。蒋介石在出发前，还以国共合作的关系，邀周恩来作过长谈，并约定请周恩来在广州待命，这就是他表示还要用他，就是他对他的一种礼貌。周恩来主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差不多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毕业之后分配到各军师工作，也有的是共产党员，因为色彩不很鲜明的，也有被蒋介石吸收到中央党部军人部、黄埔同学会及第一军所属各单位工作。我主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是隶属中央政治训练部，毕业之后，差不多是全部学员分配到第八军工作，他们随同刘文岛到湖南任该军各师团营连的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的职权比各级党代表的职权缩小了很多，仅限于政治教育与督促作战，不管行政事务，并受同级主官的指导，至此政治工作的质量比党代表制时代，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因此政治工作的威信降低了很多。

这两个训练班结束以后，我就闲在广州没有工作，我们的党中央决定要我到莫斯科去学习，我就在那里整装待发。当时到莫斯科去学习是个光荣的任务，我也没有守甚么秘密，因此有很多朋友和同事未能免俗地为我饯行。因为我在广州待得久，认识的人多，上层社会有关送往迎来的场面，我也参加，当然国民党方面也有人留我仍在广州或到前方工作，因此在广州停留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北伐军是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蒋介石约在七月二十左右出发前方督师，我是七月底才离开广州到上海准备去莫斯科。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于七月十五日克复长沙。这个捷报到了广州，一时人心振奋、鼓乐喧天，各报出号外，满街汽车发传单，全市的市民举行庆祝北伐军胜利大会，而蒋介石的爪牙与各地来到广州投机的官僚政客别有一番做作来为蒋介石祝贺，他们都说蒋总司令洪福齐天：誓师未及旬日，主力部队未出广东，即获大捷，真是"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了。在国民政府的庆贺宴会上，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摇头摆尾地讲了一大套：甚么"国民政府的洪福，蒋总司令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唐总指挥的神勇，这是三位一体的胜利，缺一不可的。"其实湖南的战事发生于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三四个月以前，唐生智原属赵恒惕的一个师长。赵恒惕以联省自治相号召，以省宪为割据湖南的法宝，唐生智初发难时亦以拥护省宪为名，采取唐朝藩镇逐留守者自为留守、逐留后者自为留后的故事，仍希望北京政府予以承认，并无革命的意图。当时北京政府久以号令不出都门，没有黜陟幽明的权力，对唐赵之争，本不欲作左右袒，采取谁胜利即承认谁的办法。而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的关系，偏偏要出头露面支持赵恒惕讨伐唐生智，赵恒惕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统率叶开鑫、刘铏、贺耀祖三个师及夏斗寅的一个混成旅，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之下，一鼓而下三湘，再战而进长岳，吴佩孚陈兵湘鄂之间，形势逼人；唐生智且战且走，退到湘南，状甚狼狈，唐

生智既得不到北京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另谋出路，想投向国民政府，又怕谭延闿、程潜、陈嘉佑这些湖南派的老军头儿占了他的上风。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那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刘文岛不得意于武汉，来投到唐生智的幕中当谋士。刘文岛与唐生智及陈铭枢、白崇禧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刘文岛在保定军官学校没有毕业，即自费到法国留学，回国后在武昌教书，被学生驱逐了，才跑到湖南，因为唐生智有枪杆，有地盘，刘文岛就镶唐生智的边。在唐生智败退湘南后，刘文岛就怂恿唐生智投奔国民政府，挂出革命的旗号，又以保定同学关系，分别函电陈铭枢、白崇禧多方拉拢，乞求声援。当时广东正在准备北伐，招降纳叛也是蒋介石的战略之一，就在陈铭枢、白崇禧的中介之下，国民政府电复唐生智欢迎他的起义，并要他派代表南来共商进取，因此刘文岛就代表唐生智来到广州。国民政府先派陈铭枢、白崇禧到湘南，与唐生智会商，并了解唐生智的军事上的实力与政治上的要求。陈、白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即发表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败退湘南时，是一支前有杀场后无救兵的孤军，经过了国民政府收编为第八军军长兼湖南主席以后，它就有了后方，有了接济，有了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就很自然地军心为之一振。唐生智治军也有他的一套办法，打仗也很勇敢，虽然骄傲暴躁、权利欲高是其所短，而识时务，善于转变，亦无可厚非。唐生智接到国民政府的任命，即通电就职，率师北进，军行所至，得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配合作战，实力增长，士气旺盛，在长沙、衡阳之间打了一仗，打败了叶开鑫，吓跑了贺耀祖，夏斗寅部张森团投降了第八军，贺耀祖部退到湘西派代表向蒋介石接洽投诚，夏斗寅亲自到广州向国民政府投诚，赵恒惕的残余部队退到湘鄂赣的边界上，没有再战的力量，唐生智统率所部进驻长沙。他第一次进驻长沙是以代理省长拥护省宪为名义，这一次进驻长沙是以

国民革命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出现，人马一样，名义不同，形势为之一变，这就是古人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人心所向，天必从之的道理。

唐生智攻克长沙，北伐军的主力分湖南、江西两路攻击前进，蒋介石统率他的主力出江西，任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除了他的本部人马而外，加上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叶挺的独立团，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亲率夏威、胡宗铎两个师，唐生智在长沙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北伐军的声势大有气吞河岳、威震中原之概。

先是刘文岛初到广州，吹牛拍马，八面玲珑，国民政府在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的同时，刘文岛以蒋介石的特许加入了国民党，即任命刘文岛为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时的规定，军长是上将，党代表与同级军事长官同级别，各级军事长官的服制领章虽有初步规定，并没有通令实施，也没有人穿过礼服，就是蒋介石七九誓师的那一天，也是穿的通常军服。刘文岛本来就是一个急色儿，他以一个中学教员被学生赶走了，现在一步登天地当上高级军事长官，非常得意，他按照规定的图样做了一套上将的军服。约在七月十日前后，他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他满怀希望在宣誓就职的那一天，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以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来参加，当时刘文岛穿着上将的礼服，神气活现，他殷勤招待参加典礼的来宾，可是那一天不独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没有到，就是次要的人物也到得不多，倒是两湖人士到得不少，这说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各种关系上不重视刘文岛。而两湖人士则以广东人一贯的有浓厚的排外气氛，这一次湖南的局面是两湖的人士搞起来的，不问刘文岛的为人如何，他这一次在北伐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形成这样的场面。

刘文岛不被人重视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待人处事作风恶

劣，主要的是由于他不是唐生智的重要干部，也不是一个正式军人，他过分地吹牛拍马，最使人讨厌。但是他究竟是唐生智的代表，在北伐战争刚要开始，唐生智统率一万多可战之兵正在前线与我们的敌人作战，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忽视这一部分力量，所以国民政府一面把刘文岛留在广州商量第八军的政治工作，一面派陈铭枢、白崇禧秘密到湘南，与唐生智会谈北伐大计，借窥唐生智的虚实。陈铭枢、白崇禧是有名的军人中的政客，各有一套纵横捭阖的手腕与拉拢谁打倒谁的妙论，他们三个人又同蒋介石拉保定同学的关系，他们在会谈中除了谈北伐的大道理而外，还谈了很多他们相互间的利害问题。这一次的会谈，决定湘军谭延闿、程潜、陈嘉佑等部不出湖南，解除了唐生智对湖南地盘上的顾虑，又决定四军七军出湖南，增加了唐生智这一路的实力，把这一路作战的计划大体决定了。陈铭枢、白崇禧回到广东，刘文岛才率领八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北上。唐生智的部队扩编为三师，以刘兴、何键、李品仙为师长，夏斗寅部扩编为鄂军第一师，仍由唐生智节制指挥。唐生智原不过一师之众，一转瞬间就形成了八个师七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的统帅，唐生智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劲旅，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中，他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更以湖南各县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与北伐军配合作战，赵恒惕的残余部队沿途被农民协会截击缴械的很多，赵恒惕的部队，差不多都是由三湘农村中征发出来的，他们鉴于大势已去，真所谓兵败如山倒，他们都把枪支交给农民协会，各人逃回老家去了。总结这一次的战争，并不是唐生智打败了赵恒惕，而是革命的民众与共产党所发动的政治宣传瓦解了赵恒惕的部队，后来贺耀组也在湘西起义响应北伐军，由师长不久也升了军长，他曾对我说："赵炎午并不是被唐孟潇打败了的，而是被你们的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轰垮了的。"这就说明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的前后，国共联合战线的裂痕已经是很显明的了。此时的蒋介石自以为有了政治本钱，对苏俄与中共是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他们以为共产党没有武力，在他那威迫利诱的诡计之下，共产党人总会屈服的。在共产党方面，是以革命的利益为根据的，我们固然是要继续维护国共联合战线，要挽救国民党和蒋介石，所以委曲求全地同蒋介石和他的一般将领打交道。在北伐军各将领随蒋介石动员北上之前，我们曾举行过两次公宴：第一次公宴是由周恩来等二人出面作主人公，地点在永汉北路财政厅前太平餐馆举行的，所请的客人是蒋介石的几个亲信的师长和几个高级幕僚如第一师指挥官王柏龄，第二师长刘峙，第二十师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及总司令部的副官长张治中，总司令部军需处长俞飞鹏，交通处长陆桴庭等约二十余人，原来请的客人中还有总政治主任邓演达，他因为有事没有到。那几天他们准备出发的将领应酬很忙，我们宴会的时间是定的下午八时，约在九点多钟他们才一窝蜂地涌到。客人当中有半数以上已经是酩酊大醉，我们入席以后又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很能喝酒，他打了两次通关，另外一个主人也打了一个通关，凡是喝酒的无论是客或是主人差不多都醉了，只有周恩来并无醉意。我们相互之间都是多年同事，都是两次东征回师广州各战役的战友，我们在公谊私交方面都处得不错，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很高，他们都以为周恩来将来在革命政府中总是一个重要人物。钱大钧同我是两次同事，在第二次东征海丰战役中共过患难，他在酒席筵前提起二次东征的往事。王柏龄最怕人提起第一次东征淡水之战，他几次装醉打断我们的话头。这一次的宴会虽然没有甚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问题提出，形式上是我们为北伐军上前线作战的将领饯行，不过是私人的应酬而已，实质上是共产党为了巩固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我们才举行这次的公宴，是我们党给我们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们在喝酒

与吃茶的当中，也表示共产党人是英勇任事，坦白待人。周恩来很勇敢地打了两次通关，输了拳就很痛快地干杯，赢了拳就很严肃地举起酒杯等待对方喝酒，以他那简单明了的语调，闪灼动人的目光，执行酒令时大公无私的态度，全场都为之喝彩，就是王柏龄那样奸狡巨猾的作风，输了拳也不敢抵赖，俯首贴耳地喝酒。大家看了王柏龄的那副形象都点头微笑，异口同声地说："今天你该认输了吧?"周恩来在宴会席上对待王柏龄的神情，就同现在他在国际政治舞台操纵自如，几乎是一样的。

第二次公宴也是共产党布置的，出面做主人的是两湖和广东四川公开的五个共产党员。此时一二军已经出发，所请的客人是三、四两军的高级将领及鄂军第一师长夏斗寅、两湖宣抚使蒋作宾，第八军的各级政工人员，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浚，以及派赴内地各省的军事特派员。这一次的公宴形式上是为出发前方作战的工作人员饯行，参加的人员以两湖江西人士较多。宴会开始，主人致词，提出三个问题：(1)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国民革命的内容，是北伐胜利的保证。(2)革命党人与革命军人要怎样执行国共联合战线。(3)北伐战争的意义。主人致词之后，接着来宾发言，如张发奎、陈铭枢、蒋作宾、何成浚、王均等都讲了话，都是针对主人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来发表各人的看法和做法的意见。那一天的情况，国共联合战线的气氛很浓厚，大家都是跟着共产党的论调走，没有甚么反面的意见。在坐的客人也有不少的人是有反共的思想情绪，中国有一句老话："吃人的口软，得人的手软"，有反共情绪的人，在那种气氛之下，也只有不作声，就是消极抵抗了。这一次的公宴是着重讲话和交换意见与联络感情，没有闹酒，没有猜拳，几个主人忙于发动客人讲话与同客人谈话，连菜也吃得很少，我们是要向那些客人作一次政治宣传，造成国民革命军中左派的气氛，即是发动他们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气氛。客人方面当然也看得很

明白，主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发表的意见，自然也是共产党的意见，一定还有人吃了我们的饭，听了我们的话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做一个小情报，讨一个好，也可能再闹一场磨擦，说一场是非，所以我们把我们主客双方的发言稿整理出来，等待蒋介石对我们有责难时，我们就把原讲演稿发表出来再作一次更比较广泛一点的宣传。

约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底八月初，我离开广州到上海准备去莫斯科学习。行前陈延年对我说：夏松云去莫斯科的请求，中央还没有批准，区委会再去信申请，你到上海再当面向中央说明理由，我想这不是甚么大问题，总不会不准。我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平安大旅社，詹大悲夫妇也住在这里，我把广东区给我带交中央的信送去了，两天还没有回信，到了第三天一大早，项英来看我们，他已得到消息不准夏松云同去，我即请他带一封信给陈独秀，我要求同他当面谈谈，项英说："你干脆就不要出国了，你仍到中央来工作，国内革命高潮到来，各处的工作都感到事多人少，就是中央准松云同志同你一道去，你在革命的责任感上过得意去吗？"他是郑重其事地对我提出这个意见。我说："我倒不一定要到莫斯科去，既是党决定要我去，就只好去，我只多了一个请求要夏松云同去，这样的先例不是很多吗？现在中央如果叫我不去，当然我就不去了。"项英又说："我去同中央商量。"我就有点神经过敏地问："仲甫不肯同我见面吗？他还在张国焘的包围中吗？"项英说："你不要问那些，你不去莫斯科就甚么事没有了。"我望着项英出神，并很感慨地说："真神秘得很！"项英毫无表情地走了，我送他下楼，他回顾说："静听我的回报吧！"当天下午接到中央的通知："夏松云同志暂留上海工作，去海参崴的船期还要十天左右，决定再通知。"送信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同志。我当时这样想："中央为甚么这样冷我呢？难道说他们就不想听听广州方面的工作情况吗？"当时我的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波动，几乎要哭出来。一会儿詹大悲夫妇来约我们同去

吃饭，他也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派驻上海的代表，同席的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还有方本仁的代表方子樵，他们正在接洽拉方本仁去广州，他们有的是钱，我就同他们混在一起吃喝游玩和搓麻将。这样腐化的生活，把我的情绪暂时平定下来。他们接着又劝我不要去莫斯科，同他们结伴回广州，同去参加北伐，我是感到彷徨。过了两天我们中央转来广州区的电报，促我回广州，据说周恩来有信给中央：李富春随二军出发前方，第二军招募新兵要在后方成立政治部，要我回去任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样就决定我不去莫斯科了。项英也来同我谈话说："如果广州方面不来电报要你回去，中央已经答应你在中央工作，不过张国焘不同意你再去搞工人运动，我同张国焘在争执中，接到广州的来电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夏松云带着两个孩子到高邮母家省视，我同詹大悲等结伴回广州。

我在上海逗留约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中，正是北伐大军集中长沙准备大举北进的时候，上海是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笼罩之下，对于北伐军克复长沙这一战役的评价还不很高。观察中国局势的国内外人士，都认为赵恒惕与唐生智之战争，是湖南人争夺权利的战争，唐生智占领了长沙，不等于北伐军战胜了北洋军队，如果吴佩孚的主力加入作战，唐生智必然还要退出长沙，如果蒋介石兵出湖南，他的实力不仅不是吴佩孚的敌手，而且蒋介石统率的湘军一定要同唐生智冲突起来，北伐军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又加以国民党的右派如张继、邹鲁、居正等在赵恒惕与孙传芳之间活动频繁，他们到处宣传国民党与共产党一定要分家，他们并保证蒋介石将来一定可以同赵恒惕、孙传芳共商国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上海还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状况，并没有一点战时的气氛。我同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谈过两次东南五省的局势，他很坦白地对我说："我到南京看过孙馨远，我们是老朋友无

话不谈，他很坦白地说：‘国家已经弄成了四分五裂的局势，谁也奈何谁不得，我的实力保卫五省有余，支撑全局不足，我对南对北，一视同仁，章太炎先生很知道我，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指国民党的右派头子张继等），我也见过很多，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是不错的，但是国民党同俄国过激派和中国共产党搞在一起，那是很危险的，目前的国民党第一要统一和稳健，第二要驱逐过激派，蒋介石如果有这样的诚意，这样的决心，我们是可以商量合作的。’他已宣布保境安民，这是对北伐军与直系军队之间的中立态度，这是与我们有利的。”我即紧接着问：“你怎样答复他呢？”他说：“我告诉他，国民党是有数十年历史的一个党，没有俄国的过激派以前就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一些书呆子，这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谁不跟谁做朋友呢？这都是小问题，蒋总司令的内心很有方寸，北伐军的主要敌人是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他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所以我们要合作起来共商国是。”我又问：“你这一段话对孙传芳说，倒是对症下药。不过你的话中：‘共产党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一些书呆子’，‘这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蒋总司令的内心很有方寸’，这几句话我听了很难过，我怕你将来也陷进破坏孙总理三大政策的迷途，走右派的路。至于孙传芳，那是反革命定了的，无足计较。”他答应我说：“那倒不会，我是搞了大半生的军队生活，我没有搞政治的兴趣，我不是国民党的左派，也不是右派，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有人说我是黄兴派，其实我同黄克强是同学，是朋友，我同他搞过军队，当过他的军务厅长，就是如此而已，有甚么黄兴派呢？你们也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中不可少的一个人，我也是这样看法，我现在是帮他的忙，他要我尽可能地拉住孙传芳，不教他同吴佩孚合作，你想我同孙传芳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甚么话好说呢？我同陈仲甫也是老朋友，你一定不要把我们今天的谈话告诉他，他发起火来，不仅是要骂出口，而且要写出文章登在报上，那我可真是招架不

了。”他说完了又叮嘱说：“是真的，我们的谈话，说了就完了，不要同别人谈。”我一向认为何雪竹是个滥好人，他爱朋友，肯帮朋友的忙，他不懂政治，也不懂革命，因为他是同盟会的老人，又是军界的前辈，所以他认识的人很多，他的朋友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从保皇党、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醒狮派乃至于共产党，无政府党的人士，他都有来往，我同他的私交不薄，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同蒋老总是一样的，他是无论甚么党派甚么主义，只要服从他的就是同志，你是无论好人与坏人，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只要同你往来就是朋友，对吗？”他说：“我这样待人处事还会错吗？”我说：“就是怕到了紧急关头，你不知道跟谁做朋友与走哪一条路了。”这一次我在上海同他作过几次长谈，我了解他是死心蹋地跟着蒋介石走，我也没有说服他，他也没有反驳我，我们是各人保持各人的见解而已。当时上海的舆论，差不多被国民党右派的活动迷惑了，销路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商报》都是接近买办阶级与国民党右派，《民国日报》为叶楚伧所占据。后来邹鲁、谢持、张继、居正等又办了一个《江南晚报》，他们对于国共联合战线尽了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能事。共产党的党报——《向导》，是个周报，虽然销路很广，每期发行到十九万多份，申、新、商及《民国日报》销行的总和，还不及此数。但是《向导》是周报，是一个评论性质的报，在报道方面的作用不大，而且我们发行的对象是学生、工人与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农民及城市进步人士，对于一般的市民与知识分子影响不大，所以我们在政治宣传上是比较不够全面，我们政治敌人的造谣中伤，我们不能及时地予以还击，质而言之，在那样革命的高潮中，我们没有一个日报，一个消息灵通、报道及时的、有强度政治宣传的日报，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们由上海回广州的程途中，在邮船上，詹大悲同我讨论国民党的右派问题。詹大悲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武汉是一个风头人物。

他当过《大江日报》的发行人兼主笔，曾一度主持汉口都督分府的事务。他原属黄兴一派，他的性情急躁、思想固执，自黄兴死了以后，他几乎是独往独来，无所依靠。还是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流浪在广州多年，对孙中山与国民党也没有甚么密切关系。因为何成浚还有一点军队在福建广东之间，他即以鄂军驻广州的代表出现，过着腐化的生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以鄂军特别党部的关系，当选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是湖北省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詹大悲与董必武是老朋友，交谊甚深，他受了董必武的影响有了转变而成为共产党的同情者。我同他因为同乡关系，往来也很密切，几乎是无话不谈。有一天他对国民党的右派问题，发表他的高论说："国民党的左右派，不是国民党内在的关系形成的，而是共产党造成的，国民党一向就是一盘散沙，只有几个主张见解不同的人，并没有甚么有组织的派别。这几个主张见解不同的人相互之间并不是真有甚么不同的政见，而是利害与感情的矛盾。如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因为国共合作，吸收了一些新进分子，整顿了党的纪律，老党员、暮气很深的党员，必然就要失势，如居正、田桐、冯自由这些人，一向是拿孙先生的钱，供他们个人的挥霍腐化生活，居正在日本经营旅馆，在吴淞有别墅，冯自由在香港有产业，在上海有生意，他们也同我们一样的政治生涯，他们那大来大往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不都是骗孙先生得来的吗？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还能象这样乌烟瘴气吗？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反对国民党改组，不能不反对国民党联共。如果国民党当时真正整顿党纪，公布事实，把这些堕落腐化的党员一个一个开除了，使他们在政治上的信誉扫地，他们还能成甚么派再戴上革命的帽子呢？所以说国民党本来没有甚么右派，共产党把那些堕落腐化的几个人说成是国民党右派，他们就真戴起国民党右派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为革命的前进途中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暗礁。再

说到左派，也无非孙先生左右的几个人，如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这是一时所谓左派的，现在胡汉民、许崇智如何呢？廖仲恺死了，算是盖棺论定，汪精卫走了，还很难说，只剩下一个蒋介石，他领导下的孙文主义学会还算是国民党的左派吗？他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还能算是国民党的左派吗？其余跟着蒋介石走的那一些人，还不是蒋介石左，他们就左，蒋介石右了的话，他们还能左吗？这也能算是国民党的左派吗？我以为人杰地灵，只要把志同道合的几个中心人物结合起来，把所有的坏蛋赶出去，革命就有希望，造成左右的分立，对革命有甚么好处呢？象冯自由、居正等，都是经过了国民党明令开除党籍的，只算是活官僚、臭政客，不值半文钱的人，共产党把他们恭维是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他们能领导谁呀？至于左派如何呢，那就要且听下回分解了！”詹大悲的这一段妙论，是同国民党的右派的论调殊途同归的，国民党右派说：国民党本来没有甚么左右派，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挑拨离间造成的。在国民党第二届一中全会中，孙科还提了这样性质的一个案，其目的是反共的，虽然在当时没有通过，也可以反映国民党右派的看法，詹大悲此时虽然是反对国民党右派，同情共产党的，但是他的思想方法还是和国民党右派一样，只是结论不同而已。

我同詹大悲、方子樵、方本仁结伴，从上海坐邮船到香港，在香港九龙饭店住了三天，又坐省港直航轮船到广州。国民政府很隆重地派员接方本仁，我同他们一起住在长堤大新公司五楼旅馆部内，西北军的代表刘骥、李鸣钟也住在这里，他们是前我们一天到的。我同他们虽然是没有见过面，外江人到了广州差不多不问是哪一省都认同乡，况且刘骥和我是真同乡，相见之下，是一见如故，感到亲切。他们是初到广州，人地生疏，我同他们比较起来算是老广东，因此他们拜客应酬游览以及一切公私活动，都把我拉在一起，

刘骥号菊村，是冯玉祥的参谋长，曾经在北京做过京兆尹；李鸣钟是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曾任北京卫戍司令。冯玉祥在北京曾表演过三次逼宫（驱逐黎元洪、溥仪、曹锟），他们两人都是主要的配角。他两人很注意党军发展的历史和方法，我也很奇怪基督将军为甚么变成了国民革命军，我们相互之间，问长道短，谈了好几天。我同刘骥谈得很投机，他表示希望我能到西北军去帮忙，他并谈了关于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共产党员）的情况，他并要我搬到他们一起住。我在这里，原是方本仁的关系，方本仁同我虽然是小同乡，我们从来没有甚么关系，尤其是他那一种土头土脑装模作样的态度，我真看不顺眼，我同他搞不来，刘骥住的地方也是国民政府招待的，我怎么好镶他们的边讨那个便宜呢？我回广州有我的任务，所以到了第三天我就搬到惠爱西路普爱医院暂住。我向我们的组织上接洽工作，见了陈延年和周恩来，商量了好几次，情况又有变化，第二军在后方成立部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方政治部当然就不成立了，我的工作必须另作安排，这样，我就不得不在广州暂时住下来。我已经是一个军事工作的干部，别的工作，一时插不上手，而军事工作的决定，又必须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这些门坎，要经过复杂的人事关系，不是短时间所能决定的，陈延年要我自己去找谭延闿谈谈，我想工作虽然是为了革命，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作去找人，总有点不好意思。过了几天，钱大钧请刘骥、李鸣钟、张九维等吃饭，请我作陪，吃完了饭就搓麻将，这是当时应酬场中必要的节目，我因为没有钱，不敢参加那个场合，我借故说我有事，钱大钧同他们一起问甚么事？我说："我想下午三时左右去看看谭主席。"钱问："是约好了的时间吗？"我笑说："没有，我想去闯辕门。"他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今天不要去，就在我这里陪客，我一会儿要到司令部去主持一个汇报。明天早晨我同谭主席要见面的，我替你

把时间约好，或者请他派人来找你，至于你的工作问题，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再谈谈。"他也知道我没有赌本，把座位搬好了之后，他拿出二百元送到我的面前说："请你代我作主人吧！"刘骥对着我看看，似乎是了解了我是个空心大老官了，我当时很不自然地脸红起来，我答应说："你早点回来，我还有事。"他们都说："你今天就不要作别的打算了。"一个有思想负担的人是不能赌博的，我们约定十六圈牌，打了八圈的时候，我的二百元赌本就输光了，最奇怪的一牌是一次输给李鸣钟六百元，这虽然是一个应酬场面，输了钱也不能不给钱，我就同李鸣钟打招呼说："我暂差你六百元吧！"李鸣钟答应说："好的。"我们是初见面的朋友，我当时很窘，我的心情同《战争与和平》中的小罗斯托夫伯爵与道洛夫赌钱是一样的结果，他还可以敲诈老伯爵三千卢布还赌账，我这六百元的赌账在思想上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深悔不该参加进这样的场合中来，我就向大家提议提前结束这个牌局，我也不想吃晚饭，我想回普爱医院去休息。刘骥看见打成了我一个人的输家，他说："不要紧，打下去，如果输赢大了再加四圈，总不能要一个人输钱，这是牌经，这个牌出进一千元左右是很平常的，好好打还可以搬回来。"我是代表主人陪客的，怎么好拆台呢？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刘骥硬是提了我几张，牌风顺了，到了圆圈的时候，我硬赶回了到差不多，李鸣钟的账打平了，总共输去不到二百元。虽然输了点钱，由大败到胜利结束，也感到痛快！吃了晚饭以后，钱大钧把客人送走了，把我留下来，他又旧话重提，要我仍回二十师，他说："二十师不久也要加入前线作战，我们共事很合手，都是为革命而工作，校长很器重你，我希望你再考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好再提了，我同邵力子不同，谢谢你的好意，倒是我要去看看谭主席，我需要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工作。"他又说："我老实告诉你吧！张主席（张静江）要我留你，他还说要同你谈谈。"我想我同张静江仅仅在蒋介石家里见

过一面，素无来往，他为甚么这样重视我呢？这当然是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人拉拢与排挤的作用之一罢了。我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他也就不再谈了。又坐了一会儿，吃了西瓜，我才辞出。他送我出门时说："我明天同谭主席约定时间再通知你。"到了第二天正午十二时，钱大钧亲来普爱医院告诉我说："明天早晨八点钟，谭主席约你到太平沙高第街老湘军司令部见面。"谭组庵在广州没有家室，他带着一个独生女儿住在那里，有人说：他是同善社的大弟子，他的工夫很高，每天早晚他要打坐一二小时。当时一般军人政客的生活腐化，是无所不为的，他却一样也不来，对人处事，都很周到，所以一般舆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次日一大早，我照他约定的时间到那里。他是住的一座古老的楼房二层楼上，我走进他的会客室，他还光着头、赤着脚，穿一套纺绸裤褂，盘膝坐在一张胡床上，他见我进去远远地伸手同我握手，也没有下床，就便拉我坐在胡床旁边。他对人是和蔼可亲的，我们相互问好以后，他先开口说："你的工作，我们商量过，张主席（静江）的意见还是希望你到前方去工作，我想由政府给你一个名义，请你陪西北军代表到前方去，走陆路太辛苦，你们可以先到上海，武汉、南昌不久可下，你们到上海用电报同总司令部联系，再决定前进，这样安排可以吗？你如同意，我即打电报给介公（蒋介石）。"我只好答应"好。"我们又谈了一些关于前方的战况，即行辞出，他送我到楼门口说："你休息几天吧！办好了通知你。"我这几天还是同刘骥、李鸣钟、张九维、钱大钧等混在一起，几乎是天天有应酬，不是吃酒就是打牌，还有其他的腐化活动。正在昏天黑地的生活中，我的内当家夏松云回到了广州，我才把放心收起来。在普爱医院安静地住了一个多星期，国民政府才送来一个简任状，派我做国民政府的特派员，谭延闿还另外有一封亲笔信要我带给蒋介石，内容是说明我同西北军代表等到前方的工作任务问题。这样我就准备北上。行前我同陈延年、周恩

来分别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要我先到武汉同邓演达接洽，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我面交邓演达，据他说：不久他乘飞机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请他担任武汉行营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演达任行营主任兼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周恩来没有去，才以陈公博为武汉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时间已到了九月初旬了，我才同刘骥等结伴到上海，准备到前线参加北伐战争中的工作。

北伐战争，是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七月间从广州出师北伐，到九、十月间北伐军克复武汉的这一阶段，时论称为第一次北伐战争。在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由武汉动员北进至五六月间克复中原，称为第二次北伐战争。这两次战争是四军、七军、八军为主力，主要的将领是邓演达，其次是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蒋介石那个总司令住在南昌，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在当时北伐军克复各地有一种普遍的谣传说：北伐军是胜利了，是一正压三邪的原故，因为蒋介石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张作霖的作字，吴佩孚的佩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这是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这也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亦是巧合。其实这两次战役蒋介石并没有出甚么力，他是总司令，虽没有出力，他的虚名也就传遍大江南北了。从这两次战役以后，北洋军阀已成土崩瓦解的局势，没有甚么战斗力量，在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他占有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乘第一次北伐战争与第二次北伐战争胜利的余威，他拉拢冯、阎，收买直鲁军，吓跑了奉军，兵不血刃而抵定平津，这就是所谓第三次北伐战争。第一、第二两次北伐战争，是在国共联合战线中进行的，是在广大民众支持之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树立了北伐军的声威，表现了工农运动的伟大力量。尤其是在醴陵战役，平江战役，岳州战役，汀泗桥战役，英勇地生动地发挥了革命民众的伟大力量，兹就记忆

所及与共产党党报《向导》的记载，将当时战斗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醴陵战役：北伐军在广东动员北进之初，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失业的青壮年工人中挑选了三、四千人给总司令部组织运输队，使北伐军在人力的供应上得到极大的便利，这些参加运输队的工人，有革命的热情，有斗争的经验，有集体生活的训练，不仅在军运上的效率很高，在行军途中，一路上联系军民，秋毫无犯，使军民结成一体，故军纪严明、行军神速，因此得到沿途民众的爱戴，供应茶水，供给情报，在行军与作战上，得到很多的帮助。醴陵战役，是北伐军的主力与敌人接触的第一仗，湖南安源的煤矿工人，及株萍铁路的工人，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而各县的农民又在共产党和工运的影响之下，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动起来，在工农运动的洪流中，北伐军到来，正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北伐军进攻醴陵时，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组织救国敢死团，参加作战，使敌军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辨方向，分不出军民，不知道北伐军有多少人，更不知道北伐军的服装番号，到处是人声呐喊，到处是枪声隆隆，敌人如入五里雾中，前进后退都有顾虑。同时，株萍铁路工人与工农学生救国敢死团早有联系，值赣军唐福山部傅应珩一混成旅由萍乡开赴醴陵增援，株萍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铁路工作队，把株萍铁路湘赣交界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路数处，这样中断了敌军的运输，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打击了敌人作战的情绪，所以交战未及半月，把敌人的万余劲旅，完全瓦解，农民夺获敌枪数百枝，并夺获机关枪和大炮，使江西湖南两方面的敌军，不能联合作战，为北伐军统一湘南、进攻武汉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二）平江战役：平江是由湖南进攻武汉必由之路，这一路的敌军，有赵恒惕败退的残部，有吴佩孚的主力陈嘉谟、刘玉春及陆沄各部，共约四五万人。北伐军的主力是第七军李宗仁部两师、第四军张发奎等两师一个独立团，共约二万余人。以兵力的数量而论，

敌人尚占优势，但北伐军得人心，有广大的民众的支持，有农民协会的武装农民配合作战，能以少胜众。据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九月三日报道据总政治部电："平江县附近河流两岸，农民协会诸同志早已组织敢死队数百人，乘我军进攻时，扰乱敌军后方，并为我军作向导。"又第十二师政治部报告："平江之战，当场击毙敌军陆军中将混成旅长兼武汉警备司令陆沄（作者按：陆沄曾任京汉铁路南段局长，'二·七'工潮中，陆沄也是屠杀工人的主凶之一）。所有东西两岸狮子岩鲁肃山等处之敌，被我军次第歼灭，是役俘获兵员器械马匹甚多，我军伤亡甚微，我师及独立团（叶挺部）官兵为党国奋斗精神，充分表现。尤其是人民组织长矛队，加入作战，更实现军民合作之旨。"又广州《民国日报》九月二十八日记平江战役："此次国民革命第七军克复平江，得农民参战之力甚大。"又"此次北伐胜利，夺获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平江县党部报告平江战役情况："农民参加作战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又"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十三人。""平江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奋勇杀敌。""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二百余人，参战之猛烈，牺牲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又"北伐军入平江时，农民参战，死二十五人，夺获敌枪数百枝。"总结这一战役：了解敌情，决定进军路线的是农民协会，参加作战，冲锋陷阵的是农民协会领导之下的武装农民。至于供给情报，供给茶水，协助运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都是农民，北伐军进展神速，是因为农民到处摇旗呐喊，造成了普遍的骚乱，对瓦解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岳州战役：岳州居武汉的上游，扼水陆交通的要道，形势险要，吴佩孚陈重兵于此，作为保卫武汉的门户。北伐军如果用兵对兵、将对将作阵地战，无论胜败，而时间之长，牺牲之大，自在意料之中。好在当地的民众，是站在北伐军这一方面的，农民协会的

武装农民已形成了北伐军强有力的战友，因此北伐军掌握敌情，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得到胜利。八月二十日晚，平江一带农民协会侦知岳州方面的敌军，战斗情绪低落，惶急万分，农民协会派人向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报告，请他神速进军。当时的北伐军，都信任农民协会，即以农民协会的武装自卫队任前驱，星夜由平江北乡渡过微水，经黄芽山小路直扑岳州。敌军不知道这一条小路，未作防御工事，北伐军如入无人之境，于二十一日顺利地进到距岳州不及十里某地，即行猛烈攻击前进。敌军仓皇应战，惊为北伐军从天上飞来，纷纷向云溪、路口铺、五里碑、羊楼司一带溃退。叶开鑫部都是三湘子弟兵，不愿同北军北退，倒戈投向北伐军者达数千人。余荫森部被截断退路，全部缴械。北伐军中路第八军何键、李品仙两师亦乘胜进击，上下夹攻，至二十二日早即收复岳州。在这一战役开始，粤汉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破坏铁路，截断电线，并准备罢工，这对于北伐军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汀泗桥战役：北伐军既占领岳州，即以第四军为前锋，沿粤汉铁路北进。粤汉铁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铁道工作队，在敌军占领区域，秘密进行掘断路线、搬走路轨活动；在北伐军占领区域内，即进行修复铁路工作。这样对敌我的进退，就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影响，因此我军士气愈战愈强，敌军士气日渐低落。据闻吴佩孚曾亲到前线，部署防御工事。他在汀泗桥布置第一道防线，由湘军全部（贺耀祖部已退湘西，不在战斗序列），吴佩孚所部一师任防守，在贺胜桥布置第二道防线，由刘玉春统率吴佩孚的亲信部队两师防守，这三师人马，是吴佩孚的最后赌注；陈嘉谟亲兼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任副司令，吴佩孚是准备背城一战的。在汀泗桥打了三天硬仗，北伐军先后冲锋十二次，均为敌人炮火所阻，不能越雷池一步！双方相持于汀泗桥上，声问相通，双方死伤甚众，桥下战死的官兵，不可数计，相持到第三日，在咸宁的北伐军右翼第八军

李品仙一师及第七军之一部，在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从咸宁绕道到嘉鱼县的簰州司，抄袭敌人的后路，敌军因腹背受敌，军心动摇，以至全军覆没，叶开鑫几乎成擒。这一仗打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北伐军直趋贺胜桥，在贺胜桥相持了一天多还没有分胜负，敌人军心摇动，即自动撤退，逃进武昌城，闭城坚守；第四军的全部，跟踪追击到武昌城下，即担任攻城的任务。同时第八军乘胜由簰州司渡江先克复汉阳，守军北洋近战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投降，因此没有经过甚么激烈战争北伐军越过汉水，克复汉口，武昌遂陷入北伐军的水陆各方面的包围中。吴佩孚所部十余万大军原来集中武汉，准备大举南下，这样一来，陈嘉谟、刘玉春所部约二、三万人困守武昌一座死城而外，驻在汉阳的刘佐龙部约万余人投降了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敌一部退回河南老巢，一部仍退到长江上游，保守荆沙，余学忠、张联升各部退到襄樊，吴佩孚对各军已失去了统御的机能，自知形势不妙，遂乘兵舰入川，托庇于川军将领曾受过吴佩孚提拔的杨森，从此以后，即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后来蒋介石定都南京，他回到北京作寓公，仍保留一团卫队，他那两湖巡阅使署所设的八大处仍旧保留，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蒋介石拿民脂民膏来供奉他那一副臭架子，也真是物以类聚，据闻中日战争时他仍住在北京，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他终于没有当汉奸，也真是秀才的本色，倒是难能可贵。

当北伐军正在长岳一带与吴佩孚、赵恒惕所部作战时，武汉方面的学生、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作出各种各样的打击敌人、响应北伐军的活动。武昌方面由共产党员陈定一领导的学生市民作罢课罢市的运动中，对敌人的威胁很大，陈定一被捕不屈，枪决于长街南楼前面的闹市中，更激起了武昌市民的愤怒。在汉阳方面：汉阳兵工厂是吴佩孚的武库，是吴佩孚武力统一的一注重要本钱，一九二六年八月初，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

行总罢工，一直到北伐军克复武汉才复工。这一罢工运动，不仅是减少了吴佩孚的军火生产，尤其是动摇了北洋军队的军心，瓦解了北洋军队的士气。据说刘佐龙的投降，因为他是一个湖北人，受了湖北的革命党人的浸润，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影响也很大。北伐军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之下，使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而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也失去信心，也只有出于一走了之而已。

陈嘉谟、刘玉春在危城中与北伐军相持了约在一月之久，外无援兵，内无粮秣，武昌一座孤城已失去战略上的作用，终于协商投降了。

北伐军克复武汉以后，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即行复工。汉阳兵工厂，是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资源，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想掌握它，蒋介石哪里肯放松呢？他电令邓演达派重兵把守，刻日开工。所以几经商洽，把汉阳兵工厂归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管辖，在军事行政的系统上也算是名正言顺。武汉行营即派原粤军许崇智部的参谋处长邓演存（邓演达的胞兄，蒋介石的旧部）为厂长，并派唐生智的心腹许有道为副厂长，该厂所存军械军火甚多，统一由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掌握调配，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磨擦，在兵工厂的管辖问题上更加尖锐了。

第一次北伐战争的重要关键在湖南，湖南如果不胜利，江西南昌战役不可能转败为胜。湖南的胜利主要是醴陵、平江、岳州、汀泗桥四次阵地战，其次还有在浏阳、华容、湘潭、宁乡各地的遭遇战。胜利的因素都是得力于农民、工人的配合作战，各学校的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普遍动员，作政治宣传，对于瓦解敌人、鼓励士气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在北伐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湖北、江西、河南各省的民气高涨，农民运动，迅速地普遍地发动组织起来，工人运动由秘密的活动到公开的行动。在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工农的组织，形成为

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力量，政治势力与军事势力就很自然地落在民众运动的后面了，政治军事的上层人物与革命的民众脱了节，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伐军进占武汉，唐生智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汉口郊区查家墩原吴佩孚的讨赤联军总司令部的旧地。唐生智是一个旧军人，他自称是佛门弟子，他标榜“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宏愿，第八军的标语和他们用的信柬上到处刻着这八个大字，他是标志着他的革命理想不同于蒋介石，也不同于孙中山。他的这种理想和作风与冯玉祥的信仰耶稣而标榜“自由与博爱”，吴佩孚的信仰孔子而标榜的“大一统与武力统一”是大同小异的。如果当时的形势要简单一点的话，唐生智是很可能继吴佩孚而起独出心裁另搞一套他自己的把戏。但是当时的局势是复杂的：第一，吴佩孚虽退却了，但他统率的十余万大军是分途撤退的，并没有被消灭，武昌城内还有两三万敌军，陈嘉谟号称吴佩孚的智囊，刘玉春是北洋军队中有名的战将，还是没有解决的一个战斗力量。吴佩孚是否反攻与是否可能反攻，在当时还在不可知之数。第二，四、七两军与八军一路并肩作战，战斗力都在第八军之上，第七军虽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增援去了，而第四军已发展成为两军还有一些其他部队，第四军军长原为李济深兼任，张发奎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四军有铁军的称号，张发奎扩编成军时仍用四军番号，第四军在武汉同广州各有一个，粤军的势力在武汉仍占优势。第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已奉命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方面执行总司令职权，他同粤军将领同乡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他在军事政治党务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很大。蒋介石就利用这些关系，才派邓演达兼武汉行营主任，他也是真正盼望邓演达成为他的化身来控制唐生智，成为长江上游军事和政治的重镇，唐生智那个前敌总指挥就不起作用了。这样的局势，谁都看得很明白．唐生智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就不得不韬光养晦，一切听命于党、政府和总司令及总司令行营主任了。第四，两湖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接着民主运动与党权高于一切的运动爆发，唐生智就因利乘便靠近了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成为武汉及两湖之间一时的红人。唐生智的部队扩编为三军，他自己专任前敌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以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后来在宁汉分裂之前，陈铭枢投降了蒋介石，即以李品仙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军长即由蔡廷楷继任，另成立三十五军，以何键为军长，以叶祺为副军长，三十六军以刘兴为军长，周澜为副军长。夏斗寅所部的鄂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十四师，名义上归总司令行营直辖，在历史关系上仍归前敌总指挥节制指挥。唐生智的声势也算是震动了大江南北了。

北伐军占领了阳、夏，武昌还在围城的战斗中，约在九月二十前后，我同西北军代表刘骥、李鸣钟等由上海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到达汉口，武汉行营交际处派员招待我们，暂住在旧俄租界的中央旅社。当天晚上，邓演达约我在南洋大楼武汉行营办事处见面。我谈了一些在广州、上海的见闻，他谈了一些有关北伐军几次重要战役的情况，我把周恩来给我带交给他的信给他，并将谭延闿给蒋介石的信交他请他转陈，接着他对我说："这里很忙，你来得很好，就在这里帮忙，不必到江西去。西北军的几位代表，也暂时安置在这里，约他们明天上午八时来会见。你同他们一路来，今后你就代表行营同他们联系。"他当时即派我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是由省市两党部及省市政府同武汉行营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当时武汉的情况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矛盾：军事将领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影响之下，强调军事时期，一切要服从军事，就是邓演达最初也是这样的见解；而省市党部及各报社在民主潮流的高涨当中，也过分强调民主和自由。郭沫若此时还是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他还是站在总政治部的军事

时期的观点上与各报社及省市党部闹对立，没有把宣传工作做好。邓演达很伤脑筋，他以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湖北人，在武汉的人事和社会关系比较熟悉，就要我来担任这个职务。我知道这个工作是很难做好，当时表示犹豫，他当时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犹疑不决，这项工作一定要你做，并且要做好，把这项工作安排好了，等到有适当的人代替你的时候才能搞别的工作。我被他的热情和信任感动了，我只好接受这项任务。我拟定一个新闻检查办法，同各报社的代表开过两次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参加了邓演达亲自主持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普海春举行晚宴。在这次招待会上，先由邓演达致词，各报社的代表都讲了话，他们提了一些要求，主要的是发扬民主，新闻检查的尺度放宽。郭沫若同《武汉商报》的总编辑邹碧痕因意见不合，拍桌对骂起来，他们本来就是各有成见，并不是大了不得的问题，弄得不欢而散。李汉俊也在坐，他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是支持邹碧痕的，他把我拉到餐厅隔壁一间小房里说："今天的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是失败了的。你应该提醒邓择生注意：我们不能打击民主，压迫舆论。我们是革命军，是革命政府，不能做得太不象样。"第二天，我也把李汉俊的意见告诉了邓演达，他倒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他说："昨天搞得不好，应该设法补救。"我对于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也没有继续做下去。过了半个月之后，武昌克复了，调我筹办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个新闻检查委员会随着政治情况的变化裁撤了。

战时的武汉

大军云集的武汉，汉口各租界里仍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并没有战后荒凉的景象。我们到达汉口的第二天早晨，我照邓演达约定的时间，陪同刘骥、李鸣钟、张九维等到武汉行营同他见面，谈了一点多钟。他为了要同冯玉祥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请刘骥暂任武汉行营参谋长，这也许是蒋介石的指示，刘骥推说他想见了蒋总司令之后仍回西北军去，不能参加行营工作。邓演达说：中原会师，为时当不在远，蒋总司令把江西方面的军事布置好了即来武汉，他已来电请你暂时不必到江西去。刘骥最后答应打电报向冯请示后再决定，约定过几天再谈。我们回到旅馆，刘骥同我说："行营的工作，我不能干，但河南国民二三两军还有不少的队伍，可以设法收编，吴佩孚的旧部如袁家骥、马及第、贺国光等同我也有些关系，如果行营给我一个适当的名义，我可以在这方面尽点力，对于将来会师中原有些作用。"他要我先同邓演达谈谈，看他是否同意。第二天一大早，我到行营办事处找邓演达，说明刘骥的意见。邓演达听完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下说："河南的情形很复杂，我必须请示总司令之后才能作决定。目前河南的军队很多，群龙无首，冯玉祥一定企图收编这些军队来壮大他的声势，今天我们派刘骥去收编这些队伍会发生甚么样的后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能不慎重考虑。不过就是不给他甚么名义，他能在武汉行营的同意之下，在事实上能够把这些队伍收编起来，对于我们的北伐战争也是有利的。你同他密切联系，他有甚么意见，他需要些甚

么，你随时来汇报情况。"又谈了张九维的工作问题，张要我推荐任行营交际处长，我也同邓演达谈了，他经过一番斟酌之后也照办了。接着他对我说："今天我要到南湖视察攻城部队的作战情况，你同我一道去看看我们的战斗部署，这一次的北伐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大事，你没有参加作战，去看看我们的战地情况，也是增加一次经验。"他说到这里，不由我考虑就拉着我走，我便不由自主地同他一路上汽车到清芬二马路下车，步行到龙王庙江边上，小火轮沿江北岸到武昌望山门外的南湖，船过龟山头晴川阁下，正是江身窄处，武昌城墙上敌人的守城步哨没精打彩地在那里走来走去，同我们的船相对看得清楚明白。我对邓演达笑说："如果敌人对我们开火，我们这只小火轮必然被打沉，你是攻城军的工兵司令，倒是死得其所，我怎么算呢？将来烈士祠中不好安我的座位了。"他说："这样的危险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以前是绕道龟山北麓到鹦鹉洲江边渡江，最近敌人差不多是弹尽粮绝，市民的粮食更缺乏，武汉绅商发动和平解围，可能一二天内有和谈代表出来，双方停火已经三天了，如果有危险，我也不会拉你来。"他又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的弟弟周同宇(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在武昌攻城战开始不久，同我在洪山北麓督战，他同我并马站在山坡上，周同宇中弹受伤，还在汉口同济医院治疗中，我的马也被打伤，从马上跌了下来。"他说到这里很兴奋地说："子弹头上有眼睛，谁该挨打，谁不该挨打，好象是有数存焉，我在洪山作战这样的事，不只碰着一次两次，我都是履险如夷。不过前年有个江湖术士，据说相看得很灵，他说我三十九岁要死于战场，我不信，我也不怕死于战场。"我顺着他的话头说："相传无论何人，逢九不利：岳飞是三十九岁死的，胡林翼是四十九周岁死的，周瑜是二十九周岁死的。"他说："人生总有一死，如何死法，也是碰机会，不过我愿意战死沙场，不愿意象岳飞那样死。"不料五年以后的冬

天，他被蒋介石秘密杀死于中山陵园的梅花山下，他同岳飞的死法差不多是一样，他死难时刚刚是三十六岁。

我们在船上谈天说地，扯了一个多钟点。船已靠岸，第四军司令部已派了几乘轿子在那里接我们，他同我还有几个随从下了船，一面走一面谈，没有坐轿子，一会就到了。攻城军司令部设在南湖一座新式营房里，即是十四军的陆军预备学校旧址，邓演达、张发奎等都是陆军预备学校的学生，今天他们在这里指挥作战，自不免有一番旧地重游不胜今昔之感了。在那里作战的将领朱日晖、张发奎、叶挺、黄琪翔等，都接到司令部的大门之外，我同他们在广州分别以后已经是两个多月了，革命军的发展很快，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般的情况，起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相见之下，感到亲热愉快，坐了一会儿，他们举行汇报，邓演达拉我参加。

叶挺报告：（1）在停火的前夕，敌人曾一度突围，发生激烈战斗，曹渊营长战死，双方都有死伤，我军死官兵九人，伤二十余人。敌人知我有备，即退进城内闭城坚守。（2）我军为了掩护通湘门工兵掘挖地道工事，曾在通湘门附近布置了炮兵新阵地，曾一度与敌军发生炮战，双方损失不大，我军独立团谢连长受伤。朱日晖报告：（1）敌军贺对庭部派员由望山门越城墙来部接洽投诚，正在接洽中。据说刘玉春坚持打到底，陈嘉谟很惶恐，但求协商率部北返，不愿投降，其余一切敌情无变化，自停火以来，战线上很沉寂。（2）攻城部队轮流换值，士气旺盛。据城内逃出来的老百姓说，城内缺粮，人心紧张，饿死了不少的人。其次张发奎谈了一些攻城的部署，由湖南、安源调来三百余名矿工由通湘门附近掘挖隧道的工事进行很顺利，由隧道攻破武昌城为时当不在远。邓演达作了几点攻城的指示。开完了会，邓演达同叶挺等去巡视攻城的工事和部队，我准备同邓演达一路去看看，张发奎拦阻说："正在雨后，路不好走，何必无缘无故地去吃那个苦头，冒那个危险呢？邓大主任是责任关系，

他去巡视一趟，对攻城部队有加油作用，也许敌人发现了新目标开上一炮，也很难说。"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他就叫勤务兵开两个牛肉罐头，拿出一瓶白兰地，要我坐下来同他喝酒。邓演达也对我点头示意，要我在司令部等他。张发奎同我一面喝酒，一面谈在湖南作战的情况。他说："这一次战争，我们是以寡胜众，以弱胜强，以落后的装备战胜了优良的装备。我们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民气，湖南的农民运动，缩短了我们战争的时间，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及铁路工作队与我们配合作战，缩短了我们战场上的空间。在浏阳作战时，我们的独立团被敌军强大部队包围，形势非常险恶，因为农民协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从敌人的后路铺天盖地而来，给敌军一个很大的威胁，才解了围。民众的伟大力量，在这次战争的作用上是了不起的，在这样军民一体，万众一心的情况之下，会师中原，为时当不在远。"他对战争的前途，颇为乐观。我问："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廖乾五主任的工作情况怎样？"他说："很奇怪！一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和动作一切都不老了。廖主任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廖乾五原任张发奎师政治部主任，后升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象第八军的政治工作就做得差些，他们的军风纪也坏些，刘文岛是唐孟潇的交际之花，而不象政治部主任，他不重视民众，也不注意士兵，他天天同一般高级将领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们的政治工作的干部也远不如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健全，听说他们那里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言下颇有得色。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喝酒，把一瓶白兰地快喝完了，邓演达一行四、五人才回来。接着就吃

饭，饭后已经是四点多钟了，我们即动身回汉口，到南湖江边上船，顺流而下，不到一个钟点即到了龙王庙码头，已接近黄昏时候了。我们分别时，邓演达叮嘱我说：“好好同刘菊村联系，工作要进行，名义总有办法，不要叫他失望；你从明天起，上午到行营办公，下午到新闻检查委员会。”我回到旅馆，刘骥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就照邓演达同我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满意，接着他告诉我说：“我已找着特一区坤厚里一号一栋三楼三底的楼房为西北军驻汉办事处，明天就搬进去，那里比旅馆好，请你同我们一路搬去。”刘骥是需要我为他们联系邓演达，邓演达也要我为行营联络刘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只好同他一起迁居特一区坤厚里一号；过了一天，邓演达告诉我，要刘骥写一个收编河南各部队的意见。据他说，蒋老总已同意任命刘骥为河南招抚使，并要他同豫北招讨使蒋世杰取得联系。邓演达是一个道地的军人性格，他说了就做，不做的事他就不说，刘骥的意见书还没有拿去，任命刘骥为河南招抚使的任命状就发下来了，并发给二千元作为招抚使署的开办费，经常的费用按照各部队的成规编造预算，实报实销。刘骥本来是一个自高自大，富于保守性的人，他是陆军大学出身，冯玉祥的参谋长，做过京兆尹。他拘于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队的成规，总以为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的一切规模制度是草创之局，不如国民军与北京政府那样古色古香的好。他由广州到汉口，我们一路之上谈了很多有关南北新旧政权的比较问题，他虽然不同我抬杠到底，但是他对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的礼法制度总有一点看不顺眼的神情，这一次到汉口同邓演达会谈了几次，一直到这一次任命他做河南招抚使，他的观感有所改变，他曾对我说：“国民政府与蒋老总的气魄很大，邓主任待人处事，诚恳痛快，很使人感动。”这就说明雇佣军人的思想就是在“感恩知己”与“有奶就是娘”的九个大字中兜圈子。收编河南的北洋军队，刘骥做了一些工作，在会师中原的战争

中，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武汉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了一个陆军处，刘骥任陆军处长。当时武汉政府是以为所统率的湘粤各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控制蒋介石，再拉上西北军，或可以收到以大制小之效，国民革命军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五个集团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先后同蒋介石走一条路，武汉政府同唐生智也挂起了反共的白旗，共产党迫于大势而退出了国民政府，结束了国共联合战线的局面，国民党的所谓左派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就从根本上瓦解了。

武昌围城已到一个多月了，北洋军队坚守这个据点，是期待吴佩孚反攻，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吴佩孚毫无动静，守城部队就有一部分官兵发生动摇，更以前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嫡系刘佐龙部投降北伐军之后加官晋级，所部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由一师扩编为两师，一切给养待遇同北伐各军一样，这些情况总政治部印成传单，散发在城内敌军部队中，也起了一些作用。因此有一个旅长贺对庭秘密派员出来向攻城军接洽投诚，据说陈嘉谟只求保全身家性命，战亦可，降亦可。刘玉春则主张打到底，一定要与城共存亡，每天派遣很多巡查部队，持着“造谣生事者斩”，“通敌投降者斩”的令箭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地巡查。敌军将领的意见分歧，士无斗志，已经暴露出来了。其次城内粮食缺乏，确实是天天发生饿死人的事。因此绅商呼吁双方停战和平解决围城的问题，并请先将与军事政治无关的市民放出城去，免致城内闹粮荒，再随商开城条件，督军署的顾问郭肇明是学界的前辈，从前也是国民党员，在绅商的吁请与陈嘉谟的同意之下，由郭肇明出城到汉口，同汉口绅商会同一起，向北伐军当局商量和平解决武昌围城的办法，提出的条件是围城部队让开一条路，北洋军队自动退出武昌城，向东北退却。经过商量的结果是：北伐军在武胜门方面的围城部队

向南方后退一华里，让敌军由武胜门撤退，经过青山、葛店到鄂城渡江，经皖北回山东。但贺对庭部已经武汉行营收编为独立混成旅，并接受相机解决陈嘉谟、刘玉春各部并逮捕陈、刘的任务。接洽既定，约定开城的第一日开放文昌门与平湖门，让市民学生出城。第二日敌军守城部队由武胜门撤退。第三日北伐军攻城部队由保安门通湘门进城。第一天倒是平安无事，老百姓差不多都是倾城而出，平湖门和文昌门一整天是拥挤不堪。第二天黎明，武昌城内发生巷战，各城门大开，贺对庭部与北伐军攻城部队里应外合，打了几个钟点，除贺对庭部外敌军完全缴械，陈嘉谟、刘玉春均被捕获，武昌的攻城战算告了一个段落。陈嘉谟被捕之后，非常惶恐，表示一副可怜相，几乎是逢人作揖，到处磕头，只求免死。刘玉春倒是一个硬汉，他正襟危坐，毫无表情。武汉民众要求公审这两个民贼，北伐军同郭肇明定了一个君子协定：保全陈嘉谟的身家性命，同时为了对北洋军队的以广招徕，没有对陈嘉谟采取严厉的处置。既不杀陈嘉谟，就不便杀刘玉春，而刘玉春的为人处事，得到很多人的同情，邓演达对他还有点爱才之意；但刘玉春愿意当俘虏，不愿意当降将，结果把他同陈嘉谟一起关了几个月释放了。这样的做法，共产党和革命的民众都是一致反对的，但是没有得到军事当局的同意，因此也引起了革命民众的愤怒，也是激起了大革命时期革命高潮的一个因素。

北伐军进了城之后，做了几天清理战场的工作。敌人在城内的死伤不多，倒是有些孤寡残老在战时饿死了的，到那时还没有收殓掩埋，我们的攻城部队在战争正在高潮时死伤也很重，共产党员独立第一团的营长曹渊就是战死在宾阳门外，城墙外战死的战士，与城墙上战死的敌兵死尸不下数百具。经过了进城部队分别收殓掩埋、大扫除消毒之后，武昌公安局才开始整理市容。党政军各机关大部分都在武昌部署办公，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设置在旧湖

北督军署，武汉卫戍司令部设置在司门口旧省长公署内，湖北政务委员会设在三道街旧存古学堂原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设在阅马厂湖北省议会旧址，总政治部初设在这里，后迁到粮道街中华大学原址，武昌公安局设在山前柏寿巷旧警务处旧址。因为在大战之后，各学校机关团体都重新改组，武汉各学校的校长都是与北洋军队和北洋政府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在大战开始时，各学校的校长多半逃走了，学生与革命运动没有关系的都回家了，有关系的是少数另有工作，所以学校根本陷于停办的状态。湖北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邓演达兼，委员是张国恩初兼政务委员会民政科长，后湖北省政府成立改为民政厅长。詹大悲初兼政务委员会财政科长，湖北省政府成立时改为财政厅长，孔庚初兼政务委员会的建设科长，湖北省政府成立后改为建设厅长。李汉俊初兼政务委员会教育科科长，省政府成立改为教育厅长。不兼厅长的委员还有何羽道、邓希禹、董必武等，后设农工厅即以董必武为厅长。武昌公安局长先是林勋南，因为他包庇旧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有贪污嫌疑，被撤职，后以吴德峰为武昌公安局长。汉口市长为刘文岛，市政府所用的人员唐生智交用的很多，只有秘书长张其雄是共产党员，他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公安局长先是张笃伦，在革命高潮中，张笃伦垮了即以江董琴继任。在武汉及湖北全省军政方面的工作，共产党人参加的很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市党部方面，共产党人倒是占统治地位，在省党部方面负实际责任的有董必武、陈潭秋、陈荫棣、蔡以忱、吴德峰、袁溥之等，在市党部负实际责任的有李国暄、宛希俨、张其雄、黄慕兰等。在国共联合战线中，工作分配的太不平衡，军政方面，差不多是干的统治人民的工作，党务方面，完全是干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农民协会是在国共联合战线的旗帜之下组织起来，可是革命的农民极端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革命的政府与革命的军队反而同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

样的发展下去，国民党就逐渐向右转，共产党也就不得不向左转，这就是国共联合战线破灭的主要原因。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蒋介石用尽流氓手法招降纳叛，兵临南京、上海，造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共产党为了挽救国共联合战线，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用全力支持武汉政府，共产党中央负责同志大部分集中武汉，全国总工会在项英、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向忠发领导之下迁汉口办公，办公的地址最初是在法租界对面友益街陈汉卿（是旧将军团的将军，曾任督军署陆军审判处长）的住宅内，后来迁到华商总会办公，一直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到底。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明朗化了，各地发生白色恐怖，全国总工会又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在出版事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把原有的《新青年》杂志社及人民出版社扩充为长江书店，大量翻译印行马列主义的著作，全国各地无论大小城市，都设有长江书店的分店，对党团员和工农群众，增加了新的血液，对传播马列主义的学说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就是革命的高潮给我们撒布了革命的种子，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风气从城市走向农村了。

武汉行营时期的二三事

北伐军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由广州动员北伐，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以破竹之势，肃清了湖南，进入到江西，攻克了武汉，北伐军的追击部队沿京汉铁路北进，把敌人追出了武胜关。我们的先头部队进到武胜关界牌关关口铺之线布防，进行休息整理补充，北伐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算告了结束。国民政府在广州时，就全国的形势说，算是一个小朝廷，经过了这一次北伐的胜利，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到大江南北，瓦解了北洋军阀的支柱——直系，进逼东南，威胁奉系，而形成了中国惟一的强大军事政治势力。这一情况的发展，使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不能不承认现实，不得不考虑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长江流域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与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的利害冲突，更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英帝国主义一面以柔软态度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新任驻中国公使兰浦生，由上海先访问汉口，同武汉军事当局打一个交道，再到北京视事，并提出对中国的新提案；另一方面，他又拉拢美、日、法各国，建立对华的联合战线，向参加华府会议的列强建议，共同发出宣言，以华府会议的精神力量来对待中国大革命的怒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事务同样繁重起来。因为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武汉行营，一切事务都集中到武汉行营，即集中到邓演达一人之身；而行营的编制很小，用人不多，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军需处，一个交际处，一

个秘书室。参谋处应该是他的主要的幕僚机构，应该多搜罗一些人才在那里工作，因为不容易找一个适当的参谋长，他只派张叔同为参谋处主任。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时，张叔同当入伍生团长，这个人很庸碌，是不推不动的，所以这一处没起甚么作用。军需处同交际处是办事务的，更不能为他分劳。秘书室主任是刘伯垂，倒是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政治宣传方面替他帮一点忙，但是刘伯垂也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他的孤僻性成，不宜于做幕僚工作。邓演达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只注意大事，不注意小事，他对人有热情而不注重细节，所以同刘伯垂就有些搞得不投机，所以刘伯垂没搞好久，就仍去搞他的司法工作，当司法厅长去了。周佛海原在秘书室当中校秘书，邓演达因为他参加过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不喜欢他，也不给工作他做。一直到十二月间，蒋介石来武汉召见周佛海后就要重用他，因为蒋介石要拉拢右派，就硬下手令派周佛海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只好在苦笑中接受了。我当时是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的名义，替邓演达做些机动的工作。每天早晨六点半到行营，经常是下午一点钟前后才下班，我给他看电报并拟具处理办法，有时还代他见客，因为我们私人的关系处得不错，也有时同他上天下地闲聊很长的时间。在计划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初，原是作为黄埔军校的分校来作计划，预定招收大学或高中毕业学生，照黄埔的老办法训练六个月，毕业后即分发各省县当行政干部或是军队中当政治指导员，这是文武合途的一个学校，准备招收三千人至五千人。这个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我奉命筹备这个学校。最初是一无所有，从炊事家具起，一直到校舍和学校一切设备，都要一样一样地购买好设备起来，限期又非常迫促。先在武昌紫阳桥畔烈士祠边，找着一所停办了的中学，开始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牌挂了出来。我是因为这里距行营很近，关于工作上联系方便，有一天邓演

达跑来看，他说这里象一座城隍庙，哪里能容纳得了五千学生的军事学校呢？这里规模太小，须找一个象黄埔军校那样规模的校舍才行，这里作为学校筹备处办公用还可以，作为是学校就不行。我当即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在武昌山前山后跑了两天，才找到两湖书院的旧址，当时是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这个学校的规模虽然没有黄埔军校那样多的房子，但对内对外尚有扩建的余地。我找他去看了一下，他认为可以，我们才在这里准备动工修建。好在战后各学校都在停办中，房子都是空着的，我们向湖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科接洽妥当，把两湖书院的全部房屋都接收过来。这所房子很大，是古老的建筑，内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及南书库北书库，庭院中间有一座高大的坐东向西的藏书楼，相传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常招集门生故吏在这里讲学，他所著的劝学篇就是在这里讲学时主要的内容。他在湖北做了很多事，如汉阳兵工厂，武昌纱、布、丝、麻四局及毡呢厂、玻璃厂，都是他首创的。他入阁拜相以后，两湖人士为了纪念他在湖北的政绩，在黄鹤楼建筑奥略楼，蛇山北麓建筑抱冰堂并重修这座藏书楼，为一时所传的张文襄公的手泽。楼的前面有很大的一个湖，湖的周围，种了很多花木，以桃李为最盛，象征张之洞桃李满天下的意思。这所房子虽然房间很多，规模很大，是帝王时代麻醉知识分子的场所，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到了我们要在这里办革命的军事政治学校，那些封建时代的尊严和典雅，对于我们是毫无用处。我们在那一所大而无当的院落里，除旧布新，把那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和南北书库改建成课堂宿舍，把那一所古老的建筑大大地改观了。只有把那一座藏书楼，依照原样加以建新，楼下做礼堂，楼上做校本部的办公厅。虽然对于这座藏书楼保留原样，有点保存古迹的思想，布置起来倒也堂皇富丽，落落大方。我们在那里大兴土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工，总共修建费不过二万余元，可以想见当时的物价低廉了。

学校的名称因为国民政府准备迁武汉，广东就变成了地方行政区，黄埔练兵的重要性因而有所改变，到了定案时就不是黄埔的分校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舍刚刚修建完成，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的一个总队开到武汉，即住在新建的校舍里。

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次一个课题，就是拟订教育纲领与成立招考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学校既然是继黄埔军事政治学校之后办的，一切规模制度和教育方针与黄埔军校是一样，为甚么还要另行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呢？起草教育纲领是邓演达提出来的，他并慎重其事地要我起草，并要我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一些进步人士的意见。在邓演达是有一个思想根源的。在三月二十事变中，邓演达以亲共嫌疑被蒋介石看管了一天，邓演达受了很大的刺激。邓演达对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的胡作非为不满意，对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一套军事制度和人事制度更不满意。他同我们一样是诚心诚意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他对蒋介石在三月二十事变以后露骨地违反三大政策与破坏国共联合战线，他时常表示忧虑。我们在公余的时候，他常常谈到这个问题。他常说："总理没有说过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校长及我们很多懂理论的同志也没有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并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共产党说：国民党是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运动中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中每一成员都应该有他的自己的阶级立场。民国十三年孙先生改组国民党之后，从它的宣言政纲都说明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党，它是带无产阶级性质或是半无产阶级的或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党，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中国国民党是有分的，有些共产党人硬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那是错误的。把国民党只认为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为止，而不明白认识它是哪一阶级的党也是不够妥当的。现在有人（指

蒋介石）把共产党认为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客体，甚至反对工农运动，那更是大错特错，是违反总理遗教的。”邓演达这样的思想与这样的理论，从国共联合战线起，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主持第三党（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活动都是一贯的，没有甚么改变。他希望我同意他的见解，并根据这个见解写成一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纲领。在当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的见解和理论提过一些意见，并把他的意见用书面报告我们的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同我谈了两次，他们只注重学校的党团组织和人事安排问题，对邓演达提出的教育纲领和理论问题，他们不重视，并说目前用不着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同意他的思想方向，至于理论问题还是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执行就够了，不必另搞新的东西。我照张国焘的意见同邓演达谈过几次，他还是固执他的意见，要我照他的意见把这个教育纲领写起来。在工作的关系上，我不能不写；在党的立场上，我不能给他写象这样中间路线的文章。一直拖了很久没有写，他催过好几次，有一次在校本部招集一次筹备会议，他又提出教育纲领问题，后来就他讲话的记录加以修正补充，算把这个教育纲领完卷，这个纲领就是他后来组织第三党的理论根据。

其次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邓演达对招考委员会很重视，他根据联合战线的精神与北伐战争发展的需要及当时在武汉的人物来组成招考委员会。委员的人选计有邓演达、王乐平、朱霁青、王法勤、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杨树松等，邓演达自任主任委员，日常工作由我代他处理。开过几次会，决定了招考的范围和招考的程序，印发招考的章程，由各省市举行初试，初试及格才到校报到举行复试。办理初试是由各省市党部和省市政府会同办理，没有成立省市政府和省市党部的地区，就由当地党务负责的同志负责审查介绍，如河南、河北、山东及北

京、天津各省市，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之下，关于招生初试的这个程序就免去了，来投考的学生由朱霁青、王法勤、王乐平分别证明介绍，即到武昌参加复试。考试的程序太多，手续太繁，初试的办法又不一致，确实是招考计划的缺点；还有些省市举行初试时有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互间的意见分歧，有的在初试落第的学生，找着了党的关系，拿着一封介绍信，跑到武昌找着党和人的关系，请求参加复试，在“情形特殊姑予照准”的八个大字的批示中开了后门，造成了很大的一场纠纷。原计划招收二千名新生，各省市都有一定的比例。湖南省原规定取一百名，湖南省党部就自作主张加了两倍，录取了三百名，另外湖南省党部及夏曦还有信和电报分致学校及我个人，强调这些学生革命情绪很高，请予全部录取。学生到了武汉，先推举代表来见我，请求免予复试。各地来的学生，都带着各地方负责同志的介绍信，差不多都是我多年的同志和朋友，我不能不接见他们，最初人少，在办公室接见，后来人多了，在会客室接见，最后越来越多，在大礼堂接见。他们都有革命的热情，民主的气派，一见面就提质问：“我们都是考试过了的，为甚么还要考。”“如果不取我们，就是不要我们革命。”象这一类的生硬横蛮的态度，真使我穷于应付。因为学校不能答应学生不复试，湖南的三百多学生发动“请愿”，发传单、贴标语，闹得满城风雨似的，最后他们以“自杀”和“暗杀”来威胁学校。我们是一个军事学校，有武装卫队，有严格的军纪，更不能因为一部分学生的要求即变更招生的程序，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再开后门，就严密地布置警卫，认真地进行考试，不再接见学生，布告所有参加复试的学生一律凭准考证入场，入场时除带笔墨而外不准携带任何器物，并命令警卫部队注意检查，监视形迹可疑的学生，在那弓上弦、刀出鞘的气氛之下，才把考试进行完毕。这些情况说明在革命的初期，群众的幼稚与我们对群众工作方法的笨拙，真是小题大做了。

考试卷子是弥缝，看卷子的人员是请的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全部试卷都严密加封，集中在校本部大办公厅评阅，最后由主任委员抽查，如有不称的卷子，须经过会阅，再送主任委员作最后的决定。其实就当时的需要，多取一、二千学生有甚么关系呢？到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前夕，夏斗寅在嘉鱼叛变进攻汀泗桥的战役中，把这些学生编为独立第一师，侯连瀛当师长，当时那样慎重其事考取的学生，作为新兵使用，除在战场上的死伤外，战胜夏斗寅的归途中，在金口翻了船，还淹死了二、三十名学生，真可惋惜！

学生入伍了。邓演达因公回广州，因为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集会议，讨论国民政府迁都的问题。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有几架小型飞机，邓演达去广州，来回都是坐飞机。临行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务派我代理，在我代理校务的那几天中，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金亦吾、左铎、陈希平等，在学校里制造风潮，进行捣乱。有一天星期六下午二时，我接着一个通知，定于当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议，要我出席，下署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官佐同启。我当时用电话向各单位问是谁召集开会？谈甚么问题？各单位负责同志都说不知道，我正在奇怪的当中，我的一个副官来报告说："今天的会是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召集的，据说他们对学校的用人行政有意见，要主任出席答复。"我问："谁告诉你的？"他说："陈希平队长。"这三个学生是黄埔二三期毕业的，陈希平已派为入伍生第二队队长，金亦吾、左铎还没有派工作，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武汉分会的骨干。在他们阴谋发动制造事件时，陈希平在内，陈希平又以地位关系，怕搞出事来要受处分，所以先向我的副官告密，还要我作个准备。我想，他们搞这样的集会是违犯军纪的，我可以不理，并可以派卫兵解散他们。但是既是他们要制造事件，今天不理他，明天不理他，总有一天他们找上门来，就不能不理了。既然是一个矛盾，就是一个问题，长痛不如短痛，逃避现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如利用

他们非法的集会，我以合法的手段来处理，较为直截了当。我就带了一个副官，到他们准备的会议室（图书阅览室）去。我进到室内，他们没有以经常的礼节对待我。他们总共约有二、三十个人，除了入伍生队第二队的官佐外，都是黄埔军校各期的学生，一半以上是候差还没有派工作的，有的还是分发刚到校的见习官，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员站起来，其余的都是坐着不动，并对着我怒目而视。我坐下来问："这个会是谁召集的？何以事前没有报告？"沉寂了一会儿，左铎站起来说："是同学会发起的。"我问："何以用全体官佐的名义呢？我问各单位的主官都说不知道。你们有甚么意见随时可以来找我谈，你们这样做，是违犯军纪的。"左铎就楞住了。金亦吾接着站起来说："我们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校长给同学会的任务：我们有权监督学校的行政和人事。"我说："我是代理校务，是代替校长主管学校行政和人事，你们知道吗？你们要为校长效忠，就要服从命令，维持军纪。"金亦吾就怒气冲天地说："你不公平，我们在这里候差了一个多月，你不分配我们的工作，你是压迫我们的，你是一个跨党分子，你是国民党的叛徒，你是一个共产党。……"声音越说越大，最后掏出手枪向桌子上一扔说："不马上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就拚！"陈希平夺过他的手枪，做好做歹。我当时气得发抖说："这完全是暴动，叫卫兵司令来。"我想把这些家伙都扣留起来，至少也要把金亦吾、左铎关禁闭，陈希平撤职。我即出了会议室，回到办公厅，抽了一枝烟，有几个副官秘书来说长道短。我即想到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金亦吾、左铎等反对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矛盾，是我个人的威信重要呢？还是国共联合战线重要呢？想到这里，我的脑筋就冷静下来一些，卫兵司令进来了，都以为我一定下命令关金亦吾、左铎的禁闭。我对卫兵司令说："门卫要谨严一点，从总办公厅到前后门加岗卫，校内各处派巡查，所有候差人员的私人手枪一律交警卫室登

记保管，马上执行，不另下命令。”一个政治教官吴企云坐在旁边，他是周恩来介绍来的，邓演达对他也很客气，因为他同周恩来是同学，他说：“主任的雅量，真可钦佩。”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处罚那些捣乱分子。接着我就拟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把这一事件报告邓演达，并请他提前回校。第二天，邓演达复电要我对学校积极负责，对滋事的官佐严加管束，这个电报是用总政治部的密码，所以由总政治部转来，并在总政治部主办的《军人日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宽大处理，也出乎金、左诸人意料之外，把那一风潮暂时缓和下来。过了几天，邓演达回到武昌，我又把那一场经过当面向他报告，并请卸除代理校务的责任。他慰勉了一番，还是要我照常负责。后来在一次联合总理纪念周上，他讲话，把那些滋事的官佐骂了一顿，金亦吾、左铎各记大过一次，调新成立的警卫团服务，这一事故算告了一个段落。但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那些专门以制造国共磨擦为职业的人们，哪里甘心呢？于是他们添油作醋地报告蒋介石说：“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员，包惠僧任用私人，把持校务，邓演达包庇共产党，包庇包惠僧。”在蒋介石那里留了一个创痕。

不久，邓演达到南昌同蒋介石商量国民政府迁都的问题，他们把主要的问题谈完了之后，蒋介石特别提出问：“包惠僧在武汉干甚么？”邓说：“谭主席派他到前方来见总司令，准备在前方工作，武汉行营的事情很忙，人手很少，我留他在行营帮忙，现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是以筹备主任的名义代理校务，还没有派定固定职务。”蒋介石就把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的报告交给他说：“用这个人是要慎重，他是不容易驾驭的，学生的意见固然不一定都对，但是总是自己人，总应该好好地安置他们，这个报告交给你去处理吧！”邓演达在当时只好答应“是。”过了几天邓演达回到武汉，把这一段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并把原报告交给我看，报告上完全是扯的瞒天大谎，还说我在会议席上拿出手枪威胁他们。我看了报告之后就

很生气地说："蒋老总偏听学生一面之词，你就应该根据事实说明是非曲直才对呀！"他说："这是个小事，当时他很忙，我不可能把这件事同他扯得很长。我已同他说过，你要到南昌去看他，他也答应请你去，我想稍缓你到南昌去一趟，见了面一切就明白了。他也没有把这件事认真处理，报告上他没有批一个字，他交给我就等于说他知道了，我交给你看，也就是说我知道了，你看了把它扔在字纸篓里不就完了吗？还生甚么气呢？"

他把这件事看得毫不在乎的样子，我就认为他是不支持我，因此我就想离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想离开武汉。适逢其会，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三番两次请我去主持该师的政治工作。夏斗寅原是李书城的旧部，他同李汉俊有交往，他托李汉俊来征求我的同意；李汉俊说："湖北人没有军队，刘佐龙虽然是个湖北人，十五军是北洋队伍，只有夏斗寅这一师人是真湖北军队，我们应该帮他的忙，把这一部分军队整理好，我们湖北人在革命战线上才有作用。"我当时为李汉俊的说法所动，我答应同邓演达商量再决定。第二天我到行营汇报，会开完了，我同邓演达谈起这个问题。邓演达说："那是个杂牌队伍，希望不大，你何必要搞这个工作呢？我想，过几天你到南昌去一趟，把蒋老总应付好了，湖北方面需要你做的工作很多，我们能够常在一起工作不好吗？"我说："我不想做官，我对部队生活，很感兴趣，而且湖北人就是这一点军队，我是湖北人，有责任把这部分军队搞好。"我的这一段话，他似乎是听进去了；他就转了话头说："如果真能把这一部分军队整理训练好，使湖北人自己能看住自己的大门，北伐军建立起一个军事据点，对于北伐统一大业，倒也有点意义。不过你让我通盘考虑一下，明天再答复你，目前还是学校重要。"邓演达认为唐生智是个危险人物，如果北伐军向前发展，两湖落在唐生智的掌握，他要干些甚么，那是很难想像的。所以在第二次北伐战役中，他是把前线作战的部

队与后方卫戍部队将湘军粤军平衡配备，总不使唐生智部独立担当一个任务。他为了不造成唐生智独霸两湖的局势，有必要培植一部分湖北的军事实力，才同意我到夏斗寅部主持政治工作。第二天晚上，他打电话要我到行营去谈这个问题，他从行营军需处把夏斗寅部的编制与员额底册调出来，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我同意你暂到鄂军第一师去工作，不过这一个师只有两团可用之兵，第三团刚成立，还是徒手，你最好先去看一看，看看官兵的素质，武器的配备，战斗力的强弱，夏斗寅及所属三个团长是否还有点朝气，是否有改造的希望等等。你看了回来，再作决定，如果这个部队有点希望的话，将来武器可以补充，编制可以扩大。"

过了几天，我即到鄂北应山县夏斗寅的防地去视察鄂军第一师。我在应山县城内住了三天，该部除了第一团万耀煌部有两营在关口铺布防而外，其余各部都在应山城内集中训练。夏斗寅很隆重地接待，举行过阅兵式，我对官兵讲了一个多钟点的话，看过兵房，检查过内务。三个团长是万耀煌、张森、晏勋甫，万、张二人是夏斗寅的老班底，晏勋甫是第八军唐生智部参谋处长，夏斗寅新成立的第三团没有枪枝武器，所以拉晏勋甫同唐生智的关系，突破请枪的第一关。晏勋甫是唐生智的得力助手，他是不能离开唐生智的，他这个团长职务只有空衔、不能负实际责任，夏斗寅也乐得这样做，即由他自己的老部属卢本棠以副团长代理团长职务。参谋长是佘式谷即佘子祥，参谋处长是叶蓬（后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中当了汉奸，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以汉奸罪执行枪决）都是湖北人。万耀煌是北京陆大第一期毕业，其余的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就当时的水平说，这几个军官的素质都很好，士兵的素质都还不错，完全是两湖子弟，并都穿上了新发的冬衣（棉军服），从军纪风纪方面看，这个部队已经过了整理，颇有朝气。我同夏斗寅及那几位主要的官佐都作了长谈，他们对我表示亲热，我对他们也是一见如故。夏斗寅的一个军

需处长是我的本家叔辈，他同夏斗寅一路当兵起一直搞拖队伍的生涯，他对夏斗寅的一切很熟悉，他把该部的人事经费及其他的情况同我谈了很多，我算是摸了底，我当时认为这个部队是有前途的。我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一切情况报告给邓演达，我们交换了意见，他同意我暂时离开武汉，他马上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派我任鄂军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坚决执行他的党务整理方案的，只要我或其他共产党人不以跨党的关系参加他的直属部队和军官学校的上层领导工作，其余的任何工作他是会同意的，因为他认为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一个力量，北伐战争的范围扩大了，需要用人，他自己的私人仅够支持他自己的嫡系军队，所以很快他即复电照准。邓演达还留我在行营帮些时的忙，夏斗寅为了整军扩编的问题，急如星火地要我就职视事，所以他在荆门防地代我发表了就职的通电，实际上我还在行营工作。邓演达留我在武汉多停留些时：第一，是因为军官学校我走了没有可以代替他看那个摊子的人；第二，蒋介石快到武汉来，他要我留在武汉同蒋介石见见面，他认为这样对将来的工作联系上是有必要的；第三，他还要介绍我同唐生智见见面，因为鄂军第一师还是受唐生智的节制指挥。

过了不久，军事政治学校的人事确定了，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是蒋介石硬派的，侯连瀛任教育长是邓演达保的，张治中任学兵团长，杨树松任学生总队的总队长，原任政治总教官李达是我推荐的，我走了他也要走，调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李达回到湖南，因为毛泽东的关系任湖南省党校（国民党）教务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主要干部大体安排就绪，还开了两天校务会议，决定了教育纲领及学校的各项规程。

蒋介石于十二月底来武汉巡视，他从九江坐江顺轮船到武汉，武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武汉夹江两岸，人山人海，邓演达乘小汽船接到江顺船上，我同行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高级人员接

到文昌门外的江边。蒋介石除带了很多的参谋、副官、秘书、护从而外，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也同来。因为群众夹道欢迎的关系，蒋介石由文昌门码头上岸，步行到行营，欢呼之声，震天动地，可以想见当时武汉革命民众对蒋介石寄予很大的希望。到行营，我同蒋介石相见之下，感觉到非常不自然，我想借故走开，邓演达紧紧地把我拉在一起。我的思想感情中浮现："包惠僧在武汉干甚么"、"这个人不好驾驭"、"用这个人要慎重"这几句话的成见，我感到对他没有任何共同的感情，所以我们在见面握手中是冷冰冰地问了一句"您好"。总司令部的秘书处长李仲公，在第二次东征我们在汕头何应钦家吃饭见过面，算是熟人，蒋先云此时任蒋介石的秘书，都随蒋介石到了武汉，住在行营，我借故去看他们，才离开那个不愉快的场合。第二天，蒋介石在行营召集武汉各军政单位的高级主管人员讲话，我仍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负责人出席。他讲完了话，就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巡视，因为学生正在办理入校的手续，编队还没有就绪，服装也不整齐，所以没有集合学生讲话。我向他把筹备经过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并把全校的官佐名册各附简历给他看一看，邓演达作了补充说明，他当时也没有表示甚么意见。每当我们报告完了之后，他那心不在焉的样子连声说"好！""好！"把这一场面应付过去了，我就再也不见他的面。有一天夜晚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在家里接到邓演达的一个电话，他说："大概总司令一、二天快走了，明天早晨七点钟至八点钟的时候，你去看看他，同他谈谈你的工作问题。"我说："我不是要到鄂军第一师去吗？"他说："就是去也应该同他谈谈。"我当时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我没有去，蒋介石就是那一天夜晚十二时，仍乘江顺轮由九江回南昌去了。行前很秘密，知道的很少，除了邓演达和几个黄埔学生而外，没有甚么人去送他，这就说明蒋介石在武汉住了几天，他的耳目也很多，了解了武汉的情况，武汉的民主运动与党权高于一切的呼声震动了江汉，所以蒋介石

看到了风色不佳，只好悄悄地溜走了，这就是宁汉分裂的开始。

过了几天，鲍罗廷及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等到了武汉，行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鲍罗廷作了两个多钟点的讲话，主要的是讲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对蒋介石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所指责。他讲话时会场寂静无声，他每讲完了一段，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那一天到会的都是党政军三方面的高级干部，鲍罗廷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的意见，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情，已经在事实上得到证明了。会后，邓演达介绍我同唐生智见面。人与人的关系也很神秘，我一接触到唐智生，觉得他那一切不在乎的神情，就感到不愉快。我们寒暄之后，他约我第二天晚上八时到汉口他的前敌总指挥部详谈。届时我去了，他又不在那里，他的秘书长邓介松倒是殷勤接待，我无精打彩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夏斗寅的部队此时移转鄂西驻在荆门，我即准备到荆门视事。行前我到邓演达那里辞行，他再叮嘱说："这个部队很快就要改为直属中央，不受唐生智的节制，你去先作一个准备，对整理训练方面要加工，整理好了，将来要调到前方作战，编制可以按照甲种师的规定。"邓演达同我的约定，因为我的行期仓促，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报告行期，并请他约定时间地点同他见面谈谈，他复信要我同张国焘接洽，我因为不高兴见张国焘，没有去，因此铸成了大错。

一九二七年一月底，正在农历年关，我到荆门防次就职视事。我同全师官兵见了面，大家都很热烈地欢迎我，这是夏斗寅部队接受三民主义的表现。在司令部召集营长以上的各级长官开了两天会议，计划整编。夏斗寅看见何键、李品仙、刘兴等师都扩编成军，食指大动，他同我说了大半夜希望扩编成军，我告诉他说："第一，你加入国民革命军不久，没有战功。第二，你还只有两团可用之兵，实力距离军的编制还很远。第三，你同任何方面的人事关系不够。你应该埋头苦干，先把队伍整理好，其次争取到前线去打几个

胜仗。人事关系我尽可能替你联系，如果过于在名誉地位方面计较，给上面以不好的印象，我说话就很困难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把全师编为四团，一个独立炮兵营，请领步枪三千枝，并请酌发机关枪、迫击炮和野战炮等武器。我同夏斗寅联名直接请行营核办，另外我写了一封信专差送到邓演达，请他特别照顾，没有打前敌总指挥部的招呼。

我们于农历正月初一由荆门出发，移防宜昌，步行约四五日，到达防地，即开始整训。整整做了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工作，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都是从头做起，师、团、营、连各级国民党的党组织宣告成立，军队里的行政事务，也逐渐改良。对士兵能按月发饷，这是夏斗寅部队从来没有的事，废除对士兵的体罚，一切人事行政，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娱乐，社会活动，都按党军时代的规模办事，士气为之一振。师的编制仍按照三三制，另成立一个独立团，两连炮兵，编为一个炮兵营，全师给养由原定每月十二万元提高到每月十五万元。独立十四师的番号是一月下旬颁发下来的。约在三月中旬，总司令部的点验委员会，到宜昌点验驻防的部队。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朱霁青，委员有蒋鼎文、邱鸿钧、王瑞清、赵铁公等一行十余人，都是我的旧识，我也在他们面前对这个师说了一些好话，当然得到一些人情上的照顾。当时驻防宜昌的部队很多，有何键的三十五军两个师，不及万人，有王天培的新编第十军三师，约万余人，独立十四师四团一营共一万三千余人，一起集中在宜昌市郊的沙坪坝举行校阅。新编第十军是新改编的部队，服装、旗帜、武器都是残缺不全；第三十五军是由师扩编成军，作战后还没有补充整理完毕，武器不全，军容亦不甚好；独立十四师是新编制，新旗帜、新服装、新武器，又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集中整训，相形之下，独立十四师的军容之盛，纪律之严就显然与众不同了。我们在校阅台上，蒋鼎文拉着我的手说："我们抬头看就知道政治工作的作用，黄浦的军事教育，你

带到独立十四师来了！你们的军事训练同政治训练都很成功，我们回去一定要向总司令特别提出来。”朱霁青接着说：“一个杂牌部队仅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训练就变成这样，真是难得。”点验完了之后，点验委员会一行十余人在宜昌住了几天，各军师对他们都是隆重招待，吃酒打牌叫局，昏天黑地地闹了几天。他们在人前人后都把独立十四师的成绩提得很高，这对于王天培倒无所谓，对于何键就是一个讽刺。从那一天在检阅台上所看到的，在校阅评讲会上所听到的，在吃酒打牌茶余酒后所谈到的，都使何键感到不安。夏斗寅带着高兴和恐惧的态度对我说：“这一次在宜昌驻防部队的总校阅，我们的队伍占了上风，何云樵（何键字云樵）很难过。我们整训扩编没有打唐孟潇的招呼，他一定会妒嫉我们，将来可能要惹些麻烦，我们要先作准备，最好请邓主任把我们的部队调到前方作战，或者是调防，老关在宜昌是没有甚么发展的。”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又过了一些时，经过了同各团团长会商之后，我们便分电邓演达、蒋介石，请将独立十四师调到前方作战。

我以为中央直辖的一个独立师是可以向总司令及总司令行营请示报告，不会有甚么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汉，已经进入到提高党权运动与酝酿反蒋斗争，我们远在宜昌并不知道，这个电报落到唐生智手里，邓演达正在河南部署第二次北伐的战斗，湘粤各军都调到河南作战去了，鄂西只有独立十四师在宜昌驻防，就在这个时候，唐生智把夏斗寅部一切没有通过他的整训扩编的怨气，结合这个电报发作起来。他一面要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当时是共产党员）报告共产党，说我同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将不利于武汉政府；一面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电令夏斗寅回汉口追查责任。夏斗寅接到唐生智的电报，知道出了麻烦，他即马上坐长江轮船回汉口，他行前对我说：“唐孟潇可能要找我的麻烦，党代表要找邓主任支持我，这可能是湖南人黑暗统治湖北人的开始！”我当时拍胸说：“你大胆地去，

天大的事我负责任。”他回到汉口约十余日没有消息，我们都在狐疑。正在此时，我接到我们党中央的电报，要我速回武汉，没有说为甚么，我知道这是一件事两面发作，我就准备动身东下，副师长万耀煌召集团长以上的官佐会议，都说：“师长回武汉没有消息，党代表不能离防，况且连日得着情报，川军杨森部有东下的企图，宜昌可能要发生战争，党代表须在这里坐镇。”我想，我们并没有犯甚么错误，我还有邓演达的靠山，唐生智也要受行营的节制，在这小小的池塘里翻不了船，我怕他甚么呢？现在是我们的党要我回武汉，我回去一趟，把情况说清楚了马上就可以回来。我劝他们一面在宜昌上游布防，一面把情况报告行营。我将党代表的印信交万耀煌护理，我即乘商船回武汉。我的家住在武昌中和里，夏斗寅住在汉口兰陵路十四师办事处，我们通了电话，他说：“事情弄得很麻烦，邓主任还没有回来，我们见面再谈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汉口模范区对过宝康里我们党中央办事处，同张国焘见面，他问我：“一、夏斗寅为甚么同蒋介石通电报；二、你的工作情况为甚么不报党；三、你在宜昌花天酒地，行为不检。就这三个问题，写个书面报告来，以后再讨论你是否回防的问题。”看他的表情好象是很严重的样子。我当时就他所提的三个问题，根据事实，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说清楚了就完了，我拒绝写书面报告。他也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约定过两天再谈。我即到兰陵路去找夏斗寅，他出去了，我就回家。过了两天，张国焘又通知我到中央去谈话，我按时到那里，彭泽湘先在那里，我们三个人就开始谈，首先由彭泽湘发言，他说：“你在独立十四师整训扩编的计划没有呈报唐孟潇批准，是破坏制度，违犯军纪。其次，我是你的上级，你的工作从来没有向我作报告，你是藐视长官。”他还在向下说，我忍不住，我本来一向看不起这个人，我听了他那一套官腔，就火起来，还他一套官腔说：“你的话只好摆在《向导》‘肉麻世界’那一栏内，今天

在我们党内说话，说不上甚么藐视长官。况且我是独立十四师的中将党代表，你是第八军的少将政治部主任，从阶级方面说，你不能管我；从军事系统说，独立十四师是中央直属部队，与第八军没有隶属关系；再就事实说，唐生智歧视鄂军第一师，压迫夏斗寅是众所周知的，行营派我去整编这个师，为湖北培植一点地方武力，为北伐军巩固后方之用，这是邓择生（邓演达字择生）的计划，他可以为我作证明。你不明事实，不明体统，你摆甚么臭官僚架子呢？"我同彭泽湘拍桌对骂了一阵。张国焘说："八军与独立十四师的关系问题不大，与蒋介石通电报的问题也算说明白了。邓演达交给你的一个任务：独立十四师整训改编的计划，你没有报党；你在宜昌工作了三个多月，也没有报告党，这是违犯党纪的。其次，你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宜昌出入于花天酒地，生活不严肃，也是违犯党纪的。"我一向同张国焘不好，说话就吵架，他这一次平心静气地把问题提出来，我倒是无话可说，我答应说："这两点是我错了。至于花天酒地那是过甚其词，生活不严肃，那是不免的。"当时的情况，我知道可能要受撤职的处分，行营此时邓演达不兼主任了，也没有人负责，我先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邓演达同铁尼罗顾问到河南部署作战还没有回来，辞呈也没有批下来，党对我的处分也没有决定，唐生智对夏斗寅一切的猜疑都推在我身上，我都担当下来，唐生智、彭泽湘乃至于张国焘，只要我离开独立十四师，对夏斗寅就无话可说了。唐生智只要控制夏斗寅，彭泽湘不过为唐生智装腔作势，张国焘排斥异己，这就是政治上的勾心斗角的鬼把戏。独立十四师的官佐一天一个电报，要我们回防，武汉的部队都调到河南作战去了，川军如果东下，独立十四师如果挡不住的话，对武汉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唐生智对夏斗寅由踢一脚到拉一把，不得不促夏斗寅回防。夏斗寅行前来看我，他说："独立十四师的整训扩编是党代表一手造成的，我们全师官兵没有一个人不信任你，也没

有哪一个不感激你，今天你自己下水，送我上岸，这样的公谊私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等邓主任回来，把话说清楚，我们还是希望你回防。如果万一你不能回去，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我们的部队还是希望你照顾。"他说到这里，几乎掉下泪来，他又继续说："唐孟潇这个人是很难共事的，我真怕他，我总要想办法脱离他的节制，不然我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这是他和万耀煌、张森常说的一句话，我也没有想到他究竟用甚么方法来脱离唐生智的羁绊。

夏斗寅回防不久，邓演达由河南回来，看到了我的辞呈很奇怪。他派人把我找到他家里，他开口就责备我不应该辞职，他把辞呈当面退还我，要我马上回防，我先同他说了一些工作上的困难，他说："不成理由。"其次，我说明我同唐生智的矛盾，并说明那个电报引起来的纠纷。他说："由我负责，今后独立十四师不受唐生智的节制。"最后逼得我不能不说出我违犯了党纪，我要受党内的处分。他说："我替你证明，你是执行我的计划。"我说："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不能证明。"他说："这个部队我们费了这样大的气力，补充了那么多的饷械，你如果辞职叫谁去掌握这个部队？夏斗寅是个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他部下的将领同我们的关系不深，中原的战事已经开始，这个时候的军事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川军东下，独立十四师不好好地打两个胜仗把川军挡回去，武汉是很危险的。你们那些书呆子（指我们的党）在这样的军事情况之下随便调动我所布置的重要负责人员，那是不行的。"他说完了仍然把辞呈交还我。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服从你的命令违犯我们党的命令，我本不应该把我们党内的决定告诉你，我希望你不动声色地批准我的辞职，并希望你把我们的谈话严守秘密，我已经把我同你的革命的友谊置于我的党之上了，我算是又犯了一次我们党的纪律。"他看到我的态度坚决，还犹疑了一下，把我的辞呈放进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接着又说："辞呈虽然我收下了，独立十四师没有事则已，如

果有事故发生，你仍然要负责任，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意见报告你们的党？”我答应到适当时候，我可以说一点，但不能说这么多，说多了就是强调我对独立十四师的作用，同志们会疑心我恋栈，更要责备我借外援来巩固地位，那就是错上加错了。他摇头叹息了一番，把这件事就暂时搁下来了。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前后

北伐军既克复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事务都一天比一天繁重。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虽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纲已有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此时的国民政府的首都还在广州，国民政府是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不能发挥革命政府的应有的作用。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是露骨地倾向与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途径，这是共产党与革命民众所坚决反对的。唐生智进驻武汉，正在争取与蒋介石平衡地发展，他的矛盾是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帽子与共产党和革命民众引为同调。共产党为了扩大联合战线，故亦以国民党左派将领待唐生智，并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演达倒是一个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虽然是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倒是忠实地执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纲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意见，大体上同共产党是一致的，因此武汉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发展与蒋介石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显然不同，这是后来宁汉分裂的主要原因。如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兰浦生的对华新提案，蒋介石就表示受宠若惊，共产党方面就认为是英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的和平攻势，别有用心。在武汉的党政军各方面的上层人士，绝对大多数同意共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武汉的形势，共产党已占领导地位了，蒋介石能够控制广州的国民政府，而不能控制在共

产党领导之下的武汉的政治、军事、外交，这是蒋介石最感到头痛的。

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北伐军的主力进驻武汉，同英国的外交关系频繁，武汉方面对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也感到极大的忧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爆发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

国民革命军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广东由沙基惨案一直到省港罢工运动中，深深地了解英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也吸收了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对英帝国主义的仇视与渺视是很自然的。北伐军进驻武汉，我们的官兵不顾租界的那一套清规戒律，携带武器自由出入租界很频繁，为这些问题几乎是天天闹纠纷，我们的部队官兵都以为中国人走中国的路，还受外国人的干涉，非常愤慨，常有成群结队的官兵闯进去又闯出来，我们的人多势大，不管租界当局准不准，自由携带武器进出租界已经造成既定事实。汉口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之下，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很高，尤其是码头工人与黄包车工人，受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经常挨打挨骂，以贱价出卖自己的劳力，过着牛马的生活，一向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看见北伐军官兵自由自在地带着武器进出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也无可如何，虽然是常起纠纷，结果要进去的毕竟也进去了，要出来的毕竟也出来了，这些事实，对汉口劳动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武装巡捕和外国水兵一向对中国人的狰狞面貌，也逐渐地变成了纸老虎，帝国主义在租界内的威信也逐渐低落，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的情绪逐渐高涨，就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运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七年元旦及二、三等日，为武汉各界民众庆祝北伐军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各机关团体学校除举行了盛大的集会而外，省市党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宣传队，作广泛的深入下层的政治宣传，凡属交通要道行人稠密的地区，都有宣传

队举行政治宣传讲演，从一码头江汉关怡和园一直到后城马路，这一条线是英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华洋杂处，行人众多，宣传队就选择了这一条线作讲演宣传的重要驻点；在元旦和二日虽然发生了一些纠纷，但有几个印度巡捕同我们的工人运动有联系，因而同我们的宣传队也发生了联系，由他们居中斡旋，故能平安无事。到了第三日，英国新调来几只兵舰在英租界江面停泊，英国水兵全副武装登陆，在英租界各交通路口驻卫，在江汉关一带为独多，并在江汉关附近安置巨大木桩，布置电网，设置机关枪哨位，枪口正对着华界及宣传站，如临大敌，行人为之侧目，码头工人与黄包车工人更为愤慨。下午三时许，宣传队开始讲演，听众越来越多，秩序虽然很好，交通上已形成阻塞状态。英国水兵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不为所动，英兵复以冲锋的姿态，用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场杀死海员工会会员一人，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部被刺刀刺穿，大肠流出，势甚危殆，黄包车工会会员方汉山腰部被刺刀刺入甚深，其余市民被打伤杀伤的共三十余人。群众见此惨状，非常愤激，一时喊杀、喊打、喊拚的人声震天动地，几十个英国水兵陷入十几万人的伟大群众包围中，便是一筹莫展了。群众以波浪滔天之势，追奔逐北，越过了铁丝网，占领了机关枪阵地，掉转枪口，准备向英兵及武装巡捕射击，如果当时有凑手的机关枪手的话，英国军警的死伤就很难估计了。经这样的一场恶斗，英国水兵四散奔逃，有的丢了枪，有的缴了枪，有的逃上了兵舰，有的逃进了工部局。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武汉卫戍司令部派来了一营兵力，进行弹压，国民政府的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共产党员），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都同时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革命民众与革命政府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民愤略平，才把那一场紧张局面暂时平定下来。当晚各人民团体都召集了紧急会议，提出进一步的斗争办法；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

表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联席大会，作了九项决议，请国民政府对英领提出八个条件，限英领于七十二小时内答复。八个条件如下：(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即将肇祸凶手交国民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撤除英租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讲演之绝对自由。(七)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国民政府派军警管理。以上八个条件如英领事在七十二小时内无圆满答复，则请政府正式通知英领事，以后如再有何种不幸之事发生，应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同时，代表大会为求避免以后再有此项惨案发生，更须要求国民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一)立即收回英国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四)立即撤销英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五)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六)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货。(七)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八)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九)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国民党，下同)、汉口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民协会、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各团体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由此十五个委员立刻将联合代表大会向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先口头向政府陈述。

此时国民政府尚未完全迁到武汉，因为事态严重，不便由军事当局负责处理，即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根据事态的发展，发出紧急公告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下午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告，特此公告。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至四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到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的态度和办法，对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八项条件，已决定全部接受，且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国民政府外交部已于三日晚向英领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即撤退英租界之水兵及义勇队。至四日晨英领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租界。武汉卫戍司令部弹压事变的部队，当晚即进驻英租界，驻扎在巡捕房后堆楼内，次晨复增派兵力一连，由营长一人，党代表一人统率，在巡捕房办公。一切军事与行政事务由党代表秉承外交部办理，把那种混乱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英国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最初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手段，经过一日的斗争当中，他们在中国革命民众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急转直下，变为退让的态度。英国方面迫于形势严重，其登陆的水兵不能不撤退，租界内的武装巡捕不能不解除武装，但是英帝国主义是不是甘心把英租界交还中国呢？完全不是。它是以退为进的阴谋：第一，它们估计国民政府还没有收回租界的准备，汉口也不止英国有租界，民众虽然提出收回租界的要求，政府不可能完全接受。在讲价与还价之间，他们先把那个乱局面的责任暂时交给国民政府，搞好了，他们还可以根据条约交涉，将来还可以同其

他国家一样保留租界；如果搞坏了，它们更有所借口，再进一步联合华盛顿会议的会员国，搞一套更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新计划。第二，英租界的侨民与商务的管理工作很繁重，毫无对外经验的国民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可能管理得很好，不可能不再度发生纠纷，它们期待着中国劳动人民采取义和团的老办法对待英国人，一俟有较恶劣的事态发生，便联合列强共同行动，再对国民政府施以更大的压力，来维持它们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地位。第三，它们也深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有内在的矛盾，蒋介石与各帝国主义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频送秋波，到了最后的关头，它们不以武汉政府为对象，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交涉，至少还可以保持在中英条约上的既得权利。英国在这样的三种可能的估计中打它的如意算盘，才决定退让政策。我们在当时接管了汉口英租界之后，民愤略平，对英国侨商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待，他们也没有甚么不便，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英帝国主义者的三种估计都落了空，因此我们才把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问题确定下来。这就是国共联合战线对英帝国主义打了一个胜仗。

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之后，一月六日九江发生同样的事件。自汉口收回英租界事件从发生到胜利的结束，大江南北的劳动人民，无不为之振奋，而驻在长江内河的英国水兵自然而然地有些张皇失措。九江突然发生一个英国水兵开枪打伤一个工人，引起了各工厂工人与码头工会的工人及黄包车工人的公愤，群起包围英租界，北伐军驻在九江的部队协助工人活动，声势甚大。停泊在九江江面的英国兵船，曾鸣炮示威，希图镇压，但是此时全国各地的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在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之下，一道同风，步伐一致，加以汉口与九江是一水之地，朝发夕至，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经验，完全被九江各工厂工场的工人接受了。英国在汉口的交涉中，已经采用了退让政策，在九江事件的交涉，大体

上仿照汉口英租界的交涉先例办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发展到国际政治舞台来了，国民政府的威信，震动了帝国主义国家长期霸占中国市场的迷梦。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一九二七年就完全收回了。不幸大革命失败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租界与治外法权，在中国延长了十八年的命运，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结局，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中国才由日本人手中收回，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的结果。

国民政府迁都问题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中决定的。为得适合当时政治军事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前途，武汉是唯一无二的适于建立国民政府首都的城市，蒋介石原也同意这一决定，所以一经决定之后，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如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即陆续迁武汉办公，已到达武汉的国民政府的重要人员如徐季龙、陈友仁、宋子文、孙科、顾孟余、王法勤、丁惟汾、王乐平、何香凝等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执行党政最高的权力。虽然国民党中央的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还在广州，武汉方面政令的推行并没有甚么故障，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共产党的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蒋介石是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置于总司令的支配之下的，自从北伐军克复武汉以后，尤其是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运动中，革命民众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革命与民主的空气弥漫了武汉，形成了新的革命形势，在武汉各军将领及国民党比较进步的人士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跟着革命的新形势走，而形成了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局面相对立的革命民主的集团，蒋介石不仅不能支配武汉，还要受制于武汉，这样他所用的曹操、王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套办

法，就无从施展了。因此他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把张静江、谭延闿由广州迎接到南昌，希图造成在南昌发号施令制服武汉的局面。蒋介石挟持两个主席，在南昌庐山举行了两次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议，主张推翻在广州联席会议决定迁都武昌的原案，从新决定“迁都南昌”。最突出的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旬在庐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他提出迁都逐鲍(鲍罗廷)，他把武汉革命民众的革命要求都归纳在鲍罗廷一人之身，认为是鲍罗廷指使的。这一次会议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出席的不多，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朱培德等都参加了，邓演达到了南昌，蒋介石认为邓演达有赤化的嫌疑，把他羁縻在南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演达也很敏感，他知道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议而不要他参加，必然是商量如何对付武汉的问题，他既然是在武汉负主要责任的人，如果有了对付武汉的决定，他就必然落到蒋介石之手。蒋介石到庐山前，要邓演达在南昌等他回来商量河南进兵的问题。他因为从三月二十事变的经验，对蒋介石颇有戒心，他便采取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的一着，轻车简从，不声不响地溜回了武汉，而武汉方面，已有邓演达在南昌被扣的传说了。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中，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倒是居中斡旋，更以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有顾虑，所以“迁都逐鲍”的主张缓和下来。

谭延闿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虽然他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做了蒋介石的傀儡，他的内心主张还是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他以蒋介石自身的利害来说服蒋介石维持国共联合战线，所以把那个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国民政府究竟是迁到武汉还是暂留在南昌，还是悬而未决。武汉方面是根据中央联席会议的决定办事的，蒋介石挟持张静江、谭延闿两个主席和总司令的名义，在南昌发号施令，而形成了两个国民政府的局面。当时武汉方面反蒋最力的是徐季龙、孙科、顾孟余等；宋子文、邓演达虽然不满意蒋介石之所为，但是，他们同我们在三月二十事变时对蒋介石一样的

看法，总以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还是居中向双方解释和拉拢。邓演达此时是中国军人的头脑，他对蒋介石的关系完全是部属对长官的关系。他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决断的人，但是他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在我们的私人谈话中知道他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表示唏嘘叹息，他从不由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在武汉反蒋运动的高潮中，在阅马厂举行的各种大会，有好几次我同他一起站在主席台上，到了提出反蒋的决议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他的态度总是冷静和沉默，他的内心的矛盾与革命意志的脆弱就决定了他最后只有出走的一条路。宋子文是追随孙中山很久的，他在孙中山的海阔天空的政治风度中得到了一些经验，他对蒋介石党政军一把抓的作风是看不惯的，他很同情武汉方面的民主运动，所以他在武汉也参加了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不过他也和邓演达一样的看法，总认为蒋介石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人选，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比蒋介石为适当，因此他就采取了拉着蒋介石不放，而不是反对蒋介石到底，所以他也始终是站在中间担任调解人。孙科以孙中山的儿子的关系，才参加国民政府的上层活动，他一向是看风转舵，谁占上风，就跟谁走。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开始，他曾以"太子派"出现搞过反共的活动；后来国共联合战线巩固了，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他又站在左派一边反对居正、冯自由等；三月二十事变以后，他发表声明，一切服从蒋介石，他又站在右方同西山会议派勾结；武汉党权运动高涨时，他又站在左方。他的干部先有吴铁城、马超俊、陈其瑗，后有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等。徐季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政客，又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既无群众又无干部，他离开广东方面的革命运动很久，是在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时，以老国民党的身分参加进来的，他看准了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国民党的左派，他

就站在左派的最前线。鲍罗廷是第三国际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他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是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在弥留之时还对汪精卫、何香凝等说："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对鲍罗廷有托孤之意，这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所周知的，所以蒋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冬天在汕头对党军官佐讲话还说："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蒋介石对鲍罗廷尊敬的程度。三月二十事变之后，鲍罗廷仍回广州，蒋、鲍之间初无任何裂痕，蒋介石于有形与无形之间，要求鲍罗廷向第三国际建议：承认把中国的革命事业由他来继承孙中山，以对待孙中山那样来对待他，并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他所要求鲍罗廷的如派邵力子代表他到莫斯科请求第三国际的是一模一样，邵力子到莫斯科碰了一个钉子，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请求的结果自然也是一样。蒋介石是一个惟利是图的人，从前依靠苏俄的帮助，使他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现在他有了相当的政治本钱，反而遭到苏俄的冷遇，他认为苏俄对国民党的帮助，已达到了饱和点，至少是鲍罗廷不帮他的忙了，再没有甚么多的希望，所以他同鲍罗廷的关系就一天一天地疏远起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时，鲍罗廷就同宋子文、孙科等先到武汉。他到武汉以后，在宴会席上发表过几次讲话，他赞扬武汉方面所发动的民主运动，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倾向与破坏广东、江西各省农民运动有所指责。因此，蒋介石认为武汉方面的民主运动与党权运动，是共产党发动起来的，鲍罗廷是支持共产党的，只要把首都迁到南昌置于他的军事势力控制之下，共产党就不能兴风作浪，把鲍罗廷赶走，共产党和他一样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他就便于应付了。在这样的矛盾情况之下，他就开始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在庐山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中，他提出迁都逐鲍的意见；在南昌举行的总理联合纪念周上，他讲话曲解孙中山所说的："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问题，他说："苏俄以平等待我，总

理才同苏俄联合，现在其他的任何国家只要以平等待我，我们就同其他的国家联合。”他抹煞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遗教，他采取了“有奶就是娘”的方针。蒋介石并且说，他有权制裁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反俄反共反对工农政策，准备同各帝国主义国家妥协的开始。

蒋介石已经对共产党开火了，共产党方面仍是采取退让与忍耐的态度，在三月十三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还是采取友谊的态度来对待蒋介石，在陈独秀右倾错误领导之下的共产党真是太不敏感了。当时在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中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他们是既无军队又无群众，仅仅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不同意蒋介石的胡作非为而已，没有甚么作用。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氏参加政治活动，是在武汉政府时代开始的，在武汉发动党权高于一切的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友仁是个真正的华侨，他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他不过是跟着孙夫人走而已。吴稚晖曾参加过武汉政府的活动，后来事实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在宁汉分裂之初，他把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拉到南京去，主张国共分裂，对瓦解武汉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武汉方面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既是那样软弱，而蒋介石拥兵在南昌尚未取得东南各省的地盘，还不够独树一帜的条件，更以大敌当前，共产党方面还没有作自己的革命事业的打算，只是把国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方面的幻想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经过了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的奔走调停，武汉与南昌方面达到暂时的协调而决定维持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原案，谭延闿才到武汉视事，张静江始终是住在庐山没有到过武汉，这当然是蒋介石拉住武汉政府后腿的一着。在这样双方面貌合神离的情况之下，南昌方面继续在发展反共，武汉方面逐渐地发展了反蒋，而形成了提高党权运动的高潮。

蒋介石发展他的军事独裁的过程中，在广东、江西各省县市抑制工农运动，排挤共产党人是一天厉害一天。广东东江南路各地驻军与民团勾结一起，压迫农民，解散农民自卫队的事件常有所闻；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大部分是共产党人）也通过农民部控告驻军民团到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也用尽一切方法建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严令禁止地方驻军及民团破坏工农运动，国民党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都照办了，但在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影响之下，没有发生任何效果。在党的组织方面，原来规定各省县市党部的负责人员是由党员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出来的，到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的主席，陈果夫任组织部长的时期，他们对各级党部负责人员的任用改变了办法，限制民主，加强了中央的委派权限。他们认为控制得了的省县市，由地方照规定委员的名额加倍选举后再送中央党部圈定，已经是违反了民主的精神了；对于有些省县市，他们认为控制不了的，即由中央党部委派党务特派员，干脆就不用选举，而在圈定的过程中，又尽量地排斥跨党的人士，这就造成了地方党部很多的纠纷。这样的不公平的人事制度，共产党与进步的人士，谁也忍耐不下去。到一九二七年一、二月之间，蒋介石引用反革命、反共产党、反三民主义的人物愈来愈多，最著名的陈炯明的走狗吴倚沧在广东东江主持党务，一向同情国家主义派反对三民主义的段锡朋以纯粹国民党员的面貌出现，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圈定为江西省党部的委员，负江西省党部的实际责任。后来段锡朋在江西组织 AB 团，专以反共为职业，在各县市进行暗中破坏与公开屠杀的事件，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就在此时被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要倪弼等人，在赣州县公署公开杀害的。事件的造成当然是蒋介石放纵指使的，AB 团的破坏活动，也是蒋介石阴谋诡计之一环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蒋介石反革命的狰狞面貌毕露了，共产党人由下而上地发出打倒新军阀，提高

党权的呼声，震动了遐迩，接着反映到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全国各地，形成了全面的普遍的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运动。

党权高于一切的运动，是共产党人与革命的工农群众提出来的，也就是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出来的。蒋介石是把党和政府置于总司令部的控制之下，党权运动就是发扬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遗教，把党提到最高领导的地位，以党治政、以党治军。这一运动，是随着北伐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蒋介石到武汉，武汉市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的口号是："欢迎张主席"、"欢迎谭主席"、"欢迎蒋总司令"，这样的排列，也是经过了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具有党权高于一切的精神，并不是偶然的。孙文主义学会为了投蒋介石之所好，特制一幅大标语，挂在长街与三佛阁之间，大书："欢迎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被游行群众撕下来。当时闹了一个不小不大的纠纷，这就是革命群众对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的一种革命教育，也就是党权运动的具体表现，因此引起蒋介石对武汉、对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怀恨入骨。从此以后，武汉的党权高于一切的运动，一天高似一天，蒋介石势力范围以内的反共活动，也是一天加紧一天。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罢免蒋介石本兼各职，国共联合战线虽在武汉政府的名义之下加强了，而实际是分裂的开始，而且分裂的情况是逐渐地扩大。

党权高于一切的运动，是革命民众的要求，领导这一运动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左派，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在实际运动中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人出面来领导这个运动，才能名正言顺；当时国民党的人物：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傀儡，谭延闿是个两面派，其余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抬得出来作为继承孙中山之后而实行他的遗教的，在当时算来算去只有汪精卫还比较有点虚声，他又是国民政府的主席，

所以就拿出汪精卫来与蒋介石作一个斗争的对象。汪精卫自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被迫到法国以养病为名，其实他并没有甚么病，国民党内的所有负责的人，几乎把他忘记了。汪精卫那一次出国，是同国共联合战线有关联的，他也看出蒋介石与共产党总有一天是要翻脸的，他为了一时的利害也引共产党为同调，因此他到法国以后常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也常涉及如何巩固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一九二七年初，党权运动初起，陈独秀欲以汪制蒋，就当时的形势而论，如仍以国共联合战线的老路来反蒋，汪精卫是有可能作为一个反蒋的工具，所以共产党就在全国各地发动促请汪精卫复职的运动；一时党权运动，汪精卫复职运动，反蒋运动，汇成一体的三面，一呼百诺，声势浩大。蒋介石在举国上下的压力下，也不得不电请汪精卫回国消假视事，汪精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由法国回来，于四月一日到达上海。他先同陈独秀会谈了两次，于四月四日电武汉政府，请示工作方针，中间也同蒋介石见过一面，于四月五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

一九二七年初夏，轰动一时的所谓汪陈联合宣言，是针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而发的。汪精卫的回国，是因为共产党的支持才实现的，所以他初踏上国土，还是想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国共联合战线的政策而恢复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也估计到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斗争究竟鹿死谁手，还在不可知之数，所以他在上海还是同蒋介石见了面。汪精卫问蒋介石“如何打算”，蒋介石说：“干到底。”（即是反共到底）汪精卫站在第三者的地位说：“留一点余地吧！”蒋介石毫无表情。汪精卫把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也同陈独秀说过了，才坚定了陈独秀反蒋的决心。汪、陈二人在联合反蒋的默契之下，即先后由上海乘船赴武汉。汪精卫于四月十日到达武汉，武汉党政军及革命群众举行过好几次盛大的欢迎会。我参加过两次欢迎汪精卫的大会：一次是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参加的人员

是党政军各机关的负责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全体官佐和学生；一次是在武昌阅马厂，参加这次大会的约十余万人，武汉三镇的学校工厂及机关团体市民。这两次欢迎大会，都是邓演达主持的。阅马厂的欢迎会中更加热烈，吴德峰此时任武昌公安局长，他站在主席台的前侧方，拿着播音筒，指挥会场，维持秩序，他当时是一个活泼的青年，现在已成“吴老”了。汪精卫在每次欢迎会上，都作了长达二小时以上的讲演，对蒋介石的丑恶行为，骂得鲜血淋漓，唯妙唯肖，博得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他的主张和词锋不仅是同共产党一致，而且比共产党还要“左”，他的讲演词共产党党报——《向导》周刊择要发表出来，可以想见汪精卫的政治态度了。倒是邓演达在人前是沉默，在人后是忧虑，我们当时没有想到他要出走，也是太天真了。当时局外的谣言说汪精卫、宋庆龄、邓演达都加入共产党了，共产党方面也认为我们党权运动相当的成功。四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讨蒋大会，反蒋运动，达到了高潮。我们认为共产党同蒋介石的斗争，会得到胜利，国民党的左派已有了重心，左派的人物如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何香凝、徐季龙、顾孟余、孙科、宋子文、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谭延闿、朱霁青等，军事将领有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蔡廷锴、鲁涤平等，把冯玉祥也算在左派将领中。我们当时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战线的实力与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的实力对比，至少是旗鼓相当，武汉方面还有合法的中央政府与广大的革命工农群众，我们大可以发动讨伐蒋介石而得到胜利。

革命的民众，倒是发动组织起来了，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各省的农民运动，已经同地主豪绅阶级面对面地斗争起来，但是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没有发现，造成了国共两党新的分裂。在当时革命的工农群众是在共产党的发动组织之下搞起来的，国民党的左派始终是躲在共产党的后面，没有同工农群众见面，因此

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就必须经过共产党的地方到中央，才由共产党中央转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样就使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国民政府脱了节。群众运动中不可能没有问题，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变成了共产党的包袱，而不容易得到联合战线的支持。国民党的左派，本来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居多数，是由共产党的启发领导而形成的，他们的先天带来了他们的两面性，如果我们当时在工作中细致一点，周到一点，把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拉到革命群众中予以适当的联络和锻炼，即不能做到国民党与群众打成一片，也可能在思想感情上达到实际的联合。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关于农民运动几乎是成为共产党的单干，国民党中央的工农组织机构很少过问。邓演达兼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他仅仅是挂一个名，他以搞军事工作为主，没有过问农民运动，共产党方面也没有争取他去搞农民运动，使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发生一个漏洞，而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第二次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谭延闿、朱培德是同蒋介石藕断丝连的，武汉政府方面固然没有作任何防备谭、朱投蒋的活动，共产党人对谭、朱也没有提高警惕，到长沙马日事变之后，他们就跑到南京投到蒋介石的怀抱。宋子文、孙科不久也步了谭、朱的后尘。邓演达约在六月十日左右出走，武汉政府不仅是陷于孤立，而且形成七零八落的局面。湖南许克祥等的叛乱，在唐生智的阴阳怪气要弄花枪的情形之下，得不到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顾孟余、徐季龙、王乐平、陈公博等受了白色恐怖的威胁，坐在屋里天天咒骂共产党与农民运动，武汉政府形成了瓦解之局，讨伐蒋介石的运动，也变成了空话。

国民党同共产党从一九二三年正式建立联合战线。一九二四年一月间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吸收了共产党新的血液，发挥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创造了新的局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选出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参加国民党的最高的领导工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副部长。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人真是推心置腹，不分彼此，所以对整党建军以至统一广东，共产党人的贡献甚大。一九二五年夏，讨伐杨、刘之后，成立国民政府，一切率由旧章，林祖涵、谭平山为国民政府委员，革命政府的形势蒸蒸日上。第二次东征胜利归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蒋介石狼狈为奸，由猜疑共产党逐渐发展为反共的阴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冬春之交，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国共之间常有摩擦，因共产党一贯对国民党抱定退让政策，尚可相安无事。迨三月二十事变发生，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反共阴谋逐渐发展。五月十五日以蒋介石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即形成共产党为在野党的形势，仍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名义上虽然还是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实际上蒋介石处处猜疑共产党排挤共产党，矛盾百出，联合战线几乎是徒托空言。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局势已成，武汉政府非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不可，到三月二十三日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之下，在武汉举行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一面罢免蒋介石的本兼各职，一面决议请共产党人仍参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任务，以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劳工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长。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战线的新部署，而脆弱的国民党左派，经不起考验，在四、五、六、七月之间，政治上的形势逐渐恶化，继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叛变之后又发生五月中旬夏斗寅的叛变，长沙马日事变，河南冯玉祥投蒋，邓演达出走，许多所谓国民党左派已经原形毕露，至七月中旬，共产党不得不宣布退出国民政府，退出国民党，退出武汉，国民党的左派即随着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而真正瓦解了。

蒋介石叛变以后

四月十二日之变

蒋介石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开始背叛革命，至北伐军克复南昌以后，即肆无忌惮地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工农运动。他以反共为南北妥协的条件，以放弃联俄为同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妥协的条件，全国各种反动政治集团如政学系、研究系、国家主义派、联治派与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代表在南昌非常活跃，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双料走狗王正廷、黄郛成为蒋介石的贵宾。蒋介石为了讨好一切反革命的派系，在三月七日南昌总理联合纪念周上讲话，提出他要制裁共产党。三月三十日枪毙《经济侵略下的中国》著者漆树棻为镇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讯号，作为讨好帝国主义的见面礼。蒋介石的阴谋是早已开始暴露出来了，共产党人在当时还没有甚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及时提高警惕，作适当的准备，以至铸成大错。

蒋介石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决心，从三月二十事变一直到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已经证明是急转直下无可挽救的局面，何以又拖了差不多一年才同共产党翻脸呢？共产党迁就他是一个原因，因为他同共产党人共事多年，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一个力量，他也想拖住一些共产党人不放。一九二六年九、十月之交，蒋介石第一次进攻南昌吃了一个败仗，他所用的主力嫡系王柏龄统率的第一师全军覆灭，王柏龄逃了，党代表缪斌也逃

了。这个师是三月二十事变之后整训出来的，上、中、下各级干部是清一色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为骨干的所谓纯粹国民党员，他感觉到同是一个作战部队，到了没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时，就这样不堪一击了。大敌当前，他为了利用共产党人的战斗力量，才把他的反共计划延缓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第二次进攻南昌是调集二军、六军、七军为前驱。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六军党代表是林伯渠，第七军顾问是马迈也夫，这三个军的各级干部都配备了政工人员督战和维持军风纪。这些政工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在行军同驻防时维持军风纪，朝气蓬勃，颇得民心；在火线上英勇善战，所向无前，官兵一体，士气旺盛。在这一次的会战，才打下了南昌，消灭了孙传芳在江西方面的主力，俘获军师长唐福山、张凤岐、蒋镇臣等高级将领，振作了蒋介石的军威、瓦解了北洋军队的士气。接着安徽北洋军队陈调元、白宝山等投了降，浙江方面的北洋军队夏超、陈仪、周凤岐等也相继投降，东南半壁已成传檄而定之势。上海即在北伐军的包围中了。但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直鲁军毕庶澄、李宝章等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作困兽犹斗之势。蒋介石是采取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针，国民党右派张继、吴稚晖、邹鲁、居正等又奔走于蒋介石与毕庶澄、李宝章之间，蒋介石欲以反共为条件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平进入上海。他一面派杨杏佛同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当局打交道，派张继等同李宝章、毕庶澄打交道，派杨虎用青洪帮的班底组织特务处，从事破坏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工会、进步人士的阴谋活动。他对青帮头子黄金荣递门生帖子，对杜月笙、张啸林认同门兄弟，他想利用上海的一切恶劣势力来对付共产党，求得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谅解进入上海。在他们蝇营狗苟的时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上海各工会、各人民团体行动起来，于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市总工会下令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工人的政治要求，响应北伐军。在工人与军警的搏斗中，十八日夜晚上海总工会作出总同盟罢工的决定，发布总同盟罢工的命令。

白色恐怖的气氛，弥漫了上海，工人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冒险犯难，进行夺取军警武装来武装自己，斗争惨烈，工人的死伤更重。二十二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士兵，鉴于上海军警野蛮屠杀工人，同情工人的反抗，未得长官命令，向军警开炮为工人助战。虽然事出海军士兵的自发运动，没有展开工人与海军联合斗争的局面，但这几声炮响，惊动了敌军，有草木皆兵之感，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有的敌军士兵在巷战中放下了武器，在这次战斗中工人夺获与收获敌军步枪三千余枝，机关枪数十架，这就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来源与组织的开始。在战斗的过程中，虽然是工人占优势，但是工人只有组织的训练，没有长期作战的训练，战争拖长了，工人所需要的粮秣与弹药都成问题。总同盟罢工运动虽然逐日有发展，因为准备不够充实，死伤日有增加，工人与北伐军联系不上，而敌军有强大的帝国主义作后援，不是短时期可以取得战果，至二十四日迫于形势，总工会自动宣布复工。

上海总工会并提出政治口号如下：（1）打倒李宝章！（2）驱逐直鲁军！（3）响应北伐军！（4）拥护国民政府！（5）群众暴动，夺取武装！（6）杀反动派！（7）为死者复仇！（8）建立市民代表政府！（9）撤退外国兵！收回租界！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二月二十四日发出《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二十五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于二月二十日发出《共产党告上海市民书》，提出十一项政治纲领。上海工人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军阀而外，并提出“武装的要求”和“政权的要求”。共产党方面虽然同蒋介石的分歧很大，总以为他不过是一

个野心很大、权利欲望很高的人，至少在北伐战争中他不敢也不能背叛革命。当时的局势，北伐军总是革命的军队，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从里面打出去，北伐军从外面打进来，杀一个里应外合，对北伐战争总是有利的。当时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言论行动有指责，而还是以同志待他和他所统率的军队。在蒋介石徘徊江浙、按兵不敢进入上海的关头，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又起，发起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斗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于三月二十日又开始同直鲁军进行武装斗争，血战两昼夜，才把盘踞上海的直鲁军根本消灭。在血战的过程当中，工人纠察队发挥了无比的英勇战斗精神，掌握了全市水电及交通运输各机构。工人阶级的威力，不仅是压倒了直鲁军，即停泊在黄浦江上约九十余艘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各国租界中约二万余人的武装军警都为之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地叫道："工人疯狂了！"工人纠察队及革命民众占领上海以后，总工会一面派代表欢迎北伐军，一面组织市民政府委员会，选举的委员有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未到职）、钮永建（辞职后改选北伐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王晓籁、林钧、侯绍裘、郑毓秀（辞职后补选叶惠钧）、谢福生（辞职后补选赵南公）、陈光甫（辞职后补选孙科）、王汉良、李泊之（上海总工会）、何洛（学生）、丁晓先、陆文韶（大学教授）、王景云（工人）、顾顺章（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后来叛变了）、杨杏佛（孙传芳委任的淞沪市政督办，蒋介石委任的国民党政治分会的委员）。这一次的市政委员会的选举虽然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之下选出来的，但是是完全照顾联合战线的精神，国民党的人数在一半以上，共产党的人数不及半数，这证明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尊重的，对群众是大公无私的，对北伐战争，贡献了力量。但是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共产党的血战功劳，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情，反而招致蒋介石的嫉妒。蒋介石进驻龙华以后，大骂共产党收回租界的主张，大骂工人纠察队的战

斗行动，他用以杨虎为首的特务收买流氓、地痞、工贼，组织各种各样的假人民团体，如以工贼童理璋、卢士英、郭寄生、袁正道等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以醒狮派组织的“新青年会”、“学生代表会”，以特务及青洪帮组织的“上海工界统一委员会”，以及“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等所谓人民团体与国民党的上海政治分会，都是由蒋介石口袋里拿出来的反共工具。当时共产党鉴于形势的险恶及反革命势力的阴谋活动，乃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及《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政治局势已到了紧急的关头，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反蒋，并且是坚决反蒋，已于三月二十三由武汉政府明令罢免蒋介石。蒋介石尤其是坚决反共，他背叛革命的部署既定，于四月十二日宣布“清党”。共产党的反蒋是政治宣传的多，实际行动的少，即武汉政府的讨伐会，也是徒托空言；而蒋介石的反共，却是实际行动，血腥的镇压。在江西、广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及上海市，实行屠杀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屠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上海方面于四月十二日上午，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人员，在法租界会同法国捕房，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及路过上海的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捕获，送龙华未经审讯，秘密枪决；同时派出流氓工贼配合刘峙的第二师、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分向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又派陈群、潘宜之、罗家伦、吴倚沧等，率领特务及军队多人，向西门林荫路上海特别市党部进行包围，欲作一网打尽之计。他们叫嚣着一定要杀尽共产党员，指名捉拿王守谦、朱义权、史鹏展、余泽鹏、杨贤江等。一时白色恐怖涨漫了上海。租界与华界在镇压共产党的关系上是打成一片，各国巡捕房包探可以越界捉人，蒋介石的特务可以自由出入租界逮捕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四月十三日，闸北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屠杀工人与市民，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游行

群众一百六十四人，伤千余人。工人纠察队被二十六军包围缴械，颇有伤亡，其余在各马路、各旅馆、各住宅中捕杀的革命民众与和平居民不计其数。这样的白色恐怖，延长了很久的时间，共产党方面的牺牲很大。约在五月中旬前后，蒋介石的特务破获了上海山阴路恒丰里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机关，捕去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陈延年、许白昊等多人。据传闻捕捉陈延年是蒋介石的特务处长杨虎亲自带队围捕，陈延年鉴于形势危急，知不可免，奋力拒捕，与特务发生格斗，以众寡不敌，陈延年的头被打破了，牙齿被打掉了，伤势甚重被俘。当时在上海有几个没有甚么政治关系的北大同学，以陈延年与吴稚晖有师生之谊，又是世交，为急救人命的关系，联名写信给吴稚晖，请他作保送陈延年到医院治疗，再设法营救，这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吴稚晖接着这一封信，即写了一封复信，在国民党右派的报上发表出来，大意是说：象陈延年这样的一个人，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到医院是多事，既然已经打伤了，倒不如杀了省事。吴稚晖是这样轻松愉快地投蒋介石之所好，赞扬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陈延年是壮烈地牺牲了，一时北大同学与吴稚晖的朋友都责骂他，都说吴稚晖是人面狗心！每逢在谈话中提到吴稚晖都以"吴老狗"代之而不名，这个称呼一直到终国民党之世，凡是正义的人士都没有忘记吴稚晖的这个徽号："吴老狗"。

安体诚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四月十二日之变，好容易由广州逃出，路过上海，在旅馆中以形迹可疑被捕，由法国巡捕房送龙华，未经审讯，执行枪决。

四月十二日之变，在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之内，各省市的白色恐怖都是一样的，而屠杀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除上海而外，以广州为最甚。据事后所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于四月十五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黄埔学生被捕者数

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军官学校政治教官萧楚女患肺病，正在东山医院养病，被军警提出挂在汽车后面拖死。李森（即李启汉）于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榨粉街被捕。因李森在全国总工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负重要责任，敌人对李森威迫利诱，希望由李森得到更多的线索，缉捕更多的共产党人与工会重要负责同志，李森不为所动，后不知何时将李森枪决了。

蒋介石这一背叛革命的阴谋，与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是有联系的。上海四月十二日之变，先由各帝国主义连同中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一千五百万元为蒋介石解决工人纠察队之奖金，此项巨款蒋介石得一千二百万元，白崇禧得一百五十万元，周凤岐等得一百万元，其余五十万元是杨虎、陈群、潘宜之等分了一大部分，雇用青洪帮流氓地痞搞特务活动用去了一小部分，蒋介石之下流，可想而知了。

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市民为提高党权运动，游行示威，与蒋介石一脉相通的吕超、向育仁、刘湘等军阀政客发动军警，屠杀游行示威的群众，当场打死四百余人，伤千余人，长江上游的白色恐怖，已先东南各省发动了。

北京为红胡子张作霖所盘踞，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同蒋介石勾通一气，是日英帝国主义者居中牵线的。张作霖于四月六日在北京以重兵包围苏俄大使馆，实行驱逐苏俄大使加拉罕、搜捕共产党人李大钊、范鸿劼等人，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警察厅执行绞刑。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是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的主使，是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的作用，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战线中之一员，他是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利益，扮演一个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刽子手的角色。

中国革命的危机，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东西南北都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武汉政府领导之下的两湖，还在进行提高党权运动，

湘粤各军正在进行第二次北伐的中原会师战斗中，驻防鄂西的夏斗寅突然叛变，革命的形势就更紧张起来了。

夏斗寅叛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北伐军在中原的战事很吃紧，武汉政府统率之下的军队如唐生智、张发奎、蔡廷锴各部，都在河南与奉军主力张学良部沿京汉铁路作战，邓演达在河南督战，很久没有回来。约在五月十五或是十六的晚上，邓演达回来了，他派一个副官拿一封信要我马上到他家里去商量一件事。我正在家里闲得发慌，也想知道河南作战的情况，我即马上动身。

我们见面之后，邓演达好象是心思很沉重地对我说："河南的战事，快要告一段落，我们同奉军张学良部血战了十几天，现在已到开封城下。仗是我们打胜了，可是我们的损失很重，叶挺一师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蒋先云团长阵亡，真可惜，他是第三次受伤才死的。他第一次受伤，叶挺接着报告就要他退下来休养，他不肯。他是打最前线的正面，他发誓要活捉张学良，全团官兵在他鼓励之下，非常激动，他们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之下，勇往无前。第二次受伤，他没有报告。最后，在开封城外的飞机场上战斗，如果张学良不跨上飞机逃跑的话，真可能活捉住了张学良，可是张学良逃了。他统率的一团官兵，大部分战死，他就壮烈地牺牲了！"我得到这个战报是悲喜交集，为蒋先云之死，我几乎要哭出来！他还只有二十五岁。他在出发河南作战以前来看我，他为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的问题，表示忧虑。他因为以前在蒋介石那里做秘书工作，没有达到党对他的要求，同志们对他不了解，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在当时他同我有同病相怜之感！他同我握别时说："带兵打仗比做政治

工作简单些，也痛快些，如果有机会战死沙场，尽了我的责任，倒落得一个干净痛快！”他的战死，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我当时想到这里，很久说不出话来。邓演达接着又说：“我找你来有一个紧急的任务，这件事我早在意料之中，现在是发作了。你最近同夏斗寅方面通消息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昨天的情报，川军杨森部已于本月五日进驻宜昌。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你想他们想干甚么？现在武汉算是一个空城，河南的部队，一时还不能撤回来，如果夏斗寅叛变了，他同杨森合力东下，直捣武汉，那是一个甚么局面？现在我是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要你去说服夏斗寅，如果他能暂驻荆沙，效忠党国的话，他这个队伍将来可以扩充成军。”我答应说：“我可以冒险去一趟，不过如果他的反旗扯起来了的话，要说服他就比较难，夏斗寅最怕唐生智，唐生智没有办法吗？”他说：“唐孟潇还在河南，他也没有甚么高明的办法。老实说：从前我们对夏斗寅投了一批资本，你是中间人，如果你不离开十四师，就不会有问题。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出了这个乱子。现在的局势，我们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我们不难为他，你去不会有危险。”我问：“我是以私人名义去吗？”他说：“不，你以私人的名义去，他不仅不听你的话，而且会裹胁你一路走。你要作政府的代表，用谭主席的名义（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给他去一个电报，要他把他的要求和困难同你当面商量，这样你才好说话。”我同意了，他即派招商局的江天轮船为独立十四师送给养，我就乘这只船西上。

约在十七或是十八日下午四五点钟，由汉口起碇，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到达嘉鱼。江边停着几只小火轮及几十只民船，还有一只汽船，江边的轮船同江天轮交换了信号，江天轮即在江中抛锚，一会儿有一只小火轮同几只民船靠拢了江天，先上来一个不认识的军官问张笃伦来了没有？事后了解独立十四师谣传张笃伦

奉唐生智之命来接任夏斗寅的师长。接着又上来几个认识的军官和士兵，一个熟识的少校副官对我说："我们的队伍已经下来了，师长知道党代表要来，特派周崇新副官长在这里等候，请您先下船再说吧！"我只好同他们下船，我带着四个武装卫士，一个译电员，同我一路下了江天，坐小划子到江边停泊的汽船旁边。他们要我上那只汽船，周崇新在汽船顶上同我打招呼，面色却是很冷淡。我从汽船下层到了上层，站在我经过的两旁持短枪的卫兵，表示很紧张的样子，有的卫兵拿着麻绳，好象是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我走上了船顶舱房，周崇新迎接出来，他们算是没有难为我，我听到后面一声吵闹，我想这一定是缴我的卫士的枪。周崇新拿出夏斗寅等昨天发出的通电给我看，并说："昨天任建若来，他是代表湖北省党部，他同师长话不投机就吵起来，当时大家动了公愤，把他枪毙了。您本来是我们的党代表，这次又是代表谭主席来的，所以师长要我们在这里接你，并保护你。为了免除误会与我们保护您周到，请你把你携带的武器暂交包处长（夏斗寅的军需处长，是我的本家叔辈）暂为保管，你同师长见面之后再行奉还。"我已落到他们的手里了，还有甚么话好说呢？我就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请你同夏师长通个电话，我有要事同他面谈。"他们即将我和我的随从送到嘉鱼县政府。虽然是优待，我们已失去自由了。嘉鱼县长是夏斗寅派的，是个黄冈的老军人，辛亥革命时当过旅长，他的名字叫夏占魁。我同他谈了几次，也算是话不投机。原十四师政治部职员还有十余人关在嘉鱼县监狱里，他们听说我去了，在监狱里闹起来，夏占魁不识时务，竟对他们打官腔要严办。我就对夏占魁说："你以为这个局面算定了吗？将来是和尚在还是木鱼在很成问题，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小偷儿搓鸡毛，你把他们关监干甚么？你把他们同我一样看待好了。"他说："我有责任。"我说："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是我用的人，我负责任还不成吗？"他推到要请示后再说，

一定不肯释放他们。好在夏占魁是个光杆，县政府新用的人员都是十四师的差遣和服务员，我都认识，他们对我也莫测高深，无形中就把政治部的人员改为优待。我在嘉鱼县政府住了三天，还没有得到夏斗寅的消息。

到了第四天，夏斗寅派人来要我到蒲圻县会见，一大早县政府为我雇了一乘轿子，我仍带着四个徒手卫士到蒲圻，我带到嘉鱼的一个译电员在我被扣的第二天即派他化装回武汉报信去了。当天下午约四五点钟的时候到蒲圻县，夏斗寅同我见面就说："我们在汀泗桥同第四军打了一仗，我们只反对唐生智，我们不同第四军打，你来了好，你给我向谭主席、邓主任作保证，只要我脱离唐生智的节制指挥，我们仍可回师去打杨森，甚么处分我都愿意受。"我说："事情是你搞坏了，现在政府正要用人的时候，只要你服从命令，回驻宜沙原防，你自请处分，政府也会原谅你，我来时邓主任保证你这个部队可以扩充成军。"他当时点头称谢。我为了使他安心，即当着他草拟一个电稿，报告谭组庵、邓择生，说明夏斗寅的态度，并请政府军停止追击(这是夏斗寅请求加的一句)。我当时追问我的自卫枪枝，他当时骂了副官长一顿，限令立即发还，我请他写条谕给夏占魁释放政治部的全体人员，他也照办了。事后我才知道：我被扣在嘉鱼时，夏斗寅召集全师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如何对待我的问题。参谋长叶蓬，副官长李希伯主张枪毙我，作为投降蒋介石的见面礼！夏斗寅颇为所动。团长万耀煌、张森、佘式谷等坚决反对，我才得到平安。任建若与夏斗寅在辛亥革命时同营当兵，他俩曾拜把结为异姓兄弟，他也下了毒手，可见夏斗寅之毒辣了。我从蒲圻动身时已经夕阳西下了，走了一个通宵至次晨拂晓才到嘉鱼县政府，我把夏占魁叫起来，把夏斗寅的条谕给他，他才将政治部的全部人员释放出来。我们步行到江边，雇了一只民船回武汉。我们上船的地方，就是任建若被杀的地方。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李书渠说：

“任建若被杀与我们被捕是同时的，我们亲眼看着他们开枪打死任建若。如果你是同任建若同时到嘉鱼，他们正在疯狂的时候，恐怕你也不免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好险！”我当时也有点毛骨悚然！

当天的黄昏时候，我们的船到金口上游约十余里之处，遇见第八军警卫团在江北岸布防，我上岸同他们交换了情报，他们派了一只汽船送我到汉口，约在夜晚九点钟左右到岸。我先到总政治部办事处，知道邓演达又出发到河南去了。郭沫若此时已升了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他请我吃了饭之后，同我到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那里，会谈我同夏斗寅见面的情况和蒲圻嘉鱼一带的敌情。郭沫若说：“夏斗寅要你打电报给谭主席是缓兵之计，他们全部已经向崇阳通城方面逃窜，他不敢回来，他请求改编是假的，他们可能逃向长江下游投降蒋介石去了。”我们谈到十一点半钟才回总政治部办事处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保康里我们党中央办事处汇报情况，见着张国焘，他开口就以讽刺的语调对我说：“武汉的情报说你同任建若都被夏斗寅枪毙了，阅马厂给你开追悼会了，夏松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夏斗寅对你总算是讲交情的啊。”我当即答复他说：“难道说我冒了一次险回来了，没有死也是错误吗？”他说：“你今天没有错，以前是错了，夏斗寅毕竟是反了。”我说：“我如果没有离开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反了，我就应该枪毙。此时的军事是瞬息万变，我离开它已经一个半月了，夏斗寅叛变是谁的责任？应该追查一下。”我们抬了半天杠，才谈上游的敌情与邓演达争取夏斗寅的计划。他毫无表情，我们的谈话算是毫无结果，我即过江回家了。过了几天，张太雷约我谈话，他此时是湖北省党委会的书记，地点在啸楼巷二号一栋古老的房子里，他对我宣布中央对我的处分：留党察看两年。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当时我迫于事实，不得不接受这个处分，我的内心是不服气的，我也估量我没有方法争论，没有力量翻

案，当时是张国焘占统治地位，我始终反对张国焘小组织，我搞他不过，我只好忍受。政治局势是一天坏一天，革命的危机是一触即发。党仍然要我参加活动分子会议，我们的那一个小组是由李民治当组长，开会的地方在胭脂山上的一个教堂里，我们那一组的组成人员有吴德峰、高一涵、章伯钧、李合林及我。在小组会议上也从来没有讨论甚么重大的问题，我非常苦闷！

对夏斗寅的处分：最后是照唐生智的建议处理，将夏斗寅免职查办，通缉归案法办。独立十四师改编为两个独立混成旅，以万耀煌、张森分任混成旅长，唐生智是用分散的方法来收拾这个部队，没有得到丝毫的效果。夏斗寅率部由崇通出武穴渡江，经过黄梅到安徽的宿松、太湖一带休息整理，接受了蒋介石所委任的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唐生智控制夏斗寅的计划完全落了空。过了十余日，邓演达由河南回来，还找我谈收编夏斗寅部队的问题，章伯钧在坐，他仍然谈他的旧调，要给我一个名义，到安徽太湖去把夏斗寅拉回来。我答应说：“我为了搞这个部队几乎开除党籍和丢了性命，我是一个弱者，我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邓演达很愤慨地说：“这个局面就是靠四军、八军这个老班底支持得了吗？南京方面一天一天地扩张，我们却一天一天地缩小，我不知道你们天天呐喊的联合战线是怎么样搞的。”他此时悲观失望的情绪，常常流露在同我们私人谈话之间。紧接着夏斗寅叛变的当中，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动摇。

马日事变

长沙马日事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过火的借口之下，爆发起来的。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范

围很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出头发难的是唐生智部下的识字不多、其貌不扬、从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象武大郎似的团长许克祥。许克祥所用的军师，也就是这一次事变的灵魂，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与蒋介石勾结到底的、声名狼藉的几个政客：萧翼鲲、彭国钧等。以这样的几个人出头露面发动起来的马日事变，使武汉政府束手无策，唐生智也好象是毫无办法似的。这一次事变的规模似乎是比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小得多，但是它在革命的高潮中起的反革命的作用确实很大，它破坏了两湖的农民运动，摧毁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瓦解了武汉政府，其中的奥妙我们在当时也是莫测高深。很奇怪的是一个其蠢如牛的许克祥和几个无聊的政客闹出了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这个局面虽是反革命联合战线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力量，何以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中央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第三国际代表团都没有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拿出镇压反革命的有效办法，任敌人坐大，造成了革命的危机？

事实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长沙方面，因为夏斗寅叛变，粤汉铁路被叛军截断，湘鄂交通一时阻塞，唐生智留守长沙部队许克祥等制造谣言，甚至说武汉已为夏斗寅叛军所占领，唐生智下落不明，许克祥出面宣布长沙戒严。当夜，长沙工会纠察队因为不知道戒严的口令，被许克祥部队捕获，当时长沙的军队少，工农团体人多，也有相当的武器，许克祥还没有甚么把握，次晨又将被捕的工会纠察队释放。许克祥、萧翼鲲、彭国钧等为了制造事件，多方造谣，他们自己秘密贴出“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许克祥属三十五军）。散布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即将袭击驻军的空气，借此煽动军心，为搞政变创造条件。当事变初起，交通邮电机关都为许克祥等所窃踞，武汉方面只接到许克祥等单方面的情报，都在谣言蛊惑之下，认为这是农民运动过火，工农

武装与驻军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不是，决定派员前往调查处理。正在武汉政府犹疑不决的时间内，许克祥借口农民运动过火，工会侵犯革命军人的家属等谎言，发动政变，突于二十一日深夜围攻长沙总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以武力压迫工农解除武装，封闭长沙总工会及省农民协会，劫夺民食维持会采购米粮的款项，驱逐不受胁从的省政府委员，抄查省政府委员的住宅，解散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仇鳌、萧翼鲲、彭国钧等组织同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一模一样的所谓"清党委员会"和"救党委员会"，提出"肃清暴徒"、"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并同张作霖在北京一样的做法：派军队查抄长沙苏俄领事馆，同时封闭学校，屠杀工农及学生，凡属剪了巴髻和辫子的青年妇女，一律格杀无论。这显然是以枪炮轰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叛变的情形比蒋介石还明目张胆，反动的程度比张作霖还有过无不及，叛乱的局势已经很显然，叛乱的部队也不过一团兵力，也没有甚么强有力的外援，武汉到长沙，水陆交通非常便利，调兵遣将并无困难，如果武汉政府不受内奸的胁持，还有一点革命的诚意，剪除叛乱，并非难事。唐生智此时是统率三军上十个师的前敌总指挥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许克祥是他小得可怜的部下，唐生智有权、有责、有力平定这个叛乱，但是唐生智阴死阳活，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采取行动，让叛乱的局势扩大。唐生智如果同许克祥没有一点默契，许克祥敢这样干吗？在那样紧急的关头，武汉政府拖了好几天才决定派第八军副军长周斓为长沙事变的调查调解专员，难道说长沙事变武汉政府真还有不明白的奥妙吗？对反革命的姑息，就是对革命的罪过，结果是许克祥挡驾，不准周斓去长沙，唐生智张弓不放箭地对许克祥发了一个电令说："长沙军队，立刻停止一切行动，发还工农的枪械，宣传三大政策。"但是许克祥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是愈干愈凶。在我们共产党方面是如何对待这一事变呢？最初是乱哄哄地说长道短，徒托

空言，没有采取甚么行动，一直拖到六月四日，距马日事变已经半个月了，才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方式，提出解决长沙事变的意见。其主要的内容如下：(一) 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的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民众共同推翻之。(二) 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 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 取消叛徒窃踞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 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自由。(六) 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这些办法还是停留在宣传命令过程中，是如何脆弱！又是如何缓不济急，不切合实际啊！

武汉政府上层分子离心离德，形成了武汉政府的软弱无能。从三月二十三日罢免蒋介石一直发展到讨蒋运动的高潮，始终是采取张弓不放箭的办法，宣传超过了事实，行动落后于客观形势，就一切变成空话了。中原会师，冯玉祥只带着极少的卫队到郑州，开封郑州之间大多为武汉政府所属的主力四、八各军，蒋介石已与武汉政府对立，他敢于轻车简从到郑州同冯玉祥会面，同冯阎拜把结为异姓兄弟，这是蒋介石的逆焰压倒了武汉政府的革命锋芒，他视武汉政府如无物。如果武汉政府有汉贼不两立的正气，命令四、八各军将蒋介石扣留起来，事实上并不是不可能，但是武汉政府的当局没有这样做，连说都没有这样说，恐怕想都没有人这样想，因此讨蒋运动就形成了徒托空言，这就注定了武汉政府的末路。武汉政府反而把革命民众的正当要求，指责为过火。徐季龙、顾孟余等逢人便骂工农运动，这些情况，唐生智是完全知道的。尤其是唐生智的父亲是湖南的大地主、大士绅、大恶霸，他到处宣传唐生智是石达开转劫的，他期许唐生智即不能称帝也要为王，在湖南农民运动初期，曾被东安县的农民协会的农民捉住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唐生智出面讨情，才以革命军将领的家属关系从宽处理释放

出来。唐生智表面上没有发作，骨子里他们父子对农民运动是恨入骨髓了。许克祥的发难，如果没有唐生智的支持，他敢这样肆无忌惮吗？唐生智挂着反蒋的招牌，利用武汉政府作为扩大他个人势力的工具来与蒋介石争雄长。他的部下用蒋介石的反叛形式"清党"来实行反俄、反共、反工农政策，他熟视无睹似的，这就说明他是别有用心的。当时的局势唐生智凭借武汉政府的优越条件，以能胜蒋介石为上策；与蒋介石打个平手平分春色为中策；即令搞蒋介石不过，还留一个投降蒋介石的后门。所以他纵容许克祥等运用蒋介石叛变的法宝——"清党"，为以后投降蒋介石下一注脚。武汉政府对唐生智非常重视，共产党对他也估计过高，把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将领来对待，是一个错误。明明知道当时唐生智有权有力，可能派兵剿除长沙的叛乱，还要作出掩耳盗铃的姿态请国民政府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剿办长沙的叛乱，这真不知从何说起。长沙从马日事变起一直到六月初旬，在长沙及长沙附近各县，被许克祥等屠杀的共产党人，工、农、学生、妇女达二万余人，共产党不由正面揭穿敌人的狰狞面貌，不明白指责唐生智、李品仙、何键、刘兴等纵容许克祥、萧翼鲲、彭国钧等公然叛乱的罪恶，不及时武装自己对抗敌人，枝枝节节，徒托空言，坐令敌势蔓延，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真是书生误国所造成的大革命时代的悲剧，使中国革命事业多走了二十余年的艰苦的弯曲的道路，长沙马日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是在毛泽东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以二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得到成功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也算是盖棺论定，受到了应得的批判，革命先烈与革命民众的血没有白流，但是长沙马日事变的主凶还健在人间，没有受到应得的膺惩。许克祥从唐生智失败之后，即投降蒋介石，当过师长、军长、总指挥，成为蒋介石的宠将。十年内战中，他同工农红军打过多次的恶仗。

在中日战争中，他的军队打光了，蒋介石对他也冷淡了，他才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当寓公。一九四九年我流亡在澳门，时常在中央饭店的赌场里遇见他，他还是那样獐头鼠目，精神饱满，听说他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他的财产不仅是民膏民脂，而且是革命先烈与革命民众的头颅与鲜血所做成的，此贼不归案法办，何以安马日事变所屠杀的两万多先烈的家属之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悬案。

长沙马日事变，是豪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抬头，是中国革命由高潮走入低潮的转折点。宁汉对立的局势，蒋介石得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支持，声势浩大，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动摇人心。长沙事变，使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的新旧军阀与土豪劣绅联成一气，造成普遍的白色恐怖的气氛，革命的工农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总起来说：蒋介石的叛变，是由于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支持，长沙马日事变，是执行蒋介石反俄、反共、反工农的反革命计划，唐生智、何键、刘兴、李品仙、叶祺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长沙事变的背景。武汉政府对长沙事变低头，就等于投降了蒋介石，从此以后事实上就没有甚么国民党的左派，国共联合战线在长沙事变以后就根本瓦解了。

邓演达出走

长沙马日事变以后，武汉国民政府即由动摇而到崩溃了。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相继托故离开武汉：谭延闿是以到庐山避暑为名，溜到南京去了；朱培德是江西省政府的主席，程潜的第六军驻扎在九江，他两人以回防的名义离开武汉投降了蒋介石。武汉政

府的军事力量只有粤军系统的四军、十一军，湘军系统的八军、三十五军、三十六军，此外还有贺龙统率的新编二十军。在夏斗寅叛变以后，邓演达新编了两个湖北省警卫团，第一团是曹振武（当时是共产党员）收编京山一带的土匪、民团搞起来的；第二团以孔庚任团长，以汉阳兵工厂的剩余枪枝杂凑起来的，人枪都不够数，官兵的素质都很差。从这一事实证明，邓演达还想干下去。当时一般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很多，如共产党与工农群众是拥护三大政策、积极讨蒋的，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上层人物，是离心离德，徘徊歧路。徐季龙、顾孟余、孙科等非常动摇，仇视工农运动，咒骂共产党，已经反映出来他们要逃跑或者投降蒋介石的情绪。汪精卫戴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面具，实际上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露出了狐狸尾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应声虫，陈友仁连中国话都不会说，都没有甚么作用。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只有邓演达是始终走国共合作的路线，真正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对共产党人不猜疑不疏远，但是共产党方面没有好好地去接近他，掌握他，从思想方面去武装他。当时共产党确实是忽视了邓演达的重要性，甚至重视唐生智而不重视邓演达，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失策。如果共产党同邓演达结合成一个坚定的同盟，由他掌握四军、十一军的实力，再加上新编二十军及我们领导的工农群众，对唐生智叛变的部属许克祥等给以有力的打击，我想汪精卫等还会跟着我们向左转，革命的局势，武汉政府的前途，还有可为。长沙马日事变中，唐生智及湖南军队的高级将领只能阳奉阴违地变戏法，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共反工农运动，是因为对邓演达及他所控制的四军、十一军有所顾虑。这一点很重要，当时共产党人没有看出来，没有掌握时机把革命的危机扭转过来，反而把讨伐叛逆的重任叫国民政府国民党交给马日事变发纵指使的唐生智，这似乎是有意识地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这是如何荒唐可笑啊！邓演达在武汉政府始终是

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人，他始终是总政治部主任。最初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的职权，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行营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他又兼常务委员仍负军事上的责任，又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常务委员，负实际责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都占很重要的地位。他所领导的除了上述的各部以外，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装学生及驻在南湖的学兵团共约五六千人，这是新型的部队，在讨伐夏斗寅的战役中已改编为新编第一师，以侯连瀛任师长，这算是邓演达的直属部队，一直到邓演达出走以后，武汉政府瓦解前解散了。这个学校原来是蒋介石自兼校长，自三月二十三日武汉政府罢免蒋介石本兼各职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委员制，校务委员很多，而以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以恽代英经常驻校负实际责任，是邓演达提出来的。恽代英不免书生气重，对人处事是小手小脚，与邓演达大刀阔斧的作风刚刚相反，所以他同恽代英共事中也有些不愉快。有一次他同我谈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制问题，他说："一个军事学校应该采用校长制，为甚么不教恽代英当校长呢？因为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军事，所以不能当校长。"他固然表示很信任恽代英，也流露出来他不满意恽代英。同样的共产党方面为甚么不主张校长制，不推举邓演达为校长呢？这就说明他能尽量地团结我们，我们没有尽可能地去团结他，他常常讽刺我们是书呆子，是不为无因的。总政治部三个科长是郭冠杰、章伯钧、李合林，郭冠杰管总务，章伯钧管组织，李合林管宣传。章、李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他两人在邓演达身边没有起到甚么作用。章伯钧是在柏林留学时结识邓演达的，他俩人见面多半是谈男女风情的问题，很少谈正事。李合林同他见面多半是说笑话。共产党没有交甚么任务给章伯钧和李合林，我们在一个小组，从来没有谈到对邓演达的工作如何做法的问题，这说明我们的党

对邓演达在武汉政府的重要性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因此共产党没有同他团结好，我们没有把他运用好，没有掌握他的思想情况，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所以革命到了危机的关头，邓演达发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约在六月十五日前后，我们才发现邓演达失踪了。我所知道的，他在出走以前，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约在六月初旬，他派他的表弟叶子英(当时任中央军政学校管理处长)送他的夫人回广东。他的夫人是个乡村妇女，很老实，不漂亮，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很淡漠，我倒疑心他是另有打算，没有想到他是准备出走而安排她。他失踪了很久，他的朋友和他的部属都是讳莫如深，总说他到河南去了。事后才知道他的出走，是在冯玉祥叛变之前，他同总政治部的苏俄顾问铁罗尼结伴，没有带随从，穿的是便服，由京汉铁路到郑州转陇海铁路，路过潼关，遇着一个黄埔学生同他行礼打招呼，他坐的是三等车，熟人看了很惊异，他答礼后对那个学生说："我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秘密出巡，我的行踪请保守秘密。"他由西安经过甘肃到新疆才去苏俄。他这一行动，可能得到第三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不然铁罗尼不会同他走，如果没有苏俄沿途照顾，他也不可能通过那样辽远而艰险的路程而到苏俄。他当时的思想，是反对国共分裂，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动，而仍然抓着国民党不放手。他赞成共产党革命的联合战线，而不同意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他还是主张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同时还是一个私有制度的拥护者，因此他只能走国共合作的路线，或者是中间路线，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现成的中间路线可走，他想依靠苏俄，实现他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中间路线，所以出亡苏俄。当时的事实是蒋介石完全叛变了，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有名无实，唐生智的狐狸尾巴早已流露出来，冯玉祥的叛变也是时间问题，国共联合战线已濒于瓦解的前夕，他是一个军人，他对人处事很机警，所以他就争取在冯玉祥还没有翻脸之前，由河南

到西北出亡苏联。事后有人说："邓演达出走，是先得到冯玉祥的同意，冯玉祥派兵把他护送出境的。"这种传说是完全不可靠的。如果冯玉祥知道邓演达经过河南出走，他一定会把邓演达扣留起来送给蒋介石，这是不难理解的。

邓演达到了苏俄，他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然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他在苏俄停留不久，就到柏林去了，他才开始同国内外一些搞中间路线的人士搞在一起，开始作第三党（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到一九二九年他才回国，在上海进行建立第三党的活动。

武汉政府，失去了一个邓演达，就是倒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在军事方面就不能掌握四军、十一军，四军、十一军没有邓演达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发挥甚么作用，而军事上的一切只有听从唐生智摆布。在政治方面，再没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让反动派抬头，只有让国共分家。在社会方面，国民党人没有哪一个比邓演达得人心，能联系群众。自邓演达出走以后，他的职务大部分由陈公博继任，陈公博一切惟汪精卫的马首是瞻，不发生任何作用。到了七月初旬，武汉政府反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空气一天浓厚一天，国民政府并下令限制工农运动，共产党迫于事势，才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宣布共产党人退出国民政府，国共联合战线真正破裂了。

武汉政府虽然是同共产党分了家，还是保持宁汉对立的局面，湘、鄂、赣各省农村里豪绅地主抬头，农民工人的组织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根本瓦解，更以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合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经济枯竭，恶性的通货膨涨，金库券无限制地发行，形同废纸，人民非常困苦，社会极度不安，最后粤军南归，汪精卫等鉴于大势已去，一走了事，唐生智的孤军已无能为力了。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发动程潜、李宗仁各部西征，唐生智所部各军无斗志，到兵临

城下时何键、李品仙等怂恿唐生智的宠将张国威等出头请唐生智下野，借便以投降而保存一部分实力。唐生智非常震怒，象发了疯的狮子似的，亲自动手扼杀张国威后上外国兵船托外国人保护，出走到上海做寓公去了。武汉为桂系军阀所割据，加紧了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这就是李宗仁的猛将胡宗铎、陶钧实行镇压共产党，屠杀工、农、学生、妇女的口号。武汉政府时代的湖北省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也在共产党的名义之下被胡、陶枪杀在汉口江汉关前。

革命与反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国共联合战线的运动从一九二一年秋开始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破灭。在这一次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们受了很多的挫折，也得到很多的经验教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惟利是图，不认识真理，这是普遍地在历史事实面前得到证明。孙中山死了，他是盖棺论定的好人。除了孙中山以外，许多国民党的人物，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人物，都是为了攘夺政权，扩张势力而进行联俄联共，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没有人民，也没有国家和民族。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同国民党联合起来与敌人苦战恶斗，同生死共患难到六七年之久。到了最后国民党对我们没有一点道义的交情，没有一点人情的气味，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在国共合作之初，蒋介石是一无所有的。由于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才能在黄埔建军。由于共产党人在黄埔建军以及国民党的组织活动中起了骨干作用，才把国民革命的事业，国民党党军的建设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在两三年中统一广东，巩固了革命政权，才能出师北伐。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顾孟余等所亲见亲闻的。共产党与革命的工农群众苦战恶斗的革命果实，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据为私有，作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的本钱而抛弃了苏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唐生智也是一样，在广东出师北伐之初，唐生智不过残破不全的一个师，在北伐战争中得到苏俄和共产党的帮助，才得到发展与壮大，成为武汉政府的支柱。他因为有了一点政治本

钱，就与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而背叛了革命。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胡汉民、汪精卫、顾孟余、徐谦、孙科、吴稚晖、陈公博等，分别做了蒋介石和唐生智的攀龙附凤之辈，就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也不过是蒋介石的许褚、张辽之徒。大小军人政客安于依附反动的军事势力，都不过是为了便利私图，攘夺权利，谁也不为国家民族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打算。他们不仅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革命，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没有它自己的革命。共产党在这样的经验教训之下，就不得不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武力去打倒反革命的武力，而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上的使命。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前后，中国共产党作退出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的部署。在动员撤退之前，我们在武昌啸楼巷二号湖北省党委会所在地举行了最后一次活动分子大会。在武汉的工作同志除陈独秀以外，差不多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国焘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周恩来此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长，作了撤退部署的报告，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当时江西主席朱培德，他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此时任第三军教导团长并兼南昌公安局长，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一方面，共产党还有些潜在力量。其次，共产党领导下有数达千万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各县，湖南广东及江西虽然已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只要有革命势力可依靠，那些广大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是不会向白色恐怖低头的，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领导湘、粤、赣的农民运动，较为有利。再其次是江西为鱼米之乡，对南京、武汉成鼎立之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比较容易与大城市的工人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这就是当时决定在南昌起义的主要原因。七月下旬，共产党中央在武汉的负责同志都离开了武汉，分赴全国各地。在军事方面负责的同志和一向

做军事工作的同志都奉命集中南昌待命。我是在武汉奉周恩来的命令到江西参加江西省党委会军事部工作。过九江时，叶挺的部队还在九江，我到他的司令部同叶挺及他的参谋长张同志见了面，取得联系即到南昌。江西省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是陈潭秋，军事部长是汪泽楷，我们在匆忙中见了一面，还没有谈工作，周恩来到了南昌，我去看他，谈工作问题，他对我说："现在要办一个前敌日报，你负责筹备，将来你就担任前敌日报总编辑，你不参加江西地方的工作了。"我当时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准备买一部油印机和白报纸。当时的情况是一天紧一天，人手也不够，这个报没有筹备好，我患疟疾病倒了，经过周恩来的同意我暂时潜伏在南昌。南昌起义的部署，在撤退武汉以前即有初步决定，共产党中央决定推定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等五人组织临时政治局，并以周恩来为南昌方面前敌委员会书记，筹划南昌起义。七月二十七日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在南昌正式组成，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叶挺所部第二方面军二十四师全部，二十五师周士第的一团，贺龙所部的新编二十军两师，后将江西、湖北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编为新编二十军第三师，以周逸群为师长，朱德统率的军官教导团之一部，总共起义部队约三万余人，参加起义主要人物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挺、贺龙、周士第、聂荣臻、恽代英、廖乾五、吴玉章、谭平山、张国焘、林伯渠、叶剑英等，还有国民党方面的江西省政府民政所长姜济寰，教育所长萧秉章。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原以讨蒋为名，率师东下，集中九江；叶挺、周士第等到了九江，奉共产党命到南昌集中，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继叶挺之后开到南昌。

周恩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设在南昌城内莲花塘一个中学校内，叶挺的部队也驻扎一部分在这里，七月二十七日夜前委与江西省党委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仍以国民

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政治面貌出现，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内外反动派”、“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等口号，从二十八日起即进行部署战斗。在南昌的朱培德及程潜各部军队，总共不过六千余人。三十一日夜九时起宣布戒严，口令是“河山统一”，至午夜一时开始战斗，在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王均的南昌卫戍司令部及省政府一带作了三个多钟点的激烈战斗，即将全部敌军消灭，结束了战斗，南昌市完全由革命军掌握。八月一日上午九时，革命委员会在江西省政府宣告成立，推选朱德、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林祖涵、吴玉章、李立三、恽代英、郭沫若、徐特立、张曙时、邓演达、彭泽民等二十五人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并推选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邓演达等七人为主席团。

革命委员会虽然宣告成立了，但革命的基础还不巩固，革命的方向和步骤随着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军事情况在发展变化中。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与统一战线的革命委员会经过了几天的观察和研究，决定放弃南昌，向广东方面发展。八月五日革命委员会仍沿用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以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统率三个军都是用旧番号，贺龙仍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十一军军长，朱德兼任第九军副军长，此外还有政治保卫处的一个团，参谋团的两个警卫营，总共十六个团，四个独立营。八月五日动员南征，六日所有机关部队全部撤离南昌，南昌就变成了一座空城。不久张发奎、蔡廷锴都以追赶叶挺、贺龙为名，经过南昌，取道赣南回广东老家去了，沿途对于共产党人，工、农、学生、妇女的追害与屠杀不可数计。最后是朱培德的第三军由九江开回南昌，执行蒋介石在上海一样的白色恐怖。南昌市组织六十个检查组，每组十二人，配备军警与暗探挨户检查，惊天动地，鸡犬不宁，共产党人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与进步的学生、妇女，被迫害牺牲者不计其数，即善良的居民从不问政治者，在新旧军阀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氓地痞

勾结之下，捏词陷害而被屠杀的亦不知多少。

革命军于八月六日从南昌东郊会师出发，经赣东的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等县，长驱一千三四百里到瑞金休息，即与蒋介石留守广东的钱大钧部队激战十余回合，将钱大钧部击溃，由赣入闽直趋汀州、上杭。革命影响迅速扩大，闽西的连城、宁化、清流、永定、龙岩、武平、汀州、上杭等县一带的农民运动又起。九月十八日革命军由闽入粤，沿韩江直下三河坝，在阍隍击溃了广西军黄旭初部，声势大震，潮阳、普宁、汕头等地的工农军都纷纷起来响应。九月二十三日攻克潮安，二十四日进入汕头，革命军即作进军广州的准备。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朱德率所部警戒三河坝至潮汕一线。周逸群的第三师卫戍潮汕。贺龙、叶挺两同志率所部由揭阳出发，向丰顺进军。

但是反革命集团同帝国主义联合向革命军包围攻击，在革命军进军潮汕时，两广反革命军队已从四面八方涌来。革命军占领潮汕后，与反革命军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地发生激战，革命军没有后方接济，敌军有强大的新旧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继续不断的增援，中外兵舰联合向汕头猛攻，革命军迫于形势，于九月三十日放弃汕头，集中全力到汤坑御敌，终因众寡悬殊，革命军战败了。

革命军主力在潮汕战败，其中一部在潮州揭阳间突破敌人的包围，冲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军会合。十月三十日在彭湃领导下，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海陆丰暴动。革命军与农民自卫军里应外合，先后击破了反革命的保安队和地主豪绅的武装，十一月一日占领了海丰，不久又占领了陆丰、碣石、捷胜等地，十一月七日在海丰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工农政府。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成为以后华南根据地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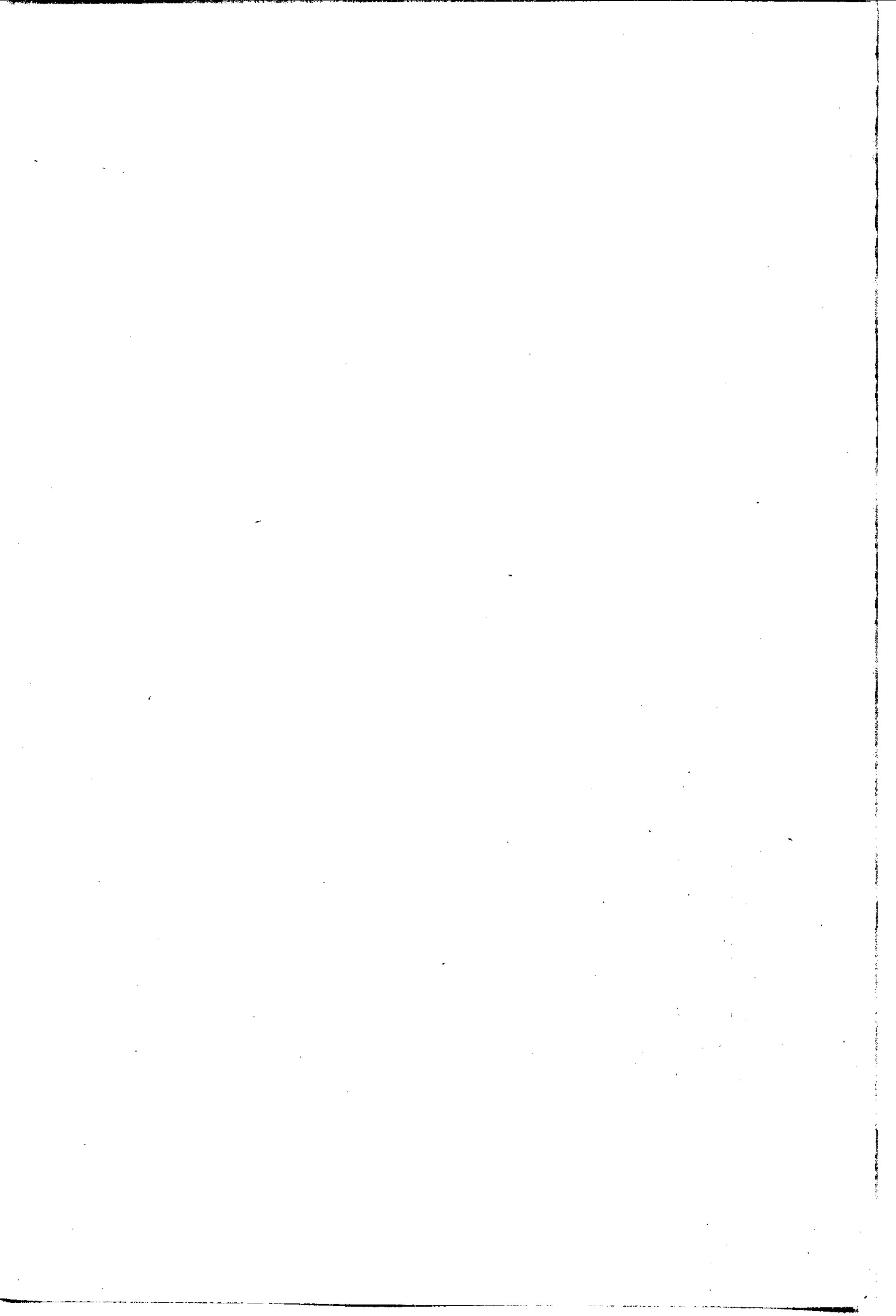
另一部分革命军由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从三河坝退入福建武平一带打游击。部队经过整编后，转入江西，经过寻邬于十月下旬到达崇义县上堡圩，十一月间由崇义经过大庾、南雄、始兴等地到广东曲江。

朱德为了扩大与增强革命力量，在进入广东后，沿途分派干部深入粤北、湘南发动农民运动，派特务营范卓在广东仁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三团。但是这支部队，遭到反革命方面多次围击，经过了一个多月才赶到郴州与朱德会合。

从曲江转移到犁铺头后，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主席联系。毛主席是于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湖南浏阳、平江两县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后，由平江出发，经修水、铜鼓、沙田、相木、芦溪、永新、宁冈等地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达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声震遐迩。故朱德准备同毛主席会合借图大举。一面向湘南发展，在武阳司坳击败了许克祥的反革命军，占领了广东的坪石、湖南的宜章，革命影响迅速扩大，湘南十多县的农民运动进一步的展开。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进入郴州后，直接领导湘南各县举行年关暴动，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五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朱德率领所部和宜章永兴等五县的农民军共一万多人，向井冈山前进。四月间到达资兴彭公庙时，毛主席也从井冈山率部在酃县、沔渡、下馆一带击败反革命的“挨户团”，来到彭公庙与朱德相会，于是井冈山区原有部队、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革命军以及湘南农民，便纷纷向宁冈汇集，在井冈山大会师。五月初在井冈山的砻市，举行了会师大会，这一历史性的会师，奠定了十年内战中红军的基础，为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光辉的前途。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于北京



人 物 回 忆

回忆李大钊

一九二二年初夏，我在武汉区工作，有一天，接到我们党中央的电报，要我立刻到北京找李大钊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我到了北京，先到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宿舍对面一所民房里，会见了范鸿劼、邓中夏两位同志；这里就是北京区委会的工作地点。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到北京来，就招待我住在这里。当天晚饭后，邓中夏陪我到西城后闸胡同三十五号李大钊的家里同他会见。北京人的大门照例是关着的，会人要敲门打户，通名问姓以后才能进去。李大钊同志的大门却只是虚掩着，因为他既没有用一个专门看门的人，来来去去的人又很多，从习惯上养成了他那对任何人不关门的作风，据说他家里倒也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他住的是一栋矮小的四合院，北屋是他的卧室，南屋是他的书房，西屋是他的客厅兼饭厅，东屋是他的储藏室。院子里面并没有花草，屋子里面也没有什么陈设，就是连比较象样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想象到李大钊同志的生活作风是多么朴素。

我这一回到北京，是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先约好了时间去的。我们进了大门就一直到他的书房，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外国的都有。从他藏书的丰富，可以理解到他对追求学问是如何地肯下功夫。据说他无论怎样忙，每天回家总要抽两

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等了一下，李大钊就来了。他的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八字浓密的胡须，象漆一般黑。穿一件爱国布深灰色的长夹袍，脚步很沉重，说话的声音很低。他走进书房，一面同我们亲切地握手，一面关心地问我："是今天早晨到的吗？住在哪里？好住吗？"

我答复了他的问话以后，他接着又说："你把京汉铁路南段的工作展开了，我们很高兴；中央为了你们在工作上的方便，由我设法把你们五个同志安置在交通部；职务虽然很小，可是很自由，对工作上很方便。"

他说到这里，在他的写字台的抽屉内拿出一个交通部的委任状交给我说："你明天就去办理到差的手续，把几个主管的人联系好了，他们就会发给你一切证件和免费乘车证，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往返在京汉铁路上；在武汉方面的工作任务也没有妨碍。不过你必须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好同各方面密切联系，使工作顺利开展。你的工作面很宽，接触的人很复杂，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

我看了委任状，又听了他的这一席话，真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从哪里做起。我从来没有进过衙门，也没有同那些大人先生们打过交道。我虽然是个阅世较深的人，但是这一次是走的一条陌生的路，这使我感到为难。我还没有想到应该向他说什么，李大钊已经看出了我的思想活动情况，他接着说："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革命。第一，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第二，我们从这些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会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对人处事的方

法，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党人要从实际生活中去认识世界，然后才能从实际斗争中去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老在学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够的；第三，高定庵（即当时的交通总长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几个有为的青年给他帮忙。原来说定你们五个人都给他当秘书，在总长室或者在秘书厅工作。我想我们的同志都是不曾当过官的，作秘书工作不在行；而且坐在衙门里面不方便。我建议他把你们五个人放下去分派在京汉、京浦、京奉、京绥、正太这五条铁路上，先做调查工作研究改进方法。你们要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同时对他交给你们的任务，也要适当地作出建议，可能在半年以内你们还要调部工作。”

李大钊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便不敢再向困难的方面设想了。

我们又谈到一九二一年他到洛阳同吴佩孚见面及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与“劳动立法”的问题，他笑着说：“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幻想。去年我到洛阳同他会谈一次，他发出了那样一个通电，就算不虚此行了。”

我们谈到十点半，他并没有倦容。我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还叮嘱说：“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时我们再商量，我们可以经常联系，我每天夜晚多半在家。”

我们五个人在交通部工作了十一个月，到八月间我们又被调到育才科当视学。到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爆发，交通总长高定庵去职，吴毓麟继任，我以“煽动工潮”的嫌疑，与其他几人同时被撤职查办。吴毓麟想要定我们的罪，李大钊托他在日本求学时的同学、那时的交通部育才科长黄统从中说话，证明在“二七”罢工期间我们天天到部办公，并没有参加罢工活动的迹象，这样才得免予查

究。我们在交通部工作的十一个月当中，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铁路上，在各路各段各厂都建立了工作据点。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对交通部，对铁路管理局，对厂长，对员司的冲突事件，大小不下十余次，我们都因为李大钊与当时的上层人物有联系，掩护了我们，减少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的职工运动在铁路工人方面得到了迅速与普遍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春我在北京区工作，与李大钊接触较多。因为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他经常参加区党委的会议。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较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也没有因为他自己见多识广就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他常对我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进行组织工人，发动群众；沙皇的统治比中国军阀的统治残酷得多，俄国的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如果我们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失败以后，工人中死伤百余人，被捕的数十人，失业的二百多人，善后救济工作是极繁难极复杂的。我们虽然向各国兄弟党募了一点捐，为京汉铁路的失业工人组织了一个济难会，但是这个组织还不健全，对救济款也没有检查监督，以至南段张连光，北段张德惠卷款潜逃，造成了一时的混乱。我们有些同志互相责难，有些工人也因为误会而有意见，造成了工作上不少的困难。有一天，区党委会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想研究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李大钊说："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比较短，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工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大批的钱，尤其在失业以后，有的人就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张德惠、张连光这种行为固然很恶劣，但是这不能说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种表现。我

们如果有钱，就替他们背上这个包袱，把这两个工人挽救过来，这是上策；如果没有这一笔钱，就把真实情况向死难工人的家属及失业工人说清楚。最要紧的是应该救济的还是要设法救济。对张德惠和张连光也不要太叫他们难堪，他们还知道一些工人运动中的秘密，如果他们投到敌人那边去了，麻烦就更多了。我们不能用衡量共产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一般的工人。工人运动究竟是一种群众运动，我们想要求群众都同我们一样，是不切合实际的。"

我们当时都是年轻气盛，大部分负责的同志不同意李大钊的看法，都说："守常同志是以慈母之心待人，我们今天是应该执行革命的纪律，要同坏人坏事斗争到底。"

李大钊知道不能说服大家，只是摇头叹息。后来张德惠果然同政客袁正道、郭祖贲等以及黄色工会的头子混在一起做了工贼，专门对我们进行破坏，使我们在工人运动方面增加了很多麻烦，遭到了很大的危害，这时，才使人认识到李大钊同志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同年二月间，鲍罗廷初来北京，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活动。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约集北京区的负责同志讨论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参加这次会的人除李大钊及我而外，还有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七八人。对于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起了激烈的争论。北京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鲍罗廷的意见就完全相反，他说，就中国革命客观形势来看，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条件地统一起来。他根据国际形势与中国历史的现阶段的情况

系统地讲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加入国民党，要我们在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与方式方法上多加研究再向中央提出意见。他整整讲了两个钟头。最后李大钊说："我同意鲍罗廷同志所提出的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的说法，也同意同志们所提出的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的意见。可是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关于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那倒比较容易商量。"

李大钊的意见，鲍罗廷很重视，他一面说，鲍罗廷一面记。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受李大钊这一主张的影响很大。那一天的会议从晚八时起至午夜一时才散。我们同他步行出东交民巷，由东长安街经过西长安街到西单分手，他始终是精神饱满的。

一九二三年九、十月之间，党中央调我到武汉工作，并要我先到上海会商一下再回武汉。中央的信是由李大钊转给我的。当时北京区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经过了一番整顿，刚上轨道，比较好做；武汉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有些同志与京汉铁路工人之间还有些分歧，我有点畏难的思想。我的爱人在唐山扶轮学校教书，因为快分娩已回北京准备进协和医院，

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所以我请求不调动或者是缓调动，中央没有批准，这是第二次来信，要李大钊促我马上南下。李大钊约我到他家里，把中央的信交给我说："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只要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服从党的调度就是服从党的纪律，也就是党性的体现。这些大道理你都知道，也不必我多说。至于你爱人分娩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你不要担心。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我说："我是觉得武汉的工作比较难做。"

李大钊说："现在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困难所以调你去，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人还怕甚么困难不成吗？"说到这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终于答应一二天内就动身南下。我们在分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告诉仲甫和秋白，曹锟的贿选势在必行，我们虽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反对贿选，但是在武力与金钱的势力下，那些议员老爷们的心目中还有甚么民主与正义啊！胡鄂公（当时众议院的议员）要求入党是真的，反对贿选是假的；他这次到上海是名利双收的手法，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他带着微笑，发出叹息的声音，我们分别了。我真没有料想到这一次就是我同大钊的永别。

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我从武汉又转到广州工作，他始终是在北京领导我们的同志和一些革命群众同恶势力作斗争，经过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奉直联军与国民军的战争，他始终不懈地为瓦解敌人、发展党、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叛变的前夕，四月六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经过了整整二十天的严刑审讯，李大钊坚贞不屈。到四月二十八日为敌人所绞杀。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还有优秀的共产党人范鸿劼等十九人。

李大钊一生勤于治学，勇于任事，坚贞自立，热忱待人。他是一个才气纵横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好教授；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国共联合战线中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前后，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卓越活动家。他死得太早，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真可痛惜！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第一次见面

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建立了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当时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到武汉讲演，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强斗争。五四运动期间湖北群众曾向督军署、省政府请过愿。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他到武汉后住在文华书院，在文华书院讲演了几次，讲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要自由、平等。

那时我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一年多了，当新闻记者。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作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一九二〇年下

半年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来武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让他来找我。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以后我同他书信来往很多，他每次来信都不长，一、两页，主要是谈工作。我保存着一百多封他的来信，装裱整理成集，封面题《陈仲甫先生遗墨》，并写了前言，文化大革命中我怕招惹是非全都烧了。

到广州找他

我再见到陈独秀是从上海去广州找他。

一九二一年一月我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联留学，在上海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因为没有路费不能成行。这时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已去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离开了上海。上海党组织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没有工作经验。"五一"前李汉俊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李汉俊因工作关系离不开，而我见过陈独秀，又常有书信来往，于是让我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我同意去但是没有路费，此时正巧马哲民（同我一道由武汉到上海来的一个团员）的父亲从福建给他寄来二百元，他拿出十五元给我做路费。五月一日那天，我们的住处被巡捕房抄了（因为我们经常发传单、写文章），新渔阳里不能再住了，这样我就坐船由上海到了广州。我去广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认识《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苏新甫，他是陈独秀的亲戚，我们武汉支部发行过《新青年》，我同他打过交道。陈独秀到广州后苏新甫也将《新青年》发行处搬到了广东，这次我去广州前先和苏新甫打了个招呼，他来信说让我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处，他招待我吃住。一到广州我就去兴昌马路《新青年》发行处找他。

到广州的第二天我见到了陈独秀，他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一见面他很高兴，我对他说李汉俊让你回上海，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陈独秀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

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广州在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上海居中。陈独秀不同意搬到广州来。他让我多住些日子，苏新甫安排我担任几家报馆里的剪报工作，每天剪报，然后用快信寄给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每月给我三十块钱。我还给报社写写稿子，也有收入，生活很不错。这样我在广州住了两个来月。

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他住在离江边不远的看云楼。他不常到教育委员会上班，也不常出去，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写东西，有客人时居多。我同他无话不谈，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上海党的工作，陈独秀说：国际代表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李汉俊可以先在他哥哥家里住住，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并指出不要攻击别人，反对漫骂。

我们还谈了湖北党支部的情况，也谈论学问，做人处世，评论时人。不过他从没有和我谈过张国焘，他知道我与张国焘关系不好。

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月我

们几乎天天见面，他比我大十五岁，我很尊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他说他来广州是陈炯明请他来的，他办了许多学校，办了宣传员养成所（还安排我在宣传员养成所当监学，我没到职）。他让我将来回湖北后也按他的办法去搞。他身体很好，从不休息，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有一天在某个场合有人说"天上有个九头鸟，地下有个湖北佬，……"这是骂湖北人的话。陈独秀听了后说："不见得，包惠僧、刘伯垂就是好人。"

广州组织选派参加党的"一大"代表

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刘尔崧，是个中学生。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七个人。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

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陈公博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住在东亚旅馆，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广州打了个电报，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

从广州回上海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又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和李大钊等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了全国著名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曾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释放后经武汉到了上海。

在建党方面陈独秀也是有功绩的。第三国际几次派代表来中国都是找的陈独秀，把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他。所以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大会还是选举他担任党的书记。"一大"后，马林(第三国际代表)、张国焘(中委)、李达(中委)、周佛海(候补中委)和我开了一次会，讨论请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马林说，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就应尽到责任，要回来担任书记职务，别人代理不行(陈独秀不在，书记职务由周佛海代理，周是日本帝国大学学生，要回日本去上学。张国焘想代理，又说不出口)，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又说，千万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官吏，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会议决定派我去广州接陈独秀。

我到广州时，正值他和广东的学阀们闹得很不愉快。我告诉他上海的情形，他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是答应回上海。他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不同意，后来他就请假同我回上海了。在船上，我问他中国革命怎么革法？他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

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他说他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们多，他有读书的修养，也有办法找到书。

关于第三国际，陈独秀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对于这点陈独秀是反感的。我和陈独秀还谈了武汉党的工作等问题。当时陈独秀年近四十，但精神和言论谈吐同青年人一样。

我们乘的船下午两三点钟到了上海。陈独秀的家住在老渔阳里二号，我住在马霍路马德里三号楼上。我一到上海就派丁竹倩（即丁默邨）去告诉张国焘说，陈独秀回来了。第二天马林和张国焘去看了陈独秀。

第三天我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碰到张太雷同陈独秀谈和马林的关系问题。张太雷（又名春木）到过苏联，从苏联回来后协助马林工作。张太雷的观点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共同的，不仅中国共产党，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等。另外每次开会张国焘都爱当主席，当大家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时，张国焘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定，搞得大家很不愉快。陈独秀同马林反复交谈了三、四次，还是谈不拢。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他让我将来回武汉或是到重庆教书（重庆那时没有党组织），我说听你的意见。

陈独秀被捕

回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杨明斋到陈独秀家里，柯庆施（团员）也去了。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高君曼让我们陪她打牌。我们刚打了两圈，可能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有人拍前门。当时上海一般习惯是出入后门。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因报纸上刊登过陈回到上海的消息）。我说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先生不在家。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我说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这时，周佛海就走了。那几个人边说着话边跨进门里来，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陈独秀家里四处都堆放满了）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们和那几个人谈话中显得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我们五个人（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被捕了。到巡捕房已经四点多钟了。巡捕房问了我们的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报名王坦甫，我报名杨一如，其他人也报了假名字，接着打了指纹，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不久褚辅成（字惠生，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

我们被送进牢房，包打听指着我们对看监的人说，他们都是教育界的名人，对待他们要好一点。晚上监里给我们送来两床被，我们垫一条，盖一条。牢房里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高君曼关在隔壁，彼此可以听见说话声，见不到面。

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问时，法庭上认为我们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后来就将高君曼释放了，其他人仍

回监。在牢中陈独秀对我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我们出去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勉强，叫我还是回武汉去工作。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马林为营救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律师名巴和，是法国人或英国人）、买铺保。陈独秀只关了两天，我们关了五天后也被保释出来，人放出来，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以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

陈独秀打完官司后就辞去了广东的职务。沈雁冰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商量，请陈独秀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名誉编辑。陈独秀说工作可以少做点，钱也少拿点，能过生活就行。沈雁冰同陈独秀谈这事时我也在座。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

陈独秀打完官司后作为合法公民，负起党的书记责任。马林为营救陈独秀等人出了不少力，为此两人的关系逐渐好了。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我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张国焘兼总部主任，南方支部主任是谭平山，北方支部主任是罗章龙。

（赵春濂、高荣光访问整理）

董必武在党的"一大"

董必武原名董用威，湖北省黄安县人（现改名红安县），少有文名。清末张之洞督湖广，在武汉倡办新政，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自强书院（即外文书院），文普通书院，存古学堂，武备学堂等，以富国强兵相号召，著有《劝学篇》，练新兵，在士林中颇有朝气。董必武在文普通学校毕业后，曾在黄州府中学任教，接受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参加了反清斗争的民主主义活动。辛亥革命起义，张之洞在武汉所办的新军拥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响应孙中山、黄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湖广人士作了相应的响应，董必武与有力焉。

清政府厄于大势，一面起用袁世凯，派冯国璋来汉口，黄克强率革命军与北洋军队大战于汉口汉阳之间，即所谓阳夏战役。一面清帝退位，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遂形成南北和议之局。

袁世凯当国，对革命党人明和暗压，局势混乱。董必武与张国恩东渡扶桑，半学习半避难，在日本年余回国，即在武昌与张国恩合伙当律师以自活，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在武昌府院街三号。

一九二〇年秋，鄂城刘伯垂在上海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派刘伯垂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刘伯垂以各种公私关系，分途与昙花林文华书院校工郑凯卿，新闻记者包惠僧，律师张国恩，教员董必武、陈潭秋等共六人，商议在武汉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约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在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也是董必武同志寓所）开

会，我们阅读了刘伯垂由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有关文件。刘伯垂事先同我们分别谈过在武汉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事宜，大家都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公推包惠僧为支部书记。当时的体制：成立了中共武汉支部，同时就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 S.Y.）。在我们宣布成立的一个月之后，又发展了赵子健又名云翃（是学生）加入了党，还有一个当兵的赵子骏是郑凯卿介绍的，赵子健可能是董必武介绍的。

张国恩律师事务很忙，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没有多大信仰，约在十一月间申明退出。

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有坚定的信仰，他虽然搞律师、教员的工作很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虽工作很忙，但是我们每逢召开党的会议，他从没有缺过席，并在会上积极发言。

一九二一年，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我和陈公博分途抵达上海。我到上海仍住霞飞路（渔阳里六号），陈公博与他的新夫人李丽庄住在东亚旅店六楼。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张国焘即要我搬到蒲柏路打铁浜博文女校去住。这是我们开会代表的宿舍，我们开会有少数办后勤的人员也住在这里。接着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也到达，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是同马林先后到达的，东京只有周佛海一个代表。在南湖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们认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当时董必武发了好几次言，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不是军阀。董必武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这样就为国共合作安下一个伏笔。

回忆陈潭秋

陈潭秋，原名澄，字云先，世居湖北黄冈，生于一八九六年，早年即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在新疆与毛泽民、林基路等被盛世才杀害。陈潭秋烈士的革命事迹，书刊已有不少的记载，现将烈士的家世及青壮年时期的活动，就回忆所及和调查所得记述于下。

陈潭秋兄弟姐妹共十人，烈士行七。他在求学时期，鉴于清政之腐败，外侮之日迫，时申愤慨，每以社会革命为己任。辛亥革命时，人有拟投笔从戎者，烈士不以为然，曰："以有用之身，应留待有用之时。此时投笔从戎，成不过为许褚、张辽之徒，败则为蝼蚁耳！"烈士初就读于武昌省立一中，后考取武昌高师英文系，苦学四年。当时湖北学风复古，教育行政权力掌握在两湖书院与经心书院两派的学阀手中，以读经尊孔与程朱陆王的学派各立门户，麻醉青年，如果不能同他们沆瀣一气，就不能在湖北教育界得枝栖之地，因此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的开始。烈士毕业之后，困居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社的斗室中近半年的时间，经常以典当借贷维持生活，但处之泰然，不以为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烈士采访撰写学生运动的稿件，刊载于汉口的《大汉》及《新闻》报上，并亲身参加各校学生罢课示威运动。武高一中等校的学生运动，受烈士之影响甚大。一九二〇年，董必武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校于武昌涵三宫，聘烈士为级任兼英文教员。该校教学设施，得烈士之力独多。同年春夏之交，第三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以后之社会情况，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会商创立中国共

产党。大约在三个月以后成立武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会员二十余人，各学校教职员居多数。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团员十余人，以武汉中学及一师的学生居多数。党组织绝对秘密。一九二一年春，党团工作均由烈士负责。在此约八阅月的时间中，无经费，无计划，烈士则坚持将党团工作继续发展。他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开展了研究苏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吸收进步教员刘子通、黄负生入党。在这期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各学校中都有发展。他还创办《武汉星期评论》，为反抗旧势力，传播新思想，在当时教职员学生中颇有威信。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虽然经常是刘子通、黄负生担任，而一切计划均出于烈士之手。在这同时，尚有《江汉评论》周刊，表面上穿着新文化运动的外衣，骨子里是经心书院系与一师派结合起来的守旧派的刊物。主持该刊的中心人物是刘文清、孟晋奇、蔡存芳等，与《星期评论》完全对立，对刘子通的攻击谩骂无所不至。烈士对《江汉评论》的反动论点，虽予以无情的抨击，对该刊的主编人蔡以忱及其他可与为善的人士则采取说理与团结的方法，终将蔡以忱吸收到《星期评论》这一方面来，不久，并吸收入党。《江汉评论》则由分化而瓦解。大革命运动中蔡以忱在湖北教育界成为一最活跃最有作用的人物。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蔡以忱在武汉壮烈牺牲了。烈士知人善任，运用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至如此。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烈士与董必武为武汉区出席会议的代表。我为广州区出席代表之一。我们在会前会后与烈士商谈甚多，烈士对人诚恳和蔼，对事慎重细致。在会议中，他同每个代表都密切联系。他再三同我说："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在会议中，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

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在讨论党纲时，他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调和的主张。在嘉兴南湖船上讨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宣言时，他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有人问他说："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他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他这样的意见，在今天来说，自然是明白易懂，但是在我们党创立初期，我们的同志都没有政治经验，我们只知道阶级斗争，只知道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没有理解到共产党可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所以烈士的见解，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等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成立分部，设工作部于武昌黄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武汉区党委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在一起办公。烈士是区党委会负责人之一，担任组织工作，武汉教职员的组合，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均由烈士具体领导。湖北省立女师是经心书院系的势力范围，校长王式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究，他把学生的聪明智慧用旧礼教禁锢起来，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各学校旧势力复活的复古倾向。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同志有三个人在该校任教。刘子通教伦理学和心理学。黄负生教国文。烈士教英文。他们三个人把革命的影响带到了女师。通过妇女读书会的关系，他们把最优秀的十二个学生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分别介绍加入了党和青年团。这十二个人把各级各班的进步学生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阵线，对王式玉的家长统治予以迎头痛击，在学校里闹了好几次学潮，轰走

好几个头脑冬烘的教员，王式玉的亲信都在人人自危。他们鉴于学生对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这三个教员的爱戴，与对那些头脑冬烘的教员们的轻视和仇恨，认为学生闹事是这三个教员发动指使的。他们遂决定要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想出解决学潮的办法。有一天，王式玉召集教职员联席会议，他把他如何苦心孤诣地爱护这个学校，如何象严父慈母般的爱护学生，以丑表功的姿态讲了一大套。最后他归结起来说，学潮逐渐扩大，学生横蛮无理地破坏学校的纪律，师道尊严扫地，士风败坏，因而他不得不引咎辞职。他说到这里，他的一班喽罗都叫嚣起来说："校长不能消极，应该积极负责，整顿学风。"他们人多嘴杂，你一言我一语，都把学生的进步要求说成是过激行动。此时黄负生因为患严重的肺病进了医院，只有刘子通和烈士出席了这个会议。刘子通是个性急的人，看见那乌烟瘴气的情形就忍不住站起来说："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合理要求，学校应该多加考虑，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逐步改进，教学的质量如果能够逐步提高，对学生的管理方法能够平情合理，学生就不可能不安心求学了。如果把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用高压手段管理学生，那就如校长所说的真正会酿成学潮了。"刘子通身躯高大，语调激昂，他的话在那个会场中激起了一个浪潮。王式玉的人还未开始说话时，忽然户外轰雷一声呐喊："对呀！"接着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原来是围在窗外听消息的学生，把会场中的情况听的清楚明白，发出了他们正义的呼声。跟着一大群学生涌进了会议室，王式玉见来势不妙，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即抱头鼠窜而去，他的喽罗们也一溜烟地逃散了。

烈士预料这场风波不会就此终止，但是他认识到这是一场新旧思想的斗争，只有站在学生这一方面把斗争坚持下去。果然过了几天，刘子通接到女师解聘的通知，烈士则接到增加钟点的聘约。很明显，他们想轰走刘子通，拉拢陈潭秋。烈士愤慨地说："我

不在乎多教四点钟的英文，甚至我不在女师教书都行。刘子通被无理解聘，我们不能不据理力争。刘子通如果解聘，就是否定了学生的正义要求，就是助长了黑暗统治的气焰，我们不能向反动统治方面屈服。”女师学生为了挽留刘子通，进行了请愿罢课、示威游行，包围校长室，最后王式玉挨了学生一顿打。教育厅请出了督军省长的大令，驱逐刘子通出境，将夏之栩、徐全直、陈比难等开除学籍，王式玉亦以办理无方调职。这次学潮，时间持续了八个月，学生罢课、请愿、游行示威达十余次。我们的同志虽然受了反动统治的摧残，刘子通失业，黄负生气愤病死，夏之栩、徐全直、陈比难等十余人失学，但是我们打垮了经心书院系的一个据点，赶走了王式玉，我们的革命影响，深入到学生和职员中，一直发展到大革命时代，发展了我们的党，使旧势力没落、新势力抬头，烈士的组织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是年轻气盛，一言不合即与人争论，甚至磨拳擦掌。烈士常呼我等为“暴徒”，曾对我说：“急躁易偾事，尤易暴露缺点，失去人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有容人之量。工作今天没有做好，明天再做；话今天没有说通，明天再说。急躁何用！”烈士之个人修养与待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二三年春，“二七”工潮爆发，京汉铁路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是我们党发动组织起来的，指挥部设在江岸，支持罢工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各学校。烈士组织武汉各学校妇女工团声援，武汉各大中学校及工团妇女组织慰问队，每日有数十人至数百人，川流不息地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的罢工。罢工运动虽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而失败，但是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势力，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认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武汉区委机关部——汉口模范区德润里

二十三号——被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查抄封闭，许白昊、刘伯垂两同志被捕，我们因为工作在外得免于难，武汉党务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武汉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我们的负责同志均以通缉在案不得不暂时转调到上海、广州工作。烈士负责办理善后，重建组织，使党团的组织继续发展，工会的地下活动没有中断。从一九二四年夏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区及湖北全省的党务工作，烈士始终为重要负责人之一，党务发展非常普遍，各学校工厂均有党的秘密小组，各县中亦多半发展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荫林（烈士之弟）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主持鄂东农民协会的活动。防武（烈士之兄）任黄冈县委书记兼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烈士任湖北省党委会组织部长。全省农民运动在烈士的组织领导之下得到普遍的发展，为十年内战中建立苏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烈士调江西省党委任组织部长。革命军南征，烈士在南昌、赣州之间主持党的地下活动，对于组织农民，发展党务，颇多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活动，烈士由江西到上海，经常奔走于上海、天津、北京之间，冒险犯难，未尝得一日之安闲。一九三三年初夏，烈士奉党中央之命赴苏区工作，与谢觉哉结伴由上海乘海船到汕头。他们经过大浦，得到地下农民协会的掩护，历尽险阻，夜行昼伏，步行十余日，始到汀州附近。汀州为苏区与白区交界处，敌人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大有长江天堑不可飞渡之势。烈士与谢觉哉是两湖口音，不会说福建土话，再加知识分子无论怎样伪装，总不像一个汀州的农民，因此他们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在行进途中，他们有好几次遇着敌人清查户口，检查行人，形势危急。烈士与谢觉哉被农民隐藏在山顶的石岩下、野草中，或是农民的谷仓里达数日之久。俟敌人清查过后，乘其不备，暗渡陈仓，经过羊肠鸟道，艰难险阻，才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得到我们游

击队的接应，安全到达汀州，然后转到当时的红都瑞金，烈士先任福建省党委会书记，后调任粮食部长（当时称人民粮食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前后，苏维埃政府准备出师长征，派烈士赴苏联向第三国际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遂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九三七年前后，盛世才任新疆军务督办，企图倚靠苏联的声援把新疆造成一个独立的局面。烈士奉命到新疆观察盛世才的情况。盛对烈士虽礼貌有加，但处处流露出为一争权夺利之小人，并无革命的意愿。烈士曾回莫斯科报告在新疆的观感，及盛世才不可靠的情况，未获第三国际重视。未久，烈士奉派再赴新疆任我党驻新疆代表。大约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投蒋反共反苏，执烈士及毛泽民等百余人于狱，终被杀害。烈士一生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力量，贡献了他的生命，真可谓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烈士的音容志节，永为后人所矜式！

烈士在弱冠时与同乡林氏女结婚，伉俪甚笃，期年林氏病死，烈士哭之甚哀，常为文哭于亡妻之墓，发誓不复娶。烈士任教女师时，有某女子锺情于烈士，烈士不为所动。烈士后在工作中与沔阳徐全直发生恋爱，至一九二五年始结婚，生女一，名赤君；子二，长名苹苹，次名国民。徐全直为湖北女师高材生，在湖北教育界的新旧斗争中与妇女运动中，同夏之栩、袁溥之等人起了领导作用。一九二七年，徐全直任湖北省立第七小学校长。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被捕，时国民甫生弥月。全直被捕时，烈士不在上海。国民寄养在同乡潘怡如家，后由全直之妹徐全勇接回湖北交烈士之六兄伟如抚养。赤君与苹苹则由徐全勇抚养。闻现均已成立。全直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传其在伪法庭受审讯时，骂不绝口，行刑之日，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一九七八年八月

回忆建党初期
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

说明：这一篇回忆录是就我个人在当时工作的经历与同项英、陈潭秋、施洋、许白昊诸烈士共事的情况写的。"二七"工潮的经过在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后我在北京《宪报》馆任总编辑时写过一次，主要的材料是就项英的来信和我参加京汉铁路工运的印象写的。在一九二六年我在广州任教导师党代表时，政治部印发了纪念"二七"工潮的小册子也是我写的，此文在一九二七年总政治部编印革命论文选编进去了，署名是一个"僧"字，记载是比较详细。现在事隔三十多年，有一些人和事忘记了，事实虽然大体不错，恐怕难免有些出入，好在《二七工讯》的这本小册子，中宣部还保存着，可以根据核正。还有一些有关的史料在一九五三年我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两文中写过的，就不在这里重复，可以互相对照。

●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我奉党中央之命赴武汉主持党务，并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于武汉，谋展开武汉劳动组合工作。惟当时党的发展在武汉仅及于学生教职员中（其他各地亦不例外），与广大的劳苦群众尚无甚接触，党团员约十余人，完全为学生、教职员，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他失业很久，后在文华书院（是美国教会学校，后改为华中大学）当校工，他对武汉各方面的工人也没有任何联系。我负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回武汉，同志们也认为我

有办法，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东投西摸，仍然是两眼漆黑，还没有找着接近工人、组织工人的门路，真叫我发急到好几夜睡不着觉。黄负生在汉口私立致中中学教书，该校有一个学生孙瑞贤是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工厂的厂长的儿子，我因黄负生的介绍交结了孙瑞贤（后被介绍入党），由孙瑞贤认识了他的父亲孙敬芳，但是孙敬芳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又认识了孙瑞贤的叔叔孙叠芳。他是翻砂匠，是一个正规的产业工人，不过他因为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工匠，也算是工人贵族，还不是受严重压迫的工人，他对于我们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所接受的不多，不过因为这些关系我们在徐家棚设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李书渠（即李伯刚，现任中南政法学院院长）经常住在徐家棚，我是每日或间日去一次。陈荫林（陈潭秋的八弟，在革命军南征时病死瑞金）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这就是我们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开始。

约在同年的十二月间，汉口租界黄包车夫因为反对车行老板加租而爆发了同盟罢工，共约二千多辆黄包车约有五千多名车夫。工人反对车行老板的加租，完全是经济斗争，租界当局尚没有对工人实行压迫。我同郑凯卿参加了这次罢工运动，罢工支持了十余日，由施洋以律师身份出面调停，资方接受了劳方的要求，罢工胜利结束，并由资方赔偿罢工时期的损失，人力车夫在赔偿损失费项下提了一部分钱在大智门附近建筑了人力车夫工会。在这一次的同盟罢工中，出现人力车夫中的领袖人物樊一狗、袁诰成，他两人始终领导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并聘施洋为该工会的法律顾问。

这一次罢工运动刚结束，我接到中央的信说，陇海铁路发生罢工，要我同罗章龙到开封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到开封同罗章龙会面，知道陇海铁路的工潮结束了，我们同几个负责的工人（姓名忘记了）会谈了好几次，策划发起组织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很大方，请我们吃了两次饭，吃了几条黄河鲤鱼，吃了不少的酒。我们

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我们称哥道弟，讲朋友，讲义气，有很浓厚的江湖好汉的气派。我们在开封盘桓了一天半，由他们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们到郑州找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我们有一个同志赵子健在郑州扶轮学校当教员。我们到了郑州，罗章龙回北京，我在郑州住在赵子健的家里，从容地找到凌楚藩等作了几次长谈。他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感兴趣，很同意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决定先组织工人俱乐部，再筹备组织工会，全路各站、各厂分头进行。京汉铁路有三个总段，即长辛店、郑州、江岸（汉口附近的刘家庙），规模很大、工人很多，我当时与赵子健商量了一下，写信给罗章龙把长辛店的组织活动划归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支部负责进行，郑州和江岸的组织活动归长江支部负责，我即拿着凌楚藩的介绍信到江岸去会见杨德甫（湖北人），姜绍基（福建人），黄桂荣（安徽人）。凌楚藩送我上车，并介绍一个加油工人姓田的请他带我去见江岸的几个工人。到了江岸正是黄昏时候，工厂已下工了，我们先到杨德甫家里，由杨德甫找到姜绍基、黄桂荣。他们看了凌楚藩的信，我说明来意，他们都认为很新奇，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大事，要好好商量一下，并约定三天以后（星期日），约几个负责的人到我的家里详谈。我理解到他们要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什么样的团体，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届时我约了李汉俊（他刚从上海来汉口，任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市政督办是汤芗铭）、陈潭秋参加。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除杨德甫、姜绍基、黄桂荣而外，还有林祥谦、张连光、黄子坚、周天元、曾玉良等。我首先介绍了李汉俊、陈潭秋的身份，其次讲了一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宗旨，最后说明劳动组合的理论和方法，李汉俊也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们了解我们都是文教和报界（我当时是新闻记者的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同意我们组织起来的意见。他们说，一切没有困难，只是他们每

日要照时上工，没有人负责联络和各处有关组织工作，要我们介绍一个适当的人办理文书和联络工作。事实上这个工作就是组织工作，我答应介绍一个人，但是当时并没有适当的人。

有一天，我接着一封信，署名项德隆，他自称是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是《劳动周刊》的读者（上海《劳动周刊》在武汉有发行处，地点是武昌察院坡时中书店）。他要同我见面谈谈，我马上复了信，请他于星期日下午一点钟到黄土坡我们的寓所会谈。他那一天身穿一件皂色的长棉袍，头戴一顶棉布的黑色西瓜皮帽，因为天阴，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来不过二十岁左右，这是我到武汉第一次接触到的青年工人。我们坐下来，我首先就问模范大工厂的情况。他说："我想同包先生谈一两个钟头，你忙吗？"我答应可以。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死了很久。我和我的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没有钱不能升学，所以考入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八至九元，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二十岁了，工资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头左右，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之日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希望你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我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谈话与表情，我觉得这个人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的思想，他的说话，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与抱负！我接着安慰了他一番，鼓励了一番，我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是新青年社出版的，如《两个工人谈话》之类，我并请他写

一点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约定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两个半钟点，他走了我很高兴，我想如果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我到徐家棚同李书渠谈起，李书渠说："项德隆我认识，是我小时的同学，很聪明也很调皮，他很穷。他的胞叔项仰之（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他从不和他叔叔往来，常骂他叔叔是个吃人的光棍，他叔叔知道了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你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说要找你谈谈。"因此我对项德隆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于本星期日参加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刚吃完午饭，项德隆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你给我的书都看了，我每天夜晚看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他并和李书渠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的拘谨，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一般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织厂的工人情形，他很直率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我本来从第一次和他会谈以后，我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工作，因为了解他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李书渠的了解和我们两次会谈，我相信他是一个纯洁天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并请他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他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

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说话之间，豪迈之气溢于言表，我对他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过了几天，我同江岸各厂的几个负责的工人谈好了，暂时把项德隆作为是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文书。俱乐部的筹备干事是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张连光管财务、周天元管庶务，因为铁路工人各处都有帮口，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在京汉路的江岸各厂即是福建帮、湖北帮、安徽帮势均力敌的，帮口虽然是我们劳动组合工作中的很大障碍，但在开始组织的时候，还不能不照顾帮口关系，否则就组织不起来，所以这五个筹备人的产生经过了我同他们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的。林祥谦、张连光是福建帮，杨德甫、周天元是湖北帮，黄桂荣、曾玉良是江南帮。当时的情况，调和各帮与用阶级教育来消灭帮口的成见，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把这些情况和项德隆谈透了，要他注意这个问题（帮口）；我们才一路到刘家庙江岸车站与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等见了面，当确定由俱乐部筹备处每月给项德隆十五元的生活费，俱乐部的一切筹备工作几乎是完全交给他了。过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俱乐部的事报告了机务厂的厂长。这个厂长是个法国人，他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因此就把俱乐部的活动作为是一个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就是这样的挂出来了。项德隆与几个负责的工人处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又能说又能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唱戏、讲演各组，并组织了一个工余夜校，项德隆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以小工居多数，产业工人中，工匠（如翻砂匠、打磨匠之类）

是很有地位的，一般人都称为师傅，工资也比较高些；小工是最苦的，工资少，都是做出力的工作，此外还要被工头、工匠呼唤差使，服规定以外的私人劳役，稍微不慎，就要挨打或被开除。所以小工最苦也最没有保障，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和工程师都坐在一起开会或下棋唱戏，无形中把小工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们也经常以阶级的友爱对工匠们作宣传教育，他们对小工的团结也重视起来，而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更因为工余夜校的关系，项德隆在小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日期记不清），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那一天天阴，细雨濛濛，刘家庙差不多是距汉口十五华里的乡下，街道甚窄，泥泞甚深，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很多，全体工人除了出勤的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们并把各厂的厂长都请到了。会场布置得很堂皇富丽，有茶烟、点心招待，并有很名贵的雪茄和名贵的点心。各处来参加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郑州、信阳、驻马店、各站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李汉俊也被邀参加，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我是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约在上午十时宣布开会，由杨德甫主席，报告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及组织俱乐部的意义，主要的内容是提高工人的地位，崇尚正当娱乐、学习文化等。报告完了以后，主席就请他们的洋厂长讲演，这个洋厂长身个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他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讲演，他对于欧洲各国的工人组合，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祝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演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我们发展工人运动有良好的影响。接着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也讲了话，李汉俊讲了“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我是以《劳动周刊》的代表被

主席邀请讲话（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词不很通俗），我讲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并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工人组合活动。因为这是在劳动运动的启蒙时期，照我们的劳动运动的计划是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啊！”的口号。成立会是在厂长、工程师、工匠、小工和谐的状态下举行的，放了很多鞭炮，据项德隆说：在成立会的前一天，全体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来缴会费办理登记的手续。

俱乐部算是很顺利地成立了。次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动组织工会，当时组织工会有两个很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反动政府没有给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工人的组织无论是俱乐部也好，工会也好，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的干涉或解散。所以这一“工人集会的自由”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式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江岸的工人是如此，全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其他如津浦、京奉、京绥、正太、陇海各路的工人也是如此，这一问题如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当时我们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我们公开活动的依据是抓住一九二一年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劳动立法”的小辫子，秘密的进行工会的组织工作。第二个问题我们决定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的冲突。再以“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

项德隆同志在这一工作中，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同各站厂的负责工人和积极分子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发挥了他的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才。他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读书，他的求知欲望很高。我们每星期内要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负责的工人谈话一次，我们每逢见面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是几本什么书，

有些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读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他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是在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当时因为党员的人数还不多，没有分组，一起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的寓内，他对党的报告和每一个同志的发言都入神地听并详细地记录。会后他同我说："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他也没有回家去看他的母亲，一直过江回江岸去了。

德隆的母亲姓夏，也是武昌人，在旧社会中是一个很能干的老太太。他们一向是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德隆在到江岸工作以前是从没有出过门的，他到江岸以后就很少回家，夏老太太很不放心。有一天，她老人家来看我，这是第一次同他老人家见面，她是中等身材，靠近五十岁的样子，穿一身青布褂裤，小脚窄鞋，身体很健康，我请她坐下后，她说："项德隆的父亲死得早，因为穷也没有教他多读书，他的世故浅，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亲戚家门来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他，听他说包先生介绍他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教书，他教得了吗？我很不放心，这几个月以来他很少回家，我也不放心……。"我知道他们是寡母孤儿相依为命，现在的德隆成了出笼的鸟了。他在追求他自己的进步和发展革命事业，不可能把他拖回来专做孝顺母亲的事情，我于是乎安慰了她老人家一番，并说德隆聪明能干，书教得很好，她老人家听了很高兴。谈了一会儿她老人家要走，留她吃饭，她不肯，我送她出门分别时，她还嘱咐我叫项德隆时常回家。过了一两天，我到江岸把上面的

情形告诉项德隆，并劝他时常回去看看母亲，以安老人之心。德隆说："我在家时是我的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还不需要我养她，我出来了，她老人家得省事。我也忙，所以很少回家。"这就是项德隆的个性，他对人处事就是干脆。他对他的母亲是如此，对同志、对同事、对群众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决不因他的母亲要他回家或是我劝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一点余暇，他就是一只手拿一本书，一只手拿一只纸烟，他对纸烟简直有瘾。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门，两只手四个指头都成了烟黄色。他的两道眉毛中间是联起来的，眉毛很浓厚，如果在他考虑问题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双眉一皱就成了一字浓眉，他的头发经常是蓬松零乱，衣服的扣子总不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单，始终是一个工人的本色。他自在京汉铁路工作后，常用化名"夏英"对外通讯或在报上写小品文章，后将化名与本名联合起来为项英。一直到他成仁。

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份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约在同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工人代表有杨德甫、张连光（江岸）、凌楚藩、刘文松（郑州）、王俊、史文彬（长辛店）、张德惠（新乡），其他几个大站厂也有代表参加，我党方面有项德隆、吴汝明（他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作）、张国焘和我，还有林育南、许白昊两同志是以《劳动周刊》的记者列席。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

总工会筹备会各段、各厂的负责人，起草了总工会的会章草案，决定以项德隆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的总干事，杨德甫、刘文松、张德惠、史文彬等为筹备会的正、副主任委员，主要的工作都是项德隆负担，张国焘也没有搞出什么花样。项德隆的工作信誉已经由江岸发展到各段、各站、各厂了。可是从这次会议以后，中央就把我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我离开了武汉，也不要我过问京汉铁路的工作。我同项英、李书渠、陈潭秋还是保持联系。

经过了半年以上的筹备，全京汉路各段各站各厂的工人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决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在郑州。各总段设分会，各站厂都设有分会及工会委员或小组，组织很普遍很严密，并建立了工会纠察制度。会场是布置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一个戏院里（普乐园），在举行成立会的前一日，各处的代表都到达了郑州，都以无比的欢欣来迎接这个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可是到了二月一日的黎明，郑州宣布戒严，会场被军警稽查处封闭了。经过了几次派员向军警负责人黄某交涉，没有结果，至正午十一时，工人非常愤慨，各厂各单位的工人都把工作丢着不做跑到工会来问消息。于是由项英同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奋勇地冲进了会场。有一部分代表随之进入了会场，军警方面马上就开来了两连部队包围会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相持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工人在这样的强力压迫之下，只好退出会场。工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京汉路的总罢工。二月二日正午一时全京汉铁路的总同盟罢工开始，各段各站各厂各处都是协同一致。工人纠察队普遍地组织起来，分途出动，执行罢工的纪律。总工会公事处由郑州迁江岸，因为江岸的工人多，工会组织健全，以项英为中心的工会核心比较巩固。在罢工的过程中，秩序良好，在江岸方面，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声援罢工，每日有学生结队从数十人至数百人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酝酿罢课示威，形成

了声势浩大的有政治意义的罢工运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北京，大总统是黎元洪，他完全是吴佩孚的傀儡。内阁总理是张绍曾，他是军人中的政客，周旋于曹锟、吴佩孚、冯玉祥之间，同奉张也有些联系。政治实权掌握在曹、吴手里，而曹锟只是吴佩孚的老长官，除了直隶省长是他的弟弟曹锐而外没有什么实权。曹锟驻保定，吴佩孚驻洛阳。曹锟的部下如曹锐、吴毓麟师等常发出不平之鸣，即所谓"保洛争权"的政潮，时常发生，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驻在南苑，他有一万多军队，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交通总长原是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同学，这个人倒还不算是很坏的官吏，在京汉铁路工潮爆发时，更换了吴毓麟。参众两院也是当时政府的组成部分，参议院的议长是高凌霨，副议长是张伯烈。众议院的议长是吴景濂，副议长是褚辅成，参众两院虽然常发生倒阁的风潮，不过是军阀的应声虫而已，点缀门面，没有什么作用。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经济力量，也算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钱，他对京汉铁路的重视和他的直属三万亲信军队一样。所以他对京汉铁路的掌握是费了不少的心机。京汉铁路的总罢工，对他是一个政治威胁，也是一个经济损失，他当时的对策最好是把京汉铁路员工一起收买起来作为他的忠实奴才，马上复工，他可以给予员工一些小恩小惠。如果收买不了，他就把京汉铁路全体员工认为是他的敌人，尽量地屠杀。所以在二月三、四、五、六日当中，京汉铁路总局的局长赵继贤（一九五一年在苏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执行枪决），南段局长冯澐派了很多的爪牙向各段的工人威迫利诱，谈判复工的条件，希望得到妥协，迅速复工。罢工支持到第六日，即是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全线宣布戒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了一些兵包围江岸车站和工会，各厂各处都有武装兵士把守，禁止员工出进，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厚庵亲自到江岸扶轮学校仍以谈判复工条件，约集工会的负责人会谈，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项英、曾玉良

等工会负责人到扶轮学校与张厚庵见面，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复工，张厚庵坚持谈好了复工即撤退军队，张厚庵用带威胁的语气说："你们要放明白些，不马上复工我们对吴大帅是交代不了的！"林祥谦马上就抢着说："复工是全京汉铁路工人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是我们答应复工，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张问："你叫什么名字？"林答："林祥谦。"张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林祥谦说："不是那样简单容易。"张厚庵的脸色很难看，厉声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项英看到了事态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和缓地说："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张答应了，大家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队到工会集合。"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说话中的冷笑，暗藏着无限的恶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任务，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有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开会，我们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到工会去等他们。"林祥谦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当当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只有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林祥谦就径直回工会，其余的人都散了。一会儿车站上发出号音(紧急集合)，大家还以为军队是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军队散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实行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人，将林祥谦等十三人及几个火车司机绑到江岸车站，把林祥谦等绑在电杆上，有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兵士来问林祥谦说："你还不下命令复工吗？"林祥谦很从容地说："我向谁下

命令？"那个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向他们和纠察队下命令。"林祥谦很激愤地高声说："你们太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没有话讲！"那个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林祥谦紧闭双眼操着福建口音，高声厉骂，正在相持之际，工人纠察队约有百人左右冲进了车站，项英也在纠察队中间（纠察队的团长罗海澄、副团长曾玉良勇敢不识字，实际上纠察团是项英指挥）。正在混乱当中，纠察队快扑到林祥谦身边，军队竟对徒手工人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的刘家庙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十二个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和工会中的几个值班的人，都被乱枪打死，接着武装部队协同路警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火车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之间发生的事态。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全京汉铁路各厂小站，都发生军队用武力镇压工人罢工。信阳、郑州、新乡、保定、长辛店，都逮捕了很多工人。在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和拒捕中都有死伤，但不似江岸之惨烈。这说明这一次的罢工运动的重心在江岸，我党负责这一次罢工运动的指挥调度的是项英。参加这一次罢工的在江岸方面除项英外，还有施洋、李之龙、许白昊、陈潭秋、廖乾五等，在长辛店方面的是吴汝明。

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施洋在汉口被捕，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军警稽查处的便探先到施洋的律师事务处（在汉口后花楼大同旅社浴室旁边的一个弄堂内）说是接洽官司。施洋的爱人告诉他往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便探就到地方法院去，走到后城马路的中间距新市场不远遇着施洋从地方法院回家，便探就拦住他，把他带到稽查处，当即押解过江，在军法审判处略加讯问，即执行枪决，到了第二天京汉铁路复工通车了才准收尸，是由汉口人力车夫工

会的负责人樊一狗、袁诰成负责收尸，棺材安葬在宾阳门外洪山的北麓，并为建亭立碑，到现在还存在。

施洋是湖北竹山县人，寒士出身，辛亥革命时他不过二十多岁，一九一三年他开始进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一九一六年毕业，毕业后困在武昌半年之久，才办理律师登记，取得了律师的身分以后，就在武汉挂牌当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最初在武昌抚院街，据他自己说：在当律师的第一年简直没有生意，到了第二年虽然有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在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曾代表武汉学联到过北京上海参加全国的学生运动。这就是他开始露头角的时候，他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很大，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湖北省教育会的筹备会上，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怕艰难。在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运动中，他不仅出力，而且出钱。他对人力车夫的疾苦，体会得很深刻，替人力车夫出主意，以法律顾问的身分替人力车夫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他在人力车夫的罢工运动中，建立了他的威信，全汉口的人力车夫都爱戴他，都称他"施先生"。

在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并于会后举行游艺会。他自动地来参加，并出席演说，他的演说内容很丰富，他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方向和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由许白昊、项英两同志提出介绍施洋入党。第一次在区委会没有通过，陈潭秋还说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决定要我同他多

谈两次话再讨论。我对施洋是有些了解，但以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虽同他谈过几次，仍不敢遽作决断。因他与刘伯垂同行，我就问刘伯垂的意见。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我也同意刘伯垂的意见，在第二次提出区委会讨论，才通过他入党。他加入党以后，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事都沉着笃实多了。因为他对劳动运动感兴趣，所以把他分配在劳动运动方面工作。他家里用的一个女工黄陂县的一个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加入了党，即是秦怡君。许白昊死了，她同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了，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中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就不知她的踪迹了。

京汉铁路工潮发生，施洋到江岸去过几次，讲演过一次，他因律师业务很忙，所以没有在这次罢工中担任什么重要的工作。吴佩孚、萧耀南因为要镇压工潮，打击共产党，所以把屠杀工人与枪杀共产党人，认为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两面，施洋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危险人物，他自己也是满头脑的法律观念，对敌人没有警惕性，所以他就不免于死了。血案铸成了，他们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道因此震动了全世界，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只剩下他的夫人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孩子。

"二七"工潮是在血腥的武力镇压下复工了。于二月八日开始通车，工人俱乐部都被查封，我党在交通部任职的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安体诚及我五个同志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我们五人分任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五路的工人组合工作，高恩洪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首领是叶恭绰的旧交通系人物和组织，最初的名义是"密查"，后以我们都是大学生，改为育才科的视学，陇海铁路的工人组合工作是李震瀛负责，他不在交通部任职）。在我们离

开交通部时，各路的工人组织已初步完善，每一路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领导。如京奉路有邓培，津浦路有王荷波，陇海路有李震瀛，京汉路有项英、吴汝明等。项英在"二七"江岸大屠杀中，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被乱枪击散，潜伏在江边，到黄昏时候，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寓内，廖乾五也住在那里，就在此处建立联络处。他开始调查工人死乱的情形，拟定善后的办法，建立工人工会的秘密联系，在江岸的被捕工人在工潮解决以后都释放了，被开除失业者达数十人，其余如保定、郑州、长辛店各站被捕的工人和共产党人都关了监，因此善后救济成了我党在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京汉路罢工的过程中，北京比较武汉是沉重多了。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我们才在北京展开政治宣传与办理善后工作，我们组织在参众两院请愿，联合众议院的议员胡鄂公、彭养光、范叔衡（范鸿劼的堂兄）、白玉逾、吴昆等对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提出弹劾案，因为这几个议员都是湖北人，同我们有些私交，党就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和刘子通、范鸿劼负责进行，并发动提出劳动立法案，争取工人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胡鄂公是北京"今日杂志"派的首领，他的干部有邝摩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曾派彭泽湘等赴莫斯科请求加入第三个国际遭到拒绝，他回转头来争取加入我们的党，所以他对此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的运动很卖力，完全服从我党的领导。项英也来到北京，他和王俊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过"二七"工潮的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弹劾案虽然照我们的原意由胡鄂公提出来，在征求连署人的时候，把吴佩孚勾掉了，因为当时北京政府吴佩孚是一个实际支持者，议员老爷们哪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呢？所以弹劾的对象仅是萧耀南、赵继贤。劳动立法案倒是很顺利地提出，连署的议

员很多，虽然没有经过大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传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运动，经过了“二七”工潮和这一次的“弹劾案”和“立法运动”有了不少的进步，也算是我们的合法斗争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其次就是善后与救济工作，善后工作是对死亡的要安葬，死亡的家属和数百个被开除而失业的工人要生活，被关监的工人要营救。一个幼年的党，遇着这样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个大事，所以我们一面进行募捐，一面组织救济机构，选择办理救济的人员，颇费周张。募捐方面国内的办法很少，因为此时全国各地劳动组织尚在萌芽时期，工人的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会的经济力量还不够，非工人阶级团体或个人如慈善会、救济会、青年会及一般富商大贾不仅隔岸观火，并把工人罢工认为是过激行为，还指“罢工运动”为“白老鼠过街，人人叫打”。我们的同志多半是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工人，大家节食省衣捐凑一点为数有限。主要的捐款是在第三国际号召之下由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赤色工会募集来的，为数倒不在少。此项经费主要的是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时间还相当长，保管与发放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工作，我们的党当时没有慎重考虑，适当处理这个问题，仅就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当中组织了一个济难委员会，北段是张德惠负责，南段是张连光负责，我们党把收到的捐款如数地交给济难委员会由他们处理，我们也没有派人监督用途，稽查帐目，捐款是陆续地来，我们也是陆续地交给济难委员会，因此他们对救济费的发放不公平，不恰当，浪费、贪污，到了最后，张连光卷了五六千元现款逃回他的故乡福建，匿迹销声。有人说他回家置了产业过他一个人的安乐生活。张德惠也拐了三千多元久不见面，过了几个月把钱用到差不多完了，才跑到北京同范鸿劼、何孟雄、王俊见面交来了一篇假帐，报销了二千多元，还差八百多元他说是他用了。如张连光卷款潜逃，倒还是一刀两断，没有出什么麻

烦，张德惠犯了错误，我们就不理他，他跑到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到处招摇撞骗，造谣生事，并与我们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豢养的走卒国际工会分子，广州的马超俊，湖南的王光辉，汉口的郭骋伯、郭案生、张纛等沆瀣一气，对我党作恶意的中伤，如："共产党骗俄国人的钱"，"共产党被俄国人收买"，"共产党陷害工人，煽动罢工"之类的诽语，工人群众头脑是比较简单，听了这些谣言，都信以为真。如杨德甫、罗海澄等跑到上海找陈独秀要算帐，王光辉、郭案生、郭骋伯等到处宣传说共产党侵吞救济工人的捐款，登报要我们公布帐目。我们的党在此时还是秘密的，我们救济工人的捐款是从第三国际和各国友党募集来的，我们既不能在报上公布帐目，也不能和这些工贼打官司，陈独秀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文章辟谣，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我同杨德甫以前处得不错，我找他解释过，越解释他们的误会越多，他们总以为还有多少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给他们用，他们的欲壑是填不满的。因此影响党与工人间的关系不少。在武汉方面因张连光卷款潜逃，林育南认为是项英用人不善，对项英提出过分的责难，李之龙说："张连光是京汉铁路工人推选出来的，就是用错了他，也不是项英一人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他们争论起来，打了一架。同志间的团结，也发生问题，武汉的工作有很多矛盾，这是一九二三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事。

补记：在一九二三年夏天，我党在广州东山陈独秀的寓内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何孟雄、项英、王荷波、邓培、张国焘、阮啸仙等，刘仁静、王俊新从莫斯科出席少年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回国，也被邀参加这次的会议作报告。这次会议中陈独秀作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鲍罗廷作了《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刘仁静、王俊作了《出席少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瞿秋白(负责编《前锋》是党的理论刊物)、蔡和森(负责编《向导》)作了党的宣传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党的组织工作报告，各地的代表也分别作了各地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

(以上的这一段材料是最近会见刘仁静据他的口述和我的记忆补记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惠僧)

项英是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仍派在武汉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京汉铁路工运，并参加武汉党委会的工作，他把武汉的这些情况报告中央，请求解决，经过中央的研究讨论，决定仍调包惠僧到武汉负责整理党务，调林育南至上海工作。我接到中央调我回武汉工作通知的同时也接到项英的信，我知道问题的发生与中央这样决定的经过，我很犹豫，但也不能不服从中央的调度，我只好照中央的指示：先到上海接洽工作的方针，在上海住四天，即回汉口。这是我第三次到武汉担任党的工作。

武汉区的党务工作和劳动运动工作，从一九二一年冬天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止，是一个发展高潮的时期，各学校都有"学生读书会"、"妇女读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各产业组合中各工厂中都有"工会"或"工会筹备会"、"工会俱乐部"的组织。汉阳兵工厂是属于军事范围，一向是严禁工人集会，也组织了工会性质的"工人小组"。运输工人也组织起"码头工会"，党员已经发展到四十余人。自"二七"工潮以后，反动政府明白禁止工人集会，我们的工运，不能不转入地下工作，几个负工运责任的同志行动也受到限制，项英、许白昊、李之龙等，都成了军警注意的人物，所以我们的机关部就不能不迁入租界。一九二三年秋末我到达汉口，我们的机关部设在日本租界一栋楼房里，项英同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周天元夫妇和黄子坚等住在这里，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的一个女同志陈云卿的丈夫是洋厨子，

不是我们的同志，也常到这儿睡觉，我初到汉口同他们住在一起，我想一个秘密的党的机关部住了这样复杂的人在一起，如何进行工作呢？我同项英商量要改变环境开始工作，项英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在租界上租房子要有家眷，我租房子时没有办法就把陈云卿同志抓了来。后来周天元、黄子坚知道我住在这里，楼下又有空房，他们要求搬来，我不好意思不答应，就这样将就住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将来可以请他们搬走。"可是为了这一个问题费了很多事，还出了一个乱子。

我们的工作开始就是改组区委会，在区委会创组的过程中同张国焘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磨擦，结果是我当选区党委兼委员长，许白昊当选区党委兼秘书，许白昊是有小组织的色彩的，这样的配合，是项英居中调和的结果。我同许白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还算处得不错。粤汉铁路徐家棚的工运工作，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我离开武汉后就由刘易华来代替李书渠，这一次我回来又把李书渠代替刘易华，在人事调动中也发生不少的争论，京汉铁路的工作仍由项英负责，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作自施洋死了以后就由项英、许白昊共同负责，指导仍是樊一狗、袁告成负责。青年团的工作重点在武昌，刘昌群任书记，陈潭秋以区党委负责指导团的工作。林育南调到上海工作，李之龙调到广州工作，武汉的工作从二七工潮以后是沉寂了大半年，经过了这一次人事调动重加整顿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又渐有生气。接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央指派刘伯垂、廖乾五、李隆郅（立三）为武汉的代表。武汉此时尚未办理国民党登记党员工作，我们的中央在名义上是指定李隆郅负责武汉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实际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张桓九、雷大同等从中作祟，李隆郅对这一工作是一筹莫展，他们到广州的三个代表恐怕只能代表他们三个党员，因为新党员还没有办登记，旧党员同他们还没有任何联

系。北京办理国民党党员登记是比较早，我还是在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由李守常负责办理登记填了表但未发党证，武汉及两湖是一九二四年初夏，林祖涵到汉口才开始办理登记，并设立武汉市党部于日本租界。这些情况也可以说明国民党在一九二三年前后进行改组时期各地的改组工作和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完全在马林、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我们的机关部因为住的人复杂，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的重要会议多半是到清芬二马路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去举行，写一个重要的文件必须等到夜十二时后一般人睡静了才开始工作，工作上太不方便。我们决定搬家，由项英同周黄两人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要搬家，为得免除军警方面对我们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分开住，项英以为这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周天元是一个狡猾多疑的黄陂人，他经常也和杨德甫一样的看法，以为京汉铁路的救济捐款总还有若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没有尽其所有给他们，他们虽然知道我和项英不经手钱，总以为我和项英可以向共产党要钱给他们，现在我们要搬家，要他们搬出去，认为我们是把他们当外人，不管他们了。他们由狐疑而怀恨，我也提醒项英注意这个问题，他说不要紧。过了几天，我们搬到日租界对面中国地界的华景街华景里一栋民房里，这个地方周天元、黄子坚也知道。又过了半个月，我迁到日租界对面的三元里，项英就住到清芬二马路廖乾五寓内，我的住所是秘密的。在农历过年前，我们还当了几件衣服由项英给了他们一点钱，他们仍然不满意。有一天晚上，项英来我的寓内商量一件工作，刚刚坐下，周天元同罗海澄（失业工人）闯进了我的寓内，要我到茶馆同他们说话，我们知道这是找麻烦的，我还没有说话，项英就说你们的事我负责，他不管。罗海澄是个横人，即破口大骂说京汉铁路的乱子是包惠僧搞起来的，无论如何他不能不负责任，要不然我们就拚，便动手要和我打架，我也只好尽量忍耐同他们敷

衍，结果是我们尽其所有凑了五块钱给他们才下台。我知道这是乱子的开始，我要项英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项英说：“不要紧，慢慢拖，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无非是要钱，我们如果有钱给他就没有问题。第二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们介绍工作也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就只有‘敷衍’和‘拖’。”我说：“如果‘敷衍’不下去，‘拖’不了怎么办？”他说：“大不了得我们一路进监牢。”我说：“我们到了进监牢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败。”他说：“不要紧，罗海澄、周天元的胆子也很小，他们也不敢真和我们干，京汉铁路有几百失业工人，将来这样的事还要多，哪里能够对每一个失业工人和对每一件事都能处理周到，叫他们没有话说呢？我们只能一面说服他们，一面尽可能来帮助他们，在张连光卷款潜逃以后，他们也常拿无赖的行为来威胁我，我还不是用‘敷衍’与‘拖’来处理吗？”我认为他这样的看和这样的做是很危险的，果然过了三、四天，有几个警察来调查户口，我不在家，接连又有一个陌生的人挨户调查姓包的，我即到日本租界一个朋友地方住了几天，我们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我们建议中央先把杨德甫、周天元介绍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作，把处理京汉铁路失业工人的事交给杨德甫负责。第二我们建立一个秘密的机关部；项英暂时不要和周天元等见面，我们的行动尽量地对他们保持秘密。这个意见项英同意并经过区委会通过了。我们即找定英租界对面华界德润里二十三号，全楼共五间，我们几个负责的同志如项英、许白昊、廖乾五、我和我的爱人夏松云、许白昊的爱人秦怡君，还有我的大女儿爱生（才半岁），都住在一起，廖乾五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他早留有胡须，完全是一个老头子的模样，我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完全象一个家庭的组织。房东住在楼下，他是一个商人，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秘密机关。我们差不多是昼伏夜出地工作，林祖涵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汉口

任特派员，曾到过这个地方，同我们交换过工作的意见。正在布置汉口市党部的工作当中，杨德甫也由上海回到汉口，我们还没有同他见面。有一天周天元突然来到了我们的机关部，我们见面当然有点惊异，就在廖乾五的房内坐下，周天元很得意地说："在汉口无论你们搬到哪里我都找得到，汉口每一条马路、每一个弄堂都有我们的弟兄。"他自己说他是洪门的老么，我们同他谈了一下，送他走了，我就提议马上找房子搬家，先把重要的文件送走，项英、白昊都说我太小胆了，不会有那样严重，廖乾五倒同意我的意见。过了几天中央来信召集扩大会议，要我到上海去开会，我在行前还提出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同意了，但要等我到上海请中央汇钱来才搬，他们总以为我是过虑。我到上海开完了会，乘船回汉口的途中航泊在南京码头，王荷波从上海坐火车赶来报告汉口机关部被查抄的情形，并带来上海的报纸。我到南京码头已从报纸上知道汉口机关部被查抄，刘伯垂、许白昊被捕。王荷波说中央要我暂不西上，我想我是坐的怡和公司的船，码头在英租界，上岸没有危险，还是先到武汉看看，并与各同志商量一下善后的办法，王荷波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到汉口即住在英租界福昌旅馆，设法找着了我的爱人夏松云，才知道查抄德润里二十三号的那一天是在下午二时，夏之栩也在那里，廖乾五、项英都不在家，当时就把许白昊绑去了，对于女人，军警只监视行动，没有逮捕。廖乾五到下午五时回来，走到弄堂口在香烟摊子上买香烟，香烟摊子的老板说二十三号查封了，不知道是甚么事？廖乾五就很机警地向英租界逃跑，一个便探跟着后面追，差不多追上了。廖乾五就闪在路边，对着便探向前跑的姿势横踢一脚，便探跌了跤，廖乾五继续向租界逃跑，凑巧通租界的一个铁闸门经常是关着的，此时因为京汉、粤汉联运的火车快到了，所以铁闸子门开了，廖乾五三步并两步地跑进了租界，便探就无可如何了。廖乾五逃到南陵路孙武的家里，才知道刘伯垂的律

师事务所被查抄，刘伯垂被捕。到了半夜，德润里弄堂口的哨兵撤退了，在房子内监视的几个警察也睡熟了，夏松云从我住的房间向外的窗户把夏之栩用绳子吊下去，夏之栩出去才到各同志处送信，否则在那监视他们的三天中，还不知道有好多同志因为接洽工作而进入罗网了。

我在福昌旅馆住了一天，找着陈潭秋谈了一些有关善后问题，我和项英、廖乾五都在明令通缉之列，政治环境不改变，我们在武汉是不能立足的。汉口的风声还是很紧，陈潭秋也催我快点离开武汉，我即于次日坐日清公司的船回上海。不久项英、廖乾五也到了上海，项英即在中央负全国工运的责任。我同廖乾五先后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在北伐时廖乾五任第四军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一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他仍任第四军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革命军南征抵潮梅战败，廖乾五即不知所终。

邓中夏烈士的事迹拾遗

邓中夏烈士系湖南宜章县人，生于一八九四年，性情沉潜而刚毅，好学深思。其先翁宜章名孝廉，家学渊源，故对国学颇有根底。民国初年，烈士游学北京，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约在一九一九年毕业。当时中国文学系学长为陈独秀，烈士与陈常相过从，慨然以改革中国政治自任。一九二〇年，烈士与李大钊等创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我党创立初期北京党务之发展，烈士尽力独多。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烈士与北京代表刘仁静、张国焘结伴到上海，准备乘船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亦住在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学校楼上，此处为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招待处，这是我第一次同烈士见面。虽然我们这一次同住的时间不长，接谈不多，而他的对人真诚，对事负责，意志坚强，有胆有识，从他的言谈笑貌中可以见其大概。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奉党命令调北京工作，与烈士见面与集谈的机会较多，在工作中得烈士攻错之益甚大。我们常在工作中或集会中发生争论，甚至面红耳赤，会后则党谊与友谊如故。一九二二年秋冬之交，上海大学成立。在国共联合战线期间，于佑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烈士任教务长，学校事权，集于烈士一人之身，上海大学亦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摇篮作用，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黄埔军官学校互相呼应，使我们党组织力量与宣传力量不数年而普及全国，此三个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烈士从一九二二年参加工运，全国总工会在筹备期间，烈士为筹备工作负责人之

一。及全国总工会成立，烈士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毕生心力，尽瘁于工运。

烈士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十余年如一日，其任事之勇，死难之烈，党史中当已搜集成篇矣。兹谨就我与烈士接触所得，略记如此，以备党史之采择云耳。

回忆陈延年烈士

（一）

陈延年，安徽怀宁县人，在前清末叶，生长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其父仲甫先生治汉学，对文字学考据学声韵学研究精深，颇负时誉。延年在童年时克承庭训，天资甚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国学颇有根底。少长以性情倔强，与人落落寡合；对学问和生活，不习惯于家庭社会的老一套，独出心裁，不同时好，因此为家庭社会所诟病，并失父母欢。

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士人政治与封建制度相表里，残酷地统治劳动人民达三千余年之久。陈延年反对封建制度，更反对士人政治，他对士大夫阶级不劳而食、不织而衣以及声色货利，荒淫无耻，深恶痛绝。常以澄清政治，改变士气为己任。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后，到北京就学曾发起工读互助团，纠合一般生活较苦，觉悟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如浙江俞秀松、湖南何孟雄等，半工半读，自给自学。这一运动，起于北京，推广到两湖上海及各大城市，不仅对贫苦学生开了一条光明大路，而对于那些戴着大学生头衔，穿着蓝袍黑马褂，脚踏粉底朝靴，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投机取巧，到处逢迎的青年学生起了一种对照与针砭的作用，为社会开展了新风气。工读互助团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一环，与"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尊孔"、"读经"等运动，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而爆发了五四运动。

陈延年最初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颇有研究，对当时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则深恶痛绝，仲甫先生任北大中国文学系学长时，旧学新知，为士林所推重，延年则视之漠然，常对人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因此师友之间多以延年为狂妄，并有指责延年为一无父无君之狂徒。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虽为一战胜国，在战争中国力损失甚大，尤其是人口锐减，社会劳动力与国家生产之需要不符甚巨。中国为世界有名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法两利的情况下有倡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主其事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吴稚晖等，中国各大城市之大中学生前往勤工俭学者甚众。陈延年与其弟乔年，均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约有三年之久，不仅学业大进，而思想的转变，更为一般师友始所不及。陈延年在法国时，为一真正之华工，以半日进工厂做工以半日研究法律。除研究法律外对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曾作过比较的研究，经过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而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活动。

五四运动后，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商中国革命大计，一九二一年七月间由毛泽东等十三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上海，同时在国内外发展组织，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创立中共支部，主其事者为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周恩来同志等。他们在巴黎发行"少年"周刊，并发动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爱国运动，为法国政府所迫害而不为所屈，陈延年为巴黎"少年"的发行人，亦为巴黎中共支部的负责人，他在旅法的学生工人中有相当的威信。

（三）

一九二四年初，吾党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国民党在吾党与第三国际支持下，进行了改组，一九二四年春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国内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有高度的发展。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吾党中央调陈延年、周恩来回国工作。约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间，陈延年与周恩来到广州，周恩来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吾党广东区党委书记，并指导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

我第一次同陈延年见面是在广州市司后街杨家祠堂，即杨匏安的家里。他的身材不高，体质健壮有臂力，面色黑而有极细微的疙瘩，骤然视之若有斑麻，穿一身半旧的粗哔叽的学生装，足踏一双从法国穿回国的有钉底的翻皮鞋，手提一个黄色皮包，他对同志们点头微笑。那一天是举行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间在下午八时左右，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他听了同志们的工作汇报，也没有说什么话。会后他同我曾作长谈，他知道我曾经在武汉、北京、上海各地区工作过，他因为是初回国对各地的工作情况还不很熟悉，他对各地工作发展的情形问得很多，我们谈了很久才散。第二天中午，他同周恩来到社仁枋二号我的寓内又继续前夜所谈的话头又谈了两个钟头。话谈完了他提议我们三人在东山找一栋房子同住，要我的爱人夏松云负责去找房子。未久，我们就租定了东山慈幼院街某号二楼一个全楼，一间客堂，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他同周恩来住前间，我们夫妻住后间，这里距苏俄顾问团很近，向东转角不过一二百步就是鲍罗廷、加伦的住宅，顾问团的办公室也在这里，我们住宅对门的山坡上就是罗加觉夫及李洛夫（鲍罗廷的助手）的住宅，我们相互联系很方便，所以很密切。

当时我原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因国民党右派分子邵元

冲、刘芦隐、郎醒石等排斥共产党人，于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党员训练班结束以后，即解除我的工作，我失业一些时。我们的党即分配我到苏俄顾问团做搜集资料与整理资料的工作，并兼大本营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在工作上与学习上得到陈延年的帮助甚多。

一九二四年冬，黄埔军校学生队及教导团组成第一次东征军的主力，周恩来出发东江作战，后方政治部无人负责。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我们的同志李汉藩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黄埔军校管理处长林振雄发生冲突，拔枪相向，几至酿成血案。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的矛盾相当严重，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坚请陈延年出任该校后方政治部主任，调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陈延年与廖仲恺先生为世交，他由法国回国的旅费，还是廖先生筹寄的，论理他不能拒绝廖先生的邀请。但是他当时是共产党区委书记，任务重大，工作极繁，既不能舍彼就此，亦不能兼顾，遂把这个问题提到区党委，作出决定由他荐我以自代，廖仲恺先生接受了陈延年的推荐，以爱屋及乌之义，对我推心置腹，使国共联合战线在黄埔军校得到一时的巩固，陈延年之力居多。

（四）

一九二五年春，广东区设工作部于广东大学斜对面即文明路与文德路之间某号二、三层楼上的两层全楼，陈延年即住在工作部内。我们接洽工作与小型的工作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在每日的工作时间中，他从未离开过工作部，较大的会议，多在杨家祠堂，或在惠爱东路省会议附近的一个小巷内一栋新式平房（这栋平房原系陈恭受的私产，商团叛变后充公，即后来作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延年白日在工作部处理工作，接见工作同志，夜晚则到各处参加工作会议，或者走访各方面负责同志，交换工作上

的意见。他自己对任何工作都有他的既定方针，他善于接受同志们的工作意见，他对同志们接谈时，态度严肃而诙谐，对同志们正确的意见，能够毫不迟疑地接受，有不正确的，他能在谈笑中把同志们的意见纠正过来。在那样的工作繁忙紧张状态之下，他每日所接洽的人和所处理的事都在十余起至数百起，我从没有发现他焦躁与疲乏，他总是愉快地工作，和蔼地待人，他没有对任何同志发过脾气，对任何事没有感到没有办法。他对革命事业有坚强的信心，对革命工作具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他担任广东区的书记约有两年半至三年的时间内，在广东曾经过几件大事："商团叛变"、"两次东征"、"省港罢工"、"镇压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案"、"三月二十事变"等事件，这都是国共联合战线过程中的大事。每一次事件中，陈延年很适当地把我们的同志分布在党、政、军、工、农各方面，配合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把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大踏步地推进，给反动的封建地主，割据各城镇的反动军阀，阴谋暗害的反动政客，盘踞沙面横行港九之间近百年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迎头痛击，使中国的革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在广东方面，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中，陈延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省港罢工运动中，英人侦知吾党在广东负领导责任的人是姓陈面麻（陈延年因面有细微的疙瘩，骤然视之若面麻）。恨之刺骨，逐以陈麻子称之，并写成传奇小说把中国共产党的陈麻子形容得神奇鬼怪，指为是捣乱的圣手，杀人的魔王。在大革命失败后，约在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看到这一本书，著者署名皮克，所写的主要人物就是陈麻子，朋辈中不知陈麻子为何许人，或者以为是暗指陈独秀，所记事实是由省港罢工至武汉政府时代的片段，多属虚构，一望而知其伪造中伤之所为也。陈延年为帝国主义者所痛恨，如此可见一般。

（五）

陈延年从不作个人打算，他的生活极简单朴素，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床底下有一个小皮箱。他的办公室中也只有一张条桌，一把广东人通用的藤椅，一个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报。他的卧室在三楼，办公室在二楼，办公室外就是一个简陋的客厅，客厅中间放着一张脱了漆的旧餐桌，四方安置着长短不齐的板凳和大小高矮不一样的椅子，这就是陈延年接见工作同志及举行小型会议的所在。他的办公室隔一道板壁还有一间小房，里面有三个工作同志，这都是陈延年的助手。阮啸仙、刘尔崧、杨殷、杨匏安及其他同志等也经常在这里工作。他因为工作忙，饮食无定时，遇着什么吃什么，他从不选择。我们有时在家里做了几样菜约他吃便饭，他总是说有时间就来，过了吃饭时就不要等了，事实上他就很难到一次。他在广州同我们共同工作约近三年，还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哔叽的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迹斑斑，领袖破烂，有的同志劝他做一套衣服换一下，他付之以点头微笑，其安于破烂也如故。他当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同志们有为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有的女同志很羡慕他，因为他对同志们态度严肃，尤其是对女同志丝毫不苟，谁也不敢向他表示爱慕。当时的风气，无论党内外，自由恋爱的潮流很高，党内的生活，亦不似现在这样严肃，有的同志因男女关系发生纠纷，闹到陈延年那里，他总是以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双方使矛盾解决，有些同志有这一类的问题发生，却怕陈延年知道，因而相互和解，化有事为无事，陈延年在同志之间的威信如此。

（六）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前后，蒋介石及孙文主义学会首要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刘峙等，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我党在中央退让政策之下，陈延年一面组织情报机构，派傅烈负责收集国民党各方面情报，来作适当的对策，一面督促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各军师负责同志严守岗位，表示我党对革命事业，对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坚持到底的光明磊落的精神，而对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等之营私舞弊造谣中伤的卑鄙行为，尽情揭发，使蒋介石、汪精卫之间了解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缺点，使王柏龄、吴铁城、陈肇英等希图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中进行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事前暴露出来。在三月十五日前后，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播流言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谓苏俄顾问团主任季山嘉与汪精卫将联合共产党倒蒋。我在东莞从王柏龄那里得到这样的谣言，即回广州报告陈延年，他当夜即走告季山嘉，在季汪会商之下由汪精卫根据谣言的线索黄夜到东山蒋介石家里根究谣言的来源，蒋介石瞠目无以为对。汪去后，蒋介石召王柏龄到他家里，责骂甚严，并令王柏龄向汪精卫负荆请罪。当时王柏龄狼狈不堪，这一阴谋被揭穿，使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在蒋介石那里的信任降低，他们希图在"倒蒋"的谣言掩盖下进行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卒不得逞，后来在三月二十事变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免去王柏龄等二十师师长职，责令立刻离开广州，相继吴铁城、陈肇英都受了严重的处分，蒋介石发动三月二十事变，算是扑了个空，就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请处分，而形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狗的局势。

在当时两党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承认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他自己说："革命事业的发展共

产党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十个国民党人也不及一个共产党人的力量。”此系出于蒋介石之口又为时论所公认，因之把两党的联合战线延长了一年的命运。在三月二十事变中，如果李之龙接受陈延年的指示，对汪、蒋一视同仁，把海军局缉私与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等，勿当暴露于蒋介石之前，则李之龙或不至落到王柏龄等的反动阴谋的圈套里。

（七）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广东形势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互有发展，蒋介石表面与我党继续建立联合战线，成立两党中央联席会议，出师北伐。而又与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互通声气，并与张作霖、孙传芳信使返往。陈延年知蒋介石迟早必反，在广东方面普遍发展农民运动，东江南路加强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对黄埔军校及第一军被蒋介石排挤出来的我党工作同志，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与我党工运农运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活动，因此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瓦解了北洋各军的士气。北伐军各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叶挺部，第六军程潜部，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主持政治工作的大都为我党同志，均能英勇善战，攻无不克。而蒋介石直属第一军因排斥共产党人，则造成贪污腐化，士气低落，风纪败坏，南昌一役，王柏龄师溃不成军，蒋介石率刘峙退高安待援，使北伐各军得以平衡发展，巩固了武汉政府的威信，使蒋介石反动逆谋不能得心应手，发展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陈延年的安排布置起了决定的作用。

（八）

一九二六年的秋冬之交，北伐军出长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东南半壁，有传檄而定之势。广州在政治军事上已形成次要地位，

我党各重要干部集中于上海、武汉之间，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陈延年转到上海工作，四月十二日之变，东南各省市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死难者甚众，后得之传闻，陈延年在上海闸北某地被蒋介石的爪牙杨虎、陈群等率领军警围捕，陈延年见于情势危急，知不可免，即奋起与敌搏斗，屡仆屡起，敌受重创，而陈延年被敌人打得血肉模糊，牙关脱落，卒以众寡不敌，为敌所缚，被捕未久，为蒋介石秘密杀害，死难时年仅二十八岁，时间约在四月十二日以后，“八一”起义以前。陈延年是壮烈地牺牲了！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工作作风，他为无产阶级，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所贡献的力量是永垂不朽的！

回忆张太雷烈士

一、在上海的初次会见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当时，我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编辑工作和职工运动的计划工作。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学生出身，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不满意我们的工作部署，他提出要陈独秀回上海负起中央书记的责任，并要求重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不能局限于在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固然是要紧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广大劳苦群众中发动民主革命运动，要在政治舞台上展开新型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同志认为马林的意见是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对他有些反感，但又不得不请陈独秀回上海来同马林商谈。约在旧历重阳前后，中央派我到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受了同志们的思想影响，也与马林发生了意见分歧。

张太雷是在八、九月间由莫斯科回来的。他担任马林的助手，终日忙于翻译，并为马林搜集和整理资料。陈独秀同马林会谈，由张太雷任翻译。陈、马会谈了两次，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尤其是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会谈停顿了，关系僵持了。张国焘当时被认为是接近马林的人，但是他也没有主意，不敢作声，因此，奔走于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和传递信件

的只有张太雷一人。

南成都路辅德里北边的一个里弄新建的楼房，我们在那里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到中央书记办公的地方谈工作，进去时，正遇见张太雷同陈独秀谈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张太雷劝陈独秀说：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话还没有完，陈独秀发起火来，说：中国的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进，……陈独秀站起来拿着帽子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下去，但是，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走了。陈走后，我才同张太雷互相自我介绍和谈话。这一次，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互相间并不甚生疏，因为一九二〇年间，我在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并兼任S.Y.的书记，张太雷此时在天津华北明星杂志工作，是天津的S.Y.的负责人，他当时叫张春木。当时各地的S.Y.开会的情况是互相通报的。我们在S.Y.的通报上互相知名，所以一见面就很亲切，好象是旧友重逢似的。他很直率地对我说：马林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不明了，但他是第三国际的代表，是来指导我们的，我们要尊重他。再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同第三国际建立正常的关系，那末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什么呢？难道说我们还能走独立社会党的路线吗？第二国际那更是臭名远扬的了。仲甫先生太感情用事了。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一定要把他和马林的关系搞好。你有机会也可以找仲甫先生谈谈，劝劝他。我们谈了一个多钟点才分手。张太雷一直同马林一起搜集和整理资料，研究草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新方案。马林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得张太雷的帮助很大。不久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查抄，陈独秀被保释出来后，同马林再行会谈，才决定中共与第

三国际的正常关系，不过在名义上中共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只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这一次纠纷的解决，张太雷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在武汉重逢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被法国巡捕房查抄，当时被捕的陈独秀夫妇之外，还有杨明斋、柯庆施和我共五人。当天黄昏，邵力子、褚惠生（即褚辅成）因为来访陈独秀，也被带到薛华立路法国巡捕房（即法租界的会审公堂）。最初，我们这五个人中谁也没有承认其中有陈独秀，褚惠生到巡捕房的候审室同我们见面后，即大声对陈独秀说：仲甫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刚到你家里，他们即不由分说地把我带到这里来，真是岂有此理呀！如此，陈独秀就不得不承认他是陈独秀。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公布出来，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地。褚辅成、邵力子当时都被认为是租界中的高等华人，立即被释放了。我们三个人因为是在陈独秀家里同陈一起被捕的，加之又没有什么高贵身分，所以同陈独秀一起收监。第二天上午九时初审，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当堂开释，我们四个人仍收监。当天黄昏，陈独秀被不知来历的人保出去了，我们三人坐了五天洋牢，才被保出来候审。事后了解，才知道在我们被捕以后，张太雷同马林等就设法营救，陈独秀是交了铺保而被释放的。马林是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巡捕房除了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外，还要敲竹杠。在马林出钱、张太雷等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他们还请了一个名叫巴和的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因为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所以落案的罪名是："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妨碍租界治安，情念初犯，罚款五千元以示警戒。当时我们也只要能脱身，就没有再进行申诉了。陈独秀出狱以后，在张太雷的帮助下同马林继续商谈。因为经过了一次风险，彼此之间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除了对工作

计划作了详细的部署以外，并提出民主革命的方案，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进行初步商谈。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同孙中山有几次书信来往，但无实际接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局限在广东一隅，时起时伏，一筹莫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第三国际鉴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派马林到中国来从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活动。但是当时有一些共产党人对于孙中山那样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并不感兴趣。好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即采取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是服从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因此，马林提出这个方案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之后就决定与孙中山面谈。张太雷是马林的助手和翻译，所以马林的这个方案，张太雷是参与谋议的。马林到南方去访问孙中山，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与马林同行。马林曾经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因此，他这次不能再经过香港，不得不由上海到武汉再转粤汉路南下。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我在上海打完了法国巡捕房的官司之后，中央即派我到武汉工作。有一天，接到张太雷的电报，要我于某日某时到汉口怡和码头接船。我一时莫名究竟，即约陈潭秋作伴到怡和码头，见张太雷同马林由岳阳号轮船的特等舱中走了出来。我同张、马都是熟人，陈潭秋与张太雷是初次见面。见面后，张太雷即低声对我们说：我们在汉口不能耽搁，要立即到粤汉铁路候车南下。我们即在江边雇了一只小船，朝徐家棚码头过江。在小船上，张太雷对马林、陈潭秋和我说：我们又在这里会见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马林很兴奋地说：但愿我们下一次在广东见面。

我们在徐家棚车站买了两张头等车票，两张到武昌的二等车票，等候一个钟点左右，火车即开动了。到武昌通湘门车站时，我同陈潭秋下了车。当时粤汉铁路并没有全线通车，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路程需要步行，因此，他们此行跋涉之劳，就可以想见了。

三、在广州的三年

一九二三年冬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正式建成，中共方面的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等都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陈独秀曾一度担任孙中山先生重建帅府的宣传工作，李大钊、毛泽东、陈潭秋等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在马林要回国前后，第三国际派鲍罗廷来中国工作。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的高等顾问。随鲍罗廷来广州工作的还有军事参谋团如加伦、罗加觉夫、施齐班洛夫等一行十余人。孙中山对鲍罗廷优礼相待，奉为国师。张太雷以翻译名义作鲍罗廷的助手，他同鲍罗廷住在一起。鲍罗廷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指导工作，张太雷差不多都参与谋议。鲍罗廷先在东山珠江江畔同苏俄代表团住在一起，后住在东教场省议会斜对面的新建的一栋洋楼中。在广州当时那样复杂落后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秩序的城市中，苏俄代表团没有警卫，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担任的。鲍罗廷在广州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安全也就是张太雷负担着。张太雷的工作，不仅要写作，要制订计划，还要行动，因此他在工作中锻炼成为一个机警、细致、勇敢、沉着的人。我们在广东共同工作了三年。我有时到他那里，或者是在会场中遇到他，他总是表现得平静、机灵、周到、谨慎，随着鲍罗廷的前后左右，寸步不离。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廖仲恺先生被刺身死。据当场捕获的凶手陈顺说：是以胡汉民为背景，以胡毅生、朱卓文为首的黑帮暗杀组织干的；其暗杀的对象，第一是鲍罗廷，廖仲恺

名列第二，还有其他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步人士共有十余人之多。由此可知当时广州反动势力之猖獗与革命形势的险恶。廖案发生以后，广东省委建立起自己的情报机构与防奸措施。

当时在苏俄代表团任翻译的人很多，如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等。他们除了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担任苏俄专家与各方面的联系和交际工作，如陪许崇智下棋，同黄埔高级军官打球、跳舞之类的活动。张太雷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白天随鲍罗廷活动，夜晚为鲍罗廷搜集和整理资料。鲍罗廷订阅国内外报纸不下十数种，张太雷每天要摘要翻译出来，提供鲍罗廷参考，有时鲍罗廷遇有疑难问题或是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还要被谘询。当时中共方面要同鲍罗廷会商的问题，也由张太雷负责勾通联系，所以他的工作是日以继夜。当时在广东的同志公认的四个特别忙的人，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一个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一个是党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个就是张太雷。

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见解各有不同，国共联合战线中发生了分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包括西山会议派)，是主张走军事投机的老路，他不问是什么集团，什么军队，什么人，只要同意他领导"国民革命"(是形式的国民革命)，他就优礼相待，引为同志。共产党主张先把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整顿好，把广东的残余军阀、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予以肃清，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出师北伐。所以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人在党刊《向导》上写了很多关于北伐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投机而发。蒋介石也在公众集会上指责共产党破坏他的"北伐大业"。双方闹的很僵。

一九二六年五月下旬，我在陈延年那里(广州文明路与文德路之间的一栋楼房的二楼，是广东省委办公地点)，遇见张太雷，我问他鲍罗廷有何妙计，蒋介石还是不是那样尊敬鲍罗廷？张太雷

说："蒋对鲍的礼貌还是如旧，不过我们每逢见面，蒋介石的神情总不象从前那样自然愉快。"陈延年说："蒋介石从前是一无所有，就靠打着联俄联共的旗号争取政治上的出路，现在他有了广东的地盘，有了两三万兵力，就野心勃勃地搞他自己的打算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张太雷又很感慨地说："我们除了目前的联合战线以外，总应该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鲍罗廷也和我谈到这一点"。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蒋介石同鲍罗廷之间已形成了貌合神离，孙中山给鲍罗廷的"国师"待遇，不复为蒋介石所重视了。

四、在武汉政府时期

一九二六年冬天，国民政府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政治军事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由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二届二中全会作了决议。蒋介石进驻南昌，在武汉设置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以邓演达为行营主任。他想利用邓演达在武汉控制北伐各军占领长江上游之地，他自己以全力出江浙进驻南京控制东南各省，造成他的党、政、军一把抓的独裁局面。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但又不愿把武汉形成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因此他改变了迁都武汉的计划，想方设法把国民政府暂时留在广州不动，或者是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于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广州的国民政府，还是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产物。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还是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威信。随着革命潮流的发展，国民党内也有一些进步人士，如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宋庆龄等都受了鲍罗廷与共产党的影响，形成了国民党左派的阵容。约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他们都同鲍罗廷一起到达了武汉，先后成立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联合办事处，代行国民政府的职权。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蒋介石就无法控制了。蒋

介石为了把南昌与武汉造成对立的局面，曾经把国民党中央的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劫持到南昌。这两个人本来是蒋介石夹袋中的人物，他们既不是革命民众的领袖，也没有革命的群众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两人虽在南昌，但国民政府的机构、印信、主管部长却都到了武汉。年底鲍罗廷到武汉后，邓演达在行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晚宴会。鲍罗廷以国府高等顾问的身份讲话。他首先说明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与北伐战争的胜利关键；其次指责蒋介石分裂革命势力和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错误。他讲了两点多钟，把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揭露无遗。当时是张太雷任翻译。张太雷为革命感情所激动，当说到蒋介石在广东、江西屠杀农民、工人与共产党人时，声泪俱下。他说话时，会场寂静无声，说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这情景说明会场听众为鲍罗廷与张太雷的讲话所感动。

鲍罗廷到武汉以后，居住在武昌城内湖上园，张太雷夫妇与鲍罗廷夫妇仍住在一起。张太雷成为鲍罗廷重要的助手，他白天要到汉口南洋大楼开国共两党的联合会议，夜晚共产党中央负责的同志差不多天天在湖上园开会，这样的紧张局面一直延续到四五月间。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调张太雷任湖北省党委书记。当时正是国共联合战线最后濒于破裂的关头，既要同国民党团结，更要同国民党斗争，真所谓任重道远，千头万绪，然而张太雷却从容不迫地部署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我同张太雷在武昌胭脂山啸楼巷二号即湖北省委所在地，因工作进行会谈，他总是那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局势愈紧张，他的工作态度愈镇静而坚定。我当时是奉命到南昌待命，而同他接洽转移组织关系的问题。握别时，他很亲切地对我说：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这是我同张太雷最后一次的会谈，他对人的态度是那

样和蔼可亲。他当时穿一件白布衬衣，下着一件旧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黄色旧皮鞋，蓬松的头发向后梳着，面色苍白显得清瘦，有点疲劳过度的神态。想不到我们别后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广州武装起义中他率领起义队伍同反动军阀黄琪翔、张发奎的部队进行巷战，壮烈地牺牲了。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和屠杀，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张太雷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宝贵生命，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九七八年八月

回忆马林

一、中共建党初期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

一九二〇年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有关人员联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① 来中国，到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

马林是荷兰人，早期即与第三国际有关系，曾奉第三国际之命在印度尼西亚搞工人运动，也在欧洲维也纳等地工作过，并参加过第三国际第二次全球共产国际会议，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奉第三国际之命，作为常驻中国代表。他在欧洲工作了两个月之后，才于一九二一年六月间动身来中国，据他的回忆不只一次提到莫斯科没有给他专门指示。据他来中国的实践来看，他这次来中国有两个重要任务：第一是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第二是要与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商讨如何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使命，并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连上海在内共有六个中国

① 据其它有关材料，尼克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编者注

共产党的支部，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点，只称中国共产党不称支部，其余各地党组织都称中国共产党支部，如北京支部、武汉支部、长沙支部、广州支部、济南支部，日本有两个党员也称支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称号，这是历史事实。约在七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我们在上海蒲柏路打铁浜租定博文女校三间楼房，为代表住所，但事实上住博文女校的代表只有张国焘、包惠僧、毛泽东、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我们在上海的机关部；陈公博住在东亚酒店；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住在旅馆里，因吃饭茶水方便；李达、李汉俊住在家里。博文女校不起伙，用茶水到老虎灶去打取。

我们开会的会场借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李汉俊家里。我们在上海开了四天会，第一天是马林作报告，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马林当时是四五十岁的年纪，高大身材，联鬓胡子，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从下午八时讲到夜一时结束。他是用英语作报告，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作翻译，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当时我们的党员人数约计不过三十余人①，除武汉支部有一个工人而外，其余都是知识分子。马林也指出，我们的党工人太少，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

第二天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各地代表作工作报告，也讲了各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我们的工作活动和自然环境等情况。

第三天也在原地、原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第一，讨论党纲，有些争论；第二，讨论劳动运动方案，也有争论。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我们当时发言很自

① 当时党员人数为五十七人。——编者注

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马林和尼克斯基第二三天都没有参加。第四天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马林和尼克斯基来了，刚宣布开会时，一个陌生的人进来把门帘子掀开，向我们会场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大家认识来人吗？都说不认识。马林说是个包打听，今天不能开会了，马上解散。我们大家一两分钟内，就从前门走了。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坐在那里聊天，一会儿巡捕房来了一大群包探、巡捕，把这间房子围住，一面问你们开什么会？一面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李汉俊说不是开会，是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在这里谈论写现代科学丛书的问题，他们才走了。

我们先出去的代表，不约而同地到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李达、王会悟也住在这里。张国焘要我去李汉俊那里看看，我内心也急切想知道一个究竟，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去，当走上楼梯时，李汉俊、陈公博正走出来看。李汉俊说，你们走了约十余分钟，巡捕房开了两部汽车来了一群人，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大概他们也知道这里是阿哥的住宅，我用法语跟那几个法国人解释了几句，他们就走了。但明天不能在这里开会，要改地方，你出去后也要注意，怕有人盯梢。我出来后，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才回到老渔阳里告诉大家。当时王会悟说可以到浙江嘉兴南湖，作为游湖去那里开会。经过大家考虑后，决定次晨到南湖尽一日之长，开完这个会。就请王会悟当向导办后勤，在南湖雇了一只大画舫，叫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这样我们就开会了。

这次会规模不大，人也不多，而在历史上的意义则很重大，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马林、尼克斯基来中国按照第三国际的方针，即列

宁的方针、政策建立起来的。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马林对中共工作的建议

“一大”以后，中共即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开展向工人群众进军的活动。接着马林建议要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的职务，回上海就任中共书记的职务。党中央商定派我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我即启程去广州，见了陈独秀，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同意马林的建议。这时他在广州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如许崇智、古应芬这些人有排外的特性，无政府党人如朱谦之、区声白等对我们肆意攻击。他也知道，对党的任务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但陈炯明诚意挽留他，他只好作为请假，先回上海，再设法辞职。

我在广州盘桓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同陈独秀一路回上海。我们先由广州乘火车到香港，住了两天后买船票回上海。到了上海，第二天马林与陈独秀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对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

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大概就是这一天，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我们五个人就在陈独秀家里被法租界会审公堂逮捕了。

三、陈独秀在家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和保释

我为马林与陈独秀的会谈很担心，也很着急，每天下午总要到陈独秀家里去打听消息。陈独秀与张太雷的谈话弄到不欢而散，我在思想上更加重了负担。

这以后，发生了陈独秀、杨明斋、高君曼（陈独秀夫人）、柯庆施和我，在陈独秀家中被捕的事。我们被捕之后，第二天会审公堂预审，陈独秀当时声明："既然是为我的事，一切责任由我负责，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家里还有孩子，请予释放。其余这三位是来看我的客人，也请予释放。"经法庭考虑，高君曼准予释放，其余三人，俟调查审理明白后再行处理。陈独秀和我们三人仍收监了。退堂以后，我们四人到牢房，陈独秀对我们说："马林给我的一封长信如果被搜出来的话，我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你们三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惠僧出去后仍回武汉工作，杨明斋仍当翻译工作，柯庆施还是去上学。"他并且说马林是个热情的人，他可能帮我们的忙。第三天下午，陈独秀被保释出去。我们三个人被关到第五天黄昏时，才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来办保释手续，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和钱都还给了我们。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我们在外面等了二十多天，法国会审公堂才开庭审讯。开庭之日，我们五名被告都到庭受审，巴和律师出庭为被告辩护。资本主义的政府，有钱能使鬼推磨，巴和律师花钱费力都做到了家，开庭时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后，特别问了陈独秀在广东的职务，回上海的情况，《新青年》杂志发行的情况，然后由巴和律师进行辩护，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前后共用了两个多钟头。

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四、马林与张太雷到广州转桂林访问孙中山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我奉中央之命到武汉，任武汉区党委书记，并兼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主任。有一天，接张太雷电报，要我到汉口怡和码头接船，到时我约陈潭秋一起去，约在下午三时左右，由上海开来的船到了，我们上船去见到张太雷与马林正在准备下船。张太雷对我说："我们不在武汉停留，我们马上过江乘粤汉铁路火车去广州。"我在上海时，便知道马林要访问孙中山，谈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此时粤汉铁路只通到长沙，长沙与韶关间还要步行或乘轿子，马林到长沙，没有通知毛泽东，他不知经过谁的联系与湖南劳工会的成员见了面，马林还给他们讲了两个钟头的阶级斗争。马林事前与孙中山有联系，孙中山此时正在调动可以调动的军队，如黄大伟的建国第一军、广西的刘震寰部及其他有关部队准备北伐。马林经广东韶关乘火车到广州，廖仲恺接待

了马林和张太雷。此时，陈炯明的部队全部在广州，马林的回忆录说他同陈炯明会见过好几次，这一次也可能见过陈炯明。此时，孙、陈之间就有分歧，孙中山调动军队北伐，没有动用陈炯明部队，由此可见一斑了。

廖仲恺招待马林，并派员送马林一行到桂林，马林和张太雷在桂林同孙中山一起盘桓了两个星期之久。张太雷单独与孙中山谈过中国青年问题，马林与孙中山主要是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当然也谈了国际形势及中苏的关系问题，后来马林回忆说：维经斯基是主张联合吴佩孚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而马林是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把中共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联合战线是抱试试看的态度，对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甚么可靠联合对象。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一派，李大钊到过洛阳与吴佩孚见过面，在李大钊的游说之后，吴佩孚发了一个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从"二七"工潮起，吴佩孚的原形毕露，"二七"罢工失败之后，我们和维经斯基联吴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

国共联合战线是马林一手搞成的。一九二二年九月间，马林曾由海路经过法国马赛回莫斯科一次，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马林同劳农俄国新任驻华大使越飞回到中国。后来马林回忆说，他安排越飞同孙中山见过面(可能是在上海)，完成了国共联合战线工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回俄国，鲍罗廷来中国途中和他在哈尔滨见过一面，以后国共联合战线问题就由鲍罗廷负责办理。

五、西湖会议的马林

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此时，马林专搞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没有参加"二大"。"二大"会议，是六个地区，每一个地区一个代表，加上中央三个委员共九个人。我本来准备去出席"二大"，因中央来信要我派个工人作代表去出席，当时

武汉区吸收了一个工人项德龙（即项英），他入党刚半年，我就派项德龙去出席。据项德龙回来说："开了三天会，谈了各地区工作的情况，也谈了国共联合战线问题，未作任何决定。为了安全措施，说要到西湖继续开，又说要等甚么人，会未开完就散了，可能还要再开。"约在八月初，马林回上海了，李大钊也来到上海，马林发起在西湖开一个中央扩大会议。据马林回忆，出席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湖南有个代表是学生，可能是夏曦。讨论过中央的宣传工作，决定《共产党》月刊暂停出版，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周刊，定名为《向导》，由陈独秀主编。另办一个理论刊物定名《前锋》，由瞿秋白负责。会议还决定联合战线的问题，共产党要派一部分同志参加国共联合战线工作。马林谈了国共联合战线与孙中山及廖仲恺等会谈的经过，谈了共产党仍保持独立，共产党的刊物仍照常发行，共产党除总书记外，其余人员视工作需要，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及政府的各项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保留共产党员的身分、地位等，名曰跨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办理国民党员的登记手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补足了中共"二大"未完的工作。

西湖会议结束后，马林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下旬由海道经过法国马赛回莫斯科。莫斯科此时正准备调马林回去，派越飞来中国任驻中华民国大使，仍派马林随越飞来中国工作。

孙中山此时正派汪精卫往来于奉天与广州之间，作为夹攻北京政府的准备。马林随越飞来中国之后，曾奉命到过沈阳一次，马林曾回忆过："维经斯基与赤塔远东局主张联吴，与孙中山在北伐前准备联张作霖，是同样的错误。"马林同越飞来中国，曾安排越飞与孙中山会谈，地点可能是上海。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正是国共联合战线开始之时，马林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中山仍然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但孙中山的革命方法始终

是专靠军事投机，搞上层人物的活动，不依靠劳苦大众，不依靠工农是其所短。一九二三年九月中，中共中央第三次调我回武汉任党的书记，负责整理党和工会工作。鲍罗廷来中国时，曾先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约北京区党委成员范鸿劼、包惠僧、安体诚、何孟雄、张昆弟、李大钊，好象还有罗章龙等，谈国共联合战线问题。鲍罗廷对孙中山的看法与马林差不多。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看法，总认为他说得多、做得少，他过分地重视军事投机，不信任工农群众的力量。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回莫斯科，据马林回忆说，他在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哈尔滨曾与鲍罗廷短暂地会谈过，他两人的见解是差不多的。

我见过不少的俄国人与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工作同志，我认为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一九二一年六月初来中国时，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国共联合战线虽以蒋介石背叛革命而告终，但在那五六年的国共联合中，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与斗争中学了不少的东西，锻炼了不少的人才。革命事业没有合作不能集中力量，没有斗争，不可能锻炼出如此众多的领导人物。马林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半，是有成绩的。据说马林回莫斯科之后被第三国际开除了，不知因何事故，我也感到遗憾！他以后回到荷兰，与荷兰革命战士一起被德国纳粹匪徒俘获，终于死在法西斯匪徒的集中营里，也是他的光荣，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也很感到悲哀和怀念！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时年八十六岁。

附：

我们的园地——沙滩

北京后门马神庙沙滩，是北京大学所在地。一九一九年震动全世界的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发动组织起来的，陈独秀、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等都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人物。由于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漫延到全国各大小城市，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凡是有志的青年学生，凡是反对礼教家庭封建社会的青年学生，固然是以考进北京大学读书为荣幸，就是没有钱没有其他条件进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志士，亦无不千方百计来到北京，有的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一年半载，有的同北京大学进步的师生发生联系，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在革命事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夏秋之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接着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先后成立了六个支部，北京支部成立最早，北方各省的新文化运动与革命工作的组织活动都由北京支部领导，所以北京方面的工作比较繁重，尤其是北京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我们的党中央在上海，而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所以我们在北京方面配备工作人员比较多，各省的工作同志往来于北京的也是络绎不绝。不过我们的党在当时是一个秘密的党，我们的同志，差不多都是穷苦的青年，我们到了北京谁也没钱住旅馆或公寓，我们都是到马神庙沙滩北大同学的宿舍内或是在沙滩附近的民房我们的同志包月的房间为栖息之所，我们在这里工作学习或者是遭到各地军警的迫害，来到这里避难的也颇不乏人。

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大学，民主与自由的气氛很高，学校当局对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甚么拘束。用功的学生当然是终日在课堂上图书馆里，研究室中忙得不亦乐乎，不用功的学生自由自在谈情说爱与游山玩景的也有，象我们的同志就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人，既要学习，更要工作，也有一两个同志搞恋爱活动，但是我们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放在工作上面，我们的生活还是严肃而清苦的。

一九二二年夏末秋初，我由武汉调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是住在北大第一宿舍范鸿劼的房间里，不久我结婚了，我们俩就在骑河楼斗鸡坑一个小公寓内租了一间房，三块半钱一个月的房租，床铺桌椅虽简单而完全，我们白天的活动都在沙滩，到了夜晚才回来睡觉。

北京大学第一宿舍对面的一个高坡上，我们租了三间民房，这算是我们的机关部。邓中夏住在这里，《先驱》的编辑部也在这里，各地因为工作来北京的同志也多半住在这里，一九二二年秋天蔡和森因公到北京时也住在这里，我同张昆弟、安体诚、何孟雄等先后在这里住过。这里是我们办公和接洽工作的地方，我们的集会多半是在北大第一院或是第三院的课堂里举行。

沙滩的中心地点即北大第一宿舍与第二宿舍的中间有几家饭铺。从外面看，非常简陋，可是它的饭菜价廉物美，几乎是样样俱全，如家常饼、馅饼、馒头、便饭、炒菜、燉鸡、燉肉，应有尽有。我们在那里吃一个莫须肉，一个豆腐汤，两碗大米饭两个馒头，一顿不到两毛钱，有时候我们邀三五个同志在那里大吃一顿，算账时听起来是几百吊，几千吊，付款时不到一块钱，北京人真算是说大话用小钱了。

我们在沙滩学习着、工作着、生活着、运动着，这其中发生了不少的悲欢离合的事情，锻炼出来不少惊天动地的人物，今天革命成功了，凭吊沙滩，怀念故人，真不胜今昔之感了！

自　传

我家世居湖北黄冈上巴河上包家畈社庙湾。先世以种田为业。我出生时家有稻田二十余亩，还有几块菜园，一直到解放时还有二十余亩地，土改时评为小土地经营，家中生活情况一直不好。我在外成家立业后，每年都寄点钱回家，供我的父母生活之需。所以我只是出生在这里，我同家里没有经济关系。

我的经历：我于一八九四年生在农村。一九一七年，我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在武昌教了半年书，后转为新闻记者。先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外勤记者，后兼写外埠各报通讯稿。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学生运动、劳动组合运动的工作。一九二一年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在广州工作。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国共建立联合战线，我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夏，我奉调到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参加讨伐滇桂军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一九二五年八月初，调任黄埔军校党军第三团党代表，参加过解散反动粤军许崇智、梁鸿楷等部二次东征战役，抵达潮梅后，调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未及到差，

改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选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党军第一师选出，时间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发动三月二十日事变，进行分裂国共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服从党的退让政策，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夏，国府准备出师北伐时，我出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广州大佛寺），后又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在国民党政府内）。同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派我为特派委员，陪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刘冀（号菊村）到前方会商军务。在同年九、十月间，北伐军抵达武汉，我们到达武汉同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见面后，奉命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旋奉命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奉命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奉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约在同年五月中旬，夏斗寅转师东下前夕，奉国府主席谭延闿之命，到沙市视察夏斗寅师。行至嘉鱼，夏斗寅已通电反对武汉中央政府。夏部将我扣押在嘉鱼县政府。五日，经过在电话上联系后，我才到蒲圻，与夏斗寅见面。他表示认错，愿戴罪立功。我在蒲圻打了一个电报给谭延闿、邓演达，我即由嘉鱼旧路回武汉。到武汉，我才知道夏斗寅取道崇阳、通城，由武穴过江逃往安徽去了，他对我的表示是缓兵之计。接着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恶化。至七月，国、共两党准备分家，共产党被迫拿起武器，才有"八一"南昌起义。

我约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

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当时，生活的情况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由一个湖南的朋友，搭上了贺耀祖的关系。军人有了钱、有了地位，总想搞政治，他想办报或办杂志。他请我们吃过几次饭，决定办一个杂志定名为《现代中国》，仍弹国共合作时的老调，出了十一期。贺因在政治上不大得意，遂将每月一千五百元的经费停止。我就这样过卖文生活，在上海混了三年半，就当了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参议。一九三一年因何成浚的拉拢，又因我同蒋介石在黄埔共过事，就当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野再回来后，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调我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三五年，参谋次长杨杰兼任防空委员会委员长，调我为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一九三六年转任文官，调任内政部参事，至一九四四年调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户政司扩编为人口局，我随着业务当了人口局局长。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迁广州，人口局又缩编为户政司，我当了一个多月的司长。第二次缩编时，我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我才直接打电报到北京，表示我的政治态度。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央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

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〇年，我在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全体会议决议，调我为国务院参事。我有十四个儿女，成立了九个，分在各机关、学校、矿山、农场工作，他们当中有两个党员，两个团员，还有两个是超龄团员，正在争取入党。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悼　词（摘录）

包惠僧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二十三时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包惠僧同志，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一九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一九二〇年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一九二一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毅然从澳门回到北京，一九五〇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内务部参事，从一九五七年四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包惠僧同志回到北京以后，三十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极参加各项工作和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孜孜不倦地撰写我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撰写他亲身经历的我党成立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他撰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回忆录，还撰写了《二七工潮始末》工人运动史资料等近百万字。特别是近年来，他不顾身患重病，频繁地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同志及外地来访的同志接谈，积极向他们提供有关革命历史情况，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

国共产党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文化大革命中，对包惠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当推倒，恢复名誉。

编 后 记

包惠僧同志生前响应党的号召，精心撰写了他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以及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片断回忆。

本书汇集了这些回忆录的主要部分。其中《回忆大革命时代》是他五十年代的遗稿，这次经整理第一次公开发表；《二七回忆录》于一九五七年曾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现在已不容易见到，这次也收入本书；其它回忆录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本书对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是有益的参考资料。作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撰写回忆录的，受到他本人的认识和经历的局限，在叙述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难免有不尽确切的地方，我们一律保持原貌，未作改动。在编辑工作中，只对内容重复处作了一些删节。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作者亲属谢缙云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二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包惠僧回忆录
作者=
页数=444
SS号=0
出版日期=